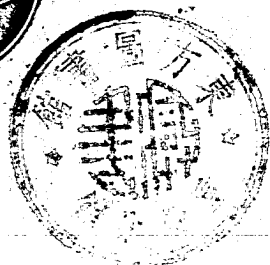


# 德國國社黨史

郝登著

林孟工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MG  
D751.664

33

林 孟 工 譯  
Conrad Heiden 著

漢譯  
界名著

德 國 社 黨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2173 8878 8

# 目錄

第一章 一九一九年	一
一 三種來源	一
二 被遺忘的發起人安頓特萊斯勒	四
三 德意志工人黨之保護人	九
四 希特勒之黯淡的過去	一三
五 追求政黨的軍人	一八
六 綱領	二二
七 進攻城市的兩個人	三三
八 褲子摺痕之爭論	三六
九 綱領之初次的修加	三九

十 有權勢者的援助.....	四〇
第二章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	四五
一 希特勒爲誰奮鬥呢.....	四五
二 新的鬭爭方法.....	四八
三 開始傳播恐怖的是誰.....	五一
四 希特勒之獲得機關報.....	五六
五 三千黨員.....	五八
六 外交政策之攻擊.....	六〇
七 俄國人的影響.....	六二
八 「法蘭西覺悟來吧」.....	六五
九 第一次怪會.....	六七
十 「領袖」.....	六九

十一 「處絞刑」.....	七二
十二 內部發生革命.....	七四
十三 特萊斯勒之與斯特萊轍聯合反對希特勒.....	七六
十四 希特勒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呢.....	七九
十五 希特勒之獲取國社黨的領導權.....	八一
<b>第二章 希特勒</b> .....	<b>八五</b>
一 出於本人心願之外的領袖.....	八五
二 造就上之悲劇.....	八八
三 「具有本能的人物」之故事.....	八九
四 毅力不足道腦筋有足稱.....	九三
五 低拙的預言家.....	九四
六 希特勒之誘人方法.....	九五

七 猶太主教們的陰謀·····	九八
八 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信念·····	一〇〇
九 奇異的神經衰弱·····	一〇一
十 犀利的外交辭令·····	一〇四
十一 信約·····	一〇六
十二 希特勒的外表·····	一〇八
十三 一個榜樣·····	一一二
十四 希特勒的演講體裁·····	一一五
十五 批評·····	一一八
第四章 一九二一年·····	一二一
一 挺進隊之組織·····	一二一
二 一九二〇年之巴伐尼亞軍隊的狀況·····	一二五

三	義勇軍之沒落·····	一二七
四	O. C.之變爲S. A.(挺進隊)·····	一二九
五	國社黨之精銳份子·····	一三二
六	什麼是社會主義·····	一三三
七	希特勒運動中之階級觀念·····	一三五
八	精銳份子之與羣衆對立·····	一三七
九	國社黨對於君主政體的態度·····	一四三
十	因估量敵人錯誤了而得到的勝利·····	一四五
十一	國社黨所遭遇的困難·····	一四六
十二	挺進隊之開火的嘗試·····	一四七
十三	慕尼黑永爲國社黨的活動中心·····	一五一
第五章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	一五五



- 一 P. P. 暴動.....一五五
- 二 羅姆與愛勃之不和.....一六〇
- 三 羣衆之趨向國社黨.....一六二
- 四 濫發紙幣時期之國社黨.....一六三
- 五 希特勒夢想資產階級的生活.....一六五
- 六 中等階級之國際的組織.....一六六
- 七 熱烈的愛國主義.....一七〇
- 八 鮑爾雪維克的誘惑.....一七二
- 九 南提羅爾之放棄.....一七三
- 十 國社黨與教堂的鬭爭.....一七五
- 十一 國社黨之被禁止集會.....一七七
- 十二 國防軍之上前線.....一八一

十三	特萊斯勒暈倒會場	一八四
十四	勝利與訂立條約	一八五
十五	羅姆組織不合法的軍隊	一八八
十六	國防軍之掣肘	一九〇
十七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的暴動	一九二
十八	希特勒之受人譽議	一九六
十九	希特勒之戰勝法庭	一九八
二十	富有誘惑性的建議	二〇〇
二十一	魯登道夫之捲入漩渦	二〇二
二十二	羅姆再爲希特勒取得權柄	二〇四
二十三	魯博烈黑特王子	二〇六
二十四	嘉爾之被任爲政府特派員	二〇七

二十五	慕尼黑之動員反抗柏林	二〇九
二十六	贈資者	二一二
二十七	「許多頭顱將在地上打滾」	二一七
二十八	國防軍軍部之不可解的人	二一九
二十九	羅梭之百分之五十一的把握	二二一
三十	希特勒之茫無頭緒	二二三
三十一	「安頓你會保守秘密嗎」	二二五
三十二	布格博羅酒店之一響槍聲	二二七
三十三	「明天不能戰勝便要死掉」	二二九
三十四	向柏林前進	二三二
三十五	陛下的先王	二三三
三十六	發誓	二三五

三十七	「我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呢」	二三六
三十八	動怒的將領們	二三八
三十九	被判罪者與抵押人	二三九
四十	太早了二十四個鐘頭的攻擊	二四一
四十一	佛力克謹慎的官僚	二四三
四十二	失機的魯登道夫	二四三
四十三	腓德赫恩廈的鬭爭	二四五
<b>第六章 一九二四年</b>		
一	希特勒有逃避之權嗎	二五一
二	國社黨屈膝於王子之前	二五三
三	希特勒想自殺	二五五
四	魯登道夫反對王朝與教堂	二五七

五 一個「擊鼓者」是什麼樣人.....	二六〇
六 魯登道夫的「心不在焉」.....	二六一
七 寬仁的判決.....	二六二
八 魯登道夫領導國社黨.....	二六四
九 斯特拉塞之出臺.....	二六八
十 羅姆組織新的隊伍.....	二七一
十一 困難時期.....	二七三
十二 從魯登道夫到黑爾德.....	二七五
第七章 一九二五年.....	二八一
一 新國社黨.....	二八一
二 國社主義的道德觀.....	二八四
三 希特勒巴伐尼亞政策之失敗.....	二八八

四	斯特拉塞之成爲障礙物	二九二
五	希特勒之與格拉夫宣戰	二九九
六	哈諾瓦之內訌	三〇〇
七	希特勒在政治上與在愛情上之不幸	三〇二
<b>第八章 一九二六年</b>		<b>三〇五</b>
一	希特勒之組織衝隊	三〇五
二	主人翁之反對奴隸	三〇九
三	斯特拉塞之被馴服	三一
四	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	三一五
五	埃塞之下臺	三一七
六	新的黨規	三一八
七	希特勒對德國經濟界的演講	三二四

八 斐佛之不堅決的獨立意志·····	三二六
九 戈培爾之被派往柏林·····	三二八
第九章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三三一
一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	三三一
二 爭奪柏林的激烈鬭爭·····	三四一
三 戈培爾之非法的行動·····	三四二
四 從右翼政黨來的生力軍·····	三四四
五 軍人維持費之浩繁·····	三四五
六 斯特拉塞之再度擡頭·····	三四七
七 選舉鬭爭之失敗·····	三四八
八 丁脫之被開除黨籍·····	三五〇
九 國社黨的改組·····	三五一

十 附屬的組織·····	三五二
第十章 一九二九年·····	三五七
一 柏林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	三五七
二 國社黨之躲避工人問題·····	三五九
三 農民宣傳·····	三六〇
四 資產者與無產者·····	三六四
五 斯特拉塞的社會理想·····	三六六
六 反對因果律的政黨·····	三六八
七 選舉人之蔑視·····	三六九
八 國社黨與國防軍之再度齟齬·····	三七〇
九 「施萊轍應上統刑臺」·····	三七三
第十一章 一九三〇年·····	二七七



一 共和政府之傾頹.....	三七七
二 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	三七九
三 國社黨之因胡根堡的援助而強大.....	三八一
四 同盟乎革命乎.....	三八三
五 挺進隊之叛變與斐佛之下臺.....	三八六
六 穆勒之坍塌與布魯寧之錯謬.....	三八八
七 打倒政治.....	三九〇
八 國社黨之藉「平民」的擁護而勝利.....	三九三
第十二章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	二九七
一 希特勒之站在反政府的地位.....	三九七
二 撲滅法蘭西.....	三九八
三 國社黨之放棄沒收「金融界各大王」的財產.....	四〇三

四	希特勒贊成罷工·····	四〇四
五	·····但同時安慰資本家·····	四〇五
六	領土之要求·····	四〇五
七	「聯英反俄」·····	四〇九
八	希特勒尊重法律之誓言·····	四一一
九	「砍下頭顱」·····	四一四
十	挺進隊之再度叛變·····	四一六
	<b>第十三章 德國政潮</b> ·····	<b>四一九</b>
一	德國德謨克拉西之虛構·····	四二一
二	斯特萊斯曼之徒勞無功的嘗試·····	四二三
三	布魯寧之虛有其表的權威·····	四二四
四	反對國社黨之各主教·····	四二七

五 共產黨之意志不堅決·····	四二九
第十四章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四三一
一 與登堡的左右·····	四三一
二 布魯寧向希特勒建議·····	四三三
三 最後的議會制內閣之傾覆·····	四三六
四 興登堡之排棄希特勒·····	四三九
五 希特勒之失掉好運氣·····	四四二
第十五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	四四七
一 國務總理施萊赫·····	四四七
二 挺進隊之募捐·····	四四九
三 格烈戈爾·斯特拉塞之脫離希特勒·····	四五一
四 希特勒之得到救援·····	四五五

五	施萊轍的大計劃·····	四五七
六	施萊轍之下臺·····	四五九
七	達到目的——希特勒任國務總理·····	四六四
<b>第十六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至三月五日·····</b>		<b>四六七</b>
一	中央黨之失掉機會·····	四六七
二	戈林之組織力量·····	四六九
三	「保護德意志人民」緊急條例·····	四七〇
四	戈林下令開槍·····	四七三
五	警察別動隊·····	四七三
六	共產黨的地窟·····	四七五
七	國會縱火案·····	四七八
八	「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	四九三

第十七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四九九

一 保守派之投降……………五〇〇

二 波斯丹紀念日……………五〇一

三 國會之屈伏……………五〇二

第十八章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七月……………五〇五

一 各邦「總督」之創設……………五〇五

二 普魯士的光榮……………五〇六

三 各政黨之消滅……………五〇九

四 國防軍各總督與挺進隊……………五一三

五 共和政治乎君主政治乎……………五一五

第十九章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五二七

一 國社黨之攫取工團……………五二七

二 農業政策·····	五一八
三 小商業政策·····	五一九
四 希特勒之放棄理論的「統一指揮」·····	五二〇
五 抵抗失業的鬭爭·····	五二一
六 猶太問題·····	五二三
七 革命的暴行·····	五二六
八 德國與國際·····	五二九
第二十章 結論·····	五二七
崇拜英雄的民族·····	五三七

# 德國國社黨史

## 第一章 一九一九年

### 一 三種來源

以學說而言，國社主義爲幾個理論家——大部份是北德意志人——所創造，產生於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

以生存的政治細胞而言，國社主義是從「德意志祖國」與「汎日耳曼同盟」之龐大的黨派演傳而來，而且繼承了一九一七年武力的併合主義之種種口號。他的獨立的存在是開始於一九一九年。

以政治的工具而言，國社主義爲慕尼黑國防軍所意構，而藉後者的援助，亞多爾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一個具有絕頂的智慧而又性情不固定的人物——與埃恩斯羅姆大尉 (Capitaine Ernst Röhm) 加以鍛冶。這是經過於一九二一年。

這個運動的名稱是導源於奧大利。牠是在遠反牠的現在的黨魁之意志下被採用着，而又不合於牠的真實的性質。在一九二〇年，牠受了命名的典禮，然而在那個時候，由德國革命所傳佈的社會主義已開始不合時宜。必然的，對這個名稱認真的黨員此後須脫離本黨了。

爲着了運動之劇烈的發展，學理的綱領不能與實際的施行相雜於圓滿的關係裏面。刻板的形式不易成爲政治的利器，後者不但須在鬭爭中愈接愈厲，且須能夠撓而不折。

國社主義的綱領之不存在——著名的二十五項不算是牠的領袖們所認真看的綱領——實有甚於一種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懶於想像的事實所鼓勵之單純的機會主義。這是基於經驗所示，一個政黨從牠的挺進裏而不從牠的目標裏吸取了牠的力量，黨員則聽命於領袖們又過於聽命於黨綱。確然的，我們在這一點上，是遇到一種神授的宿命論了。國社主義者在這裏，像在許多其他的問題上面，實自附於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學派。不過，馬克思派們想將情緒熱烈的與盲目的政



治擡高到「科學」的地位，而比他們聰明多了的國社主義者則視政治還是政治，他們允許人民在爲生存而奮鬥裏保留着建議權，但凡是關於命令、組織以及目標的選擇，他們認爲屬於中央特權的，就都抓住不放。在國社運動裏面，凡是關於個人的，都可自由行動。反之，凡是關於黨之組織的行動，卻都爲領袖們所保留着。

爲人們所最重視的而又爲國社主義所特有的，那便是鬭爭的方法了。反之，所有五花八門的政治學說都可以在黨中表現着：從最反動的專制主義以至於最嚴酷的革命的思想，從最放任的個人主義以至於絕對否認個性的最嚴格的社會主義。黨對於政治的理論是非常自由的。希特勒允許每一個人懷着，在他成爲國社黨黨員後，將要達到各人所切望的目標的幻想。他所要的代價，是每個黨徒服從他的領袖的權威。這樣地，纔能擁合一個個人主義之碩大無朋的隊伍，而在其中，每一個人都自謂是向着他的，他個人的，目標前進。然而，到那一天，大家都發覺沒有一個人達到目標的，那時候將有如何變化呢？

## 一 被遺忘的發起人安頓特萊斯勒

國社黨之好幾種重要的性質是導源於牠本身所從來的一個小政黨，這個小政黨成立於慕尼黑，其始是二十幾個平民所組織的，他們聚會於小酒店座中，辯論國事，習以為常。可是在眼前的運動裏面，這些原始之創辦人的踪跡是不多見了，而且在那裏面，他們絕無扮演重要的腳色。

這個原始的政黨，名為「德意志工人黨」，成立於希特勒出場之前，牠的領袖名為安頓·特萊斯勒（Anton Drexler）。特萊斯勒為一個平凡的機器工人，他或許僅是缺少充份的智識之培養，以使他可以達到顯揚的地步。他很努力攫取思想與思想之表現。可是，我們知道的，這種從辛苦艱難得到的智識，必是成為最堅強不過的。這個身體不健全并為徵兵委員會所廢黜的工人，視他從書本上所得到的見解是像鐵一般結實的，而且看作與科學一樣。於是信仰使他蒙昧了他所從事的工作之種種困難。特萊斯勒將這兩種特殊的性格：書本上教訓之過信與對自身之天真的信賴，傳與他之將來的同黨：希特勒；而希特勒卻更有甚於為今日他所不復認識的平凡의 同伴了。當然

的，希特勒，從人家所傳授給他的，利用到完全出了贈與者意料之外的程度。特萊斯勒後來與希特勒發生破裂，因為他覺得後者之驚人的發展是對於他的主張很不利的。

在特萊斯勒與希特勒兩個人的生活之間，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是，屬於第一號黨員（指特萊斯勒）的是偶然的且是有限的，而第七號黨員（指希特勒）則具有賤博的并且偉大的特性。特萊斯勒以年青的工人，與希特勒一樣，同一團發生糾紛；他痛恨工團傳播恐怖使他失業，且迫他進下等舞場彈琴以維持生活。可是，也與希特勒一樣，對外政治最使他感覺興趣。

一九一八年年頭，在布勒門城成立了一個討論德國的公正和平的工人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代表了十萬會員左右的意見。特萊斯勒便領導一個具有四十個會員的地方小支會。這便是一個小團體，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充當了國社主義的運動之真正的權輿。

特萊斯勒構想——固然祇有一半是出於有意的——組織一個鬭爭的勞動黨，後者不但將牠的運命建築於國家的軍事勝利上面，並且也要建築於對領袖的命令之絕對服從上面。一九一八年，他在會上曾宣稱：我們應該讓最高軍事機關去決定和平的方式，牠是可以與以無限制的信

任的。以一個受過無多教育的人，在一個公開的會場裏面，解釋「反猶太主義」這一個名詞在德文是什麼意義，這實是一種可嘉的謙遜。可是，這種謙遜，牠也一樣，成爲將來之黨的基礎之一。

特萊斯勒想將工人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合爲一體，因此，他有了一個「生產的」國家之意識。勞動的德意志是被貪慾無厭的西方列強所犧牲了。一九一八年秋天，在他藉其本身的政黨與「德意志祖國」的援助而開的一個會裏面，他喊道：「資產者們，勞動者們，你們聯合起來！」

但是，他並不會離開他之同階級的伴友們。一九一八年，他復進他們的工團裏面。他簡直是一個奇異的同伴了！當他起來公開反對「有組織的職工之低賤」時候，以手藝自豪的他，遂攻擊了解其自身的階級之無產者了。他對於工團所倡導的工資政策的見解，是以爲「中產階級，民族的智慧以及小規模的企業，都被工人們所摧殘了。」說這種話的人，當然是夢想着工人可以高陞到小資產甚而至於大資產的階級的地位，並且他寧可喜歡一羣獨立之人 (self-made men)，而不願意有一個有組織的并有連帶性的勞動的階級。

這種思想，最初是從那一個政治領袖來的呢？韋爾脫拉德羅 (Walter Rathenau) 這個猶太

貴族便是國社主義者所仿效而不盡的仇敵。他之精細的格言，一到了國社主義的工人手裏，卻變爲轟炸的材料了。「世界革命與宣戰同時開始；牠之真正的目的——固然是在無意中的——是使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施行立憲制與財閥政治制之下，替代了舊有之封建的統治階級。」拉羅這樣地說着，帶着了憤世嫉俗與愁悶鬱結相混合的態度。祇要特萊斯勒重述這一句話，他就可拿做一種洩忿的呼聲了。拉德羅會說過，將有三百人掌握世界經濟之主人翁的地位的日子。在十多年之中，這一句名言便成爲國社主義者之鬪爭的口號，並且遍載於他們的廣告他們的報紙上面；任何一種的宣傳，再也不能找到更動人的公式。狄斯累利 (Disraeli) 有一句名言：種族問題爲世界歷史之鎖鑰。這一句話，到了國社主義者手裏，也遇到同樣的運命。托洛斯基是爲資本主義所收買了嗎？特萊斯勒不敢絕對地斷定；但是，經過幾年之後，戈培爾 (Goebbels) 與羅森培 (Rosenberg) 還十三分嚴重的爭論這個問題。他以為，無論如何，許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實是祕密結社的社員，這便是說：馬孟 (Mannion) (拜金之神) 的奴。僕前進報 (Vorwärts) (社會黨機關報) 在任何問題上不是與佛蘭克福日報 (Frankfurter Zeitung) 取同樣的論調嗎？在特萊斯勒看去，這

便可證明前進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并不是真確的了。這些推論不是屬於淺狹之見嗎？然而我們所趨向的時代，是重怨恨而不重思想的。

照上面所說的——雖然說得很簡單——我們可以得到所有國社主義的教育材料了。再進一步說，特萊斯勒本身，站在人與同志上面，也做了希特勒的材料。無疑的，德意志工人黨若是老跟着特萊斯勒走，牠將永為一羣小酒店裏的老主顧。然而，沒有特萊斯勒，這個政黨就不會存在，而希特萊將要從旁的方面去找他的學說之出發點了。

特萊斯勒的際遇，是一個真正的發明家的際遇。在一九二一年，希特勒使他事實上離開黨的指導機關——他在那時候為管理財政的領袖。名義上，他為一個政黨之安分的名譽總理——黨那時已得到很重要的地位——他仍在慕尼黑那些鐵路工廠裏面充當普通的工人，一直到那一天，被狂暴的同伴們指為「反動者」，遭受他們用鐵桿毒毆并被逼離開了他的職務。這是經過於一九二三年年頭，被希特勒所完全排擠之後，他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暴動之牽連，與希特勒一同下臺。他當了巴伐尼亞邦議會之民族派議員到一九三八年以後，他就在政治舞臺上銷聲滅跡。

了。

### 三 德意志工人黨之保護人

「公正和平工人委員會」因為德國革命成功遂無所施其任務。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特萊斯勒將他的團體改組爲「德意志工人黨」，黨總理爲新聞記者加爾哈雷(Karl Harter)。這個「政黨」共有四十個黨員；可是，牠也覺得有選出六個人組織政治委員會之必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黨的政治地位到了發展的時期，固然是極有限的發展；共產主義的共和政府在慕尼黑被推翻了，并由社會黨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出來替代。在這個聯合政府裏面，事實上是軍人們當權。他們的心裏還踴躍着對於他們所認爲勝利的四年戰爭的驕傲，對於斷送國運的忿懣，以及對於賣國的痛恨。在軍人們看去，所有資產階級的政黨，是都已筋疲力盡而且腐化了。其中唯一的部份，那個小政黨，是爲着要求「公正的和平」而組織的。像「德意志祖國」那樣強有力的政黨，也忍痛接受停戰之事實，并且自己解散了。在其他大政黨看去，戰爭是已經結束了。然而

軍隊卻不以爲然，德意志工人黨也不以爲然。便是爲着這個原因，軍隊與德意志工人黨互相接近，而從這一種的接近，於是產生希特勒運動。

在那個時候，德國是遍佈着義勇隊：如愛拉爾特（Ehrhardt）旅團，如波羅的地方軍，如黑特伯克（Heydebreck）騎兵團，如斐佛（Pfefer）、羅斯巴克（Rosback）、羅溫斐爾（Lowenfeld）、魯梭（Lutzw）、里區施拉（Lichtsclag）、錢戈（Chiemgau）、奧伯蘭（Oberland）、愛勃（Epp）等等義勇隊。不久之後，便成立了這些團體之中最強大的一個團體：「巴伐尼亞義勇軍」（Bayrische Einwohnerwehr），從後面這一個團體產生出「愛區里黑組織」（Organisation Escherich）（簡稱爲奧爾格區 Orgesch），後者的支部遍佈於全德國境內。隨後幾年之中，所有這些團體對於國社黨都有了頭一批的徒衆之供給。

一九一九年，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加入這個小政黨，對於後者的前途將有決定命運之重要性：這參加者乃是來自愛勃義勇隊的羅姆大尉。羅姆是一個勇敢的軍人，而究竟不過是一個軍人，他以過戰場的生活爲他的要素，曾經好幾次受傷，始終是不忘情於戰爭。他在革命後，極力鼓起勇氣；



他說：「我在事實上似乎不屬於這個民族了，我祇記着我將會屬於德國軍隊的。」其實，羅姆將這句話放在他的一個同伴的口裏說出，可是這種話實表現出羅姆本人的思想。他對於許多軍官懷着強烈的厭惡。照他所述，那些軍官裏面有幾個人，在戰時的行動是可以煽動十幾次叛變的。可是他懂得指揮軍隊，他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他憑着情緒來做政治的活動，也憑着情緒而入迷途。他說：「我以軍人的眼光來觀察世界。我是存心偏袒的。」

羅姆是德意志工人黨之第六十號黨員；他為黨引來了好幾個國防軍裏的同伴，軍官以及士兵。這樣，自然有必然的趨向了。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國防軍與警察便成為國社主義運動的骨幹。

在那個時候，德意志工人黨已經得到兩個來自資產階級的保護者：著作家迭特力區愛加爾（Dieterich Eckart）與工程師戈特斐力特費德（Gottfried Feder）。愛加爾曾經充當雪爾（Scherl）之地方新聞報（Lokalanzeiger）編輯；他曾寫了幾部劇本，譯了皮爾金特（Peer Gynt）的作品。革命的弱點，尤其是巴伐尼亞共產主義共和國的弱點，激動他的興趣。他辦了一小張的 Auf gut Deutsch 諷刺報；這張報以粗俗的幽默口吻，但也以巧妙的新聞記者之反猶太主義的

論調，暴露敵人的弱點。最初，他與德意志工人黨的關係是彼此心照的。他的全副精神是注在他於一九一九年五月所組織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同盟」的計劃上面。

「工廠裏的工人果然不是資產者嗎！」在他的宣言裏面，他大聲疾呼地說：「我們要回復到單純的地位，我們要回復到德意志人的地位。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唯有屬於德意志血統的人纔可佔據行使威權的地位。」這個資產階級的同盟，當愛加爾相信牠是已經存在了之前，是已成立了有些時候：這便是德意志工人黨了。

在這個時期裏面，費德便給與德意志工人黨以科學的學理之外表。費德會長時期做過土木工程承攬者，在外國做過工作。一九一八年，有了三十五歲的年紀，他忽然奇想天開，發現了「廢除利息奴隸制」的原則；他用一夜的工夫起草一個條陳，將它獻與巴伐尼亞政府，他并很有把握地期待答覆。當然的，對方婉辭謝絕了。從此之後，他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一個「被拒絕者」爲着實現他的理想而奮鬥。在受他的影響之下，德意志工人黨便開始製定綱領。主要的幾點是：土地權最後歸於國有；禁止私人間之土地買賣，羅馬系的民法改爲德意志系的民法，銀行國有，「無期的利

息」改爲分期償還本金。對於猶太人的待遇還是相當溫和的；他們不得充當法官，充當教員，也不得充當德意志人民的首領，但得從他們同類裏面選舉出席國會的議員。這是對於將來而言的。關於眼前的呢？我們所要求的可以包括於其他左派政黨的範圍裏面，無須在這裏標明出來。」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德意志工人黨的機關報，慕尼黑觀察報（Minchener Beobachter）（後來改名爲人民觀察報 Volkische Beobachter）便是照這樣的將原文公布。

是的，在那個時候，德意志工人黨還是屬於「左派政黨」的。那時確有着哈雷——有分寸的新聞記者——與指甲還染著無產者之鐵屑色的特萊斯勒。至於費德呢，他並不是一個能將這麼小的隊伍拉上新路徑去的領袖。

然而希特勒之加入政治還是受費德之賜的呢。

#### 四 希特勒之黯淡的過去

亞多爾夫希特勒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布羅諾（Braunau），他的父親曾在這個地

方充當奧國稅關關吏。關於他之少年時代的材料，只有他自己所著的我的奮鬥史（Mein Kampf）一書可以參攷，不過這本書裏面有許多不清晰的地方。希特勒的祖先爲瓦德維爾而泰爾（Waldviertel）地方之小農。這個地方是上奧大利之一個隱僻而又貧瘠的區域，充滿着羅曼提克的景色，過去曾經過好幾次農民革命與宗教戰爭，可是很早已信奉天主教了。希特勒的父親最初是鞋匠，經過多年之生活上艱苦的奮鬥，乃做到了官吏。這種堅忍卓絕的精神，有的地方是傳到他的兒子身上。

希特勒最初是在巴梭（Passau）——屬於巴伐尼亞，其後是在林斯（Linz）——屬於奧大利，過他的童年時代。有一個傾向於汎日耳曼主義的教師對他灌輸了虛偽的歷史概念，將世界歷史作爲日耳曼英雄之紀功文字似的講給他聽。這樣，便使希特勒永遠得到偏見的精神之培養了。

在十六歲那一年，希特勒失掉他的父母，并且自己幾乎死於很嚴重的肺病裏面，他在學校裏考試落第，於是在家裏閒住了兩年。在他的自傳裏面，他對此並沒有加以掩飾。據他自己說，學校考試之失敗是由於他夢想成爲畫家。可是，要實現他的理想，他又缺乏天資。維也納美術學校校長很

無情地對他這樣說。固然他確有相當之繪畫的天才，然而，要進建築學校去，他是缺乏了很深造的科學之根柢。

不久之後，他缺乏金錢以繼續他的學業。不管做什麼，他必須勞動。因此，他在維也納充當工匠的助手。昨天呢，他還是美術學校的學生，藝術家。今天呢，他變成了泥工徒弟。他從他的父親傳下來階級的自尊心理。雖然命運迫他到這種地步，可是他尙是矜持而不甘自棄的，這便是說，他不願意淪爲「無產者」在他的眼光看去，這是有重大關係的。

在學理方面，希特勒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可是，在實際方面，他對於人生還有不懂的地方。他所遭遇之個人的頭一次經驗，便是關於勞動者們彼此相牽繫的連帶性。他的同伴們強迫他加入他們的工會。很堅決地，他不願意與「無產者們」同其命運。「我的衣服還是整齊的，」他說：「我的談吐還是不俗的，我的態度還是謹慎的。我從事勞動無非是爲着維持生活，爲着繼續發展我的智識，即使只能緩緩地發展。我將絕不憂慮到包圍我者，假使……」是的，假使包圍他的人沒有憂慮到他身上，而且沒有強迫他與擁護勞動者的權利之組織合作。

希特勒切實地回答道：「他不能夠也不願意與『反對一切』的人們做同志；他們把國家看作資本階級的一個創製品；把祖國看作在資產階級手裏用以剝削勞動者的一個工具；把法律看作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方法；把學校看作養成奴隸的中心；把道德看作一種愚昧的綿羊式的耐性。」

他拒絕參加的結果是被他的同伴趕出工場。反馬克思主義因此在他的心裏面長出萌芽了。在二十歲前後，希特勒改換他的職業，而學習建築學圖案。關於政治方面，他是站在觀察者之地位的；或許在那時候，政治不是他之主要的關心所在。他在林斯學校時候，已經有信仰「大德意志」與厭惡多腦河流域的君主國（奧國）之培育了。

在這個雜處着日耳曼，斯拉夫，馬札兒，羅馬尼亞各種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都城（維也納）裏面，種族問題當然要鑽進希特勒的心裏面去。爲着在維也納有許多猶太人，因此，反猶太的運動在那邊佔了優勢。維也納市長加爾魯格博士（Dr. Karl Langer）社會基督教黨之一個領袖，是反猶太運動的勇士。希特勒受了他極大的影響，其程度是遠過於那時已經存在的奧國國社黨人們

所影響他的。在那時候，希特勒與後者們尙是毫無接觸的。然而，魯格是想利用宗教來同化猶太人，希特勒卻是不然的，他乃是基於人類學觀念的反猶太運動者，在他看去，種族是包括一切問題的。至於信仰則不能算做什麼的。而所有這種地方，照希特勒自己所說，是在維也納時候萌芽出來的。當他離開維也納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堅決的反猶太運動者，這是很可能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不見得他已經是一個存心的反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一二年，希特勒僑居慕尼黑。他自稱為建築圖案家。但實際上他是做房屋油漆工以度日的。他覺得在慕尼黑比較在維也納舒服。我們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他厭惡維也納。慕尼黑成爲他之繼承來的祖國。奧國徵兵委員會將他除名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中間，他以志願兵的資格加入巴伐尼亞第十六預備隊。這一批軍隊在戰時受了特別重大的損失。我們不管那些辯論者所爭論關於希特勒在戰陣上的行爲。我們只須說到他曾得了一個鐵質獎章，這種勳章原是極少頒給一個尋常之伍長的。他曾經兩次受傷。不過，我們總覺得有可奇異的地方，他爲什麼緣故不能昇級，而他之無可非議的領袖的性格，何以不能夠應付這個環境，何況這個環境是完全可以使他容易扮演這

個腳色的。一九一六年，他拒絕被派往奧國軍隊服役。在戰事快結束的時候，他幾乎爲着中了危險的毒氣而失明。這是有生以來之第二次，他的身體受了病魔之極嚴重的戕害。他的智力曾經衰弱，歇斯的理病象曾經出現。

希特勒在他之駐紮於特羅斯登 (Traustein) 的預備隊裏過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時期中，他重進於他之駐在慕尼黑的軍隊。有人說他在那個時候曾對接近他的人說，他願意加入多數的社會黨。如果這是的確的話，他必是爲着策略上的作用，而不是由於信仰上的作用。在許多人看去，多數的社會黨那時是帶着右派政黨的色彩，很久牠已經失掉牠之戰前的原來面目，而又還未取得新的面目呢。

## 五 追求政黨的軍人

在國防軍與義勇隊收復了慕尼黑之後，希特勒在步兵第二旅裏面做了人們所不都感覺興趣的活動。他是處分革命陰謀預審委員會的一份子，而且擔任起草公訴狀。他以置失敗的敵人於



死地而感覺愉快。至於後來他之必須以斫頭手段壓迫他的政敵，這實是他已經在步兵第二旅裏開始下手了。

他曾在國防軍所組織的政治訓練班聽講，一九一九年六月，他聽到費德的一篇演講。這一篇演講曾使希特勒十分感覺興趣。這些反革命的軍人們不以僅僅做了軍人便可以滿足；他們想組織一個政黨。希特勒便以費德的主張作爲他自己的意思，他於是成爲這些軍人們的發言人。生產的資本與投機的資本的學說也影響到了希特勒的長官，治爾（Gehr）指揮官。

希特勒在軍隊裏面開辦一個反猶太運動的辯論會；他的長官們，在參加這個會後，覺得他可以在慕尼黑的旅部裏充當一個優良的政治教導官（Bildungsleiter）。這種政治教導官的任務，是在軍隊裏面演講，是要引導軍隊「恢復國家的和愛國的思想與觀念」。希特勒於是利用這個機會以練習演講家的技術，並以恢復他之被毒氣所嚴重損壞的聲腔；那時候的聽講者中，有許多後來是加入他的政黨的。

不久之後，他與費德結交，費德乃是德意志工人黨的老板之一。雙方的聯絡於是建立起來。其

在希特勒身上，國防軍軍官之追求一個能夠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的政黨，或是說，他們之企圖利用一個政黨以做政治活動，現在能夠如願以償了。

在一家酒店後廳裏面，希特勒頭一次參加德意志工人黨的聚會。憑着他的性格，他壓服了聽衆；在反對巴伐尼亞分離黨的爭論當中，他制伏了他的對手。特萊斯勒請他入黨。希特勒便與以接受，他於是做了政治委員會之第七號委員（不是第七號黨員，黨在那個時候已經得到很多的參加者）。這是經過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可是，隨後還有九個月之久，希特勒仍留在國防軍裏面服務，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那時候，他已被目爲有名的演講家，活動者和取媚羣衆的人了，而他仍向國防軍領取薪餉。他之黨中同志，是那些人們覺得在幾個問題上聽命於整千成萬的黨員是不如在一切問題上聽命於政治委員會之七個委員的。這種排除一切行動的情緒，是天造地設的。希特勒來統治了。希特勒開始便自領黨的宣傳部。由他來決定舉行公開集會的日期、地點與提出討論的問題。關於其他更重要的問題，譬如說黨的圖戳應該是圓的或是方的，他卻讓給他的同事去決定了。

然而，這種分權的辦法，即在開始時候，就不見是圓滿的。一九一九那個年頭，充滿着委員會委員之間彼此極激烈的與極滑稽的對立。比方說，領袖哈雷就不肯承認第七號委員有演講家的天才。據他看，希特勒之有相當的才幹是無疑問的，但是，說到演講家，他將永遠不是的；而希特勒頭一次演講的成功并不會使哈雷改變他的意見。一九一九年十月，在希特勒對着百多個的聽衆作頭一次公開演講後，哈雷就繼他登臺，請聽衆當心提防一種「徒事叫囂之反猶太運動」。

希特勒之第一篇公開演講的題目名爲「布萊斯脫——立托斯克 (Brest-Litovsk) 與凡爾賽 (註)」。這個題目乃是德國國防軍心目中之真正的題目，猶同布萊斯脫——立托斯克條約是德國軍人心目中的一種真正的和平。希特勒是企圖，或是奉着命令而來，消滅將凡爾賽條約認爲逼訂布萊斯脫——立托斯克條約之應有的責罰之見解。所以黨之頭一次公開宣言便是說到外交政策上面。以個人而言，希特勒在那個時候所反復糾纏於心中的是關於利息奴隸制與猶太人勢力之種種問題。可是，黨須首先做了對外政治之一個工具。

特萊斯勒所曾有的意構，也是傾向於這個同樣的意義；他呢，是完全倚靠於軍隊的領袖們。軍

隊之最高指導機關是不存在了，然而運動本身的性質卻是存在着；一個工人運動不是爲勞動者的利益着想的，而乃是爲「國家」的利益着想的。但是，這個「國家」是存在於國防軍軍官——如愛勃與羅姆等等——的營盤裏；他們聚精會神追隨他們的後進希特勒充當經營政治的開路先鋒。

（註）譯者按，布萊斯特——立托斯克爲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德國與鮑爾次維克的俄國簽訂講和條約之所在地。

## 六 綱領

「我們要成爲七十人呢，或是七千人呢？」這一個問題，仗着希特勒不斷的努力，成爲政治委員會之主要的任務。希特勒已經理會宣傳是應該怎樣做：向羣衆活動，集中努力於少數的要點之不斷的提起，活動須有強固的堅持，等候成功須有絕大的忍耐。他有着準確的觀察，但他不易使委員會裏面同事信從他的見解。因此，他必須在會中堅苦奮鬥，而奮鬥的結果是使哈雷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引退。

在這個時期當中，黨找得一個新老板，一個醫生，若翰丁斐德博士 (Dr. Johannes Dingelder)。丁斐德曾用日曼律斯亞格力可拉 (Germanus Agricola) 假名在民族派機關報裏面寫文章。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霍夫博羅 (Hofbrau) 酒店所開之有紀念價值的會中，這是他而不是希特勒，充當主要的演講者。黨的綱領便是在這一次會中公布出來。

希特勒在他的日記裏面，對於這一次開會的情形，會有極偏袒的記述。富有抵抗力的一段而且為聽衆所靜聆的，乃是丁斐德的演講。希特勒和特萊斯勒與費德起草包含二十五項的綱領，希特勒於敵人們嬉笑怒罵之中宣讀出來。二十五項於是為大衆所共知，但沒有人與以注意。人民觀察報便不曾談起。會中焦點卻為通過關於供給猶太人製造無酵麪包用的麵粉之抗議。

說我們不曾見過「國社黨」的綱領，但祇見過「德意志工人黨」的綱領，這實不是過言的。因為公布綱領的時候，還是用着德意志工人黨的名義。(希特勒本人或會比較願意他的政黨採取「社會革命黨」的名目。)

我們對於二十五項的綱領是不能根據牠的字面的，即以宣傳的工具而論，牠也不會得到如

費德與特萊斯勒所期望的功效。可是，爲着牠是表現着黨的精神緣故，我們不能與以忽視。下面是綱領的原文：

「德意志工人黨的綱領是暫時的綱領。牠的領袖們在本綱領所規定的目標達到之後，不能基於大眾的不滿，僅以本黨能繼續存在爲目的，提出新的目標。

第一條 我們要促進全體日耳曼人，根據民族自決權，聯合成爲唯一的大日耳曼。

第二條 我們要使德意志享受與其他國家平等的權利。凡爾賽條約與聖日耳曼條約必須廢除。

第三條 我們要求土地與領域（殖民地）以供給我們的國民，并使我們的過剩人口有向外移植之可能。

第四條 凡屬我們的「同類」（*Volkgenosse*），方有公民的資格。凡屬日耳曼血統的，不問其信仰如何，方是我們的同類。猶太人絕不是我們的同類。

第五條 凡不具公民資格的人等，僅得以客籍名義住居德意志境內，并須受管理外僑的

法規管轄。

第六條 凡具有公民資格者，方有決定國家的行動與製定法律之權。因之，我們要求中央政府或各邦與各縣之公共職務，不論其性質如何，祇許具有公民資格者充任之。

我們反對行賄的議會政治制與不顧才能與德性而以政黨中人攘據權位之壟斷制。

第七條 我們要使國家以保證公民的工作及其生存方法為牠之首要的任務。國家如遇不能養活全部人口的時候，牠應將異族的人民（非公民者）驅出德意志國境。

第八條 禁止非日耳曼的民族從新入國。對於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後移入德意志之非日耳曼的民族，我們要求迫其立刻出境。

第九條 凡屬公民，均享受同等的權利，負擔同等的義務。

第十條 公民之第一義務，為須擔任勞心的或勞力的工作。個人的活動不得損害全體的利益，但須在全體範圍內發展，而且為公共的利益服務。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要求下列各項：

第十一條 廢除非由勞動與努力而來的收入。

打破利潤奴隸制。

第十二條 一切戰爭必與人民以血與金錢之可驚的犧牲，凡個人之因戰爭而致富，應視同損害人民的犯罪行為。因此，我們要求全部沒收所有在戰時獲得的利益。

第十三條 我們要求將一切已經存在的托辣斯收為國有。

第十四條 在大規模的企業裏面，我們要求採用僱人分沾利潤制。

第十五條 我們要求全部改組救濟老年的機關。

第十六條 我們要求建立健全的中等階級并維持牠的存在；立刻將大百貨店收為公有，而以低廉的租費租給小經營者；對於小企業，應由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極力照顧以維持之。

第十七條 我們要求實現適合於民族需要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制定法規，藉以實行以公共的利益為目的之無償徵用土地，廢除土地租金與禁止以土地為目的的物的投機。



第十八條 我們要以嚴厲的鬭爭對付會做損害公共利益之行爲的人們。凡是犯了損害人民之罪惡的，如高利貸者，投機者等等，應不信仰不分種族一律處以死刑。

第十九條 我們要求以德意志的法律替代主持世界之唯物觀的組織之羅馬法。

第二十條 爲着使一切有能力而且勤奮的德意志人得受高等教育，并可取得居於領導地位的職務起見，我們要求全部改革現行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機關的課程，應當適合實際生活的需要。一到兒童的智識啓發時候，國家的觀念即應深入學校（公民教育）。凡是特別有天才的窮寒兒童，不問其父母的社會環境與職業情形如何，應由國家與以免費而負培育的責任。

第二十一條 國家爲注重衛生起見，應保護母性與兒童，禁止童年勞動，創辦強迫的運動與體操，補助一切從事青年體育的團體。

第二十二條 我們要求廢除傭兵制度，而成立國民兵役制度。

第二十三條 關於對付故意的政治造謠及其在新聞紙上流布，我們要求合法的鬭爭權。

爲使德意志的新聞機關能夠成立起見，我們要求：

(a) 一切用德意志文字出版的新聞紙，其經理與合辦人應屬於日耳曼血統；

(b) 一切非德意志的新聞紙，須在國家許可之下，方得發行。此種新聞紙不得用德意志文字出版；

(c) 凡是非德意志人而在德意志的新聞紙有財政上的參加，或企圖使德意志的新聞紙受其影響，應受封閉報社與驅逐非德意志人的犯者出境的處分。

傷風敗俗的新聞紙應一律禁止發行。關於對付使我們人民發生風化影響的藝術與文學運動，我們要求合法的鬭爭權；違犯上述規定的機關應與以封閉處分。

第二十四條 關於國內一切宗教的信仰，在其不危害國家的生存及不與日耳曼民族的倫理情感與風俗相抵觸的範圍內，我們要求保障牠的自由。

本黨，以牠之本身而言，是維持實驗的基督教的立場，並不與任何特殊的信仰發生關係，本黨，不論在內心或在外形，均以攻擊猶太人的唯物思想爲意志，而且牠確信對人民施行持

久的治療祇有依據內心的意志與站在下面的原則上，公共的利益是先於私人的利益。

第二十五條 爲求實現上述主張起見，我們要求在德國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中央議會應在全德國境內具有絕對的權威。

爲求實現施行中央政府所頒布於各邦的法律起見，應建設職業議院。

本黨諸領袖宣誓爲求實現上述各項主張而奮鬥，必要時，他們不辭犧牲自己的生命。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於慕尼黑

這一篇用奇異的費解語法寫成的綱領之關鍵所在，我們可以從那個日期看出來。牠的制定人們，稱牠爲暫時的綱領。其實呢，這不但是形勢創造出來的一個綱領，而且是一個垂之久遠的綱領。黨的內部發生了競爭勢力的鬭爭後，遂迫使希特勒於一九二六年宣布這個暫時的綱領是不變動的，雖然希特勒本人對於那裏面若干點的價值是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在他所著的書裏面曾公然承認）——因爲在一九二六年曾有新的國社主義運動之產生，後者與慕尼黑平民所組織的政黨是無復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這個綱領乃是一個汎日耳曼主義的綱領，而以小資產階級的口氣表現出來，并且混合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所產生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各種理想。在國社黨，以少數的帝國主義的政黨的立場，着手與「太多了」的羣衆發生內戰之前，尤其是在國社黨的力量足以攫取與約束羣衆的心靈之前，這個綱領是已經制定成功了。在綱領裏面，還不會見有高唱任何本身的政治的要求，但將國家安放在幾種義務的前面。每節的開頭不會用着傲慢的口氣：「我們一定要」而還是用着民權主義的口氣：「我們要求。」

這乃是希特勒，國社黨之未來的領袖，將建立「大日耳曼」的追求列爲綱領的頭一點：這一項與第二項是表現了黨的外交政策的主張。黨老早已將第三項放棄了，至少是在牠的書面上；黨摒棄了追求殖民地的嘗試，而改爲追求德國東部領土的擴張。

帶反猶太性質的各項，自第四項至第八項與自第二十三項至第二十五項，實是表現出希特勒壓倒哈雷的勝利；不過，在暫時時間內，這還是帶着許多妥協性的勝利。在那裏面，這實是帶着民族

主義的趨向之反猶太主義，還是與這個簡單的口號：「猶太人處死！」相隔很遠呢。然而，我們必須說明這幾項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到必要的時候，牠們的實施範圍可以擴張到可驚的程度；希特勒在隨後幾年的演講裏面，便曾有這麼做過。很久之後，在一九二八年，他重復採取了比較仁慈的態度：猶太人在安分守己的條件下可以居住德國，但當然的沒有當公民的權利。可是，到一九三三年，大家便看到這些例外的處分之用意是使德國的猶太人遭受物質上的絕滅。

第九項所包括之「權利平等」是對時代思想之確實的讓步。可是，國社黨人，從一九三〇年起，所開始建立的「國內之國」，乃反而完全建築在義務與權利之不平等的上面，便是希特勒在他的演講裏面所樹下基礎的將來國家，也是毫無二致的。

從第十項至第十四項以及第十七項各點，乃為綱領之社會主義的部分。不久之後，裏面一部分公然的不復爲人所提起，并且被祕密的拋棄了。到一九二八年，他們便斷然的拋棄第十七項了。談到利息奴隸制且爲黨中爭論最熱烈的一點的十一項，在一九二九年後，得到出於綱領制定人的意料之外的重要地位。這一項，連同第十七項的放棄，使黨獲得負債的地主的擁護。

第十五項是綱領之關於「社會的」一點；第十六項可算爲綱領的中心；這便是後面這一項談到了中等階級。關於應該將大商店給與佣人或是給與小商人的問題上，後來在慕尼黑所開的國社黨大會，則宣布應該給與小商人。

第二十四項是用最巧妙的外交手腕寫出來的，牠認定黨爲非宗教的性質的，但同時又強定了黨之經濟的倫理觀。第二十三項可以說是宣傳的綱領，牠實表現出實驗的機能，因爲牠只談到了宣傳的工具而并不指定宣傳應該是怎麼樣做。在這一點上，精於宣傳的希特勒可以，趁着適當的時期，在未來的國社主義的政府裏面，保持一切宣傳的工具。綱領在這個地方顯是具有機智的，因爲節所述，如照後來所加的解釋，是表示如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可以繼續出版，但須用猶太文字。

關於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之第二十五項，實出於希特勒個人的意思。在其後幾年當中，或許希特勒明白了在必要時候應放鬆些他的中央集權的學說之嚴格性。從這種地方，他實顯出是具有用游移兩可的言語如火焰一般地發揮他的思想之堅強的構造而在這個火焰後面他卻

想法逃避的天才。然而，他老早就理會應該怎麼樣辦：或許，其後數年之中，他需要飄流於巴伐尼亞的水裏，可是他并不諱稱巴伐尼亞的聯邦主義是他最擔心的敵人。第二十五項便是等於說：注意，這不是一個巴伐尼亞的綱領，這乃是一個反普魯士的綱領啊！國家是建築在權力上面，而不是在合同上面；德國的中央政府不應是一個聯邦政府，而應是一個整個的機體；德意志人不應生活於各為各的與單純并列的狀態之下；他們是應受統制的……。

隨着黨的發展，綱領所申言其它各種的要求，都流為齶粉了。唯有上面所說的要求，是不受撼動的，並且成爲黨對於政府的初次經驗的根源。

## 七 進攻城市的兩個人

希特勒現在到了一九二〇年的關頭，他幾乎是單獨剩下一個人同一個極靠不住的綱領。因爲，除他之外，黨可以誰爲主腦呢？愛加爾只向「資產階級同盟」着想。費德或許因爲他之有些理想曾被錄入綱領，而覺得滿意，但他對於他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五月所組織的「反利息奴隸制同盟」

更感覺有興趣。在他的宣言裏面，他說：「我覺得政治的生活是被不實際的，私心的，虛偽的，爲貪慾與盲想金錢所迷惑的首領們之仇視心所荼毒了，我覺得到處是由財閥政治來統治的。」在希特勒看去，這樣地說話的人是一個不良的政友；希特勒呢，他以狂熱與偏執爲成功之必要的條件：「你們不要，他說，以怨毒對待我們的民族與我們的世界觀之敵人而覺得是可恥的，你們反而應當保持這種怨毒的心呢。」

可是，在一九二〇年年頭，希特勒在一個很年輕的新聞記者海爾曼埃塞（Hermann Esser）身上，找到一個可貴的黨徒。他是於國防軍新聞部結識埃塞。這個少年不見得便是一個理論家與實際的工作者；他實是一個徒事叫囂者，而且領會這個技術實更有甚於希特勒。像希特勒一樣，他懂得利用反猶太主義的武器，可是他呢，還懂得以攻擊個人來激動他的聽衆。他是一個確實的抄襲家，同希特勒一樣，是爲才辯的魔怪所驅使，而且爲出身最卑賤的魔怪。希特勒尙有若干自制的地方，埃塞則并此而無之。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克姆登（Kempten）組織了一個革命的學生會，他加入過一個軍人團體，并且曾要求絞殺幾個資產者；一九一九年，他還在一家社會黨報紙執筆。這



乃是在國防軍裏面，他纔找到他的路線。希特勒本人，雖然是缺乏了靈敏的感覺，但後來也避免將這個在最初時期所找到的心腹放在前臺。然而在開始的時期當中，埃塞實爲他之無可替代的幫手，因爲那時他唯有埃塞一個人。

希特勒與埃塞絕不會藉顯著的鬪爭征服了慕尼黑城，也絕不會在最初開大會的時候，實現了特殊的功績。當希特勒在著作臺面或在演講裏面，講到在他之前，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夠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他委實是錯誤了。恰恰是相反的，「民族攻守大同盟」便已曾開過迥異尋常的大會；在那裏面，有凱倫（Kerlen）——一個反猶太主義的煽動者——有羅彌德博士（Dr. Rohmeder）——僑居外國的德國人的運動之一個領袖——曾使會場有興高彩烈的表現。在全德國境內，這個「大同盟」便擁有十萬個會員。在那個時候，無論什麼人，只要對大眾談到反對猶太人，他便可預先穩得成功了；而那個時候，在大眾們看去，國社黨僅是許許多多反猶太的團體裏面之一個而已。做這種運動也并不像如希特勒所說那麼危險。從「共產主義共和政府」顛覆之後，「赤色流氓」是很受人威嚇，雖然他們忍氣吞聲放任反對者們到他們自己的會裏發言。或許當社

會黨領袖們被控爲猶太流氓所收買的時候，他們重新起來抗爭。然而，這與後來在希特勒派所開大會裏面所施行有組織的恐怖，相隔還很遠呢。

## 八 褲子摺痕之爭論

說句實話，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動運之最壞不過的敵人，便是國社黨本身。牠雖然還未在資產階級的會裏搗亂，但同那些比較馴良的敵人作不誠實的鬭爭。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機關報慕尼黑快報 (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的總主筆日利克博士 (Dr. Gerlich) —— 後來爲國社黨之強項的敵人 —— 根據眼前鬭爭的意義，得到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如下：「凡是屬於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不論他是屬於社會民主黨，屬於獨立的社會黨，或屬於共產黨，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國社黨便將這個公式擁爲己有，隨後并利用牠以攻擊任何人，而且以攻擊牠的發明人，後者且被控爲猶太人與擁護馬克思主義者。

國社黨所要攻擊的競爭者還是不少呢。在那個時候，有着比較特萊斯勒的政黨還有力量，且

爲同一批的人所主持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黨」(Deutsch-Sozialistische Partei) 牠以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哈諾瓦(Hannover) 開一個名符其實的大會。牠的政綱是採取了好些費德與丁斐德的理想，而且揭發比較國社黨的主張還有膽量的土地改革。牠之最傑出的運動者名爲巨里亞斯特萊撒(Julius Streicher)——勞連堡城之學校教師。在一九二〇年，衆議院舉行選舉時候，這個政黨竟然冒險提出牠的候選人（這爲國社黨在那個時候因爲缺乏金錢所不能辦到的），但也不會成功。

在德國北部，還有着另一個可怕的競爭者，這便是今日變成國社黨之一個平凡的黨員李嘉德孔茨(Richard Kunze)所組織的「德意志社會黨」(Deutsch-Soziale Partei)。費德有一個主張，爲希特勒所望而卻步的，而孔茨卻敢加以擁護；這個主張是：國家宣告破產。最初，費德曾主張將所有戰事公債照貿易的貨幣通用，無須在表面上顧慮發生貨幣膨脹的影響。現在他卻主張取消國債；在他看去，這個辦法將使出貸者的資本受到致命傷；這便是後來施行膨脹政策而得有效功的辦法。孔茨很快便得到可怕的政治活動者的名譽，而他的政治地位似乎可以得到廣大的

前途。

這些政黨便是那個時期之希望獲得民衆擁護的競爭者們。然而在反猶太的立場上，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派政黨是似乎處於不可動搖的地位。

如上所述，祇有鬭爭這一條路了。爲着應付德意志社會黨與德意志社會主義黨起見，他們頭一步便想採取一個比較妥當的，比較迎合羣衆心理的名稱。特萊斯勒的政黨是與奧國的國社黨相結合的。奧國人覺得有改換這個政黨的名稱之必要。於是有人提議改爲「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黨」。但是，奧國人方面，對於「工人」這個字眼發生異議；而在慕尼黑方面，則對於「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引起了爭論。後來還是照這個名稱整個的採用了，雖然是遇到了希特勒的反對。從一九二〇年四月起，特萊斯勒的德意志工人黨便改名爲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黨（國社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或簡寫爲 N. S. D. A. P.

不久後，牠便與資產階級的政黨開始發生衝突。奧斯加柯爾奈（Oscar Kohnen）國社黨的發起人之一，便在民族攻守大同盟所組織的一個會裏，以嬉笑怒罵的態度痛施於大同盟的委員會

人員，並且責備他們不具一點人民之真正的情感，而人民還是站在他們的前面呢。於是在人民觀察報上面——這個報在這個時候還未屬於國社黨——彼此交換攻訐的文章。人民觀察報的總主筆，以豪放的口氣，指明說民族的理想並不是一個政黨所能獨佔的所有物。希特勒的回答便是責罵他沒有勇氣，而柯爾奈卻寄給他一封忿怒萬分的更正信。在這封信裏面，他要禁止這個新聞記者稱呼他爲無產者，因爲他的褲子是沒有褶痕的。

柯爾奈不過是國社黨裏面一個態度不明的份子。可是，在上面那一句話裏面，他實表現出所有各個同伴的精神：同時對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仇視。

## 九 綱領之初次的修加

不過，鬭爭應須暫時停止。國社黨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明目張膽來攻擊牠的競爭者。尤其是從希特勒以是年四月一日離開國防軍後。現在他需要恢復他的生活條件，至少須恢復一部份；至於其它部份，他的朋友們，像愛加爾等等，可與援助。因此，希特勒接受在若干時期中充當民族攻守大

同盟的演講員，他於大同盟在各城市所開的會裏，仍舊講他的老題目：「布萊斯脫——立托斯克條約與凡爾賽條約。」在這些會裏面，他領受酬金；而在他的政黨所開的會裏面，他則不受報酬。

過於忠促決定的國社黨綱領，在那個時候，已經使希特勒感覺志志不安。譬如，他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慕尼黑所開一個會裏宣稱：照國社黨的意思，產生財富的「工業資本」是不應該與以動搖的，唯有猶太的，國際的與來自國債的資本應與打倒。照這樣說，綱領第十三項是被否認了。反之，第十五項的範圍卻是大見擴張。現在增加這麼一段：「國家應保障全體勞動者之最低度的生活。」這是幻像着一個國家，在那裏面，公共救濟的事業之得到發展的程度，比我們眼前在這一方面所看到的一切情形，是超過萬萬倍了。

### 十 有權勢者的援助

在這個時期當中，政治大事變的波濤激盪了這個僅能隨波逐流的小政黨。加勃(Kapf)在柏林起事失敗了；反之，國防軍與義勇隊以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在慕尼黑推翻了霍夫曼(Hoff-

mann) 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并代以嘉爾 (von Kahr) 政府。在這一次政變裏面，羅姆 同志扮演了重要的腳色，而希特勒 便不會有這種幸運。在這個時期當中，希特勒 的活動是着重於組織黨的演講會與佈置黨的機關。那時，黨的機關是設在舊城中一家小旅館之一間簡陋的房間，裏面僅陳列着幾張櫃子與木架。

巴伐尼亞 政府的更動，對於國社黨 方面，發生了良好的結果。黨現在受到正式的保護；新首相 嘉爾 便在巴伐尼亞 議院中對他大與頌揚，警察也擁護他。在巴伐尼亞 內閣裏面，嘉爾 無事說是扮演着偶像的腳色，不過因為他之出面是有用處的。實權卻是操於警察總監包勒 (Polner) 與其助手政務處長佛力克博士 (Dr. Frick) 的手裏。

包勒 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官吏，具有聰穎的天資，深受微德斯巴克 (Wittefshack) 的影響，帶着近於普魯士 而不近於巴伐尼亞 的毅力。對於革命的思想，他簡直是到了不理會敵人是有所思想的程度；他并不起來與以攻擊；他簡直是不懂得這是什麼東西。包勒 確是有點發狂，但所發的是冰冷的狂。後來，他以厭惡的態度對審判官說他是做了五年之反叛共和政府的活動，他自己認為這

乃是神聖的任務。

在包勒眼中，除了有一點深沈的與缺望的性格之外，佛力克委實具有大部份之良好的代理人的資格。後來他對於希特勒也是這麼看法，雖然他是不精於鑑別人物的。包勒與佛力克便使國社黨享有警察所特予的一切便利。有人對包勒說道：「總監先生，外面有著確實的政治暗殺機關的組織。」包勒回答道：「不錯的，不錯的，可是這還見得太少了！」國社黨因此得到寬大的待遇，而在那個時候，凡是自稱爲「愛國的」活動者，都可得到這種寬大的待遇。直到一九二三年年頭，和國社黨對立的團體在政治上是比較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因爲國社黨黨人是最激烈的，警察的仁慈，對於他們是更有價值了。

不久之後，國社黨的地位便超過了與牠對立的德意志社會黨和民族主義派各黨。牠便從事搗亂敵人的集會和組織街上的襲擊。因爲這樣，國社黨得到惡劣的聲譽，然而這總比無聲無臭的來得好些——從事競爭的原來是要如此的。在有一次會裏，慕尼黑一個猶太教長起來批評反猶太的學說；當然的，他激動了全場的暴怒。國社黨便懂得利用這一次變故，而從此之後，國社黨的告



白上面便寫了「禁止猶太人入場」的字樣。在那個時候的慕尼黑街上，到了這種情況，實比較各種各樣的辱罵「共和政府」還來得有效力了。從這裏面，我們看出國社黨之反猶太運動並不是一種逢場作戲，牠之對猶太人的仇視乃是十足的成色；而這種確實的態度，是為兩年來困於黑暗政治的羣衆所歡迎的。

混合着粗狂的辱罵與狂暴的行爲，這便是國社黨從事宣傳的辦法；而這種宣傳的辦法是從此創造出來了。



## 第二章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 一 希特勒爲誰奮鬥呢

德國不會漂亮地結束戰事。牠不會像從前的荷蘭那樣以寡勝衆，也不會像迦太基與墨西哥那樣覆滅於最後的慘劫。牠的總司令官驚昏了，牠的皇帝逃走了，牠的人民不能以革命的抵抗力來反抗敵人。然而我們不能以此責備他們人民，也如我們不能責備巴黎人民，於一八七一年，在同樣的情形下，受着饑荒的壓迫，終於屈服求和。反之，我們所要責備德國人民的，乃是他們對於事變沒有深切的了解，而將局面的瓦解認爲一種革命的成功——其實這種革命並不會存在。高舉着紅旗這一回事實，是不成爲一番偉大的舉動，也不構成一層深重的罪惡；但是，請被推翻的人物來與新政體合作——這種合作不久便變成了實際的領導——并以取消紅旗爲合作的條件。這便

是反「革命」的深重罪惡了，沒有人敢於藉革命的名義來統治德國，這一個事實便使革命在開始時期即遭受打擊。那些最少負責任的人物反得到了人民委員的頭銜，並在歷史上誤被認為充演查可賓（Jacobins，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激烈派黨人）腳色。一個政府應當自己有一個目標，而不改向徬徨迷路的選舉人徵求意見；應當自己向國民提出一個方案，而不該改由自由主義的學者來代起草；應當自己想法積極復興國家，而不能僅以保障安寧與維持秩序為牠的最高目的；照這樣做的政府，仍然可以簽訂凡爾賽條約，並且還能使這個條約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性質。然而結果呢，這個條約卻變為出於一個帶辦理日常事務之性質的政府手裏，而後者乃是代替帝國政府來拿起不名譽的筆桿，不怕染污了自己的手指。

凡是認識了那時的情形與參加事變的人物的人，便認識了真正的革命政府之建立是如何困難的，或至於如何不可能的。被壓迫者起來活動了，統一的社會主義者也有了意志不堅強的動作。但是，這些政客們，在不自知之中，做了資產階級的性格之囚人。德國的資產階級，最初並不是反對革命的。「踏上實際的地步」這一種步驟，並不是專專基於恐怖而採取的行動；這裏面實有點

暗示贊同之意，資產階級已作歡迎偉大的事變之準備了。及到了看見沒有一個革命的事變發生，資產階級重復下手活動，而是必然的，照牠自己的性質做去，這便是說：做反革命的活動。

可是，這個最初之贊成的見解還是存在着。傑出的著作家約瑟夫何夫密勒（Joseph Hoßmiller）在最近所發表的日記撮要裏面，有關於慕尼黑之革命時期的記載。即是在這些原是決定不發表的冊子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對於事變的一個批評；希望革命進行順利，這幾是當時一般的情緒。許多公法家——忠實的保皇者——也歌頌政治的改革。到了革命黨人使資產階級失望之後，後者便發生做了錯事的感覺。在這裏面，資產階級實表現出，正如波巨美爾戈爾赤（Bogumil Golts）所說的，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我們是一種富有自制心的民族，而又有不規則的性情，容易為幻像及其反面的結構所刺激，總而言之，為悔恨與意識的交戰所惱亂。」

國社主義便是德國資產階級之壞的方面的意識之反響。

在慕尼黑，大家覺得意識不安定，未始是沒有理由的。在這個地方，革命的領袖為古爾脫愛斯勒（Kurt Eisner）。他是進步的自由思想之模範，一個純潔的與致熱烈者，一個公平無私之人；雖

然是猶太人與來自布勒門與北德意志的原籍，他卻醉心於巴伐尼亞的平民精神，猶同凡是認識了這種精神的人們一樣。他所不同於他之大部份的政治同伴者，便是他主張聯邦政體，並且在猛烈攻擊柏林政府之下，他領導巴伐尼亞的自尊心與個人主義進入革命的路徑。藉着倦於戰爭的與反普魯士的農民之援助，他推翻了人民所不愛戴的巴伐尼亞王，在這幾個星期中，他深得人民的擁護，便是到他被暗殺後，還有幾十萬人追隨靈柩，恭誠執紼。

巴伐尼亞的分離運動就此與革命同歸沒落了。就政治方面而論，巴伐尼亞內部的一致實有過於普魯士，階級間的矛盾，在巴伐尼亞是比較不甚尖銳的。按他的性格，他是渴望政局穩定。當船隻傾斜下去時候，他是整個被拖向一邊去的；但到了搖動力改換方向後，他也可以整個被拖向另一邊去。牠本身的性質便決定了牠自己的命運：他曾將革命擴展到了共產主義的共和政府，而到了風勢轉向後，牠便將反革命一直擴展到希特勒的暴動。

## 二 新的鬭爭方法

一九二〇年，到了三十歲的年紀，希特勒教導這批羣衆別開生面來應付政治，同時，他自己也力加鍛鍊，并教他的黨徒訓練羣衆。他這一種活動，不論人們對於所發生的結果有如何批評，是深值得敬佩的。

在巴伐尼亞的都城（慕尼黑）裏面，反猶太的怒潮還未減退；國社黨人便來利用這個機會。在那個時候，民族攻守大同盟，或所有其它能够擔任廣告費與會場租費的團體所組織的演講會都能吸引羣衆。民族主義派各黨黨人也并不缺乏宣傳的能手。在好幾個月之中，反猶太的傳單裏常現着下面的通告：「抓猶太人進牢獄去，地方纔得到安寧！」希特勒不見能說得更漂亮些。

然而，僅僅有了理想是不夠的，僅僅常在報紙上登告白也是不夠的。沒有職業的希特勒，在恆心上面，算是超過了他的競爭者。到了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民族派各團體對於會場中的成績感到厭倦了。「我們不要徒事叫囂的集會，徒事逢迎羣衆的衝動我們認爲是可恥的，」有人在人民觀衆報上面這樣地寫着。不錯的，每個星期都使全會場滿座了，而後來如何呢？這不是靠着這種辦法可以破毀凡爾賽條約，可以趕走柏林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使老闆們恢復主人翁的地位。總而言

之，巴伐尼亞政府現在乃是國民的政府了。

現在是靠在希特勒身上，來對厭倦的領袖們說道，如要獲得政權，必須經歷十三年不憚煩地將搗亂所得的成績彙集起來。希特勒是來自民間的。羣衆對於任何人都可表示贊同。對於在那個時候尙未受資產者之青睞的希特勒，比較對於民族派各團體之擁有相當資產的先生們，更是無限的容易表示贊同了。在後者們看去，媚民主義是一個不甚靠得住的政治工具。而在希特勒看去，這正是政治的目標。

在一九二〇年中間，因為這個，一個敵人的機關報已經指定希特勒爲慕尼黑之「最狡猾的搗亂者」。這是說錯了；他不過是最有恆心的而已。總而言之，他是不受不着實的虛文所糾纏的。

他是從實驗裏面鍛鍊他的宣傳方法——不久他便將這個方法大規模施行；他是靠着實驗而成爲現時代之天字一號的政治運動專家。他開頭是使用表面上極簡單的方法。他用從未見過之大面積的廣告以布告開會。這些廣告是血紅色的，並且寫上許多長的條文。很長嗎？其實三分鐘便可把牠念完了，每個字都寫得很大，很容易念。筆調還是帶商業式的，而每句常像蠅蟲那麼長，可



是有些寫得特別粗大的字可將空氣灌進步步荆棘的原文裏面去。那些口號是很容易記着的：「共和政府是猶太人，交易所人與投機者的政府；」「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馬克思主義是爲德國掘墳墓的。」智識階級們望之而鼓慄，可是他們也將這些簡略的方式記下來了。

這些方式每星期至少在公告牌上展列兩次，羣衆是爭先恐後的來念讀。在慕尼黑這一間或那一間酒店裏面，牠是每星期兩次對着兩千多的聽衆反復提起。往往的，當聽講者聽過了三次之後，他便將這些方式作爲是他本人的思想之表現，而且他以能夠復從演講者的口裏找到這個而感覺愉快。幾個月之間，國社黨便得到幾千參加者，而且使他們堅認有再聽到他們所確信的話之必要。這樣，演講者在自己面前，不僅有着尋常的聽衆，但是有着成千與高彩烈的合作者，他們且招到許多新人來參加。

### 三 開始傳播恐怖的是誰

從上節所述的裏面，我們看到了宣傳方法之一面：有恆心。可是，裏面還有着一個更重要的特

點：這便是活動辦法了。我們不要認此即是舉行吸引聽衆的演講這一回事。所謂活動者實是如下：好些國社黨的小隊伍，用着「秩序維持人」(Ordnungsmann)之好聽的名目，深夜在街上巡邏。若是遇到鼻部爲他們所不喜歡的人呢？這個不幸者立刻被迫到一個墻角，他們對之拳腳交加。許多野蠻的事件曾經發生：有些嫌疑人極力聲辯他不是猶太人，他便須遭受精細的檢查（這種舉動會施於一個長了鷹嘴狀的鼻子之南美洲某共和國代表身上）。這種狂暴的行爲，并非偶然發生的舉動，牠乃是屬於整個的計劃。這不是虛言的。國社黨的指導機關，追溯一九二一年的情況，曾於人民觀察報上致詞贊頌道：「無所顧慮的討伐之精神，還能在這一年中，使黨之行動積極的同志有着蓬蓬勃勃的精神。」

國社黨的「秩序維持隊」(Ordnungstruppe)是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夏天，牠的首領爲鍾錶匠愛彌爾毛利斯(Emil Maurice)，一個兇猛的好勇鬪狠者。照希特勒所說及其所製的傳說所講的，設立秩序維持隊的目的是專爲着保護國社黨會場而彈壓搗亂者。這不是的確的。在一九二〇年夏天，秩序維持隊之最無聊的工作，已經是以大聲叫嚷阻止聽衆聽到反辯者的發言。一直到那個

時候，在會場裏面，是保留着自由辯論的習慣，即使是在革命時期之極騷亂的會場裏面。國社黨人便將這個辦法改變了；在他們的會場裏面，演講者宣讀了一篇「詔書」，而不許任何人擾亂宣揚黨之志願的人。

有些聽講者應用了議院會場所認可的答辯權，結果他們祇有自悔孟浪。譬如，工程師巴勒斯德脫（Ballerstedt）聯盟派的「巴伐尼亞大同盟」之領袖而又為希特勒所特別仇視的，便曾有過這樣的遭遇。照人民觀察報所說，「他是被怒不可遏的會衆趕出會場，且帶了一點小紀念品走。」漸漸的，產生了用「一隻妙手」——照國社黨的機關報所說——將質問者趕出會場的習慣。

然而，國社黨人對這種「自衛的」成績毫不感覺滿足。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他們常於敵人們所開的會裏面從事搗亂。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便是這樣的，希特勒親身侵入巴勒斯德脫所組織的演講會裏面，並且帶領他的徒衆闖上演講臺。隨後便發生野蠻的鬪毆，巴勒斯德脫又被飽以老拳。當聽到警察命令他停止鬪鬥，希特勒冷酷地回答道：「成了！成了！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巴勒斯德脫再也不敢說話了。」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國社黨的示威運動也曾擾亂了新聞記者節——後者為慕尼黑之嘉年華會的慈善組織之一。

這些是單獨行動的示威運動嗎？完全不然的。人民觀察報答載說，希特勒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向聚於金特爾（Kindl）酒店的羣衆宣稱：『在將來，對於一切使我們已經患病的同胞之心靈發生敗壞影響的集會或演講，國社主義運動要想法與以破壞，必要時當訴諸武力。』

在一九二二年，有一個出於基斯（Gies）手而帶點表情派風調的基督像，預備放在總教堂用的，先放在慕尼黑黑城中展覽，但與慕尼黑黑人之尙古的趣味相砥觸；希特勒便威嚇說，若是不把這個基督像挪開，他便與黨徒們親自動手將牠除走并毀成碎片。結果是基督像移走了。希特勒并不曾注意到這個像是出於北方派之心裁的。

當然的，在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史裏面，所有這些事實都不曾提起。國社主義的歷史家認這些狂暴舉動乃是一種果敢行爲與踴躍任事的精神之表現，在這裏面，已經含有勝利的把握了。然而，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恐怖」之惺惺作態，是不能與這種果敢行爲并行不悖的，也不能與公然

倡導的狂暴行爲并行不悖的；在這種地方，實顯出缺乏尊嚴，同時也缺乏誠實的態度。固然在開始時候，國社黨人的活動不會釀成流血的慘劇，然而這乃是爲着敵人不慣於使用這種方法，而僅是緩緩地樹立抵抗的力量。

在政治的鬭爭裏面，國社黨人向德國輸入了直到那個時候所從未見過的方法，這實是他們所不能否認的。這些方法，一部份是取法於意大利法西斯蒂，但也有些地方是取法於俄國的「百黑黨」。到了敵人的抵抗力量樹立起來後，當然不能避免流血的事實；而在這十二年之中，曾流過大多量的血。從這個時期起，籠罩德國的恐怖，其責任是落在國社黨身上，即在希特勒身上；這乃是歷史上真確的事實，而且這種事實是根據國社黨本身所供給的材料而斷定的。

上面所列舉的證據，大部份是錄自人民觀察報。希特勒本身之參加恐怖行爲，是經過法庭判決而爲人所共知的。這是確實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巴勒斯德脫所開的會裏面之搗亂行爲曾使他受了三個月監禁的處分——其中一個月不會受到緩刑的待遇。

我們若是說希特勒不會預料到他的行爲所能引起的牽累，這實是對他那樣聰明的人——

他的確是聰明人——有了悔慢的地方。但是，他將黨的利益放在公共的利益之上；他將利人愛物與奉公守法都放在他的黨章之下，對於黨，他已經認為將來國家興隆之所在的。他之不斷的攻擊敵人，結果是引起敵人對他的重視，而且打破了沈默的陰謀。到了後來，敵人終於一九二一年年底決定採取反攻的態度，那時希特勒則大見高興，而因此而發生的事變，便以「何夫博羅(Hofbräu)酒店的鬭爭」之名稱，在國社黨裏面長留為不朽的故事。直到那個時候為止，國社黨是必須自己出來鼓勵鬭爭的。

#### 四 希特勒之獲得機關報

在那個時候，國社黨之最有力的財政支撐者乃是愛加爾。在個人方面，希特勒之得愛加爾的幫助實是不少。這乃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後者對於希特勒有更顯著的幫助。

人民觀察報因為負債纍纍而宣告出賣。愛加爾與費德都對於報紙感覺興起。但是愛加爾本身卻處於惡劣的環境當中；他所辦的 *Auf gut Deutsch* 週刊是虧本不少，且將停止發行。那個時

候，國防軍由愛勃將軍出面而給與援助。愛勃會同羅姆組織一個團體，專以維持民族派的出版物爲目的。他替愛加爾籌得六萬馬克以清償 *Auf gut Deutsch* 週刊的債務。其實，愛加爾便用這一批款收買了人民觀察報。按這個報的債務而說，這當然是冒險的舉動。這裏面的危險便由國社黨去負擔了。

在十五個月之中，竟得了這麼蒸蒸日上的現象！希特勒以出身不明的軍人，與以黨員僅三十個財產僅一架打字機的政黨之演講者的身份，現在竟然有一個機關報了。這不過是一個週刊，是不错的。然而這有什麼關係？這一張報紙，其十五個月以前，僅許希特勒畏畏縮縮地附登一條廣告；直到那個時候，僅以二十行的地位記載他的演講，且有時還向他挑釁；現在這一張報紙可屬於他了。國社黨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受人民觀察報。從此之後，希特勒擁有做廣告的工具了。

對於照這個樣子做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黨黨人，德意志民族派各黨黨人以及所有的教授和律師，希特勒則一一加以侮蔑。可是，的確的，這些人們並不會蹂躪猶太人，並不會在會中搗亂，並不會叫囂咆哮，也並不會虐待任何人。而且他們也不會有國防軍與羅姆大尉做後臺。

## 五 三千黨員

在這過去一年中，希特勒可以躊躇滿志了。埃塞已經在人民觀察報裏面，寫文章贊揚他之演講家的天才，並指明他如何懂得征服聽衆。埃塞說：我們應該讓希特勒在德國所有各都市演講。這便是希特勒之博得榮譽的開始，而將來對於黨義方面是有極大用處的。

一九二〇年，這一年中，國社黨開過四十六次聚會，便是說，幾乎每一星期開一次。這是很可異的，牠的敵人們怎麼不會發現牠之成功的祕訣，其實是最明顯不過的：具有恆心，便可對於一經決定的事件堅持到底。在國內，國社黨能夠開了三十二次宣傳會，雖然是籌劃演講者的旅費常常成爲問題。在羅森黑木（Rosenheim）與蘭德收特（Lands hut）各成立了地方支部。便是在佛蘭克福（Frankfurt）也成立一個支部，在巴登（Baden）邦內，蒲爾斯黑姆（Pforzheim）城中也設立一個，領導者爲工頭微特曼（Wittmann）另一個支部設立於斯多德牙爾（Stuttgart）領導者爲烏爾索費（Ulshofer）。



總算起來，這是一個好年頭。國社黨由六十四個黨員增加到三千個；增加了五十倍之多。以希特勒之演講的天才來解釋這樣的成功是不夠的。希特勒不過是一個小黨派的發言人——羅姆是依附在那裏面。羅姆即使不是義勇隊與軍人團體之隱在後面的領袖，無論如何，也總是一個極有權勢的人物。他替希特勒引來好些士兵與軍官，將他所能找到會活動的人物都送進國社黨裏面。另一個供給黨員與金錢者乃為「巴伐尼亞團體大聯合」，牠為右派政治團體之有勢力的聯合。然而，若是沒有一個懂得利用的人物，所有這些幫助力量將亦成為無用的了。這便是耐勞的希特勒主持宣傳工作；在他人祇願說了三次的話，希特勒卻知道對羣衆不厭倦的反復申說至四次，五次乃至於十二次。這是他，不拍用粗俗的口吻來對羣衆講說，祇要他的話可以深刻於人們的腦府裏面。說他是缺少風雅嗎？他實不怕那些更醜惡的東西。這是他，親身踏上街面活動，在他自己所開的會裏面預備同敵人爭鬪，而在敵人所開的會裏面從事搗亂。他敢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鼓動恐怖、鬪爭與不公正的行爲之冒險，是由他來擔當，因為他知道如沒有不公正的行爲，便不能獲得權力。他人乃望而卻步，而受淘汰了。不過，希特勒實不免自己感覺到對於歷史與三千黨員負了

責任。

## 六 外交政策之攻擊

一九二一年一月，有人聽說工業家與公法家亞諾爾雷克培(Arnold Reebberg)向聯盟國當局人物遞送一張說帖，內中提議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在人民觀察報裏面，雷克培曾寫了好些反鮑爾雪維克的文章，他這篇說帖是依照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之命令寫的。魯登道夫是於不久之前，來到慕尼黑。

而這正是在這個時候，國社黨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外交政策的理論。在人民觀察報——改屬國社黨已有十多天了——的新年號裏面，登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其內容所披露之有巧妙曲折的動議，實可構成國社黨好多年中之外交政策的綱領。這篇文章的作者觀察蘇俄有不久侵入波蘭之可能——雖然是在波蘭戰爭中蘇俄已經失敗了——而他便寫道：

「到了這一陣狂風驟雨集向德國東部邊境的時候，我們需要在那邊集中數十萬義勇軍。

若是在柯恩(Cohn)與雷維(Levy)的號令之下，德國鐵路將要實行罷工，事前已經相當的佈置好了的軍隊集中將要徒步前進。我們國內暫時不免有地方的共產主義政府之建立，但我們須忍耐着；管不到婦女們，管不到兒童們。兇猛的革命正同時與西部猶太人的態度相呼應，後者是攜有法國的大砲與坦克而站在萊因河後面，且望見東部的猶太人之受凌虐而大聲呼號。便是到了列甯本身進駐波蘭，我們還有時間來救援後者。波蘭是猶同患狂熱病的女人，救援者須先使她受點苦痛，然後再下手援救。最緊要的是使俄國軍隊再經過第二次坦侖堡(Tannenberg)的戰仗（譯者按：坦侖堡爲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德國軍隊大敗俄國軍隊的所在地），而退回牠的國境裏面。這將完全是屬於德國的好事業，而且是我們的復興之所由開始。退卻而無秩序的軍隊，便是蘇維埃政府之最壞不過的敵人了。」

照上面所說，國社黨之「對外大政策」是從德國討伐俄國的計劃下手。因爲這篇文章的作者乃是國社黨之新進的政治理論家，俄國種的德國人阿爾佛勒羅森培(Alfred Rosenberg)。羅森培有德國的籍貫而又有俄國人觀念的思想。他以一九九三年生於雷瓦爾(Reval)在大

戰時代，他在俄國當學生；當德國軍隊向俄國前進時候，他自願——照他自己所說——充當義勇兵，但是人家對他不信任。與很多其他的俄僑一樣，他以一九一九年避居於慕尼黑；經愛加爾的介紹，他於是與國社黨人發生關係。他曾研究過建築學；這便使他與希特勒在個人之契合上另有一個接觸點。他能在最不可能的前提下，構成一種確實偉麗堂皇的建築的方式，他便將這種天才哄上了希特勒無疑的，在眼前的德國，很少有能以羅森培之奮發的精神在政治上現身說法的人物，也很少能在虛無飄渺的基礎上建立精細入微的錯綜理論的人物。華麗的圖案徒供束之高閣，建築師的心裁徒誤了自己的天才：你便是羅森培外交政策的方案了。

## 七 俄國人的影響

羅森培所向國社黨提出的對外政策，其所帶的性質並不是德國人的，而乃是白俄人的。慕尼黑為這些俄僑的科布林士（Coblenitz）（譯者按：科布林士為德國萊因河流域之一個都會，被法國大革命所驅逐的法國人，於一七九二年僑居此城，藉這個地方作他們反革命的大本營），這些

僑民存心誘導德國再鼓動一次瓦爾米(Valmy)戰爭，藉以達到推翻猶太人列席的目的（譯者按：一七九二年，法國僑民德惠普魯士出兵聲討法國，普軍與法軍大戰於瓦爾米）。我們若要揭破這種政策之祕密內容，須先找到對於猶太人問題所取步驟的關鍵所在。

我們若用沙皇的政策來形容國社黨從那個時候起所採取的對外政策，這或是言之過甚。然而，在事實上，這種政策精神上實導源於沙皇時代的俄國，從百黑黨與純粹的俄國人方面取法而來的。逃出故土之後，這些變成流浪者與無祖國者的人們，便將他們的觀念，他們的思鄉病和他們的仇恨，帶到歐洲中部與西部來。黑暗的和流血的俄國反猶太主義便傳染到了比較柔懦的德國反猶太主義。彌雷考斯基(Merejkowski)諄勸大家撥絕鮑爾雪維克的反基督的敵人，至於「西溫(Sion)長老的議定書(註)」還使大家誦讀有熱烈的興味。俄國之舊的反猶太主義正可為旅

(註)譯者按：西溫長老議定書是有人以謝爾志尼律斯(Berdy Kline)的名字於一九〇五年向世間發表。據他說，這一個文件是猶太人於某次祕密會議中所議決的計劃，他的內容是猶太人企圖掌握全世界而鼓動革命的陰謀。這一個文件，據說，是某婦人從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人物手裏盜來的。他是否真確的文件，現在還成爲疑問。

外俄僑的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之最鮮明的利器了。現在牠卻充當國社主義之對外政治的工具。這是絕對的錯誤的。說句實話，包圍希特勒及其同伴之反猶太主義并不是德國道地的。至於羅森培，他是永遠不變的反猶太主義者，他永遠的環繞全地球而追逐飄蕩的猶太人。

一九二一年五月底，俄國保皇黨黨人在上巴伐尼亞邦內之巴德·雷真哈爾 (Bad Reichenhall) 城中開一個大會，德國軍隊於一九一八年在烏克蘭所擁立的哥薩克的領袖斯哥羅巴斯基 (Skoropadski) 便在會中充演重要的任務。他的黨徒曾與國社黨發生了悠久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維持到那一天斯哥羅巴斯基因得有法國人的同情而受嫌疑為止。好些俄國僑民在人民觀察報上寫文章，在國社黨所開的會裏面演講，譬如說，斯哥羅巴斯基的情報部長聶米羅微赤·丹真戈博士 (Dr. Nemirovitch-Danchenko) 便是其中之一個。

爲着不喜歡像杜洛斯基，像金諾維夫，像加米列夫這般人的緣故，羅森培便斷定說：「實在講來，幾乎全部的猶太人是鮑爾雪維克主義者；」我們還看到他很堅決地認定法國的猶太種財政家是鮑爾雪維克的同盟者。很快的，希特勒便將這些見解作爲他本人的意思。在人民觀察報新年

號裏面。他說，他深信這些猶太人，這些魔鬼，在腦中祇想做革命，祇想糟塌外族：「每個猶太人，他寫道，不管在什麼地方，祇管爲着這個最大的目標而努力，而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大肆活動。」

## 八 「法蘭西覺悟來吧」

在那個時候，國社黨的外交政策是反猶太的和反不列顛的，其程度是遠過於反法蘭西的。在牠看此，法國的內閣是做了「盎格魯·沙克遜世界營業公司的代理人。」在這個口氣裏面，與其說是帶了仇視心，不如說是帶了哀憐心。人民觀察報曾預言道：「歐洲國家之復興，」是需要「我們所用善意認識的與以誠悃的態度尊崇他之卓絕胸懷的法國人民終於承認了……。」承認什麼呢？「有好幾種徵象可使我們預料到國社主義將在法國發展，像在其它地方一樣。」法國應當從新把猶太人關在「蓋托」裏面（譯者按：蓋托 ghetto 爲意大利古時在城市中另闢一地方強迫全體猶太人居住的區域）。國社主義的革命是向前猛進的，牠的鬪爭口號是：「全世界的反猶太的人們，聯合起來！」

同時，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克羅恩（Krone）馬戲場所開第一次龐大的會裏面，希特勒大聲疾呼反對英國。他說：「這是英國，用着奸陰的策略，企圖以鼓動永遠不斷的革命之手段，使愛爾蘭的人民瀕於絕滅；這是牠，竊據了具有悠遠的文化之印度。像英國將世界最偉大的進化民族之一——德意志民族——所剩餘之最後一點的自由都剝奪無遺，還有誰相信牠願意以自由給與弱小的民族呢？」

在這個時期當中，民族之物質方面的財產，在希特勒看去，是遠重要過於武裝的榮譽。如果賠款問題可以取消的話，他便準備答應德國全部解除武裝，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之人民觀察報上，他向外交部長西門斯（Simons）喊道：「解決賠償問題（那個時候還未用納貢的字眼），爲我們排除值百抽十二的出口稅，防止這一羣強盜（國際聯盟）所加在我們身上的可恥的監督之延長，給與我們以繼續生存之可能，使我們得從可在德國激起內戰的危機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們纔可使世界得從巴伐尼亞的在鄉義勇軍所能激起的危機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們解除武裝。」在幾年後，這一種政治曾被希特勒形容爲做買賣的政治，牠是以取消債務的代價而出賣武裝權



與自衛權。

現在是到了倫敦方面下哀的美敦書的時期，後者將賠款的數目規定爲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當然的，特希勒與羅森培主張反抗，而不僅是用空話來反抗的。這些實事求是的政客們，已經在東方找到一個同盟者：『我們不要簽字，不要再演一次之太早了的五分鐘整個的俄國正在起來反抗猶太人的恐怖』（羅森培說的）。『鮑爾雪維克的制度是開始動搖了。在一個不顧死活的鬪爭裏面，俄國工人是向猶太的嗜殺的兇狗反抗了』（希特勒說的）。

在一九二一年，這一種對外政策，爲魯登道夫，霍夫曼將軍與雷克培所倡導，爲羅森培所裁定，一部份爲希特勒向民衆宣佈，牠是傾向於組織一個反猶太，反鮑爾雪維克與反不列顛之大陸的歐洲。是由覺悟的德意志和覺悟的法蘭西的聯盟來構成這個運動的樞紐。

## 九 第一次怪會

即使說這種對外政策是危險的，或是不合理的，但無論如何，牠卻產生了圓滿的結果：靠着牠，

希特勒擴大他的勢力範圍。他結識了魯登道夫。關於對內政策方面，另有一種共同的見解，使希特勒與魯登道夫彼此接近。這便是關於反巴伐尼亞之分離主義的鬭爭。不久之後，他門兩人背道而馳，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夏天，彼此纔從新接近。

希特勒擴大了他的勢力範圍，其實，他還未抓着羣衆。在倫敦的哀的美敦書下來不久之前，民族派方面的競爭者，在奧迪安大廣場，開一個超過二萬人來參加的碩大無朋的會。希特勒也應在這個會裏發言，但是輪到他上臺的時候，音樂隊卻奏了一段音樂，結果使慕尼黑之最熱烈的演講家不能使聽衆聽到他說話。無論如何，他自己確信能夠利用倫敦的哀的美敦書以召集羣衆。有了二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的好題目供給導演家應用，他便想開一個抗爭會以反對這種脅逼的行爲。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希特勒首次冒險租賃了慕尼黑最廣大的大廳，克羅恩馬戲場。這個大廳可以收容八千多人。四千多人是到會來了。經巧妙的分配之後，他們把大廳坐得像很滿的樣子。雖然希特勒僅得到一半的成功，可是，他將使敵人看到什麼叫做鬭爭。這些敵人回到家裏，以二萬聽衆到會而自傲且自滿。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則重新召集他的徒衆於下星期再到克羅恩馬戲場。

來；他是不疲倦的，因為他知道，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期中，羣衆也是不疲倦的。因此，憑着恆心，他終於得到八千羣衆到會。到了一天，竟然超過他之競爭者們所引爲滿意之兩萬的聽衆了。

希特勒的勢力現在是伸張了。原始團體之那些平民，漸漸地被推進黑影裏面去了。現在環繞於希特勒左右的，是一批新的幹部人員，他們具着狂熱的與冒險的本性，也具着發生疑問的聲譽；不過，無論如何，他們是與致蓬勃的，也正同希特勒本人一樣。

同希特勒一樣，這些人裏面，大部份是確信自己的；但是，到了緊要的關頭時候，沒有一個能夠達到希特勒之健勁的奮勵激昂態度。繼愛加爾——直到那個時候，他是委員會裏面之唯一的「先生」——之後，便來了羅森培與一個生於國外的德國青年，大學生魯多爾夫赫斯（Rudolf Hess），後者爲希特勒之最深摯的朋友，後來充當希特勒之私人祕書與最忠實的伴侶。這便是，或基於真心的，或基於利害關係的，信服希特勒的人們。

## 十 『領袖』

數千年來所傳下來的經驗，現在又證明是不謬的了：祇要三個人專心一致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即使是要征服全世界，他們也會達到目的。在克羅恩馬戲場得到一半的成功後，埃塞頭一個人，便向希特勒加上「領袖」(Führer)稱呼。從此之後，在國社黨內部產生了領導的小集團，牠之堅決肯定的信條是：希特勒同志對於黨人大衆擁有絕對的權威。

好些有名望的「好人」也從外面開始進來了。亞葉沙軍艦大尉黑慕特慕克(Helmut von Mücke)——一個民族英雄——也簽名入黨：他是一個有誠實的社會信仰之人，他對國社主義這個名稱，其認真的程度遠遠過於國社黨的首領。而在那些首領之間，彼此的對立也發生了。埃塞對於羅森培便懷着強烈的仇恨，當他忘其本分時候，他便將這個仇恨轉移到希特勒身上。

希特勒現在開始相信他本身。可是，在還有很長的時期裏面，照他之更有勢力，更有學識，更有睿敏之智慧的同事們看去，他還是一個區區的「打鼓者」而已。對着魯登道夫或包勒的面前，他或許確信自己並不是怎樣特異的。然而，當他在面前沒有對手的時候，當才辯從他的唇邊或從他的筆端——因為他的文章是與他的演講一樣——傾吐出來的時候，他或許可以夢想：「到了一天，

有一個鐵鑄的腦筋之人物，或許穿着骯髒的皮靴，但具有純淨的良心與堅強的手腕，將使這些軍隊的英雄默默不敢作聲，并且要允許人民活動。」

鐵鑄腦筋的人物嗎！我們忖度或許這便是這個爲時勢所眷佑的人，這個會對四千多人演講，而在他情緒熱的時候，或許將他們看有八千之多的人呢。而骯髒的皮靴，他也有着；他呢，在他之大尉與中尉各同伴裏面，總覺得自己僅受普通伍長的待遇。然而，不管他之骯髒皮靴是什麼樣，以他的聰慧，以他之善於迅速應付最不可預料的境遇之本能，他是超過他們一切的；他已經不僅認識法西斯主義之重要性，且還能理會牠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墨索里尼同志——他也一樣是穿着戰壕的骯髒的皮靴來的——正在創立起來：他要「允許人民活動。」

後來，一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形容這個做效羅馬的人物爲「戴提羅爾(Tirol)式氈帽之凱撒。」果然不錯的，這個維也納工人且自己常常在言語中流露出來。在眼前這一個時期，他的目的是成爲辦理宣傳的凱撒；他是具有尊貴的性格，但他卻情願鑽到羣衆裏面去。一年後，在他之新年宣言的結論裏面，他大言不慚地贊揚庫特馬勒(Courth-Mahler)說：「揭衝軍敬向司令之神致

禮。」而到了一九三二年底，當挺進隊被取締的時候，他便用了意大利法西斯蒂首領的口吻喊道：「在你們的心未泯之前，你們永盡忠於我。」

### 十一 「處絞刑」

然而，這種威嚴是放在後來用的。在他成功之最初時期，希特勒有着愛用譏諷之危險的癖氣，這個癖氣有妨礙他之活動的危險。有的時候，他的語氣竟像猶太人的難解語言。這是基於他要在聽衆面前過於忠實的摹倣猶太人的狀態與思想。當他說了「這些發狂的革命之鵝的喔喔亂叫，從猶太老醜娘羅沙(Rosa)到了這個發狂的猶太老母雞古爾特愛斯勒」的話時候，他之嘲笑的口氣是不存在了。當他大聲喊道：「我們提議：維克多爾柯勃(Viktor Kopp)應縊死於俄國大使館的窗戶，這便是說，猶太的大使館，塞維林(Severing)和賀爾新(Horsing)應受至少二十年徒刑的處分。」希特勒在這個時候是比較斬截的了。

這些話便是初期的報復威嚇了。這算是頭一次說到「砍下頭顱」的話。國社黨的綱領祇認

死刑是應施於重利剝削者與投機者身上。但希特勒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宣稱：「我們要將犯了禍國罪狀的政客，從愛爾斯柏格（Erzberger）到西門斯，連同所有參預這些罪狀的議院之醜類，送到最高法庭去。可是，我們堅決地希望這些罪人不得受很體面的槍決，但須絞死。我們敢先對將來的審判官說，爲着節省燃料起見，我們之大部份的反光鏡可以供給他們使用。」

上面的話是清清楚楚的寫在人民觀察報上面，而不會使任何一個檢察官動怒。在那個時候，這張報紙，雖然有牠之誇張的地方，可是非常適合於牠所提出的目標，與後來出版的比較起來，是永遠沒有辦得那麼良好。在這一點上，牠實是靠着年輕的主筆埃塞；他呢，反猶太主義者，懂得應用真確的模樣。與希特勒相比較，埃塞是遠具新聞記者的天才。希特勒最長於感動羣衆，但不能感動有批評眼光的讀者；要獲得後者的信服，則需要說具體的話，而這乃是希特勒所不能的。在這一點上，埃塞是比希特勒較有精神，較激烈，較少被疑慮所顛倒。這個國社主義的新聞學派是由米斯巴赫新聞報（Mischbacher Anzeiger）傳演下來的；後者是一張地方小新聞紙，憑着牠之堅強的反共和政府的仇視論調，牠於幾年之中幾至使全世界知名。很快的，人民觀察報學到摹倣牠的論調，

而與米斯巴赫這一個小報相比較，牠卻有了自己的政治學理這個優點。

## 十二 內部發生革命

希特勒之新興的光榮開始放射到遠方了。他的名字是傳出慕尼黑城之外。一九二一年夏初，他在柏林過了幾個星期，在那裏與右派的團體接觸；而且曾在國民俱樂部演講。他一心祇想將他的運動擴展到巴伐尼亞境界之外，就中與從前的貴族總會之保守派領袖們，如瓦爾登堡（Walburg）、伯爵和比爾（Behr）伯爵，發生密切結合。但是，當他出遊時候，事變突然爆發，并迫他急速奔回慕尼黑。他之新興的光榮現已發生疑問了。那些國社黨的創辦人們，卻想推翻他們認為發展過度的希特勒。

這裏面的錯誤是有些地方基於運動本身的擴展過於迅速。黨吸收了好些友好的團體與外派的領袖，但不能夠消化。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努連堡成爲教師斯特萊撒的活動區域，他是一個民衆的運動者，他之反猶太的演講在效率上並不比希特勒的減色。或許在智慧上，他是低於希特勒



的；他之世界觀的理想是幼稚的，所說的話是粗俗的，晦澀的與雜亂不清的。然而在「公民的」毅力上，在缺乏廉恥心之一點上，他是超過希特勒；他能夠將自己所拋棄的東西重檢起來，他能夠常常以卑劣的情事向努連堡人民講述，後者是愛受刺激，同一切大都市的住民一樣。當他抓到一個敵人——大多數是猶太人，他總有幾點的理由，雖然他是有過火與誇張的地方。簡言之，同埃塞一樣，在具體的意義上，他是超過希特勒；他所短者是缺乏了政治的規模，與致與教育。

斯特萊撒為希特勒之死敵。他不但肯屈伏於他的敵人，而且還有更大的慾望；他想推翻希特勒，企圖在後者的身上奪取慕尼黑的政黨之領導機關。不久，他從狄克爾博士 (Dr. Dickel) 身上找到一個同盟者。狄克爾在奧格斯堡城 (Augsburg) 領導一個非正統的工團，工團聯合會對於後者是取敬而恨之的態度，且目之為「黃色的」。對於特萊斯勒之德意志工人黨的理想，狄克爾認為是接近於他本人所有的。在好些地方，他還有着稍為「進步的」見解。經過國社黨的領導機關之邀請後，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慕尼黑做一篇演講，在這篇演講裏面，他極力攻擊大地主，他認為後者與猶太人是具有同樣的危險；這乃是國社黨從來所未見過的，而且是對於大地主之唯一

的攻擊。

### 十三 特萊斯勒之與斯特萊撒聯合反對希特勒

狄克爾之出現臺上便是國社黨內部叛變的信號。這不是希特勒請他到慕尼黑來；那個時候希特勒是在柏林。請他來的乃是從前之「國社黨執行委員會」即國社黨之創辦人們。他們從前曾在「德意志酒店」成立了為數僅三十人的政黨，而現在卻眼巴巴地看他們之新的隊伍脫離他們而趨附於希特勒。

這些創辦人原不是純粹的勞動者，他們也是這樣的自信；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自己卻以為是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窮人，他們自知本分；而從這裏面，便生出一種階級自尊心。他們認為有摺痕的褲子，是最美的德性之特徵，并且是所以區別於「投機者」的所在。由是產生一種資產階級的貧困之倫理觀念，這便是組織一種新的階級之確實的根據。破爛的褲子便成為無產化的中等階級之自傲心的代表物，正如胼胝的手新近成為真正的勞動者之自傲心的代表物。在這些

窮人們看去，黨之真正的總理乃是特萊斯勒；希特勒則不過爲執行委員會中之一份子而已。爲什麼希特勒可以壟斷權力呢？

這是因爲第七號委員懂得辦理宣傳，後者正屬於他的權限，而且幾乎是黨之唯一的活動。總理及委員會與委員們無非是這個膨脹過分的宣傳部之附屬品罷了。外面人所看見的是宣傳與管理宣傳的首領；徒擁虛名的黨總理儘可在都市外表現他之平庸的演講天才。希特勒之專門辦理宣傳，或許使他在數年之中將政治的功績之利用擱在第二步。

這小批的思想遲鈍而又模糊的人們，是不能夠與那個具有不固定的與有影響勢力的，且又永在爆發狀態中的性格的人物競爭。而且他這個人又爲黨引來一批自信本身之價值的新的份子，學生們，軍官們。在委員會裏面，他們或許沒有什麼職務，但他們在人民觀察報裏寫文章，在演講會裏發言，而且很蔑視黨的執行委員會。

只要不是怯懦的，委員會的委員們必定要下手鬭爭。他們便利用希特勒出游的機會。既然有人在柏林方面爲黨謀利益，爲什麼不就將黨的機關移到那邊去呢？我們不能與布魯勒（Brunn-

日)和斯特萊撒的德意志社黨主義會合併嗎？得了斯特萊撒的支撐，狄克爾便向特萊斯勒煽動。若將其它的黨派合併一起，大家站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便可以長期阻礙希特勒的權威，特別為的是這種聯合需要收羅另樣更有毅力的而不同於這些慕尼黑黑人的人物。

希特勒的還擊是用着最極端的嚴厲手段：他立刻回到慕尼黑，並且揚言脫離國社黨。敵人們不會預期到有這種步驟，便想法向他說好，尤其是特萊斯勒。特萊斯勒且受到責罵，如「無性格的騷人」、「賤狗」這一類的話；而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卻宣言準備向黨員提出辯護。委員會也不能夠走這一條路。擺在眼前的是兩種辦法：失掉希特勒，或屈伏於希特勒，而委員會終於採取了第二辦法。我們如果想到希特勒手中是握着黨之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人民觀察報，我們便可格外的領會為什麼會有這一個決定。因為黨於希特勒者有費德與愛加爾——後者弄來愛勃將軍的金錢——還有羅森培與赫斯，便是說，所有的「好人」而且支持他的還有埃塞，他是次於希特勒的黨之最好的演講家。黨不能夠失掉牠之最傑出的人才，同時也不能失掉牠之最寶貴的財政來源與

機關報。

#### 十四 希特勒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呢

希特勒的勝利是將近於成功，而他忽於是年七月十四日送一封哀的美敦書與黨的領導機關，在書裏面，他要求行使狄克推多的權力。反對者方面，感覺萬分憤怒。他們便向黨員散布傳單，在那裏面，控告希特勒的罪狀，而所提的罪狀并不是毫無根據的。就中有下面幾段話：

「覬覦權柄與個人的野心使了亞爾多夫希特勒先生，於居留柏林六個月後，復向他自己到現在還未與以解釋的目標前進。他認為時期是已經到了，可以在我們內部播弄是非與進行離間的作，用藉以迎合站在他後面的曖昧不明的份子之意志，以及做了猶太人及其保護者們之利益的工具。他的居心是想利用國社黨以為達到不可言的目的之工具；他是企圖奪取這個政黨的領導機關，以備時機到時將牠駛向另一條路線去。這便可由前幾天他所與黨之領導機關的哀的美敦書裏面證明出來。在這封書裏面，他就中要求給他以絕對的獨裁權，并且要求執行委員會和黨的創辦人與領袖——機械工人安頓特萊斯勒——之引退。他要求以他本人充

黨黨總理，他又要求不得在六年之內企圖與其它國家社會主義黨以及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合併一處。這些要求是表示什麼意義呢？無非是希特勒先生是存心阻礙本黨之任何發展……

「這裏面還有他之職業與經濟來源的問題呢。每次遇到同志們問他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和到底那是他從前的職業，他立刻大發雷霆……

「而他是怎麼樣領導鬪爭呢？是像真正的猶太人一樣。他竄改一切的事實，並且妄指特萊斯勒乃不是十分革命的，與是希望恢復議會制度的。那裏面之實在的情形是怎樣呢？特萊斯勒并不曾改變他於組織本黨時候所確定的信仰之傾向。在他之革命活動外，特萊斯勒是向德國工人指示應走的途徑，以求達到目的。這便是說，在眼前可厭惡的狀態下之中傷的批評裏，特萊斯勒是要實行一種國民經濟的政策。

「希特勒找到一個同伴以助長他的陰謀：這便是埃塞先生。這個人——希特勒自己常常認他是有害於黨的——常對特萊斯勒要求罷免希特勒；這個人，希特勒卻忽然與之勾結以求切實實現他的陰謀。最可注意的是希特勒自己常常對人——這些人必要時可以出來證明

——說了下面的話：「我知道埃塞是一個無賴，但在他於我是有用的時候，我總要用他。」國社黨黨員們，請你們評判這種的性格吧！你們不要受他的迷惑；希特勒是工於討好於人民的，他祇靠在他的演講天才；他想靠着雄辯來欺騙德國人民和你們。你們不要允許人們，像已經影響了其它的黨派一樣，來影響國社黨之公正的創造人。」

## 十五 希特勒之獲取國社黨的領導權

這篇通告雖然在好幾點上說得很正確，而在策略上實是重大的錯誤。事實上希特勒已經在黨裏面壟斷一切的權力，並且已經使黨離開最初的路徑（改向那個目標走呢？或許在那個時候希特勒本身也知道不確實）而且在他背後，還有着好些看不見的保護人，他們是無論如何總要躲在黑影裏面，為的是他們代表了國防軍。

他的敵人們既然沒有證據又沒有證人，他便易於對付了。結果是特萊斯勒同第二總理柯爾奈當衆否認那篇損人名譽的文字。在七月二十六日與二十九日所開兩次國社黨非常大會裏面，

希特勒鞏固了他之勝利的地位，他於是強定了構和的條件。因此，黨章是經過一番修改；希特勒成爲黨之第一位總理，第二位總理仍爲柯爾奈。特萊斯勒則被放逐到名譽總理那一排去，換言之，他是被人打倒而且受人監視。不甘熟視無睹的委員會委員們是離黨去了，不過在幾個月後，裏面有幾個仍舊回到黨裏。

這算是『先生們』在黨的內部戰勝了『小資產者們』。國社黨黨人的口吻現在是改變了；從前是帶着社會主義色彩的革命的情緒，現在卻代以極端因襲的與『社會的』性質之不平觀念。仇視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羅森培的勢力，是着着進步；從此後，替軍官們如羅姆與戈林（Göring）等等打通一條通行無阻的坦途。國防軍將領愛勃於六個月前所付與愛加爾的金錢已經發生效力。現在領導國社黨的人們，大部份是個人身上沒有什麼財產的。然而他們擁有財政上的靠山，雖然在暫時期中這個靠山還是有限的。希特勒之一九二一年的勝利，乃是擁有金錢勢力者的勝利。希特勒先前是對付容易使之沈默的國社黨舊創辦人，現在起，他卻須對付不可輕慢的人們。他絕不會變爲後者們所卵翼的人，然而他卻須採用外交家的手腕，卻須對凡是過於強盛的勢力



立刻找出一種對抵的力量。經過許多變遷，直到了一九二六年，他算是辦理成功了。再往後去，便開始更困難的時期，在那裏面，他更須審慎應付。



## 第二章 希特勒

### 一 出於本人心願之外的領袖

現在我們到了更進一步的來考察這個，照他的徒衆的意思，與國社黨和整個德國成爲一體的人物之時候。關於大戰前之希特勒的生活，我們所知道者僅是照他本人所說的；可是他本人的敘述尙遺漏了好幾年的過去事蹟，而且他所給與我們知道的小部份還是異常不確實的。裏面有些暗示且使我們懷疑到他的政治生涯不是由正途發展來的。他的敵人們說他曾與猶太人發生接觸，這或許便是他反猶太狂熱的來歷；然而關於這一點是毫無根據的。不過無論如何，國家對於要求與以全部信任的政治家，應當有權來確實根究他的細底，並且向他本人詳細根究。這個圍繞着國社主義運動及其領袖的祕密，雖然在開始時候，格外使羣衆對於運動及其領袖感覺心悅誠

服，然而即在興高采烈的信徒心裏，到底也生出某種困難的地方。

關於希特勒自離開軍隊以至於上政治舞臺的生活大家是知道的，並且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大部份有作爲的政治家都想攫取政權，而極力爲個人從中取利。這可不是對希特勒而論的。對於大戰前所樹立的政權，希特勒的態度，不論過去與現在，是屬於保守的；他沒有想到他本身對於這個保守的運動卻有了積極的參加。只要這個政權存在着，他就不作另外的要求。他本身呢，曾想過做畫師或建築師。他信任貴族階級；而一個貴族階級不能無臣民而存在，而希特勒，照他的出身，曾準備着充當臣民的。這種人是爲戰爭，換句話說，是民族的經驗，所政治化了。這些爲外面的環境，而不是基於內心的稟賦，所引進於政治生活的人，不見得全是最好的政治家；然而希特勒的確不是低劣的。

這個崇拜大腓特力與俾斯麥的人，固然發覺在威廉第二的帝國裏面，嚴格講來，有某某種應與改革的地方；然而，在全體上，他的保守主義對這現狀總覺得很滿意，而且他信賴着治愈國家的力量。革命卻與他之最濃厚的情緒相抵觸，而因此使他起來反抗。他的性格是很可以使

這種反抗行動擴展到了反革命的行動，但他的性情卻完全不是革命的。以他之爲專制政體的信徒與俾斯麥的崇拜者，而竟然在十四年之中，扮演了革命者的面目，這實非出於他之本意的。以當初的情況而言，他尙懷着忠實的臣民所抱之失君的憤恨。祇爲着他的左右有了有計劃的傾向，或許也爲着有了墨索里尼的榜樣，遂使他做了「領袖」而在很長時期當中，他做了與馬克思主義算賬爲目標的運動之首領。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他還宣稱說，到他使民族復興後，他的任務便可終了。

事業之悠長與生命之短促，使他漸漸從革命的領袖之企圖而轉生政府的領袖之企圖。有加無已的自信力之徵象，與猶疑不定之迴盪，更番在他心中交戰，而這種猶疑不定的情緒并不表現出同情心，雖然牠是用誇大的辭氣表現出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當他爲着妨礙集會自由的罪名受判處一個月監禁時候，他已經宣稱說，二千年前另有一個人也被推進監牢裏去，也是被與今日攀他入獄的同種族人所陷害。然而過後一年，在與人對談中，他承認說：「我們無非全是小聖約翰之流。我等待基督出來。」這種人生實是不乏可悲的偉大性格：一個渴望服從的人物，等候教主降

臨，結果是他自己勉強拿了權柄，爲着是教主不會出現。

## 二 造就上之悲劇

在政治家之這一種的悲劇裏面，又加上另一種的悲劇，後者乃是屬於內心方面的。好些敵人或是不尊重的黨徒們，曾以小學生看待希特勒。這種過於輕易的挑剔實是難於自圓其說。綜合他所得到的智識，希特勒當然強過於一般進過大學堂的人物。他之可驚的記憶力使他胸中包羅許多由書本所擷取并能與以消化的概念。這便可由他對聽講者面前所用含有深意的方式證明出來，縱是那裏面所附帶着無稽的註解不會顯出什麼稀奇的地方。若說他缺乏專門學識，這也是不正確的。他不曾成爲低劣的建築圖案家，而他之隨着時間而成熟的對外政策之計劃便可證明他是具有真確的智慧。

關於他的筆調輕佻，已經說過了。他之德國文學低劣，並不是基於他不會在修辭學班裏研究德文論說做法。筆調的缺點便將性格的缺點暴露出來。

關於他之造就上的悲劇，乃是一種精神上的悲劇。他曾經做過聰慧的學生，而爲着貪懶緣故，竟至於考試失敗。在那裏面，并非屬於運命的錯誤，而乃是他本身的錯誤，這且使他永遠發生煩惱。同他接觸的人們都發覺到他對於那些人們擁有堅固的資產階級的地位，如文憑同頭銜之類，不加信任。從這裏面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羞怯態度便是過度的粗野態度。這便可由他在法庭的態度觀察出來：如缺乏機智和對首席審判官以叫喊與卑辭頌諛相和的態度。當然的，我們不是指近年來他以證人資格來受迅速的問話而說，我們所指的是最初所經過的訴訟，那時他還未成爲大人物。

以鼎鼎大名的希特勒，竟然爲裁判官的社會地位所屈伏，這實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他似乎看這些可崇敬的人物是那些在少年時代曾得有成就的人們，而他自己在那個時代卻失敗了。至他之因行險徼倖而得到的榮譽，實還不夠抵當完成義務的初衷所可使他得到的滿足呢。

### 三 「具有本能的人物」之故事

那些是希特勒所受於命運的贈與呢？

使他在童年時代幾瀕於死的肺病，使他幾乎失明并易於墜入幻想的瓦斯中毒，乃是他的身體微見衰弱的原因，而身體衰弱卻常能解放思想與鍛鍊性情。在他之政治活動的初期裏面，這個舊軍人乃是確信他之文人地位的人物。當濫發紙幣那幾年頭，差不多所有德國青年都赤脛行走，希特勒卻極力保留他的長褲子。在那個時候，他對於挺進隊及其指揮員們，是採取一種人民委員的態度。他斷定武力在政治上有一種極高強的重要性，其程度是遠過於那些左派政黨所授與他的。但是，在右派政黨之中，他一開頭便帶着堅決的反軍閥主義的面目，他所謂軍閥主義是限於軍人領導政治的範圍。在他心目裏面，軍隊是政治運動之決勝的工具，但充其量不外是一種工具；他的手腕并不強過於腦筋。在這個地方，後來挖了一道深溝隔開希特勒與挺進隊的領袖——羅姆大尉，幸虧後者的忠忱及對政治無所可否的態度，始能填滿這道深溝。

希特勒實不會有一種堅果的毅力。從許多他之左右的證明，我們曉得他是缺乏自制的力量，他是犯了使他時發狂怒的歇私的里病象的激烈行動，而這種毛病便是當私人談話中間也發作



出來，一遇到發言者支配了談話，向他提出了種種問題，勉強他嚴酷地討論，他便立刻陷於連接不上的期期不能出口的狀態了。在他這種暴急的性情裏面，是毫無什麼固定的表現。有了力量麼，是的；然而人們看不到力量之最有力的憑據：戰勝他自己。遇到決定命運的關頭時候，一種陰沈的甚而至於粗野的莊嚴，在他身上替代了那種僅能在戰勝自己之下產生出來的自然的威嚴。從他之那些重大的實質上的成就，即使是那些在最近時期所得到的，作一個詳細的分析，我們便可看出他是用着何種苦心以求極力躲避嚴重的處置。與其說是他自己登上政治臺面，實遠不如說他是被擁護上去的。

希特勒的毅力實不足道，而他的腦筋卻有足稱，而且是有價值的腦筋。他之攫取政權的計劃，委實是一種最上乘的聰慧的結構。然而，他是最低拙的賭博家，遇了失敗便不能忍耐着，而且一遇着些微的困難問題便有失敗之預覺；他是像一個瘋狂之人，對極不相干的事情，往往在辦事室裏大發雷霆；他往往手打他的最老的同事爲着對於他之最後的講演速記不佳——最後的講演每次都是最重要的。常常的，比較溫和的——在他面前便是不然——同伴對他表示羞恥并導他復

返到理智裏邊；但是他總還能夠用他之受震動的精力壓住他們。而那種地方，他實是靠着他的腦筋。

他的敵人們——幾乎是所有的敵人們——把他估量低了，把他當爲一個具有本能之人；靠着一種第二眼光，使他與平民的精神發生了緊密的接觸，他於是每次能夠講出最足發生效力的話，無需乎顧慮到對於客觀的真理到底是怎樣。這種判斷未免失之太輕易了。在開始時期，希特勒常常以平民的演講家遇到失敗；在他所著的書裏面，他本人曾經說過。同所有的演講家一樣，他需要學習他的技藝；可是靠着他之絕好的腦筋，他極快學到演講家應有盡有的熟練。在這個地方，人們是不應說到本能上面去的。

以普通情形而論，具有本能的人們，其態度是鎮靜的而穩重的，爲着是本能在內面低聲操縱的。反之，難於自加忍耐的希特勒，便不是一個能依從內衷引導的人。凡是人們曾經從頭到尾聽過他的演講，而不是從通訊社的片斷的分析讀到的，便可在那些演講裏面發現了與一種本能的精巧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們可從那裏面找到合於邏輯的地方。

#### 四 毅力不足道腦筋有足稱

希特勒的力量是存在於他的思想之邏輯的精確。在今日之德國，或許沒有第二個政治家也具有這種智慧上的勇氣，這種勇氣可使他從某一種局面中，推求出最不可更改的結論，可使他不顧那些學識比較豐富的人們的譏諷而宣揚那些結論，尤其是可使他依照那些結論而行動。這種邏輯的精確，實成爲希特勒的演講所可使人信從的力量。

凡是在希特勒身上不認識有這種邏輯上的天才之存在，便也不能夠在他所著我的鬭爭史書裏面找到有趣味的地方。在這裏說句話，不僅要違抗希特勒的敵人的意思，而且要違反有些希特勒的黨徒的意思：我的鬭爭史是一部絕佳的著作，全書充滿着透澈的沈思和常常使人動目的公式，或許這是一部紛亂無頭緒的書，充滿着許多寫不厭的重複，遂使這部書有不可卒讀之慨。他當然是一部國際的反猶太主義的著作，至少我們可以承認他的前提。

## 五 低拙的預言家

在這個地方，他的腦筋，雖然有良好的構造，卻告失敗了。他的推論越是有精確的連繫，他的觀察越是趨於忽略而且與事實相違反。若是在某種事件裏面推求結論的話，他是超人萬萬的；可是在將這個事件作種種證明時候，他卻有了危險的錯誤，因為他不做證明的工夫，而做了上面所說的結論的囚人。便是因為這樣，在一九二一年，他極相信蘇維埃政府顛覆即在目前；在一九二三年，他忿激萬分的大聲呼喊，說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明明深切認識法國人絕不會退出魯爾 (Ruhr)；在蘭德斯堡 (Landsberg) 監獄裏面，他鄭重地向受拘役的同伴宣稱說，到一九二八年，卅字旗必定飄揚於柏林總統府屋頂。而在一九三一年秋天，他於哈次堡 (Harzburg) 大會裏面，確定最遲在三個月內他便得到政權。

或許其他的政治人物，同樣有過錯誤。然而，希特勒卻永遠自命是不會錯誤的。在一九二二年，他大聲喊道：『我對你們向來沒有說過這種或那種事件能夠發生，我但永是說那件事情將要發

生，因為那件事情一定要發生出來，而且是那件事情不能夠有不同樣的經過。」從這種辯證法所產生出最使人注意的結構，便是關於他之在東境殖民的理論了。「百年之內，德國的人口將要增加二倍或者三倍。」從這個論據出發，他的辯證法結論是國內殖民將證明是不夠的，而他便要求用武力佔領東方的新土地。假使德國的人口是趨於繼續增加的話，他的話將完全有道理。然而在那裏面，希特勒是錯誤了：德國的人口反而趨於減少，統計的數字便如此與以指明。

這種辯證法根據着謬偽的前提，因以達到錯誤的結論，我們應該以何種的價值去看待它呢？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希特勒具有一種認識：是對於他的人民的認識。將謬誤的見解立為學說，這便是他的大部份理論之趨向。可是謬誤是屬於人類本性的，而在政治上也有着國際性的學說化乃屬於德國民族所固有的。而這種地方，便是他之政治的真正的價值：他曾比較準確地預料到德國人對於有些政治的事件將有如何的反響。在這裏面，他實有理由反抗一切的聰慧人物。

## 六 希特勒之誘人方法

下面的一段是錄自希特勒於一九二二年四月所做那些演說中之一個，在那裏面，把他一個人物表現無遺：

「在政治方面，猶太人做到了確實精巧的好生意。這個資本主義的民族，頭一個在地面上創立了對於人類不顧廉恥的剝削，懂得操縱第四種階級（工人）的領導權；關於這點，他是靠着向右方與向左方同時施行陰謀，爲着是他在兩方面都有使徒。在右方面，猶太人尋求抽取一般時勢的最大利益，藉以極力激動下級社會的民衆；這裏面是靠着他的貪慾、無厭、廉恥心之泯滅、心腸之冷酷以及像暴發戶之可鄙的行徑。猶太人滲入高等社會越來越多；其結果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越來越變成爲民族的外人了。」

「那種陰謀便做了左翼的工作之準備。爲着是在這裏面他有了卑鄙的媚民人物。起初用着他的國際主義的見解，隨後用着宣稱產業便是盜竊的馬克思的理論，他使民族的智識份子無味於領導工人階級。爲着有了後面一點關於馬克思的理論，具有民族性的經濟家也不能夠與工人們同步前進。因此，猶太人做到使工人運動與民族的份子相隔絕。而隨後，他們藉着精巧的利用言

論，使民衆所受到影響的程度，竟至於使右方認左方的錯誤，乃是德國工人的錯誤，使右方的錯誤，在德國工人看去，無非是唯一的資產階級的錯誤。在兩方面，並沒有人覺得這些錯誤全屬於來源一樣之奸惡的外族蹂躪者之願望。因此在世界史上竟然有這種笑話之實現：從猶太人的腰包裏面出來的人物居然成爲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當摩斯柯恩（Moses Kohn）催促他的公司董事會以最嚴酷的態度對付工人的要求時候，他的兄弟伊沙克柯恩（Issac Kohn）卻在工廠的院中鼓動工人，並且對他們喊道：「你們看得見，他們要壓迫你們啊！打斷你們的鐵鍊罷！」而在那上面，他的親兄弟卻極力使這條鐵鍊鑄成更堅固呢。爲着要使民衆更陷入這個永遠存在的剝削者的種族之鍍金色的束縛裏面，民衆需要絕滅他之經濟的獨立呢。」

我們應該想像出這種用啞聲呼喊出來的聲腔，以低調的音符而變由喇叭的號聲播佈出來；若使羣衆聽到這篇演說之後還不鼓舞起來，那除非構成羣衆的份子，是涼血動物；這篇演說無非是「西溫長老的議定書」這一個小冊子之普遍化及圖解化罷了。

## 七 猶太主教們的陰謀

整個問題是建築在無數可以證明出來的錯誤上面。拉薩爾 (Lassalle) —— 一切社會主義者領袖的模範 —— 不但決沒有排擠非猶太的智識份子，卻反而設法吸引他們，並且使他的同志們提防有猶太人的領導之存在。在他的猶太環境當中，這個猶太的社會主義者往往被指為背叛份子，他不但非他同胞的伴當，而反是他們的敵人，這是很容易證明的。至於所說伊沙克柯恩在工廠院中鼓動工人的描寫，卻與一般意見相反；照一般意見，這個猶太人是過於怯懦且習於優美生活，何足談到親身混入工人堆裏去。可是，所有這些錯誤實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引人信服的力量。

現在所要加以證明的焦點，是陰謀之是否存在。仗着千古流傳來的巧妙的偽計，這個焦點於不知不覺之中，經過演說辭的潤飾，竟成爲曾經證實的假定了。於是憑着一種不可抵抗的邏輯的力量，從這個假定產生出種種論證，後者實在須先與以證實而後纔有成爲證據之可能。陰謀證明是存在着，因爲猶太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活動僅是做了破壞國民經濟的工具；這個活動僅是做



了破壞國民經濟的工具，因為他是從一種猶太人的陰謀產生出來的；而陰謀證明是存在着，因為……如此等等。在這種連鎖的論法裏面，像這些錯謬的論證循環連續下去，要想抓住隨便那一點的錯謬是不可能的。即使對方能夠做到將敵人引來與之辯論，并向他提出主要的問題：陰謀的證據是在那裏？他很可以回答道：要認識陰謀之是否存在，只有他的結果可以斷言；如果他的存在是經發現了，他將是早已消滅了。加之，人類永遠是願意相信百分之九十是假定的祕密之揭發，而不願相信百分之百是眞確的更正。

尤其是在大戰後初年的這些人們，他們不願意接受用武力逼成的結局。在他們心目中，如果不能將戰事失敗歸咎到某一種不可思議的原因去，那麼，德國在大戰時可贊佩的行爲將失掉一切的價值。西格斐力（Siegfried）之死是誤於菩提樹葉，巴爾杜（Baldur）是被一種寄生的植物所刺死的。所有這些無稽的故事似乎預示德國所遭的運命。這個俯臨世界的強國之失敗是由於一種卑劣的，可厭的，無意義的，看不見的東西。在巴爾（Baloo）所開一個猶太教大會。他們不願意承認一個光榮的戰爭可以在光榮中失敗去；他們反覺得死於猶太的蠱蟲身上比較死於劍鋒還有榮

耀。『這是由於猶太人的罪惡，』這一句話便成爲低能的賭徒之再好不過的安慰話了。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便是大戰後頭幾年一般民衆的反猶太主義之所由來。隨後，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同柏林的國社主義者對於這問題確定了更見深切的意構；然而羅森培永是固持着西溫長老議定書裏的故事。

#### 八 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信念

從他開始活動以來，希特勒有了極重大的進化。是向更好的方面嗎？在他自己的政黨裏面，那些批評的精神曾以理智替代他的原始主義，曾定立仇視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政綱之嘗試。他們有充足的理由嗎？反猶太主義不再爲反抗幾十個猶太主義的陰謀而鬪爭，而爲着反抗猶太的精神對於文化與經濟之破壞而鬪爭，這種反猶太主義當然更容易同受過教育的階級親近，或許也容易同敵人親近。然而他卻離開了政治的實際，後者須有具體的敵人做對象——也同社會主義一樣，一旦牠不攻擊資本主義的剝削者而攻擊資本主義本身，牠便失掉牠的力量了。可是，我們

可以相信希特勒，雖然他的外交技術有進步，他的心坎裏面還留有猶太的不軌之徒蓄意叛亂之信念。在一九二五年，他還是說：「佛蘭克福日報不斷以西溫長老議定書之原稿爲捏造而呻吟；這便是再好不過的證明這個原稿是正確的。」人們雖然是趨於進化，而總不輕易消滅這一類的信念。

然而，希特勒所手創的方略包含了好些錯謬，倒無甚關係，如果後者確是有用的；主要的地方是他做到使這種方略戰勝了事實。

## 九 奇異的神經衰弱

靠着這個方略，希特勒並且能夠戰勝了他之天生的弱點。這個被矛盾的趨向所統亂的心腸，這個不固定的性格，這個感覺靈敏的心靈，這個對着強有力者而露出如此怯懦的膽量；所有這些弱點都被腦筋所制馭了。這個人呢，他，當閒暇的時候，對你們現出怯懦的狀態，他，當着謙虛的客人面前，并不裝模作態，他絲毫不傲慢的任他的感覺力隨意動作，他放任他的前後左右凌亂不堪，他

可以將次要的事件擱起好幾個月，他有時爲着疏忽卻把他的組織之重要的部份棄與他人——到了關鍵所在的時間，在精力上這個人是超過他所有的同事。他事先即在好幾天中，甚而至於在好幾個星期中，籌算他的手段，準備他的論證，自己增加了毅力，而即在開始論爭之前，他已穩有勝利的把握了。那時候，他懂得運用他天生的激烈性情，而當他放縱不羈時候，任何聰明人物都要緘口無聲。

可是他所要求的恰在這個地方。在安靜的時期中，他可以全任他比較溫和的同事哄騙他以及指導他；但是他們應當保有他的寵遇，不然的話，他們將成爲不幸者了。他的同伴們，如年青的埃塞之類，曾用嘆賞的口吻贊揚他決斷力之敏捷，然而這些人們那會想到他是徹夜準備着第二天驀然以已經預備好的主意壓倒委員會的委員們呢。

可是，那些不滿意的份子，卻以與此相反的指摘他，即是說他沒有主意。有人說，要引導希特勒同某個人發表意見，這將費九牛二虎之力，而黨的重要人物，如區領袖 Gantfuhrer 等等，爲這個問題費了幾個月工夫而終是無效。似乎這種地方絕不是一個黨領袖的合於理想的行徑，然而

這乃是主人翁的行徑。提比略對他的倖臣，大腓特力對他的地主，拿破侖對他的將帥，都並沒有異於此者的待遇。或許這種懈怠地方是不甚適合於現時代的國家之進展，這個國家自從俾斯麥死後，無須再受統治而須受奉事。但是國社黨，在這個時候，還是處於封建時代的狀況；他是像有了近於各自為政的權臣之從前的土耳其朝廷一樣。在那種地方遷延時日以待良機，并不是性格上有什么缺點，卻是對待視私利重於公益的權臣們之聰明辦法的證據。

性情不固定的希特勒，對於他自己的理想，卻三分的執拗，而因此使政治臺面的愛美家覺得可厭——可是羣衆卻不覺得可厭，後者卻不是愛美的。這種易受影響的神經系所構造的腦筋，永是將這種神經系導入牠所斷然認為良好的路徑裏去；猶同磁針一樣，雖是擺動不止，終於永遠指向南方。

希特勒的敵人們愛述會有深切認識希特勒之機會的羅梭將軍 (General von Lossow) 所說的幾句話：「在最初時候，希特勒之帶有感動性與誘惑性的口才曾使我產生了一種重大的印象。但是到了每次我再見着他的時候，這種首次的印象總是逐漸減退。我覺得他的長篇演講的

內容永是同樣的東西……」無疑的，政治的人物總是向握有政權的人物誅求同樣的東西，這是不能滿足人意的，尤其是後者是決定了絕不肯答應他的要求。羅梭將軍若是聽到希特勒有時對他作其他問題的談話，他將較見滿意。可是，照這樣，希特勒將成爲一個故事講述者，而不是一個政治的人物了。

## 十 犀利的外交辭令

如上面所述，希特勒懂得以外交家的方法利用他缺乏自制力的弱點。他同羅梭爭論之一幕是饒有趣味的，經過了好些時候，他諄諄勸羅梭將軍向柏林進兵。起初羅梭聽從希特勒與嘉爾的誘導而起兵叛變，隨後他又覺得不稱意。在審判危害國家的案件當中，希特勒宣稱：「羅梭將軍是坐在那邊，不勝其煩悶。」——「這是極可能的，」羅梭以證人的立場切齒地說：「因爲我是被希特勒的聒絮不休的談論所煩悶着了。」上流人物的羅梭，想以有禮貌的毫不在乎的態度使希特勒理會到他希特勒的出面實使他受犧牲了。而如胡根培（Hugenberg），如布魯寧（Bruning），如與

登堡，都可以將這點證明出來；當希特勒爲雄辯的魔神所驅使時候，他什麼東西都聽不到，都看不到，人家不能夠用有禮貌的暗示將他趕走。

不過希特勒若是有了斟酌的時間，他也會用外交手段來答覆。比方說，在這一二次審判當中，人家訊問他從什麼地方得到他的經濟來源，不能夠推辭不答，於是他，目光如炬，發尖聲說道：「巴爾馬（Barnat）與古提斯克（Kutisker）的政黨，巴爾威斯（Parvus）斯克拉斯（Sklarz）查可伯戈爾斯密特（Jacob Goldschmidt）的政黨，猶太百萬富翁羅森斐德（Rosenfeld）的政黨，都妄想可以假借一種思想使他們的黨徒刻刻在德國人民之前犧牲熱血及性命與以擁護；像我們現在有了發展，這是靠着整萬成千的德國青年的犧牲精神，絕不怕流血的犧牲，從早到晚緊握敵人的咽喉，不到使他終於躺倒地上終不罷手……」從這個時候起，法庭書記官再無須記錄被告的供詞了，爲着爲極端高興所狂亂的聽衆卻替後者免除了解釋財政來源的麻煩。

如果人家訊問他關於南提羅爾的問題，這個問題，對着有右傾色彩的聽衆之前，是很難於回答的，希特勒卻有了已經預備好了的答覆：「背負南提羅爾者不是我們，他說，卻是在一九一八年

死於德國軍隊背上的人們。」如果他之舊日共同奮鬥而今日感情破裂的同伴，格拉夫（Von Graefe）先生，向他問道，他還是從前平凡的擊鼓人呢，或者已經是明日之凱撒呢？他便回答道：「格拉夫先生，不必再對我提起過去的擊鼓人罷。我現在是而且永遠是鼓動國民起來的鼓，但不是爲你與你的同類而設的。」

在這些地方，他實表現出并不平凡的機巧：旁敲側擊與張帆逆風前進的技術。希特勒十三分領會應該如何躲避，如何默默不作聲，如何裝假作態，使聽衆對他生出急性的老實人的幻象。最費事的「雅緻動作」，在他看去，是類似不可測的禍事，而他并且急速從捷徑逃去了。

## 十一 信約

希特勒所訂立的協定和他所發的信約，實不算爲他這種外交手段之比較少有興趣的一面。凡同他約定某種事件的人們，須於事後承認他們所了解的與對方所了解的是完全不同。巴伐尼亞警察大佐賽士（Saiger）便遇到這種情形，他以爲從希特勒口裏得到他不企圖暴動的約定。



然而看吧！希特勒所說的恰恰與此相反。直到某種時間，他不企圖暴動，但是過了這個時間，希特勒便自命無復遵守信義的義務與保證之必要了。

或許賽士大佐是個呆子，所以不能深切了解希特勒的保證。然而羅梭將軍也確認得到希特勒同樣的保證。看吧！他也誤解這個大演講家的話了。而且，經過多年後，情形還是一樣的。胡根培與布魯寧也輪到他們身上得了不容易了解希特勒的信約之經驗。當一九三二年，與登堡總統聽到希特勒說出默認巴本（Von Papen）內閣之保證後，老元帥也輪到他身上不了解希特勒的保證。而當希特勒對他表示要取得全部政權時候，與登堡總統又重新誤會他的話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希特勒曾故意的對巴伐尼亞內務部長施衛愛（Schweyer）說：「部長先生，我給你一個信約，我是永遠不做暴動的。」施衛愛隨後便懂得一個信約，經過三個月後，便可使說者無遵守的義務了。而當人家對他堅持信義的時候，這總是希特勒在精神上覺得最見忿怒與最受侮辱。他的許諾既然這麼多次受了誤解，我們可以作下面一個結論：被燥急的性情所拖累的希特勒實從來不知道他所保證的確是什麼，而人們不應認他是像一個說十分可靠的話之對手。一到他認為合

式的時候，他便立刻背棄他的許諾，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自命爲正人君子。

有一個作傳記者蕭特 (Schott)，稱呼這個有時任他的神經自由動作有時冷酷地從中利用的希特勒爲「熱心人」與「夢想者」。蕭特并不比較強過於那些大部份人們曾經從事解說希特勒之難於了解的言語，他也不曾懂得一個政治演講家須具有用劇厲的聲調說明久經成熟的思想之天才。希特勒在他所著的書裏面，幾乎用了忿怒萬分的態度反對視他爲普通理想之使用者或視他爲宗教之幻想者的人們，可是這種曾經採用的影像，用於熱烈的擁護者的手裏，當然好過用於反對者的手裏。聖張伯倫 (St. Chamberlain) 最崇拜他的人中之一個，或許也是國社黨之最有名於世界的黨員，於一九二三年向希特勒所寫下面的話是比較切近事實：「你完全不像人家對我所說的樣子：一個狂熱者；我對你卻有了與狂熱者恰恰相反的評斷。狂熱者是想使人們信其理想爲真確，你是想說服人們。」

## 十二 希特勒的外表

希特勒是傲慢自尊的，直到了非常的程度。拿破侖、哥德、俾斯麥都也同他一樣，不過稍爲精細一點。腓特力·柴恩霍斯特（Behanhorst）列寧可就不是那樣了。以他本身而論，傲慢不算是一種可嘉的行爲，也不算是一種可恥的行爲；全看人們從傲慢裏所表現的是什麼樣。『我所說的同我所做的全有歷史的價值！』他出場之初所說這一句話是到了極端的界線，而與兒戲的創造的意識相隔絕了。

在最初時候，他的自誇心是以消極的方式表現出來；他禁止人們廣布他的照片……在這種禁止裏面，或許他有着關於身體上的理由：他從前曾有一點下鬚，在大戰後頭幾年還留着，他等候他的左右并同他本身先看慣了他的新面目。無論如何，他是面目不會被人認識之人，而爲着這個資格，他成爲一種足以幻惑人的神祕者了！『這個希特勒，他的面目是什麼樣？』這一個疑問淆惑了慕尼黑居民，其程度不下於幾年後所發生下面另一個疑問：『政府所不許公開說話的希特勒到底是什麼人呢？』然而這種圍繞於他身上的神祕還不僅是一種宣傳的奇計呢。人類具有自然的本性，無須表露於他的同伴之前。人們若是問希特勒關於他的私人生活，這便使他感覺不快。他

的朋友赫斯可作下面的保證：「即是關於這一方面，我知道他是純淨的。」而他的左右卻不見信。或許他實沒有什麼須與掩飾的地方。各方的觀察都認為希特勒是屬於那種簡簡單單的無在人前自顯之能力的人們裏面。凡對他信任者便應該信仰他，無須要求解釋。由是，他可以利用那種神祕，使他的黨徒更密切的依附於他——預言家們早已認識這個方法了。

他的文人服裝——在今日他還是故意叫次一等的裁縫製造——在他開始出臺的時候，便使他顯出不同於右派政黨的首領們之老舊花樣的制服。後來他最常穿挺進隊的制服，藉以使軍人們想到他是他們的最高領袖。可是經過那一次，作完兩個鐘頭的熱烈演講後，他的領子僅成一條環繞脖子之溼透的細繩，頭髮膠黏鬢角，袖子縮到裏面，鈕扣脫落，以後他纔穿得像樣了。

爲着要在大衆面前裝出一種大政治家的儀表起見，他於是想出一種或是媲美拿破侖的叉着手臂的態度：他將兩邊手臂下段平行着，與上段成爲直角，一邊的肘部放於一隻手掌心中。這種姿勢便使他具着十足的威嚴的儀貌。

他的面目呢，實使他的信徒陷於爲難的境地，而使他的敵人有存心不良的快意。要使他具有

有作爲的面貌，這實是毫無辦法的。慕尼黑的人類學者與人種改良學者格魯白 (Von Gruber) 說他那種容貌是低劣的人種之表現，格魯白并且極力與以證明。那種深金栗色的髮縷，鼻下之小毛刷都是再凡俗不過的。在他身上，至多不過是有着炯炯的目光。當他態度激昂時候，可使大家覺得好像遇着一個不知名之人，而後者忽然闡發了幾百萬個不知名之人的思想。可是三年前，在壕裏面，爲着這種思想，不知名的同伴們卻當面譏誚他。從這裏面，我們或許得到了希特勒的整個性格的關鍵：一種中等的性格擴展到牠之最高的表現。

進一步說，有作爲的人物難道總具有作爲的面貌嗎？我們對於那些自命具有哥德或拿破侖的面貌的人們，都生了不信任的感想；而真正的大人物，其相貌往往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好些時代風行的畫像，特別是十九世紀的，慣將不規則的形態，甚至於多病的形態，改裝爲英武的模樣，而其實那種不規則的形態卻往往表現出強盛的能力呢。祇要將墨索里尼的面貌與希特勒之經過裝飾的照片相比較，大家便可以覺得這個雄偉的狄克推多是如何顯得有人性的與布爾哇的 (Bourgeois) 希特勒之無足取的外貌絲毫不足傷害他的偉大，但卻足以證明這一個事實，他所

做的模樣是與其他偉大人物所表現於學校教科書的一樣。

在最近這幾年中，希特勒的面貌曾有了好幾番的更改。最初，他裝出一種有作爲的姿態。運命之神似乎曾用無機的物質將一個人物依照模型改裝。最近在他身上曾出現未老先衰與精神昏昧的症象。

希特勒的病象在病理學問題上已到如何之程度，關於這一點，他的醫生眼前還保守秘密。可是病症的現象實瞞不了常常看見他的人。從他之憂鬱症時常發作，他之避人獨居，以及有時他之不負責任的演辭看來，我們或能夠看到上述病症的徵象。

### 十三 一個榜樣

下面有一段絕妙的描寫：

「他具有一種鮮明的，敏捷的，創造的智慧；他所起草的宣言，雖然文字粗俗是無可否認的，卻顯出是特奇的與有力量的；總而言之，最重要之點，是他具着一種說不盡的，天生的與使人一目了然

然的演說家之天才。

「有一天，在開會議當中，發生了下面的事件：社會民主黨人散布一種傳單，在那裏面，他被形容爲一個瘋人與一個無恥的取媚於人民之徒。有人將這傳單帶到議事室來。他拿來念着而勃然變色。在我們眼中看去，他好像高大起來。他的目光好像射出火焰。他用拳頭猛拍桌面而開口說話。他所說的話不僅是沒有價值的，而且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發誓要在「向全體的勞動者說明社會民主黨之狡詐及其無恥」後，將「不使社會民主黨存在於人間，」他還說了許多不足置信的話。然而這并不是他演辭的意義使我們發生了一種印象。我常常聽到白比爾（Behal）與左萊斯（Jahob）說話。他們裏面，從來沒有一個人有同他那樣的感動聽衆，而這樣，不是在民衆的會場裏面——在那裏面是很容易說話的，但是在一所小小的房間裏面，對着幾個聚在一起開會議的人，仗了一篇幾乎完全充滿着威嚇的演辭。他擁有一種確實的演講的天才，當聽到他狂急的咒罵後，我於是了解這個人是靠着什麼擺得了羣衆并且得到他們的服從。到我對他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後，我覺得他並沒有強大的與熱烈的革命之熱忱。」

上面那一段所描寫的對象，乃是曾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組織著名的「紅色星期日」之俄國教士嘉彭（Gapone）。口述者乃是恐怖主義者波力斯沙文考（Boris Sawinkow）。那裏面，每一個字都可以用於希特勒身上。即以這兩個人物的政治腳色而論，也是相類似的。嘉彭也不會成爲一個純粹的革命家，但做了一種所謂「皇帝陛下之最忠誠的反叛者。」所以他被指爲一個煽亂內部之人，最初他並不是這樣的。後來他於一所荒僻的別墅裏面被他的同伴們所「處死。」無疑的，對於希特勒方面，我們不應談到關於煽動內部這一回事。然而，到了他的地位提高之後，他便委棄他的黨徒們所與他之忠實代理人的任務，因爲這樣，黨之帶無產階級色彩的原始創辦人對他表示不信任顯得是有理由的了。照沙文考所說，嘉彭也擁有希特勒所具備的特長：當他所需要的時候，他也會同任何人相融合，並且會在對談者的心目中裝出後者所希望於他的面目。在嘉彭身上猶同在希特勒身上，有着同樣的關於他們的身份的來歷以及他們政治的經歷之神祕，有着同樣的對於同伴之孤立，有着同樣的關於私人生活之暗幕。



#### 十四 希特勒的演講體裁

希特勒之關於智識上的頭一種嗜好是歷史，第二種嗜好是美術。這是大戰前的一般德國中學生的習慣：學校是那樣地督率他們。希特勒是忠守着這兩種遺傳的嗜好。國社黨的標識、演劇、檢閱與建築物等等大部份都出於他的意構。我們不要看這種地方僅是鍍金作用之單純的嗜好。費好些天的工夫來爲挺進隊繪畫一面切於實用的旗幟或是爲國社黨大會畫一面紀念牌，希特勒卻不以爲這是無用處的。這便可由這些標識所得到的宣傳的功効證明出來；因爲他們可以靠着旗幟而不靠着談判來引誘羣衆，希特勒於是可以安心地費他一部份時間專心來畫旗幟了。以美術的作品而論，他的創造實表現出一種廣告式的粗野的格調。在那些旗幟裏面，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半是取材於拿破崙的旗幟的，一半是取材於蒙利亞而（Monreale）的。希特勒的作風是完全趨向於哥特克式的。他的美術理論爲中學生所受美術的教育與種族的社會學之一種混合物。因此，在他看去，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必屬於北方派的纔有美之可言。爲了他認表情派爲代表猶

太——鮑爾雪維克的色彩深邃與痛絕，爲了他完全不懂大戰時與大戰後所產生的表情派的創造與哥特克藝術相連結的關係，我們對於他的美術意義與種族意義的價值可以表示失望了。

然而主要之點仍是存在着：他是一個偉大的演講家。

當他在一句話當中失掉邏輯的線索時候，他並不現出遲疑不能連接的態度；他不曾感覺有過量地考究造句法的麻煩；他不怕使用粗俗的材料來說話，只要能使他所說的話顯得是有力量的；上面這種事實已經使他成爲大演講家之預先指定了。

更稀罕的才質，乃是他的不僅能夠絕對的支配造句法，他並且能夠支配演講辭的題目。一個演講家往往墜入思想的迷宮裏，其情況常常遠爲大部份的聽衆所發覺不到；主要的地方是不要使人們見到在那迷宮裏面有長時間的迷誤，是要自己曉得趕快在那裏面找一張凳子坐下，而湊出時間來找一條出路。

可是，希特勒之最卓絕的天才，乃是在聽衆萬目睽睽之下，懂得與言辭之無可避免的障礙相抗戰。世間有些演講家往往因發言錯誤而現出激昂的態度，使聽衆看不見他的缺點，而所看見的

乃是戰勝這個缺點的人，並且向這戰勝者鼓掌贊揚。

在這個時期的所有那些曾向德國羣衆說話的演講家之中，希特勒算是最熱烈的與最有奮鬥精神的。無疑的，人們極願意聽聆他所說的話。一個中等的身材在講臺上大踏步踱來踱去，雙手向空所作種種姿勢——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並不會增加修飾他所說的話，但卻絕妙的表現他的精神，並且使聽衆深受感動。而當他如鳥爪樣的食指指向聽衆時候，每個人都覺到對於德國國家的罪惡實負了責任。

這是爲着站在講臺上的人是不作辯論的，他是來作戰的。羣衆看不到敵人，他們並不理會到敵人乃存在於這個奮鬥者自己心中。他爲着反對國家之分崩離析，爲着反對羣衆之不過問政治，爲着反對舊的與新的當權人物之有罪的錯誤行爲而奮鬥；可是，實則他同時也爲着反對他自己曾經做過的馬克思主義者，爲着反對不肖的生徒，爲着反對曾於一九二二年錯過機會的，曾於一九二三年兩度自相殘殺的，不於一九三〇年奪取政權的以及曾於一九三二年任政權脫手而去的猶疑不決之人，而奮鬥呢。他猶同高年的修行家一樣，爲着反抗自身的恐怖，爲着反抗自己的魔

邪而奮鬪——在這裏面，談不上革命的鼓動，也談不上演講的運動，不過玩魔術而已。這樣，他儘可以講他所喜歡的話；即使他說月亮是一塊圓的牛奶餅，大家將照樣的鼓掌。當一顆炸彈吊下來時候，就沒有人去考究牠到底漆的是綠色呢還是灰色呢。

當他於一九二三年深切認定無反攻之可能的時候，他大聲喊道：『假使六千萬人民祇懷着一種志願：極端自命爲國家主義者，武器便從他們的拳頭射出來了。』

當他在一九三二年認定無當選爲德國總統之希望的時候，他於柏林體育宮對敵人厲聲喊道：『你們儘管說幾百遍：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走開——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不管怎樣總要把你們推翻。』

而這樣，在強有力的黨徒大聲鼓掌之下，屋宇震驚了；這樣，幾百萬人次日在報紙上看到這些話震驚了；這樣，國家望而震驚了。

## 十五 批評

戈培爾——他的徒弟并曾短時期做過他的敵人——斷定他是「一個頭一等的偉大的人物。」希特勒確是像戈培爾所說的麼？

以民衆的演講家之身份而言，希特勒確是歷史上所未有之最偉大的人物；較之克利安（Cleon）或瓦特提雷（Walker Tyler）或李恩齊（Rienzi），他實是有過之無不及的；若是僅以他所煽動的人數來講，他是超過彼得達米安（Pierre D'Amiens）與穆罕默德的。在現代的歐洲，我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比得上他的。

那些熱烈擁護他的人們認他是與路德（Luther）並駕齊驅的。確然，他是具些路德之政治天才的。然而，關於良知所表現的地方，這種偉大性，在他態度激昂奮發當中所發出來的，恰恰是缺乏了。他的演講與文章之由於沈思與由於邏輯所成就的及以準確見稱使人信服的那幾部份，常常不見得超過一般中等的智識。而尤其是，那幾部份并無特異之點，不過是他將所聞見敘述出來而已。

一個政治人物可以裝出平凡的样子，這是不錯的。可是，當我們考究希特勒那些宣言之平凡

地方的時候，我們不應當蔑視其與經驗相配合以求實現一種政治的目標之才識。

有歷史上價值之偉大性，並不是基於才能或基於性格的，而乃是運命之賜與。牠往往客於賦與最偉大的人物，而卻賦與平凡的人們，英雄往往不能造出時勢；而時勢卻常常造出英雄。那些翻天覆地的大人物，能爲他所利用以活動的環境謀得福利，這乃是罕見的事實。充其量不過是後世認本身乃屬於他們所創造，對他們表示頌揚而已。

希特勒爲一個偉大的翻天覆地人物，這是毫無疑議的。他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創造者麼？國社運動的組織僅一部份是他的成績；屬於他所特有的，乃是一種巧妙絕倫的政治之指導。這種政治之最顯著的性質，乃是牠爲着達到目的起見，情願採取最長遠的與最困難的路徑；但同時也是最易於高瞻遠矚的路徑，在那裏邊，不至於遇到任何之事先料不到的障礙。

這便是國社黨在德國爲達到目的而採取的路徑。爲德國着想，在人民裏面會有與牠相類似的路徑嗎？也像牠是困難的但又是穩當的路徑嗎？

## 第四章 一九二一年

### 一 挺進隊之組織

當希特勒在國社黨內部取得總理的地位之後，他便下手將這種屬於議事的最高權改成一種實權。因為直到那個時候，他所擁有的權限，在事實上，僅是在宣傳品上面簽個名字而已。同了他的幾個信徒與新進的黨員，他於是鍛鍊了統馭國社黨的利器：挺進隊（Sturmabteilung，簡稱為 S. A.）。

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國社黨曾有着「秩序維持隊」的組織；到了一九二一年年頭，這種秩序維持隊便分組為百人團。實際上，這乃是一種搗亂者與打手的團體，牠的任務是在那些會場裏面驅逐反對者。其他的政黨都絕不懂得這一套，而在國社黨出現之前，人們沒有感覺到玩這一套

之必要。那些軍人所組織的團體，如奧伯蘭、阿格赤之類，實際上並不加入那些政黨的內部；牠們只想做而且是只配做那種用以實現那些重大的主張之工具，而關於那些主張，牠們的領袖本身僅僅有着極其空泛的理想。這樣，牠們變成操縱牠們之野心的政治家之工具，是無可避免的了。同樣，在那時候，有一批放在貯藏所的軍火，是屬於那些曉得牠之祕藏所在的人們所有的。

在他給與這些具有奮鬥精神的青年們一種新的組織時候，希特勒實是向政治裏面灌輸了一種簇新的花樣。挺進隊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三日。關於牠的成立宣言是如下：

「國社黨在牠的組織裏面成立一個體育隊。體育隊的目的是於年青的黨員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絡，使一個似鐵一般的組織樹立起來，以其全副的力量供給黨隨時運用，而在進攻敵人的時候，牠將爲摧堅擊銳的利器。體育隊應當受一般自由的民族所應有的尚武精神之鍛鍊，並對這種精神應當堅持不懈。牠應當防衛領袖們所努力的宣傳工作。牠特別應當使我們青年黨員心中常存不可悔的勇往邁進的毅力；使他們腦中永遠銘記時勢不創造英雄而乃是英雄創造時勢；使他們知道自甘束手就縛忍受奴隸待遇之人，其遭受壓迫乃是應得之份的。牠還應



當訓練牠的各份子，使之對於同志彼此忠誠相與，對於領袖踴躍服從……本黨指導部盼望各同志一致參加；前途是靠在你們身上的。」

#### 國社黨指導部

體育委員會主席克林赤 (Klinzsch) 同志

這篇宣言的原文，明白指示這個體育隊內中包含的重要性是遠過於牠之名目的。體育隊這一個名稱，無非是一種笨拙的矯飾，這是顯然的。到底，真實的與確定的名稱，不久便隨行動與追求的目標而產生出來了。

照那一篇宣言所說的，牠的目標是：製造一種摧堅擊銳的利器，鍛鍊尚武的精神，保護黨的領袖與訓練黨員使做不會有明白規定的活動。這樣，我們可將這不明顯的辭氣——因為對於警察方面須採取慎重的態度——尋譯如下：兇毆敵人，演習軍事訓練，將持反對議論的人們趕出會場與做暴動的準備。這確是挺進隊裏的人物所懷的見解，而牠的首領克林赤便於體育隊成立後兩個月，將這個不懷惡意的與合法的「體育隊」名稱改為「挺進隊。」在人民觀察報上就有「挺

進隊的消息』那樣的整個寫出來。不久之後，S. A. 的簡寫便現出來了。任何地方都不曾指明這個 S. A. 簡寫可作『保安隊』(Sicherheit-Abteilung) 解釋。幽默者乃指爲是『合唱隊』(Singabteilung) 的簡寫。

在對他的隊伍所作之第一次訓話裏面，希特勒宣稱：『挺進隊不僅爲防衛本黨的利器，牠首先應爲反對國內敵人而準備解放的鬪爭之大本營。』後來，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所發的通告裏面，我們看到有下面這一段話：『挺進隊是一個隊伍：牠應當像隊伍一樣，不但須爲防護本黨之集會而抵抗一切狂暴的行爲，且牠自己也應採取攻勢。』

因爲，從一九一九年之流血的日子以來，從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之加勒暴動以來，進攻敵人便爲挺進隊之根本的氣質。其實，挺進隊無非是繼承流戍於慕尼黑之愛拉爾特旅團的任務而已。

愛拉爾特旅團是有牠本身之歷史的。

## 二 一九二〇年之巴伐尼亞軍隊的狀況

赤色的慕尼黑被國防軍與義勇隊——愛拉爾特旅團也包括在那裏面——克服之後，巴伐尼亞是陷於正規軍與非正規軍的手裏。靠在軍隊的領袖們之彼此離異與缺乏目標，於是社會民主黨與巴伐尼亞人民黨所組織的資產階級的政府，還能夠支持一年之久。

羅姆大尉乃為愛勃旅團之政治的主腦，隨後又為國防軍之地方參謀部的政治的主腦。那個強有力的巴伐尼亞義勇軍的組織乃是他所手創的，隨後森林稽查員愛區里黑(Eisacherich)把這個組織編製成了一種國民義勇軍。在必要的時候，這種各人備有槍枝之資產階級的軍隊，可以供給十萬之多的人數。然而，不論羅姆是如何迅速的使愛勃發令將軍火及各種軍用品供給義勇軍，不論從前之參謀部長官海爾曼克利伯爾中佐(Lieutenant-Colonel Hermann Kriebel)是如何機巧的使愛區里黑總部組織起來，——義勇軍自從牠之開始的時候，是有了過多的人數。牠永遠不能做出一種名副其實的革民行動。霍夫曼政府以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被愛區里黑及

受國防軍統領摩爾將軍 (General von Mohl) 所推動之幾個軍官所顛覆。照敘述這一次事變的官方報告書所說，愛區里黑「藉着上巴伐尼亞省長與慕尼黑之警察當局的許可，」組織了一個代表團，便是這個代表團將這個氣息奄奄的霍夫曼內閣推翻了。代表團是包括着：摩爾、愛區里黑、嘉爾省長、包勒警察總監、克利伯爾與學生何夫曼。

嘉爾充當巴伐尼亞首相之後，他很體面的誇獎這個靠他之許可而後爆發的革命。他之被選為首相，可以說是議會派對於軍人派之得到一半的勝利。因為嘉爾本身雖然是基督教徒與為一個自由主義之官吏的兒子，但他卻是天主教的巴伐尼亞人民黨之一份子；他具有超過一般人的魯鈍性，上帝，在他動怒之中，卻把他這樣人送到政治裏邊了。照他的外貌看去，嘉爾是一個矮小的匈奴種，生成豐厚的脊部並帶褐色的皮膚——巴伐尼亞卻並不少見這種人物；在政治方面看去，他無非是由一個逞而走險的資產者而做到首相，他認識人民的心理，且愛護他的王子。在他之舊王朝的官吏心目中，共和政制是等於不會存在的，他的政策卻是違反共和政制的志願而行動。對一個不會存在着的生命給與一種致命的打擊，他覺得這是很無謂的。

### 三 義勇軍之沒落

在巴伐尼亞邦內，總而言之，共和政制僅是於名義上存在着；在那個地方，兩種矛盾的趨向相對立。其一是天主教的，反普魯士的與反猶太的趨向（反猶太運動是爲着孤爾特愛斯勒之冒險行爲而變本加厲），這一種趨向是想在政治上保持巴伐尼亞的特性；牠想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巴伐尼亞，而牠覺得這個目標是似乎完全達到了的；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德意志，當然是一件可慶幸的事情，但是若無堅強的巴伐尼亞自治之存在，上面的理想是不能構成的。代表這一個趨向者爲巴伐尼亞人民黨（領導人爲赫姆博士 Dr. Heim 與黑爾德博士 Dr. Held），嘉爾愛區里黑以及其他保王黨人。魯博烈黑特王子（Prince Rupprecht）知道須要避免公開的參加其中，可是用他的名義——猶同用浮爾哈伯主教（Cardinal von Faulhaber）的名義一樣——所發表之意義顯明的宣言，實是很無謂的。

在敵人的營壘裏面那些人們，雖然是巴伐尼亞的優良份子，但首先是向德意志着想。在他們

看去，整個的局面是重要過於局部的局面。他們之當然的領袖爲魯登道夫，他們之最出色的政治的首腦乃是希特勒。

聯盟國受在柯尼斯廣場 (Königsplatz) 所舉行之大檢閱所恐嚇，於是強要德國政府解散義勇軍。微爾斯 (Wirth) 內閣將解散的命令傳到慕尼黑。巴伐尼亞方面便爲着這一番舉動而狂怒不可遏。譬如希特勒，他便向中央政府宣稱：「你們在派遣專使來此地之前，該當再三考慮，不然的話，恐怕你們在柏林找不到那麼多的醫生以抽去你們的專員的腦殼所中的啤酒瓶碎片。」

軍人們相信舉事的時期已經到了——雖然他們自己也認識義勇軍的力量是薄弱的。政客們卻以爲讓步是比較合算的。到了黑爾德博士，以巴伐尼亞人民黨及國家利益的名義，要求解散義勇軍。愛區里黑遂表示屈服。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府簽發解散義勇軍的命令，而嘉爾所主持的巴伐尼亞政府，在一種挽回面子之滑稽的企圖中，只將命令登載於公報裏面而不加以批評。固然如此，他的首相和政治領袖的權威卻因此遭受極其重大的打擊。至於愛區里黑則從這一次事情後，再不出現於政治的舞臺上了。

#### 四 O. C.之變爲S. A. (挺進隊)

從那個時候起，小的軍人團體之重要性是蒸蒸日上的。那些團體爲大部份沒有家庭的青年所組織的，他們將全副精神費在那裏面。他們常常是同時兼有僱傭兵與理想者之身份的。不錯的，在利害關頭的環境當中，他們也有一部份捲入漩渦。在他們裏面，有些從前是學生或是執有文憑找尋職業的人們。奧伯蘭義勇隊於一九二一年在西勒西亞曾表現了奮鬥精神，而且在那個地方得到勝利；愛拉爾特旅團被解散於普魯士而用「康樹組織」(Organisation Consul，簡稱爲O. C.)的名義繼續存在於慕尼黑；牠與羅斯巴克義勇隊的殘部聯合起來。曾有確實爲理想所支配並站在各黨派之上的青年熱情表現最良好的奧伯蘭義勇隊，是採取獨立態度的。反之，愛拉爾特的徒衆卻幾乎全部投歸希特勒。挺進隊便是以後面的份子組織成功的。

希特勒之獲得這種力量的補助特別是由於愛斯柏格暗殺案件。好些O. C.的份子，卽如海軍中尉基林格(Killingen)之類，是與這個案件有牽連的；在司法機關追究之下，他們的組織不能

夠繼續存在。在鋼盔上面鑄有卍字符號的老軍人須要投歸新的組織。羅姆——慕尼黑所有一切軍人團體的領袖——便將他們傾注於新近成立的挺進隊裏面。愛拉爾特本人也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志願而與希特勒磋商，並將他的官佐讓與希特勒，那些官佐便充當新組織的教練官。挺進隊之頭一個首領，克林赤，即是曾爲愛拉爾特的助手。他當時的同事，如基林格與何夫曼，眼前還在國社黨裏面充當重要的角色。這些人從前對於愛拉爾特曾有熱烈的感情，他們在經過許久時間當中，還認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領袖；可是，受了國社主義的吸引力作用，愛拉爾特旅團在事實上是溶化於國社黨了；唯有少許的殘餘以『維經團體』（Association Vikings）的名目還散散漫漫地繼續存在了好幾年。此外，挺進隊成立不久之後，克林赤因被控有鼓動暗殺愛斯柏格的行爲而在監獄裏面過了幾個月，希特勒會趁這個機會用一種非常的熱忱表示與他是心心相印的。

挺進隊與O.C.歸併成功，羅姆達到他所最切望的目標之一：國社黨軍隊化。挺進隊之成立是與義勇軍之解散同時發生的。從義勇軍解散後，慕尼黑國防軍的創辦人對巴伐尼亞政府採取一種不信任的與仇視的態度。同時，挺進隊與國社黨是依照這種態度而決定牠們政治的步驟。



但是，在羅姆剛達到他的目標時候，他即有保守他所獲得的他位之必要。而他之取防備的對象不是別人而卻是希特勒。後者希望得到做他之政治工具的一個隊伍，他所需要的是正如挺進隊之領袖們所用輕蔑的口吻喚作「裱貼廣告的隊伍」那個模樣，換句話說，依希特勒看去，一個挺進的隊伍，其力量可以在街面橫行，牠纔成爲黨的骨幹，牠纔可以巡行街面而爲黨做廣告。羅姆卻是不然，他想組織一種祕密的軍隊，後者盡牠之可能的範圍之內，代替那種爲條約所不許可的軍隊的地位。「這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厲聲喊道。以他之老資格的軍人的地位而言，他十三分明瞭一種有用的軍事準備是非經過兩年之嚴厲的訓練不可的；進一步說，一個軍隊不經軍事裁判所之制裁而成立，乃是一個不合理的事情；挺進隊的份子將永遠不是良好的兵士，如果他們的領袖不能使他們受鐵窗風味的威脅。

羅姆呢，他同樣是一個老資格的軍人，他卻有較柔性的表示：只要環境對他不成問題，他便作滿足其慾望的準備。這樣，在他們兩個曾有親密之友誼的朋友中間，發生和氣的衝突，但這種衝突有時也現出尖銳的形態，我們可從黨的歷史過程裏面，常常看到這個現象：即文武兩方之永遠不

可避免的衝突。

### 五 國社黨之精銳份子

在這一時期當中，希特勒認為挺進隊在國社黨內部之發展是比較國社黨本身之發展還見重要的，換句話說，他所企圖的乃是挺進隊攫取國社黨的權力。他想放棄舊有的德謨克拉西式的組織，而代以一種具有無數觸手的機械，祇須撥動牠的樞紐，便可使之服從他的意志而動作。

此外，挺進隊本身對於新的任務是極其適合的。在種那裏面，大部份是年青人，所以他們是傾向服從指揮的；他們一部份是從前的軍官，祇要領袖是具有堅強的意志，即使是穿着文人的服裝，也可以使他們服從指揮。而且他們差不多都受過大學堂的培育，具有階級的觀念與爲個人爭取領導權之願望，但是他們同時又願意爲使人服從而自己服從指揮。在以反無產階級自誇之劇烈的爆發當中，同時，資產階級方面，對於穿着做工衣服的同伴，發生突如其來的同情心，其範圍是限於這個同伴是屬於加入資產階級的。大戰前之反平民的觀念受了一番修改，而希特勒運動便

是這種修改的表現。他們覺得應用一種右傾的平民理想以抵制左傾的平民理想。

希特勒對着這種羣衆，宣佈猶太的馬克思主義爲取得勞動者之擁護而行使陰謀的祕密；他指破摩斯柯恩與伊沙克柯恩的奸謀，他的目的不是使勞動者本身發生動搖，而乃是使這些資產者與大學生發生動搖。可是，關於勞動者方面，他所做的活動是多半靠在表面上對資產階級而發的那一部份的勸告，在這部份的勸告裏面，他鼓勵資產階級採取一種適合於社會的性格。勞動者對於這種訓令是完全表示讚許的，即使在實際方面他們還抱着不信任的態度。

在一個上軌道的國家裏面，這些學生，大學學士與退職的尉官，應當充當兵士或預備隊的軍官。現在這種路徑是閉塞不通了，他們於是變成打手：一個被犧牲的階級，牠的前途是打斷了，而財產也破毀了。他們厭惡簡單人的生涯，而同時卻望那邊走去。簡直是將他們的船隻駛往對抗他們之所不認識的無產階級的方向。

## 六 什麼是社會主義

國社黨之自稱爲「社會主義的」實是太過於自作愆尤的。希特勒當初只想做到「社會革命黨」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想憑着局部的變更來改造原有的社會結構，給他一種新的社會倫理觀，其性質不是關於人道的，而實是軍事的。但是現在呢，黨卻掛了「國家社會主義」這種招牌。直到這個時候，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是「生產工具之社會化」現在卻須要給他以一種新的意義了。

新的意義是如下：「凡是準備以全副精神謀民族的利益，其程度確實是以民族的利益爲他之最高理想者；還有，凡是認識我們之偉大的國歌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之意義，其程度是到了的確在他心目之中，絕無其它事物足以凌駕這個德意志——民族與國家、國家與民族——者；這種人便是社會主義者。」（見希特勒之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演講）在這裏面，社會主義之舊有的概念是已經消滅了；而不久之後，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照後面的解釋也跟着牠的概念而消滅了。「國家的 (national) 與社會的 (sozial) 是兩個含有二而一、一而二之概念的。所謂走向社會的方面去，乃是表示下面這個意義：將國家建立於民衆的公團體之

上，使每一個人爲公同體之利益而努力，而因此，使每一個人確信這種公同體之特優性及其爲正直無私的組織，遇到必要的時候，不辭爲牠而犧牲性命。」希特勒這樣的解釋國社黨這個名稱的意義，便等於取消了「社會主義的」(sozialistische) 這個字眼，而代以「社會的」(sozial) 這個字眼了。

## 七 希特勒運動中之階級觀念

在對於社會主義方面，國社黨的立場發生了變動時候，同時，對於那一部份持有國社主義者之稱呼的人民，牠的立場也發生變動。照特萊斯勒的意見，勞動者便是資產者，資產者便是勞動者。希特勒當開始活動的時候，他曾想將了解自身之閑闊的資產者，與了解自身之階級的勞動者一律驅逐出黨。可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他說：「當然的，我們也認識有階級之存在與有階級存在之必要。不錯的，譬如鐘錶匠或製帽匠的階級，或是技術家、工程家、官吏種種階級。但是在這些階級中所發生的經濟鬭爭，絕不應當到了這麼激烈的程度，而隔斷牠們的壕溝，絕不應當到了切斷種族

之關係的程度。」祇有在不同的種族中才有真實的隔離之存在。勤勞者與懶惰者所不同之點，主要是如亞利安（Aryan）民族之所以不同於猶太民族的地方：前者以「勞動爲民族共同體之生存之基礎，」而後者則以「勞動爲剝削異族的手段。」

這樣，希特勒很迅速的在階級鬭爭上面張開反猶太的幃幕，而從前他對於階級鬭爭是很不注意的。可是，他很可能以無須談到階級鬭爭，而代以職業組合彼此間的鬭爭，職業組合的階級性是由牠們，站在私有財產制之基礎上，爲利益而鬭爭的事實表現出來。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希特勒正以英國政府的組織，與其高下分明的階級之存在，爲一種可能的理想。他而且曾經說過這個話，幾年之後，卻輪到羅森培身上將這種意構在他所著關於聖張伯倫的書裏說明如下：「如果德國有維持共和制度之必要的話，牠祇能成爲在上層有強有力之組織的領導的貴族階級之共和國，這是顯然的。這裏面所包含的意義是承認階級不平等的基本原則。磨粉機之能夠轉動，無非是因爲水平之高低不同，這是人所盡知的。」

如上面所說，他們全是向英國政府的榜樣着想的。或許他們也向從前俄羅斯帝國的榜樣着

想呢。這句話不是無根據的，希特勒於一九二二年七月曾以沙皇時代的俄國政府，同時也以從前德意志帝國政府，為政治組織的模範。因為在英國——便是他在幾個月前所稱揚的英國——猶太人是已經佔勢力了（在法國，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西歐與中歐及東歐有何分別不同呢？猶太人不能不想道，在這些國家裏面，精明強幹的專制政體之復興並非不可能的。政府的元首還握有三種強有力的要素。一種是軍隊，具有訓練精良之龐大的軍官團體；一種是行政機關，具有絕對忠誠的官吏之強有力的工具；一種是廣大的羣衆，內心還未沾染毒質。』以種族方面而言，希特勒對於俄國人並不特別推重；但是他以沙皇時代的政府，照舊之民族的與反猶太的政府之性質而說，實高過於共和政體，而且他以精明強幹的專制政體為反猶太的利器而與以重視。

#### 八 精銳份子之與羣衆對立

到希特勒心中漸漸長出貴族的性格時候，對於他所曾企圖使之產生國家思想的工人，他從保護者之善意的態度一變而為嫉恨的態度。他說了下面這句話：「馬克思主義必定是那些完全

做勞力的工作，或毫無求知的悟性，或失掉用腦筋之習慣的人們的意構。這乃是一種龐大的無方向的勞動畜性的組織。」（見人民觀察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號。）

人民觀察報於登載上面那一段話兩星期後，復於登載波基斯羅封塞爾蕭（Bogislaw von Selohow）的一首詩中表現同樣的思想：

我痛恨

那堆羣衆，

弱小的，

下賤的，

只管彎腰曲背，

只管喫，睡與製造孩子。



我痛恨

那堆羣衆，

怯懦的，

柔順的，

今天做我的信徒，

明天卻吮我的心血。

「今天做我的信徒……」便是指着後來參加國社黨的龐大集會的人們而言的。他們曾經慮到所愛戴的領袖心中竟然存有這種念頭嗎？

在不知不覺之中，希特勒是顛倒於一種矛盾的思想裏面。在前一方面，他想證明大部份的民衆是被猶太人所侵吞而淪落爲一種地位卑賤的階級，且染着階級仇視心的毛病；而在另一方面，他卻相信人類有天然的差別，相信有生理的貴族之存在，後者且與社會的貴族互有關係。在前一

方面，他以民衆之受摧殘完全歸罪於外族人，如伊沙克柯恩與摩斯柯恩之類；他們外族人「敗壞我們的種族，加重我們內部的隔閡，鼓勵同室操戈，組織內戰，而因此使我們內部的革命狀態懸延不斷……」在他們外族人眼中，「猶太之服從多數的德謨克拉西，在無論那一時期，永遠無非是使真正的亞利安民族領袖陷於萎靡不振地步的一種手段；」對於他們外族人的罪惡，希特勒以為有深切的認識，他說：「猶太人不懂愛情是什麼東西，他們祇認識肉慾。他們想傷害，敗壞我們德意志民族；所以，在來因蘭地方，他們將德意志女人摔入黑奴的懷抱。」

一直說到這裏，這種話還可算爲一種合理的反猶太主義，向被外族人所陷害的民衆表示一種誠懇的哀憐。然而，再往下去，便生出矛盾了；民衆本身卻被他目爲屬於卑賤的人等。他說：「權力集中的原則是被否認了，基於個性的行動自由與創造能力是被妨害了，他們在領袖的天賦特質上加了層層束縛，而阻礙他一切自由的發展，因此他們拿出德謨克拉西的多數主義原則以代替一切，這個原則的意義乃是表示庸庸碌碌者，卑賤者，弱小者的勝利，尤其是表示怯懦者與不負責任者的勝利。總而言之，個性是被羣衆所摧毀了。」這堆羣衆到底是屬於或不屬於亞利安民族，希

特勒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再也不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裏了。

照實在的情形說，對羣衆其初推崇備至，後來加以侮辱，這種態度正與國社主義運動之前後兩個時期相符合。當特勒主持國社黨時期，他們推崇羣衆，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們覺得這種身受猶太人誘惑的羣衆，以其本質而言，並不是卑劣的；他們以為倚仗一種佈道的作用，可以使之重新服膺真理；至於辦理這種佈道事業的講座便可由國社黨充當了。

然而現在呢，黨不做這一種講座了。那些思想家與佈道師是與黨脫離關係或是被排擠走了。代替他們的是一羣沈默寡言的武士。黨的精神現在是寄託於挺進隊身上。在這個時候，希特勒喊道：「我們不需要幾百萬個冷血動物，我們只需要十萬個狂獍之徒。」他還說：「毅力，代表一切偉大的性格，只有存在於少數人心中。世界的歷史向來是少數人創造出來的。」現在呢，羣衆最多不過是精銳份子所領導的隨從與隊伍而已。「此後支撐我們之奮鬥的，不是大多數之議會的議席，而乃是大多數之力量與毅力。」我們不該使「這種新的運動企謀爭取議席，徒以填滿參議院與衆議院並以增加飢餓的議員之數目爲目的，」但要「用帶有民族意義的言辭向我們最廣大的

各層民衆竭力宣傳，並且使他們組織起來，做成反抗破壞我們歷史的與文化的最後共同體之陰謀的鬭爭利器。」

實在講來，不論希特勒他們是壓低羣衆或是稱揚羣衆，他們不過是使用同樣的方法來做兩種應用罷了。這一個方法便是這種煽動羣衆之心理的傑作：對羣衆施以熱烈的刺激，即使是要他們做消極的任務。當希特勒口裏提到精銳份子時候，個個都可當爲希特勒是指他個人而說的，且都可以輕視他的鄰人。羣衆裏面每一個份子受了希特勒派的鼓動之後，便因爲這個原因自以爲是離開羣衆，卓然獨立和超出尋常的了。不久之後，這一個方法便在黨的組織裏面，特別是在挺進隊與其許多等級的組織裏面，成爲一種非常的制度；這個制度可算是對工團的社會組織之一種饒有趣味的答覆。在那個時候，工團的社會組織幾乎是對政治有興趣的勞動者之唯一上進的實際的工具。在開始運動時候，國社黨不能夠將這種利益留與牠的黨員；因此，牠構想出一種精神上的上進，其方法是授與牠的徒衆一種憑證，用以證明他們是超出尋常羣衆的。

## 九 國社黨對於君主政體的態度

國社黨之對於君主政體所採取的冷淡態度不過是一種表面上文章。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人民觀察報宣稱：「選擇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這個問題並不成爲絕對的問題；牠是，如一種通俗用語所謂，各行其是的一回事。」這個話不過是隨隨便便說的。在同一號的人民觀察報裏面，雖然對於廢太子加以侮辱，說他是「猶太人之皇太子」，因爲廢太子，在他的回憶錄裏面，也曾邀請猶太同胞爲國事戮方同心；人民觀察報還大聲疾呼責難道：「啲！霍亨索倫（Hohenzollern），你們到了這種墮落的地步吧！我們不要因爲這樣侮辱態度便說國社黨有反君主政體的傾向。而這種侮辱態度並不阻礙廢太子後來投票贊成希特勒。」

果是不錯的，在什麼地方會寫了將來的君主應屬於霍亨索倫族或卽是一個具有皇室血統之人這種話呢？凡是理會說話是表示意思的人，聽到了希特勒於一九二二年四月所說的話後，便不至於不認識希特勒的心緒；希特勒所說的是如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依照民族之特殊性質與

需要的條件而成立的，而這裏面是那樣具有因素的力量，到德國是統一了與恢復自由了的時候，個個可以毫無異議的與以接受。」但是，像希特勒那樣一個人，能夠以共和政體爲一種適合德國之特殊性質的政制嗎？當他以危害國家的案件受審判的時候，他宣稱：「究竟，我本人也是共和主義者。」可是，這個「究竟」的字眼所代表的意義實是：「我雖然是這麼說，但是在我心中，總不是這麼想的。」幾年之後，羅森培，在他之一本帶有非正式性質的著述裏面，便表示贊同君主政治。此外，人民觀察報曾於一九二二年提出下面之君主政體的原則：「我們有站在一種對內兼對外的計劃上實現民族統一之必要，懂得實現這番事業這個人，他便在這事業上佔居首腦的地位。」

假如希特勒便是這個事業之實現者，情形將是如何的呢？在這個情形之下，以德意志民族之主要的與因素的需要爲根據，希特勒將做了終身的元首，或許還擁有指定他的繼承人之權；他將成爲，照他自己所曾用過的字眼來說：「精明強幹的專制者。」

## 十 因估量敵人錯誤了而得到的勝利

將西溫長老議定書之無稽事件堅認爲確實的，將敵人的力量作過高的估量，可是國社主義在這些錯誤裏面反而構成了牠之成功的原因。牠憑空製造鬪爭的武器，自以爲是從敵人所用的模樣抄襲而來的，而實則敵人並沒有這種東西；牠構想種種詭計以對付敵人的詭計，而實則後者是莫須有的。這樣，仗着這種錯誤，國社主義做成了異常龐大的宣傳，簡直爲德國向來所不曾見過的。

既然，希特勒自己忖度道，羣衆盲目的追隨馬克思主義派的敵人，爲什麼他們不也追隨國社主義的領袖呢？實際上，唯權學說之基本原則，便是從敵人方面抄襲來的，這乃是列寧與托洛斯基給與德國以狄克推多制思想。國社主義方面，漸漸地發現到敵人之不對的地方是在何處，這不是由於後者企圖攫取領導權，乃由於後者是屬於一種低劣的民族。對於原則是不加以攻擊，但所攻擊的乃是敵人之領袖的資格。總而言之，領導機關是必需有的，因爲受猶太人的影響所陷害的

一批羣衆，不但是被這種影響所敗壞了，並且證明其本身是缺乏了充分的堅定意志。尼采（Nietzsche）、戈弼婁（Gobineau）、拉嘉德（Lagarde）、聖張伯倫、馬迭生格蘭特（Ma'ison Grant），這些人都曾使民族受領袖的領導，而且，在希特勒出場之前，好幾千人是做了他們的生徒。希特勒同時是一個好學不倦之人，愛加爾與羅森培是做了他的導師。在此後好些年之中，希特勒幾乎是專專做了他們兩個人的發言人；羅森培供給他以材料，愛加爾則以格式。

## 十一 國社黨所遭遇的困難

希特勒成爲國社黨之唯一的領袖後，他起始不是十分愉快的。

愛加爾雖然認他爲黨的首領，但卻將他的人民觀察報的管理權用友善的但是堅決的態度收爲己有。這便是說他將希特勒的摯友埃塞趕走了，埃塞曾做了好幾個月人民觀察報的總主筆。他與國社黨內部的鬭爭頗有牽連；他專於筆端上鬧意見，結果使即如包勒與佛力克這些人也不能永遠採取不聞不見的態度。愛加爾於是自己擔任編輯的職務。而希特勒之要天天發表他的文



見，不得不期於將來，或是不不得不將他的政見改由他的演講裏面發表。

至於外面的情形也變成很困難的。嘉爾的地位，因為義勇軍的解散而發生動搖。他終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引退。包勒也下臺，雖然新的警察當局對於國社黨人的態度仍然是良好的，而後者總以他們的舊保護人之下臺而惋惜不已。佛力克也被調到與政治無重要關係的職務。勒真 斐德伯爵 (Lerchenfeld) 之被任爲巴伐尼亞總理，實使國社黨與最高當局的關係大見冷淡。直到這個時候，嘉爾不僅對國社黨會有極其熱烈的接近，他並且對於國社主義運動有一種實際的了解。

## 十二 挺進隊之開火的嘗試

仗着他所練成的工具，希特勒現在對於他之政治任務的情緒是越來越興奮。他從挺進隊裏面找到這種可以代表大多數之具有毅力與犧牲精神者的少數人。爲的是從前愛拉爾特部下的士兵實爲一個忠忱無可比倫的隊伍。當奉到首領命令歸附希特勒後，他們立即服從；可是他們

還須在長時期中自處於派入國社黨內部的愛拉爾特的代表之地位。愛拉爾特的姓氏似乎被他們所遺忘了；他們只簡單地稱呼他爲「首領」。到了進國社黨後，那個稱呼的名詞便爲 Führer（領袖）這一個名詞所替代；同樣地，他們仍舊保留他們從前的軍歌，而在那裏面他們把「愛拉爾特旅團」的名稱改爲「希特勒的挺進隊」。

鋼盔上嵌卍字徽，

黑白紅的三色帶，

人家都叫我們作

希特勒的挺進隊！

靠着慷慨的黨員的捐助，國社黨於是能夠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在柯森尼烏街（Corneliusstrasse）成立第一個冠冕堂皇的永久會所。喬遷新會所正與另一個在國社黨的歷史上更見

十三分重要的大事同時發生：挺進隊嘗試開火的試驗。

十一月四日，希特勒在何夫博羅酒店發言。一大批社會民主黨人來到會場，他們蓄意在場中對國社黨黨人之累次搗亂與狂暴行為採取報復手段。爲着傳遞命令不會辦理妥當，挺進隊僅有四十個人到會。希特勒站在會廳門口，對他們極力鼓勵，結果使基於感覺自己人數這麼薄弱而生出之神經刺激更見增加無已。希特勒對他們說這次不是勝利便是場臺，對於膽怯的隊員，他以親手摘去他們的臂章與徽號的話向他們威嚇。一遇到小小的搗亂企圖，他們即須先佔上風。他們心中且要具有「進攻爲最善的防衛」的信念。這種語氣乃是從大胖特力於女鎮（Leuthen）戰役之前夜對軍隊所致的訓詞抄襲而來的。

這樣地準備好了，挺進隊的人員等候事變發作。希特勒認定敵人們在他發言時候會將啤酒空瓶窩藏他們的桌下。現在照希特勒自己所描寫的劇情之如何經過錄述如下：

「有些敵人故意咆哮，有一個忽然跳上椅子，向場中喊道：『自由！』這個信號發出之後，我們方面那些爲自由而奮鬥的人們就開始動作。在幾秒鐘之間，全會場便充滿着叫喊與怒罵的聲音，

和着到處亂拋的啤酒瓶子所發出像炮彈一樣的聲音；椅子斷裂聲，玻璃瓶破碎聲，咆哮聲，叫罵聲，呼號聲，益發增重了騷亂的景象。這是一場多麼有趣味的境界呵！

「我還站在我的坐位旁邊，我能夠看到我的年青人用何等勇氣完成他們的任務。

「我很希望能在資產者們的集會裏看到同樣的現象呵！

「在這番鬪爭還未開始的時候，我的挺進隊——從那一天起，我的隊伍是採用了這個名稱——就採取攻勢。他們像狼子一樣，八人一羣，十人一隊，擁向敵人那邊施以攻擊，終於做到把敵人馴馴服服地趕出會場。」

照這篇描寫所說，最初敵人曾有喊道：「自由！」希特勒說是他們企圖隨後即來一個以玻璃瓶做炮彈的轟擊。他們曾實行了這個計劃呢，或是不曾實行呢——歷史也不能知道。可是歷史所知道的乃是挺進隊先敵人而動手，正如希特勒特意命令牠這麼做：在這一番鬪爭還未開始的時候，希特勒自己這樣說，挺進隊就採取攻勢。最初敵人裏面有一個人，在會裏搗亂，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國社黨方面不僅以懲治這一個搗亂者可以了事，而挺進隊卻立刻開始毆擊一切有嫌

疑者。這乃是挺進隊動手毆人，希特勒自己也認爲事實；而不但是挺進隊毆人，兩聲手槍的彈子曾經射出。希特勒說：「一想到這樣的復現戰爭的景象，我們都不勝喜悅。」

是誰放手槍呢？發生在騷亂當中，這是無從斷定的——這是希特勒的意見。可是，真正的事實可以無可否認的證明如下：國社黨人自覺身處危地且又人數薄弱，於是放手槍了。

這一次「何夫博羅酒店之鬭爭」與挺進隊在那裏面驍勇奮鬪並獲得勝利是在宣傳方面，與以向所未有的功效，他們也知道儘力量利用這一次事變。然而，這不見得輕容易可以作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恐怖行爲與國社黨之合法行爲的證據（註）。

### 十三 慕尼黑永爲國社黨的活動中心

希特勒雖然在那時候從國社黨內部的變化遭遇許多困難，他之搗亂者的威望已經在德國

（註）譯者按：希特勒在他所著的《鬥爭史》中第二部第七章裏敘述這一次鬭爭經過情形。這一章的題目是

「與赤化鬭爭」

南部樹立堅牢的根基，而且蔓延到了德國北部。魯多爾夫容格 (Rudolf Jung)，國社主義的有思想的老板之一份子，尊崇希特勒為運動之領袖，他並且勸告其他民族主義黨派——其中包括克拉斯博士 (Dr. Class) 所領導的汎日耳曼同盟——站在希特勒旁邊而奮鬥。然而希特勒卻以激烈的態度反對這種建議。他公然宣稱他所要的不是站在他旁邊而奮鬥，而乃是受他之指揮而奮鬥；他覺得這種聯合太類似議會政黨的結合，其價值是不足道的。他還說北部可以自由來歸附他，而他是永不到北部去的。從一九二一年七月，國社黨內部的敵人利用他逗留於柏林的機會企圖叛變以來，他再不願意聽到與北部結合這類話，至少是在眼前所說這一個時期。

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底所開國社黨第一次大會中，希特勒將這種關於黨之發展的原則予以肯定。在這一次大會裏面，人們覺得似乎在全德國境內遍佈着國社主義的小集團，有的是忠實的，有的以倔強態度要求在權利上之平等。那裏面，有在哈諾瓦 (Hannover)，司多德牙爾 (Stutt-gart)，曼尼亨姆 (Mannheim)，巴拉丁拿 (Palaftat)，邦內，哈勒 (Halle) 以及上西勒西亞 各地從事活動的國社主義者，這裏面還不會算到來自羅森亨木 (Rosenheim) 與蘭德收特

(Landslut) 的忠實黨員。有些其他比較隔遠的城市至少也是電報打來。這些在外面活動的國社黨人，大部份是從前曾在慕尼黑求學的學生。在開會當中，希特勒尙且以他們的人數比較他用宣傳的助力所召集到會的慕尼黑羣衆，顯見微小而再三致意。

爲的是，照希特勒的意思，需要將他的權力建立於一種「銅鑄的巖石」上面。他對大會的宣言裏面會宣稱，我們應當撇開「這些怯懦的資產者所代表的卑劣人物，他們表面上高談闊論，而實則一遇到無賴者立即驚惶無措。」照希特勒的意思，同時，還應當刷新黨的內部，因爲「這是有各的心緒之瘋狂人的混雜物，而便因爲這個，他們更見是危險的人物；他們向沙克遜 (Sachsen) 或蘇亞伯 (Soubbe) 的舊貨攤搜尋之後，便想使我們的民族開倒車走向千年以前的途徑；他們沒有世界的眼光，沒有看到已死的生活形式現在不應當使之復活，而我們所應當做的乃是創造一種新的日耳曼法律，密切的適應着我們時代的經濟條件。」因爲沒有人對於這種現代眼光會有比較希特勒及其左右更有深切的認識，所以國社主義運動須要集中於慕尼黑。「慕尼黑應當成爲一種模範，一種學府，且也成爲一種花崗石築成的建築物，總而言之，我們應當明瞭運動本身

是具有領導機關的，而且明瞭這個領導機關之所存在的地方是在那裏。」

國社黨之集中於慕尼黑實有更粗淺的理由：若將黨移到慕尼黑以外的地方，他們須能夠將慕尼黑國防軍一起移走，為的是後者乃是國社黨的核心與臺柱。國防軍裏面的人物用不着教訓希特勒。在六個月以前，希特勒已經拒絕接受柏林方面所提出之富有誘惑性的建議，因為他知道他的事業的運命是與國防軍結了不解緣的。

雖然內部是團結一致，慕尼黑的國社主義者總不能夠勉強大會接受他們領袖的意見。大會以是一月三十一日閉幕，散會時平平淡淡，留下一篇意義不顯明的文章，沒有決議案，也沒有表示信任的舉動。蘇德特一帶之奧大利人與德意志人還且不會到會。然而實際的收穫是不在名義的利益之下；因為希特勒的地位並不會受人攻擊，而事實上他是更見穩固的了。



## 第五章 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

### 一 P. P. 暴動

一九二二年年頭，希特勒首次領略行政當局之嚴厲對付的手段。他同好朋友埃塞，以妨害集會自由的罪狀，被判三個月監禁的處分。巴伐尼亞邦內政部長施衛愛且曾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嚴重考慮將現在之勒莫斐德新內閣所不表同情的希特勒驅逐出境。施衛愛終於不能執行他的計劃，爲的是，在這個地方，有參戰軍人的資格之希特勒，是一個最有力量的人物。那些參戰軍人團體羣起反對這種處分。希特勒經過這一番很難堪的震動之後，暫時離開政治舞臺，避人幽居，使他不能復爲人所稱道。後來，他復在柏林出現，在柏林之國民俱樂部演講，并於柏林結交幾個新朋友，其中便有格拉夫與實業家波爾施格（von Borstig），後者爲資本家協會的領袖。

到一九二二年七月月底，希特勒重來慕尼黑，目的是來受一個月監禁的刑罰（關於其他兩個月監禁，他受了緩刑的待遇）。他到慕尼黑的日期是非常湊巧，因為，如果早一點到慕尼黑投案，他將進監牢受刑，那麼，一番政治大風潮將使巴伐尼亞人幾乎捲入革命的漩渦了。

激動這次政治大風潮的，乃是中央政府外交部長韋爾特拉德羅之暗殺案件與基於上述暗殺案件而頒佈的保護共和政府的法律。為反抗這種法律起見，巴伐尼亞邦內那些右翼團體便起來煽動羣衆。在一方面，中央政府之如此擴展司法權限便激怒了分離派的團體；在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經過數年之放任政策後，忽然表現剛毅的態度，遂引起一切右翼團體之羣起反對。在策略上，牠們羣起反對是沒有錯誤的，為的是這種猝然發作的剛毅態度無非是一種自然的態度，牠是不能持久的，而不久之後，在德國重復現出那種由習慣的作用而被認為是合法的實際情形，這便是說：左派團體居臺上統治，而右派團體儘管在臺下做牠所喜歡做的事情。

勒真斐德政府便要求將在德國南部執行這種法律的權限交予一個特殊組織的議院，後者是處在全國最高法庭的地位；此項要求實現之後，勒真斐德政府以為是跳出難關了。同時，愛伯

(Eberth) 總統，在他的一篇宣言裏面，也肯定中央集權制不至於擴展到更遠的範圍。

然而，在國內，人們認這種妥協辦法是一種失敗，於是開始作變動的企圖。這樣情形便給希特勒一個機會，來同其他右翼團體的演講家，第一次向集於柯尼斯廣場之數萬羣衆發言。可注意的地方，是他想法反對巴伐尼亞人之對於普魯士人的天生的仇視，他說：「我要求你們，不要爲反對普魯士人而屈膝於猶太人面前，祇要你們對現在的柏林人表現倔強的態度，那麼，你們在整個德意志國內便有幾百萬人做你們的後盾，他們是普魯士人、巴登 (Baden) 人、瓦敦堡 (Württemberg) 人，或是奧大利人。」

可是，在那個時候，希特勒之最激烈的演講還不曾危害了巴伐尼亞邦政府。反之，在黑影裏面，有一種企謀是在暗中準備，而且幾乎釀成禍變，這便是說：巴伐尼亞國防軍之叛變。

不軌的陰謀是醞釀於愛勃勒將軍的左右，愛勃勒爲步兵第七師團的首領，且爲一切右翼團體的保護人。羅姆與幾個其他軍官構想用武力推翻中央政府的計劃。如果國防軍將領用有禮貌的態度向愛勃勒總統證明德國國內情形是成爲無可維持的，那麼，愛勃勒總統也只能同前任巴伐尼亞邦

首相霍夫曼所取的態度一樣，不能採取抵抗的辦法。羅姆做到使愛勃將軍接受他的理想，而愛勃便也以此得到摩爾將軍的信服。在發動之前，巴伐尼亞這一師團全部集中於巴伐尼亞北部之格拉芬窩爾(Gräfenwöhr)野營裏，牠是處於著手動作之絕好的形勢。

可是這種計劃卻失敗於那些文人政客手中了。

巴伐尼亞的軍人團體中之最有力的「巴伐尼亞與帝國同盟」也做一個發動的計劃，其內容是與愛勃及羅姆的計劃相類似的。領導這個團體者為參議官畢丁格(Pittenger)。畢丁格為天生的從事祕密活動的政客。他具有靈敏的手腕，聰慧與野心，且有決心。他所缺乏的只有一點：他的同事及同志對他沒有充份的信任心。

畢丁格相信發動的時期是降臨了。不曾想到聚集於格拉芬窩爾野營裏面的國防軍將領之準備工作如何，他以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慕尼黑城中之金特而(Kindl)酒店召集巴伐尼亞與帝國同盟之各支部首領開會討論，他并使住居於前木西(Chiemsee)河邊的鄉村之包勒來會，他籌備推翻斐德政府的暴動。

然而，當他以為是完全靠得住的，派人到格拉芬窩爾，將他的計劃通知那些軍官們，羅姆卻萬分憤怒，他便拒絕參加這個後來為人所稱為P. P. 暴動（P. P. 兩字母是這次暴動的發起人畢丁格（Pittenger）與包勒（Pöhner）兩人的姓氏頭一個字母）。畢丁格於是覺得再沒有勇氣了。他便遣散召集來的人衆，而自己也跑到鄉下住去。這一顆地雷爆炸太早，遂將國防軍的計劃破壞無遺了。

希特勒已經自命為國防軍暴動中之政治的領袖，對這種結局，他不免是最失望的。不錯的，羅姆打算倚靠挺進隊使他的武力暴動成功；他之組織挺進隊，無非是為着這個目的。在那時候，希特勒相信偉大的政治行動的時期是已經降臨了。在這幾個狂熱的星期當中，他的希望是有了過度的膨脹，他的演講辭裏面重新表現了狂熱的態度。在他進監牢不久之前，他厲聲喊道：「如果我們不攫取這個機會，我們永遠再找不到同樣的了。」

事實上，過了好些年後，右翼團體纔再有這麼好的機會到手。希特勒之居心，是想追隨國防軍的足跡而前進；他在最初時候，是做了國防軍的政治顧問；他或已做了為個人攫取政權的準備。但

是這種僥倖的機會現在是消滅了。

不過，希特勒從這一次失敗裏面得到一種教訓，這種教訓是：如果國防軍不經一番小小的推動，則不論牠是具着如何良好的志願，牠總不向不合法的路徑闖去。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便給牠以這種小小的推動。

## 二 羅姆與愛勃之不和

每當某一種鬭爭或是某一種企圖遭受失敗之後，往往在同謀者之間發生許多爭論。這一回事實，現在又重演一次了。國防部經鼓起勇氣後，遂於是年十一月，決定調動羅姆的位置，將他由第七師團步兵統領愛勃將軍的參謀處職務調往第七師團統領摩爾將軍的參謀處；這樣，國防部拆散了這兩個同謀者。部裏發下來的命令是附帶一封寬仁無比的公文，這篇公文且極力使關係人確信這種處置辦法是爲他本人最大利益著想的。公文裏面是這麼寫著：「奉部長命令，羅姆無論如何必須予以調任，羅姆須認爲這次遷調乃是昇級待遇，因爲他現在是調往師團部總參謀處服

務。」

而這一封公文之發出，乃僅僅在這個陸軍大尉企圖以武力推翻中央政府之兩個月後。

雖然如此，羅姆還是快快不平。因為，在他或在愛勃看去，師團部之參謀處與柏林方面發生直接的關係，對他們是處於對敵地位的；羅姆以為是愛勃本人將他獻與這個敵人，而愛勃在他那方面，眼看羅姆俯服受命，於是當他是一個賣友之人。他們兩個人因此不和了。羅姆忽然發現在這幾年之中，愛勃享受盛名，而他自己卻是造出這個盛名之主要的人物。當他可與愛勃維持友好的關係期中，索性熱中的羅姆，對這種實際的情形，還可忍受。現在呢，苦痛鑽進他心中，使他不能自制了。後來，他們兩個人和好如舊，但是掩蔽他們之友好關係的黑影，終於不能完全消滅，他們之彼此不和，也在國社黨的歷史上留下一種反射的痕跡。

離這個時期不久後，廉爾將軍陸任為駐於加塞爾(Cassel)之節制幾個師團的統帥，羅梭將軍現為羅姆之新長官。起初時候，羅姆在他新位置裏受到對他個人之嚴重的與凌辱的攻擊，這種攻擊的結果，且使他受了有關係機關的檢查。照他自己說，檢查所下的斷語是使他恢復名譽；至於

攻擊所取的緣由，我們無須乎談到；而在反證方面，如羅梭與魯登道夫那些純淨人物，都替他說好話。羅姆之軍事的才幹便於短期間內得到羅梭的器重；但是，不久之後，他又爲着政治的陰謀而失去新將軍的同情，爲的是羅梭原來不過是一個軍人。

### 三 羣衆之趨向國社黨

羅姆的計劃雖然是不幸而失敗了，可是隨後便發生一件可慶幸的大事：墨索里尼向羅馬進兵。這件事是於巴伐尼亞國防軍幾乎實現向柏林進兵之計劃後兩個月發生的，牠便引起大家對挺進隊的領袖之注意。埃塞原是決意與希特勒相依爲命的，他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所開的一個會裏宣稱：「我們沒有抄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必要，爲的是我們有我們的墨索里尼，他是名做亞多爾夫希特勒！」

意大利這次政變，實在德國發生良好的印象，大部份因爲這次政變是於安謐無擾中與從容不迫中實現出來。在政變之經過裏面，不曾發生巷戰，不曾掀起罷工風潮，不曾危害王室的權利，



不會施行死刑。這便是德國的資產者所理想的革命。希特勒便答應與議會合力完全照那樣來活動；他於仿效意大利之獨裁者的辦法之下，宣稱「政治的自由向來是一種屬於力量的問題。」墨索里尼所主持的政變，曾使一般意見相信法西斯蒂的革命，對於一般袖手旁觀者，可算為不含危險性的革命，而希特勒因其仿效墨索里尼的緣故遂成爲羣衆所愛戴的革命家了。

#### 四 濫發紙幣時期之國社黨

國社黨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有了迅速的進展。直到那個時候，國社黨人之招徠同志的力量，還不及那種虛張聲勢的情況。然而現在是到了濫發紙幣的時期；那些從共產主義的共和政府之狂驟行動後感覺心灰意懶的人物，現在被變動局面所喚醒所動搖，他們便準備接受希特勒派的教義了。

不錯的，濫發紙幣的辦法是僅在開始之中；因爲一直到那時候，人們僅僅感覺到物價高漲，以貶低貨幣價值之辦法而言，濫發紙幣是開始於一九一九年；但若以一般之精神的價值之墮落而

言，濫發紙幣則實僅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在拉德羅暗殺案與魯爾之佔據兩件事情發生之間。從前之德意志工人黨的政綱僅向那些重利剝削者與投機者加以死刑的威脅，便是說，政綱僅指那些爲貪得無厭而抬高物價的強盜而言的。黨的領袖們在那個時候便是絕沒有想到一個政府，在他運用紙幣的模版之下，可以破壞整個民族的財富；絕沒有想到執行這種政策的工業可以發生取消債務的效力。直到一九二二年，普通人民心中，祇想到貨物擁有者們貪慾無厭之無恥，祇想到政府之庸懦不敢嚴厲絞死這些投機者。

現在呢，這些貨物擁有者漸漸得到赦宥，反之，另一種可驚的懷疑是傳佈出來：牠是說，好賊的政府，用一種毒惡的策略，破壞了國民的財富。這是基於羣衆越有了熱烈的情緒，他越以爲政府是一個具體的人物，他越想不到變化局面之無政府的狀態。忽然之間，那種在不久以前許多人還目爲是可笑的概念，現在居然成爲真實不虛的了：這個概念是說，這個精於剝削人民的政府是操於猶太人的手中。

在那個時候，凡囊中有幾分錢的人都做投機的買賣。新聞紙上之經濟界消息從來不曾這樣

地爲人所爭相閱讀。當小投機者看到行市是對他不利的時候，他便以爲是與金錢之權威者直接相處於鬭爭的地位——而對這些權威者，希特勒則從好幾年來以他們爲對象而每星期兩次做他的大演講。小儲戶現在都跑去聽希特勒的演講了；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希特勒曾於一夜之中連赴慕尼黑中十處大會廳發言，而每處都是滿座的。

## 五 希特勒夢想資產階級的生活

希特勒現在得到了成功，而這種成功實使他難於矜持不惑。他曾對密切的朋友說道：「當一個人一天這樣地踱過十個會廳，而且到處受人歡呼，他總不免有一種偉大的感覺。」他的演說才能現在是得到一種堅強的地位。他卻採取簡單的與有禮的態度，舉起啤酒杯向會衆致禮，口放Pat, Pat 的聲音，像馬戲班老板之滑稽的態度，以命令質問者不要多言。

然而，像普通的習慣一樣，興奮勵進之後，而繼之以意志低落。人民觀察報漸漸增加牠的閱者範圍；到一九二二年，牠已經每期出版二萬份，牠且考慮有改爲每日出版之可能。以實在的情況而

言，希特勒以小小的水彩畫師的身份而擁有一個機關報，靠他來經營，且他自己在那裏面是最有力的宣傳者。因此，一種資產階級的好運命現在他的眼前，而對他不免有所眩惑。他在那個時候會於寫給他之政治的朋友信裏說：「我對於生活上並沒有多量的要求，我祇要這個運動延長下去，而我便可靠着人民觀察報社長的地位以維持我的生活。」

他想維持生活嗎？是的，因為在一年前他還在他之比較富裕的朋友的飯桌上吃飯呢。以慕尼黑之最大的演說家的身份，他還是居住一所很小的房間；他從這個會場到那個會場總是履街上的汽車坐去，他而且以不向國社黨要錢自覺高尚。他所過的是流蕩人的生活，現在他想成為資產者且得到一個職業。

自然的，現在他是為資產階級而辯護。為後者的利益起見，他擁護私有財產制；但是他向資產者們所要的代價，乃是要他們相信他之流蕩者領袖的特質。

## 六 中等階級之國際的組織

在一九二三年年頭，羅森培發表一篇關於國社黨綱領的批評，在那裏面，他認為這個資產階級是國社主義的鬭爭中之英雄與犧牲者。他說：「中產階級乃是堅決反抗欺騙天下人的主張之唯一的階級。」他還說，夾在資本主義的統治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精神上節節退讓的德國（而不僅是德國）有淪為齏粉的危險。」

「這不僅是德國將淪為齏粉呢！」懷憂的羅森培預言說，我們要記着國家主義是德意志所獨有的，而反猶太主義乃含有國際性的。羅森培於人民觀察報裏喊道：「國社主義的理想，不管人們是給他什麼名稱，它今日是像液體一樣，廣播於地球面上。」他用預言家的口吻繼續說：「總有一天我們可以看見法蘭西的、英吉利的、俄羅斯的與意大利的國社黨產生出來。」在這個地方，我們是和魯多爾夫容格所與我們的教訓相隔很遠了，照後者所說，社會主義，即是在威廉第二的時代，也是德意志所特有的一種政府的形式；而和司本格勒（Spengler）之普魯士的社會主義與摩勒布魯克（Moeller van den Bruck）所與我們的教訓相隔更遠了，布魯克則說：「每個民族各有他之特有的社會主義。」慕尼黑之德意志國家主義者現在已經產生國社主義者之帶有國際

性質不下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了。

在國社黨裏面，俄羅斯與德意志合滲的和反猶太主義的勢力是駸駸日上。神采奕奕的羅森培向他的同伴極力贊揚一個新來的燦爛的人物：半俄羅斯的半德意志的浪人崔伯勒（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崔伯勒曾有一個不安靜的過去；他曾在土耳其充當政治工作的人員；羅梭將軍便曾在土耳其認識他，且說他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浪人。崔伯勒用更見明確的詞句來申說新的國際主義的意義，他寫道：「各種民族開始認識他們真正的敵人了，他們開始了解他們是互相殘殺而使這個共同的敵人從中漁利，後者是以國家主義的名義來欺惑他們的。」這種說法實是簇新的了。直到那個時候，人們所聽到的是說猶太的敵人玩國際主義的把戲，而在這位超民族的反猶太主義者看去，國家主義本身也成爲危險的魔物了。他還說：「我們如果能够做到以民族的理想——裏面還是暗昧不明的——建立一種解放自由的制度，得到所有各種民族的採用，那麼，在戰爭中所受的犧牲將不是虛費的了！」

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崔伯勒爲國社黨之關於思想的最大的權威者。許多人都以國社黨之將

來的外交部長看待他。

找到最動人的方式以闡明反猶太的國際主義之意義者乃是希特勒。在下面可以看出他對聽衆如何講出歷史的事實。他說：「在一種密切的合作之下，德謨克拉西與馬克思主義，經過猶太的高級指導者暗中擺佈之後，終於能夠鼓動俄國人與德國人彼此互相殘殺，他們其初原是彼此很相和好的。在這種人造的仇視當中，是誰可以從中漁利呢？這乃是猶太人。」

他還說：「在法國方面（牠與德國是無疑的有根本的糾紛之存在，但是在德國方面看去，一八七一年那些糾紛是已消滅了），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挑唆牠對德國取一種熱烈的仇視態度。鼓動一種糾紛而從中利用：在這裏面我們又明顯的認識猶太人所慣用的陰謀。」不錯的，反抗累世的敵人之鬭爭，其本身現在也成爲猶太人的陰謀了。而英國也是被猶太的報紙所鼓動而與德國開戰呢。因爲，「誰乃是英國的新聞界領袖呢？北巖（Northcliffe）——一個猶太人；」不過他的兄弟羅武邁爾爵士（Lord Rothermere）還被希特勒後來利用做發言人呢。「世界上二十六種民族受了這種機關報的鼓動而互相仇殺，這種機關報是完全操於唯一的種族手裏——後者實爲

一切國家主義國家的死敵——而因此終要達到消滅德意志的目的，爲着德意志是地面上之碩果僅存的社會的國家。猶太的漢奸是於世界大戰中勝利了。」

### 七 熱烈的愛國主義

無疑的，希特勒不至於做到使他的聽衆爲國際的反猶太運動與反鮑爾雪維克運動而犧牲了民族的愛國運動，也不至於使他們認法蘭西人爲友好的民族；雖然是這樣，而實際上他的煽動辦法是對於這種目標有所贊助。

當一九二三年一月，魯爾的鬭爭開始時候，政府努力在國內實現一種神聖的團結，便是在魯爾地方，這種努力也告成功，但反馬克思主義的希特勒，對這種辦法，自然覺得難於接受。不久之後，關於採取消極的抵抗或採取積極的抵抗這個問題，便引起德國內部之意見紛歧，這種意見紛歧便使希特勒解除他的困難了；他現在又可以對那些想「以偷懶的辦法制敵人的死命」之神聖的人物肆意嘲笑。可是，其初他對於「神聖的團結之撒謊」除了用惡毒的與最失人望的譏笑態度



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他認定猶太的國際主義是在各民族之對立當中擺佈陰謀，這種固執的見解所趨，竟使他宣說了怪異的言論：他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在蒲爾格布羅酒店說道：『我們不必口喊打倒法蘭西，但是我們應該喊：打倒賣國的漢奸，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日後國社黨人所那麼重視的積極抵抗，在那個時候之國社主義領袖的理想裏面，竟然僅佔那麼微小的地位，而愛加爾便可於是年二月八日在人民觀察報上面寫道：『猶太人極力推動我們與法國開戰，這種辦法簡直是一種瘋狂的舉動，爲的是我們事先便知道立刻會戰敗的。』

照上面所說，希特勒給與俄羅斯人——德意志人所傳播與他的國際主義以一種便於運用的形式，便是說，一種熱烈的愛國主義，而其尖端不是針對外國人，但卻對一部份的德國人。在開始時候，這種辦法是不很得人心的，而且是冒險的；可是，這種辦法卻有着絕大的好處，因爲在策略上是合理的。一種精巧的策略，不能摒棄理由而存在，即使這個理由是類似不稱人意的。已經接受了國社主義的人，不應當在照這個國社主義所定的原則而下定論的時候，竟與這個主義背道而馳。

## 八 鮑爾雪維克的誘惑

魯爾的鬭爭事實上是不利於國社黨之反鮑爾雪維克的大理想。在國社主義運動中之平民份子與在國社黨創辦人之無資產份子的心裏，重復產生了對資本主義的宿恨。國社黨之第二位總理柯爾奈——不久前被迫降貶——曾以辯論人的資格出席於共產黨的一個會裏，他並宣稱國社主義者祇求所有真正的反資本主義的同胞團結一致；關於壓制交易所的強盜之狡猾行為的意見，他們是與共產黨人一致的。羅森培空費力量將拉狄克（Radok）所做關於施拉格忒（Schlageter）之興高采烈的演說，比為粗俗的猶太人的撒謊；他空費狠心用下面的話懇求身入迷途的人們：「我們祇有唯一的目標：消滅鮑爾雪維克主義；任何一種情形，都不能夠使我們打斷這個念頭。」這些努力總是空費的。斯多德牙爾城的國社主義者，素來是抱着喜歡批評的態度，竟至於邀請共產黨議員雷梅爾（Remmele）出席他們的辯論會演說；不過他們并不因為這個舉動，而不向共產黨演講者提出不好聽的疑問：為什麼在共產黨的領袖裏面有這麼多的猶太人？

## 九 南提羅爾之放棄

總而言之，在希特勒心中，眼前的目標是與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算賬；在羅森培心中，遠大的目標則為消滅俄國的鮑爾雪維克主義。而對於法國方面呢？對於英國方面呢？關於英國方面，他們或許覺得是不確定的。英國是屈伏於猶太的奴隸制之下嗎？或是牠還站在盎格魯薩克遜之主人翁的種族地位嗎？因此，他們更見決心轉向意大利着想。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之幾個月後——這是在一九二三年年頭——希特勒對南提羅爾問題說了很不合於正統的國家主義的話。在那時候，意大利法西斯黨人進至梅蘭（Moran）並且凌虐德意志的人民。希特勒所發表的意見是說不應當將這種情形看得太嚴重。

同年之六月十八日，羅森培闡明國社黨對提羅爾問題所站的地位，這種地位是國社黨從那個時候起所不會變更的。他說：「南提羅爾之解放問題，須在一個新的德意志政府存在之後，纔能事實上成爲問題呢。」照他的意思，大家不應該喊道：打倒提羅爾的暴人，但應該喊道：打倒十一月

事件的罪人。他還說：「這個問題須在魯爾與萊因、波森（Posen）與但澤（Danzig）這種德國的心臟，重新歸還我們後，纔能解決呢。還有許多其它的區域，在意大利看去，是更可寶貴的呢。祇要德國重新成爲強國，牠說了一句話，並對意大利施以一種和緩的壓迫，便可使後者實現牠的希望而恢復南提羅爾的自由。」這便是說，復興的德國在其它區域的問題上面與意大利人以政治的援助，作爲歸還提羅爾的代價。

這個產生於魯爾鬭爭時期中之提羅爾政策，實成爲國社黨將來之對外政策的一個基點：聯合意大利而抵抗法國，可能的話，將英國加入聯合裏面。在這一計劃之外，同時又有一個計劃恰好與前者彼此矛盾：這乃是進攻鮑爾、維克主義之世界十字軍的計劃，後者爲求其能夠實現起見，當然需要法國參加那裏面。其實，這種政治的構造之不固定，到底也被國社主義者自己發現出來；可是，因爲這個黨的內部也曾經過激烈的爭論。從那個時期起，他們纔願意讓俄國自己決定牠的命運。不過，在一九三〇年之選舉勝利後，他們重新從櫃裏面將德國憲兵的大刀找出來——照他們的意見，這把刀爲維護世界文化之利益起見，是可以斬斷蘇維埃聯合國的——重新將牠放

在桌上。

其實對外政策向來爲理論家的弱點所在。平心而論，我們應該承認從那個時候起國社黨對外政策的原則實不像從前那麼刻板了。

## 十 國社黨與教堂的鬭爭

社會主義者並不以國社黨人之拒絕參加「神聖的團結」以抵抗侵入魯爾的敵人覺得可驚異；國家主義者卻以爲是可驚異的。他們的見解是錯誤了。國社黨人實則不過在國內提倡國家主義，他們維護資產階級的物質的根基，而在事實上他們攻擊牠的特性。他們還且不是如通俗的術語所叫做良好的基督徒呢。

『我們應將撒旦 (Satan) 之邪說的聖經——舊約全書——撕成碎爛！』愛加爾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之人民觀察報上面這麼說着。希特勒原是從愛加爾方面借用了大部份的術語，因此有一次與後者談話當中，忠實地申說道：「路德所做繙譯聖經的工作，或許對於德意志文

字是有所貢獻的，但這種工作之有害於德意志人民的心性，是無可補救的。上帝啊，現在撒旦的聖經頂上是有何等燦爛的圓光啊！路德的詩是多麼光芒動人，即使是羅德（Loth）的女兒那種亂倫之人有可以得有一種宗教的光輝呢。」後來有人否認有這篇論調，可是人民觀察報尙於一九二七年特別介紹會引用這篇話之愛加爾的著作。

在最初時候，慕尼黑的主教浮爾哈伯是被國社黨人認爲主持阻礙工作的重要人物。浮爾哈伯儼然以真正的教堂大王的本色而爲王朝之忠實的友人與革命的敵人。他曾說過：這次革命乃是一種背誓棄信的賣國的行爲。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他也起來反對「猶太機關報的撒謊。」這些言論只有使一切國家主義者感覺痛快。可是在這些言論之外，他又說些不合於國社黨人的脾胃的話。以教會的人物與「羅馬式和平」之信徒的立場，他起來反對軍事的檢閱，他痛斥政治的罪惡行爲，他並以這種罪惡行爲歸罪於右派政黨的急進機關報之挑撥是非。這種種的表現便將等於採取一種直接的攻擊了。

加之，他所用「背誓棄信」的術語，在國社黨人看去，實是太帶了君主主義的口吻了。因此，

羅森培便起來攻擊，他說：「在慕尼黑天主教的演說裏面，有的是妥當的，有的是可厭的。」他便對着這個教會大王，像披露新宗教似的說道：「一種朝氣蓬勃的與愉快萬分的新的世界觀，產生於所有各種階級與所有各種信仰的心中，其來勢是銳不可當的。總有一天，在牠廣被之下，所有一切的德意志民族——而不是所有一切的種族——聯合起來共同奮鬥。這樣纔是民族的理想。」

在此後數年之間，羅森培這一個理論形成國社主義之真正的信條。牠是代表了一種哲學教育的輪廓，許多黨徒對牠採取了無可無不可的態度，但許多其他的黨徒卻因他而獲益不淺。在那上面，希特勒又有了一次機會來提出最精良的公式：「除了德意志之外，我們不願意有其他的上帝。我們應該一心一意的信仰牠，愛護牠，而且抱了無窮的希望。」

## 十一 國社黨之被禁止集會

希特勒之拒絕參加神聖的團結，實使他在那時候與各種軍人團體之間所資以彼此聯結的理想之一致，發生裂痕。這次拒絕參加所使希特勒受到的損失，比較他之因在街上鬧毆與在會中

搗亂而受到的損失，其更見嚴重的程度是不可以道里計的；而從這次拒絕參加所發生的影響，比較他之被逐出巴伐尼亞境而發生的影響，是更見惡劣萬分的。

頭一件，他的態度是使國防軍陷於極苦痛的進退兩難的地步；國防軍之認一切祕密的軍人團體爲牠的子弟兵，並不是沒有理由的。羅梭將軍不會有一種確定的政治地位；凡是帶着國家的意義的，他都對之表示尊重，他當然是喜歡那些馴良聽命的份子。而希特勒的性格恰恰不是馴良聽命的，這種情形便不能使他得到將軍的同情。

希特勒預備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開國社黨大會，這一次並且要連帶舉行軍事的大檢閱。他將巴伐尼亞所有的挺進隊集中并使新來的隊員穿上制服之後，已經做到使一個五千人的隊伍列隊待命。後者原要遊行於郊外的閱武場。此外，十二個大會還要同時在慕尼黑城中十二個大廳裏面舉行。在這些年來，慕尼黑已經有過許多次這一類的閱操，牠向來是很和平的，而且地方當局，爲表示團結起見，卻給牠許多便利。但是，這一次大家感覺遇到一種實實在在的討伐國內政敵的舉動；以人數而言，牠是還不如五一節的社會黨的隊伍，但以牠的軍事性質而言，牠是比社



會黨的隊伍更含有危險性的。

國社黨大會是應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舉行。大家很憂慮希特勒會做暴動的企圖，因為大家都曉得他曾經預聞一九二二年九月之國防軍暴動的陰謀。巴伐尼亞邦內務部長施衛愛且曾於十一月間傳他到部，很嚴厲警告他不要做出蠢事。這便是在這個時候，希特勒跳起來並且拍他自己的胸膛高聲喊道：「總長先生，我給你一個信約，我是永遠不做暴動的。」施衛愛回答他道，他沒有輕視希特勒所發的信約的價值，但他所怕的是希特勒要想遵守信約而他的政黨不能跟他走，而到那時候，恐怕希特勒要被迫而追隨他的隊伍了。

施衛愛於看到希特勒在慕尼黑聚集了五千多人後，他便記起謹慎的原則所示，一個政府對於革命之防衛手段，若僅靠了革命黨人的信約，是遠不如藉重警察的馬槍。那個時候，大家對於希特勒所用的手段還不會有充分的領略，大家僅以為這五千人是專為聆聽希特勒的演說而聚集起來的。露天大檢操以及十二個大會中之六個均被禁止舉行了。

在警察總監諾爾斯(NOLLS)房中，希特勒跳躍咆哮，並演出一種不可描寫的形態。起初，他極

力用和緩的態度要求警察總監：我們可以記得嘉彭主教是知道在每一個人面前裝出這個人所喜歡的模樣。堪作模範官吏的諾爾斯，是喜歡有禮貌的公民；因此，希特勒便裝出與他是同樣有分寸的誠實人與愛國者的模樣；但是，當他是對着羣衆說話時候，他當然要使用一種爲羣衆所能理解的口吻。現在他極力使警察總監認爲禁止這次開會，不但是希特勒個人的不幸，且亦是愛國運動本身的不幸，也即是國家的不幸。在說話當中，希特勒忽而發怒，忽而娓娓動聽，忽而柔順萬分。一個頭髮深栗色的年青的武士向頭髮斑白的官吏懇求，口口聲聲以國家的禍福爲言。好像是波沙（Posa）侯爵在腓力浦（Philip）國王面前的情景（頓加爾羅 Don Carlos 劇中的情景）。他竟做到像劇中所演的那樣屈膝下跪，使諾爾斯不勝駭異；這一幕雖是像電光那樣飄忽過去，但他是的確要喊道：「陛下啊，給我們開會的自由罷！」（用頓加爾羅劇中的話）希特勒所表演的形態還不止是這樣的。而警察總監並不以受了感動的聲音回答他，他反是冷酷無情地反駁他說，關於國家的安全與警察的權力等等問題，便是愛國者也須俯受制裁。那時候，希特勒便改變他的聲腔；他嚷起來說：不管什麼樣，他總要往前走，警察可以開槍；他自己要站在前面走，而讓警察把他打死。

然而，政府並不願受他的威脅；而爲更見安全起見，牠宣布了非常時的戒備，而將國社黨的十二個大會完全禁止舉行。

## 十二 國防軍之上前線

希特勒現在是陷於絕望的環境中了。他知道仍然往前走和犧牲自己的性命，是無濟於事的。然而同時他也知道臨機退縮，是他統馭愛拉爾特舊軍人的威權之致命傷。

可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國防軍——出來替他解圍，而且牠後來還救過他好幾次。

何等勇敢的羅姆，何等可佩服的愛勃！他們在那個時候用了個人的勢力來援救希特勒之幾乎無可補救的失敗。當然的，他們知道他們所努力的是爲什麼。這實是關係着他們的政黨與他們用自己金錢與黨羽所手創之政治的軍隊之運命呢。

第七師團統領羅梭將軍於嗅到暴動的空氣之下，召集軍官們開會討論。或許他想使軍官們對他保證說他本人能夠支配他的部下與後者是已準備服從他之任何命令。而結果卻是不然，他

便聽到愛勃用忿懣的態度反對政府對付愛國的運動如國社主義者之使人不能忍受的手段。無論情形如何，國防軍總不應受這種危害愛國理想的舉動。因此，比較年輕的軍官更見膽氣雄壯，而羅姆竟公然指謫政府是背負愛國的主張。在那個時候，一個同伴便責問道：「你們怎麼能夠將這一類的想像與對軍旗所發的誓言調和一起呢？」其他的軍官，羅梭將軍也在內，於是也覺得心志動搖。會議終於紊亂情形當中閉會，且不會作有任何決定。

羅姆於決心冒險進行之下，聚集幾個表同情的同伴，重新擁到愛勃面前。不管怎麼樣，他們必要使羅梭將軍確信他們的主張。愛勃便單獨與他的長官談話；羅姆則如發狂熱似的在前廳等待。羅梭開門出來向他說：「你能夠領希特勒來麼？」

「可不是當然的！」羅姆回答道。狂喜的他，便跳出外面去。

羅梭將軍從來還不曾見過希特勒呢。現在他開始認識希特勒之最良好的方面。因為希特勒呢，若是出他不意之中將他抓到，他便任他發狂的性格表現出來；若是給他以充分準備的時間，他則能夠表現出一種勇敢的，簡單的與專為公共利益着想的人物。以他那樣的人物與他的主張，可

使羅梭將軍產生了不必加以那麼重視的印象。當然的，何必因為這個過火的小資產者的緣故，而使他的軍官與那些勇敢可嘉的軍人團體發生愁悶呢。

因為慎重起見，羅梭便問他道：「至少，你不能答應施衛愛部長說你不企圖暴動嗎？」

可是，這對於希特勒是太過分了，而他之調劑好的鎮靜態度卻不對此表示抵抗。在兩個月前，他已經以信約給了施衛愛嗎？後者難道已經忘記了嗎？

他大聲回答道：「我拒絕以任何種的話允許施衛愛部長，但我答應閣下，在一月二十六日那天我不做暴動。到一月二十八日，我再來進謁閣下。」在他說話的時候，他現出忿怒萬分的紅色面孔。

「這麼容易動怒的先生，」羅梭將軍不禁想道：「這麼得人歡心的革命家，口口聲聲說他的信約，說他不作暴動！這地方他的信約，那地方他的信約！他這個人是誠實的，他無非是想將旗幟交付他的黨徒而已。」

忠實的羅姆，於參加這一幕經過當中，一言不發。他奉了命令去告訴政府說羅梭將軍認希特勒

勒及其政黨的大會是無害的；而爲保護國家起見，他覺得愛國團體方面發生破裂是可憾的；因此，他請政府重新將牠所決定的辦法加以詳細的考慮。羅姆不僅是執行了他的任務，他而且向施衛愛部長表示國防軍一個大尉是對後者取了蔑視的態度。羅姆去找嘉爾先生。後者以他之上巴伐尼亞省長的地位而論，是爲施衛愛部長的屬員；但以政治的強有力的地位而論，他是凌駕施衛愛之上的。羅姆與希特勒便將羅梭將軍的希望通知嘉爾，自然的，嘉爾像羅梭一樣，也被希特勒的一篇演講所迷惑了。政府終於讓步。在第二次接見希特勒時候，諾爾斯要求國社黨首領仍然限定舉行六個大會，而且祇在克羅恩劇場內使用旗幟等等，這個劇場剛好是位置於講武場裏面。希特勒知道這些條件的用意無非是爲着挽回警察當局的面子而已。他回答道：「或許可以！」他須要看看大家能夠怎麼樣做。警察總監終於吃到苦頭，在事實上，十二個大會是全部舉行，而旗幟也是露天使用着。

### 十三 特萊斯勒暈倒會場

對於這次事件，一般輿論是認為政府遭受可恥的失敗。那些預聞秘密的人們，當然知道這是關於文人當局對於武人當局的讓步；而這些人們之屬於羣衆裏面的，并不多過於屬於挺進隊的人物裏面的。在後者們的眼中，希特勒是像了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他不怕警察的馬槍的彈火，他而且能夠以他的志願壓倒一個孱弱的警察總監與一個不懷好意的部長。大會又鞏固了他在黨中的地位；他的夙敵柯爾奈失掉第二總理的位置，繼任者乃是他的朋友查可伯（Jacob）。很猛烈的劇景會伴着這次決定而發生出來，因為在希特勒對着幾千黨徒念歡迎詞到精彩那一刹那，特萊斯勒是暈倒了。

參加國社黨的人，現在不斷蜂擁而來。黨的那些辦事處須暫時關門，因為他不能夠一下把所有的黨員都登記完了。到了四月，希特勒可於四個星期的時間中，在克羅恩馬戲場舉行八次龐大的會；民衆不倦聆聽他的演講。

#### 十四 勝利與訂立條約

希特勒越有了名望，他越容易找得金錢，而不必再經過中間人與監督人如愛加爾者的手裏。在得到了與致熱烈的朋友的幫助後，他並且能夠在愛加爾的手中奪得人民觀察報的管理權。

這裏面的工作，是分步實現來的。人民觀察報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改爲日刊；三月十日，羅森培被任命爲總主筆。此後還有幾個月，愛加爾仍以社長的名義在報裏面簽名，但是到了八月二十九日，人民觀察報改用現在仍舊沿用之碩大無朋的篇幅出版之後，愛加爾的名字就不見排印出來了。在財政方面，人民觀察報之能否生存，是天天成爲問題的。雖然如此，而牠現在是屬於希特勒個人的了。愛加爾仍舊留在黨裏面，大家仍然另眼看待他，他也照舊做希特勒的朋友。後來，他從積極的政治活動裏面退出來；他是一個藝術家與一個酷愛美術的人，他是不僅對於政治感覺興趣的。

另一個勝利是在巴伐尼亞北部，希特勒制服了他的夙敵斯特萊撒。這個努連堡學校的教師，在他自己的政黨那方面，也有了許多敵人，他不能像希特勒之對付特萊斯勒與柯爾奈那麼容易的對付他的敵人；他而且失掉他的努連堡人民黨機關報的管理權。他由是辦理另一個對立的報



紙突擊報(Stürmer)，這張報在摹仿埃塞的模樣與將猶太人的醜行作淫穢的描寫之下，也於短期間內風行一時。可是，在眼前這個時期，對於黨內部的鬭爭，希特勒可以做他的一個精神上可貴的援手。希特勒於是以一九二三年一月來到努連堡，對着幾千人發言，而且受斯特萊徹尊崇為德意志人的模範。不過，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斯特萊徹還是希望希特勒以平等的地位看待他；而慕尼黑方面的人們卻視他為瘋狂人，或許手脚還是不大乾淨的；他們而且派了好些專員，便如挺進隊的首領波克(Boch)之類，到他身邊，專為對他採取監視的態度。到了一九二五年，斯特萊徹纔完完全全被制服了。

第三個大成功是：希特勒於一九二三年三月與德意志人民黨訂立一個條約，德意志人民黨是剛剛由參議院議員格拉夫·伏爾(Wille)與亨寧(Henning)組織成的；他們原來屬於黑爾斐力克(Helferich)的德意志國民黨，因為覺得後面這一個政黨的反猶太活動是不充分的，他們所以脫離出來。汎日耳曼主義的著作家烈芬特羅(Reventlow)也是屬於這個新生的德意志人民黨。在條約裏面，格拉夫保有德國北部做他的活動地盤，那邊是不許國社黨的勢力侵入的；至於

德國南部，則讓希特勒去支配了。

### 十五 羅姆組織不合法的軍隊

希特勒在這一個步步高昇的時期當中，卻充分地表現出在事實方面他是如何不能夠控制他的政策，他的政黨以及他自己。

這是正在所謂魯爾「戰爭」的時期當中，在外敵侵略之下，「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這一個口號失掉牠的力量了。不管怎樣，在國防軍的領導者方面，雖是自然傾向於變更現行的制度，但在眼前他們暫時卻不加以注意。加之，古諾(Onno)內閣並不帶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至於愛伯總統，大家卻曉得他僅僅有了些微的成分。古諾總理於是年二月來到慕尼黑，並使羅梭服從了他的見解；然而古諾之一個助手，雖極力對希特勒勸導，但結果是毫無成效的。經過羅姆在中間接洽後，他們兩個人便於羅姆的辦公室中會晤。希特勒與羅姆，在他們那方面，極力使對手確信將來戰爭中頭一聲的炮火應先向內部的敵人瞄射，而馬克思主義者乃是比法蘭西人更壞的敵人。這些

話進到對手方的耳朵裏，簡直使他覺得是一種確實的鼓動賣國的誘惑。由是雙方用冷酷無情的字眼相攻訐，而從這個時候起，希特勒便成爲古諾之深刻的敵人了。

無論在武人或在文人的眼中，大家都認魯登道夫將軍爲最強有力的權威且其名字是可以代表軍隊的，魯登道夫則宣言反對希特勒個人及其思想。在二月底，全德國的愛國團體，都聚集於柏林，開會討論。羅姆與黑斯（Hess）大尉——努連堡的一個團體名爲「帝國國旗會」的領袖且爲希特勒之同盟者——同往參加。他們兩個人有了很明白的認識：魯登道夫是真真的缺乏了一切政治的意識。他是說，大家應當支持古諾與犀克脫（Seckel），團結一致以抵抗外敵。一切民族的團體應當合併起來。在國內奪取政權自然會實現的。

羅姆所能找到唯一的策略，便是聯合巴伐尼亞的軍人團體，樹立一個武力的組織，在那裏面，政治方面的領袖將不能得有高過於看門人的勢力。他以國社黨與幾個其它的團體——帝國國旗會也在內——爲基礎，組織一個「鬭爭的愛國團體大同盟」。希特勒極力想在這個大同盟裏面加入一個政治的綱領，但結果是空費力量；大家對這個綱領不會予以考慮。在綱領裏面，他要求認

定唯有愛國的團體纔能夠享受政治活動的權利；認定有組織國民的政府之必要，「這個政府將以一切的權利賦予德意志人民，而對於不願意做德意志人民的，牠只留一條死路給與他們。」這個綱領乃是「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這個口號之天然的、祕授的與推定的補充品了。

## 十六 國防軍之掣肘

在他自己的政黨裏面，希特勒再不能夠任意指揮了。他所創立的，目的在供個人統治國社黨的工具——挺進隊，現在卻被軍人們從他手裏搶走了。而教唆這種舉動的不是別人，乃是希特勒之最好的朋友羅姆。羅姆並不顧慮到這種舉動足以妨害他的「領袖」；他將國社黨改成一種廢備的隊伍，而國防軍的軍官們，將來可以為所欲為了。

挺進隊果然是發展了，但是便因為有這種發展，使希特勒不能將牠操縱在手裏。在一九二一年三月，挺進隊已經到了很強盛的程度，牠能夠在巴伐尼亞編成三「旗」(Standartes)，每旗包容三千到五千的人數。後來採納羅姆的主意，將旗的名字改為聯隊。國防軍，像對其它祕密的軍人

團體一樣，同牠們一起做夜間演習以及軍事檢閱；而在這種軍事的把戲裏面，希特勒不過是一個周遊陣地之善於說話的遊歷家而已。在挺進隊裏面，踴躍着對法國人採取積極抵抗的精神。從牠那裏面，或是更確實地說，從羅斯巴克之慕尼黑的團體——向來不會對國社主義表示特殊的同情——裏面，施拉格脫（Schlagerer）跑出來，而後來在魯爾地方被法國人鎗斃了。

因為這樣，希特勒的政治活動便銷耗於訂定操演的規則與媾結武力的聯盟上面。萬幸，他們所任命的挺進隊首領是一個因不能上戰場奮鬥而沉溺於內部鬭爭的人物。這便是從前之飛行隊大尉海蘭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前克利施托芬（Richthofen）飛行隊長並得有「勳勞卓著」的獎章。他的年紀是比希特勒少四歲，他曾於丹麥及瑞典以航空公司經理的職業過了好些年，後來會到慕尼黑當學生。他是很有錢的，而在那個時候，希特勒對於有錢的人是最表示歡迎的；此外，戈林之來援助希特勒是恰好在十分湊巧的時機，那時「領袖」的生活還是極不富裕的。戈林不但以他的熱血供給國社黨，並且也以他的金錢。他懂得訓練他的隊伍，但是，對於天天之周而復始的工作，與新招隊伍的訓育，他缺乏了鎮靜的態度。羅姆對他是向來抱着某種懷疑的情

緒。另有一個人物，雖然沒有戈林那麼出色，但比他更富有抵抗力，這個人便是羅姆的參謀長——霍夫曼(Hoffman)海軍中尉，從前曾為愛拉爾特的同事。他對於希特勒的政治活動，是不及戈林那麼信仰，而且是比較接近於羅姆的軍人眼光。

在這一年中，希特勒對於他的挺進隊失掉了控制力，而因此他必要組織一個特殊的隊伍以應付黨內的需要。在八月，他之老同事中之一，退職中尉柏施托爾(Berchtold)，組織一種衝隊，名為「希特勒的衝鋒隊」(Schutzstaffeln)。這個隊伍乃是眼前之保護隊(Schutzstaffeln)的核心。

### 十七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的暴動

在三個月中，希特勒牽曳着軍人們所拋於他身上的羅網。隨後他跳到那上面而想撕破了牠。結果他在那裏剝傷了自己的指甲。

照每年的慣例，社會黨與共產黨於五一節那天舉行一個大會，這個會是露天舉行於德爾仙維爾斯(Theresienwiese)廣場——城外之一片大草地。凡是認識這個節之意義的人們，都知道

社會民主黨的參加者企圖作各種活動，但不企圖革命；至於共產黨人方面，情形也是同樣的。再進一步說，在這個一九二三年年頭，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向來沒有那麼安靜。

但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牠已經自命爲唯我獨尊的——祇要看到敵人現出面來，便認爲是一種抹殺行動。因此，希特勒與其同盟者鬪爭團體大同盟宣言說，五月一日所舉行的節是抹殺行爲，他們決計以武力反抗。一封哀的美敦書便遞與巴伐尼亞政府，牠不是說：禁止舉行這個節，不然的話，我們便上街面活動；但是說：禁止舉行這個節，而祇讓我們在街上遊行。鬪爭團體大同盟要求政府給牠以防止舉行的任務，牠將照「保安隊」的手段而行動，這便是說，可以打人，抓人，而必要的時候，可以開槍打死人。

政府在希望表示妥協的態度之下，便下令禁止社會民主黨黨人在市中遊行，但准許他們在德爾仙維爾斯集會。有人並且警告希特勒及其友人說，他們若有侵犯政府權威的行動，便將以武器相對付。

無疑的，大同盟方面，也擁有武器。然而這些武器是存儲於國防軍的貯藏庫裏面。當初國防軍

方面曾答應這些領袖說，他們若表示要用的話，馬上便可將武器交給他們。希特勒便已經存着鼓動國防軍再度反抗文人權限的希望；他於是同羅姆及大同盟之幾個領袖往見羅梭，向他要求履行他的義務。在極度驚異之下，羅梭很冷酷地回答說，他不能交付武器。希特勒則漲紅了發怒的臉色，提起從前與羅梭是怎麼約定。

「你儘可以當我是背負信約的，我總不能把軍火交還你們，」羅梭回答道。羅梭是知道對於國家的安寧應負何種責任的。他並不托辭說他們曾誤解了他從前的宣言。他僅簡單的說：「不成。」一句話了事。以從前帝國軍隊的軍官之身份而言，他對這一批國家主義的「傭兵」並不另眼看待；而在他心中，德國的反革命工作乃屬於將領們的事業，而不是屬於義勇隊的首領們與做民衆活動的人們的事業。

在憤怒萬分之半癡狂的情緒下，希特勒由是企圖對國防軍施行突擊的手段。他派人去領取武器，不管羅梭會下令禁止。那些低級軍官曾受過羅姆的訓練，當然不至於刁難。希特勒方面便派了大運貨汽車到武器儲藏庫來，他們對那裏面幾個國防軍士兵發下命令，而藉後者們的幫助，他



們將武器搬上汽車，但到了蘭德收特 (Landshut) 下巴伐尼亞挺進隊的首領——藥劑師格烈戈爾 (Gregor Strasser)——正在將奪取物運走時候，卻被國防軍幾個軍官撞見了。看到他實沒有辦法逃避，斯特拉塞便與軍官們約好將武器運回營盤。軍官們於是讓他走過。但是他並不進營盤的大門，而開足馬力一直駛到慕尼黑。「這不過是鬪爭中詐計而已。」後來在巴伐尼亞邦議會裏面，當人家提起這次經過，斯特拉塞以很愉快的態度這樣地回答說。

照這樣動作後，希特勒希望推動猶疑不決的羅梭，不顧他本心的志願如何，而採取果敢的決心。他計劃由內部兵變開始，而由慕尼黑黑國防軍發動大政變來收束。這種計劃結果是慘遭失敗了。起初，一部份同盟的團體感覺驚慌而至於叛變。實力上所受的損失還不重大，但希特勒卻是腦筋慌亂而終於逃避。他不於五月一日早晨帶領他之武裝完備的徒衆佔據城中之軍事的重要點，而卻退紮於阿柏維森斐爾 (Oberwiesenthal) 練習場。將慕尼黑黑城夾在他與敵人之間，後者是集於城之另一端，在德爾仙維爾斯 (Dresden) 平靜靜的聆聽五一節的演講。

在阿柏維森斐爾那些「鬪爭的團體」與在那邊做演習的國防軍士兵互相表示友愛，至於

他們的各領袖，則於進退兩難的態度下，商量應取的步驟。羅梭將軍於嚴酷處罰羅姆後，命令他的部下解除國家主義叛黨的武裝，但在那個時候，他祇可用最友誼的態度商量解除武裝所採取的形式。希特勒終於做到保存他的面子，至少他不曾感覺有在戰場上解除武裝的恥辱。對方卻准許他的徒衆自己將武器送到營盤裏去。

這次乃是希特勒，直到那個時候，所未曾遭遇之最重大的失敗。或是因爲大家都親眼看到他是不曾具有奮鬥者的精神。到五個月後，他想重新勒逼羅梭下一個大決心時候，他還是失敗呢。

## 十八 希特勒之受人譽讚

在這一個時期，希特勒之私人的生活經過一番突然的變化。他受到慕尼黑一個大家庭之十分親密的招待——這個大家庭的姓氏在國社主義運動裏面，眼前還扮演著某種的角色。牠爲希特勒弄到金錢與娛樂的方法，而靠着牠，希特勒開始親近一個遠見華麗的社會。這種行徑便引起黨中元老的譽讚，那些歷來不滿意的議論與謠言紛紛起來，說他喝香檳酒與接近漂亮的女人。老

黨員兼創辦人柯爾奈，第二總理查可伯以及其他幾個人便組織一種聯盟，以挽救希特勒之「勞動者的精神」爲目的。居於首腦地位的是費德與一個國立鐵道局之高級官吏——希特勒的好朋友。費德宣稱說：大家不能夠引用普通法以處分領袖——他是有美術家之精神的；但是大家須考慮到外面是以黨魁的行徑來對黨下批評的。總而言之，希特勒是被人促其猛省；但結果是無效的。

永不磨滅的迷信，現在又找到一個新的犧牲者了。不過是，希特勒之遭受這些攻擊，基於他個人的行爲的減少，而多半是基於從前他之譏刺那些左派的政客，後者們不見得比他還有罪過。

「領袖」現在是沈醉於安樂鄉了。對於類似失掉指導的國社黨，人們暫時不提起了。「希特勒已經停止過問民衆的思潮了，」一個紐約報館的通訊員曾有這樣的證明。紙幣的膨脹是到了最高點，那些愛國的團體卻是沈溺於內部的鬭爭，而民衆也再不相信牠們，僅於每天擁到櫃臺旁邊領取工錢，而趕在物價未漲之前購買那些罐頭食品。

## 十九 希特勒之戰勝法庭

在這個時期當中，在那些消沈的辦公室裏面，演了一齣悲喜混合的戲劇，牠使希特勒得以稍爲補償在阿柏維森斐爾所受的恥辱。巴伐尼亞法庭決定處罰他於五月一日所作暴動的企圖。

慕尼黑的法庭開始辦理起訴的手續。判決罪狀似乎是當然不可避免的。希特勒在頭一次判罪的時候，對於兩個月的監禁會得到緩刑的待遇，現在似乎要併科處刑了。還有，內務部長似乎可以實行他之從前的計算：驅逐希特勒出境。整個的局面似乎可以發生變化。照這種情形看，後來便不至於有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暴動，也沒有一九三〇年三月的選舉，也沒有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選舉。希特勒或許將以舊活動者的身份繼續在奧國過他的黯淡生活了。

然而，他卻發出一種猛烈而又有效的反攻。他便向法院遞送一篇節錄，就中他說下面這一段話：「既然從近這幾個星期來，我受到邦議會的機關報的侮辱，使我因爲對於國家方面有所顧慮，不能夠公開的自己辯護，那麼，我祇好感激運命使我現在能夠在法庭裏面辦理這種辯護，而從

此後，不必再受到愛國的信心之牽制了。」

照希特勒所固有之叫囂的辭氣看，這篇話是十分清白的。但是特來斯 (Dresser) 總檢察官便懂得牠所包含的威脅。他於驚嚇之下，便寫一封信給司法部長。信裏面說：

我們現在是遇着危險，「鬭爭的團體」各領袖爲自衛起見，不惜趨於不利於國家的行動。希特勒且至於以他的說帖傳播於新聞報紙相威脅。

司法部長念了後，便在他那方面慎重考慮。希特勒及其朋友們很知道在克里林 (Knilling) 總理與施衛愛內務部長之間，會有緊張的關係之存在。他們兩個人曾在鬭爭的團體的各代表之前彼此用很惡毒的答辯相攻訐。司法部長方面，自己是在心中忖度不應當使希特勒得在法庭面前暴露內閣各閣員自己所做的醜事。加之，這一任的司法部長不是別個，而乃是法蘭斯孤爾特勒博士 (Dr. Franz Kurner)，後來充任巴本 (Papen) 內閣與希特勒內閣的司法部長。以德意志國家主義黨的立場，他對於國社主義者是抱着「他的肌肉卽是我的肌肉」(他自己有一天是這樣的講) 的見解。進一步說，他斷定了「無論怎麼做法，現行的制度之變改是必要發生的」；他

還且斷定了希特勒不是完全失敗便是完全勝利。

他於是告訴總檢察官說，「照現在的情形看，舉行公訴若改移於比較安靜的時期是比較妥當的。」施衛愛卻完全不會知道。他時常到司法部打聽情形。人家總對他說「案件是在進行之中。」其實呢，牠是擱下去了。到了十一月暴動後，牠當然是被撇開了。

## 二十 富有誘惑性的建議

在一九二三年夏天，參事官克拉斯——汎日耳曼同盟的主席——產生一個理想。他看到魯爾的鬭爭是延長無期，古諾卻是依違於消極抵抗與積極抵抗之間，和進行神聖團結與撲滅馬克主義之間。國防軍的領袖，厚克脫將軍，是與普魯士內務部長塞維寧（Seyring）——一個社黨民主黨人——不很融和。克拉斯便決計推翻古諾——格拉——羅森培——亨姆（Cuno-Gessler-Rosenberg-Hamm）內閣。以他之一個尋常人物的身份，這是一種狂妄的企圖，然而克拉斯便是在政治上做狂妄舉動的人物。他想倚藉國防軍的援助而組織一個國民的政府，不受議會的

拘束——一種總裁政府，正如他們在這一夏天談話討論當中不久便以這個名稱形容所說的計劃。照他的意思，新政府的軍權當操於屢克脫手邊，而政府的領袖便是克拉斯本身。

克拉斯也同巴伐尼亞方面的人物接洽，舉起名字來說，是同包勒與嘉爾，嘉爾一向充任上巴伐尼亞的省長，而他之最得意的助手仍然是畢丁格，後者實為巴伐尼亞之酷似克拉斯的人物。畢丁格也構想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可以說是與克拉斯的計劃相等，但其實施的範圍是限於巴伐尼亞；組織一個巴伐尼亞總裁政府，其首腦為嘉爾，裏面並包含包勒與……希特勒。

無論如何，這種誘惑對於「領袖」發生了廣大的影響。在四月二十日，趁着希特勒之三十四歲壽辰，前任司法部長羅特（Roth）便以偉大的領袖恭維他；他又會同魯登道夫與羅梭在一起討論德國的前途；可是畢丁格的建議是超過所有這些光榮了。巴伐尼亞之最有勢力的著名政治家卻希望他做地方攝政一份子。畢丁格之對他做這種建議，無疑的，不過是想以希特勒為他的囚人——「我們須叫他少在馬戲場裏面演講，」畢丁格會這麼說過。然而，我們可以看出人家是用何等的高價以收買他呢。

但是畢丁格及其部下堅持巴伐尼亞分離主義，而希特勒卻對於整個德國的單位堅不放鬆，這一點也爲以魯登道夫爲首腦的「鬪爭團體大同盟」所擁護。而因此，這兩派彼此又多一次的衝突。希特勒在這裏面，實更難於決定一個主意了。

## 二十一 魯登道夫之捲入漩渦

「鬪爭的團體」以九月二日（西丹 Wotan 戰役的紀念日）在努連堡舉行一個龐大的示威運動，名爲「德意志日」，那裏面聚集了差不多十萬人（在那個時候，這個數目是很可驚的）。這十萬人頭戴鋼盔或軍帽與繫綁腿列隊遊行，高聲呼喊，引吭高唱以及作了激烈的演講，使這一天呈現着亂烘烘的政治鬪爭的景像。大會的目標便由魯登道夫以一個首領地位之帶有明確的與普魯士的口氣之演說表白出來。

「合羣與武力在那些戰陣上是這麼燦爛光明的表現出來，這乃是列皇的偉業啊。」這種說法已經可使希特勒無忍受之可能；而後面跟下去的話是越見不對的：「……列皇們，尤其是霍亨



索倫皇室，而現在卻常常受人侮辱，因為牠是被人所驚駭及嫌惡。但是，在蔑視愛國的與愛皇室的情緒之下，在蔑視公民的意識之下，人民是將國家的威嚴破壞無餘了。」

這與羅姆所曾宣佈說，「我是不屬於這個民族了」一句話，是有同樣之軍人的、嚴酷的與賤視人民的口吻。聽衆聽了後，像有了呼吸窒塞的感覺，他們在感覺爲難之下，便低下頭去了。至於國社主義者們，則以很顯明的神氣表示不聽魯登道夫的演說。

這乃是很有意義的神氣。可是，這對於他們是毫無作用的。在盡所有的右派的營壘裏面，魯登道夫在那個時候還保持着半上帝的威望，在會場裏面，他是儼然如不可非議的首領。並且，經過他的心腹崔伯勒·里克脫（Scheubner-Richter）之居間撮合後，他便將希特勒引來身邊。大家都看到魯登道夫與希特勒兩個人並列參加軍人團體的大檢閱，而一般人從這個情形看到軍部與人民攜手的徵象。

其實，希特勒現在卻是處於困難的地位。鬭爭的各團體，裏面包括他所固有的挺進隊，在努連堡是更密切的冶成一爐了，而人們卻不會提起希特勒之政治的領導。新的組織是名爲「德意志

鬪爭大同盟」(Deutscher Kampfbund)。如果魯登道夫不是一個盲目的半上帝的話，那麼，他很可能在挺進隊之軍事指揮權因五月一日的失敗而歸屬於國防軍後，更進一步從希特勒手中奪取挺進隊之政治指揮權。但無論如何，新鬪爭大同盟之政治的首領乃為崔伯勒·里克脫，希特勒卻猶同禁錮於金鑄的樊籠裏面，而去領略偉大的光榮之苦澀的滋味了。

## 二十二 羅姆再為希特勒取得權柄

替希特勒恢復自由，這乃是從此後他的朋友羅姆之主要的心緒。鬪爭的各團體之合併，一部份是羅姆的創造。他的意思，是這個組織不應當構成一個政黨，但構成一個強有力的隊伍，為的是準備做政治目標的工具。然而，到了緊要的關頭，他們看到沒有辦法可使將領們決心做政治的活動。希特勒固然是不願意充當羅姆的武力的工具，但像他一向到了最後關頭，即使是他本心不願意，也還任羅姆隨處牽扯，因此在羅姆心目中，希特勒總是一個適當的政治領袖。所以羅姆是費盡他的氣力使希特勒得以充當鬪爭大同盟的政治領袖。

這乃是崔伯勒·里克脫於九月二十四日在寄給他一個說帖裏面，樹立他的將來政治計劃，這個政治的策略，是主張以武力攫取政權，藉以先下手打破巴伐尼亞分離派的敵人。那裏面曾經這麼說：

「國民革命不能發動於取得政權之前，反之，奪取政府的警察權力，乃為國民革命之先決的條件。換言之，我們至少須企圖用合法的途徑攫取政府的警察權力，這種途徑隨後不免因為採用一種近於不合法的壓力使之超出合法的範圍……若果我們的行動是為羣衆的情感所擁護，並且其表面現出是合法的，危險的成分將大見減少了。」

崔伯勒·里克脫在那裏面所說明為鬭爭方法的合法舉動，從一九二五年起，便成為國社黨策略的標準原則。

不達到使鬭爭大同盟各領袖贊成他的意見，羅姆是決不中止的。斯特萊斯曼於九月二十四日宣佈停止魯爾的鬭爭，羅姆便搶了這件事情為藉口。到了第二天，奮關大同盟各領袖：克里伯爾、黑斯、衛伯爾博士（Dr. Webel）、羅姆、塞德爾（Seydel）大尉，以及戈林、崔伯勒·里克脫與希特勒，

便開會討論。在這一次機會當中，希特勒表現出他確確實實是一個大演講家。繼續兩個半鐘頭之久，他極力鼓勵他的同伴的勇氣，而在最後結論裏面，他要求他們以奮鬥大同盟的政治領導權交給他身上。當他說完時候，黑斯跳起來，滿眼熱淚，伸手緊握希特勒；羅姆也下淚，即是性情冰冷的衛伯爾博士，也不禁受了感動。因此他們便以下面的通告書送與新聞報館：

「鬪爭的團體各領袖，在考慮政局的嚴重性之下，認有建立單一的政治領導權之必要。因此，爲求策略方面與目標方面得趨於一致起見，我們以上述政治領導權委託亞多爾夫希特勒先生。」

羅姆也終於決定辭去他的國防軍職務，以求整個的爲準備「救世的活動」而努力。他已將希特勒扶擁上馬，現在他卻須留意看他的朋友這麼樣的出發。

### 二十三 魯博烈黑特王子

以鬪爭大同盟的首領的地位，希特勒的頭一着，便是於第二天派崔伯勒·里克脫到魯博烈

黑特王子的秘書長——索登（Woden）伯爵——身邊，要求王子接見希特勒。崔伯勒急於替新「領袖」辦到事情，便以各種各樣的狡猾手腕應付伯爵，他自以為這是一種慎重的外交手腕。他解明說，在巴伐尼亞，沒有一個人敢於教訓王子，可是，如果王子願意參加民族運動的話，希特勒本人原是一心擁護君主政體的，對於在巴伐尼亞恢復君主政體將絲毫不反對。而且，民族運動反要極力尊崇王子，並且擁戴他做最高的領袖。不然的話，崔伯勒用很乾脆的聲調下結論說，民族運動將不過問王子了。

伯爵在他那方面，已經認識了魯登道夫對於微德爾斯巴克王室是蔑視的，便批評說這一陣用肥皂做炮彈的轟炸是極其滑稽的。鬭爭大同盟的使者卻將實際的政治做成一種真實的幻象，竟像戲劇一樣；那麼，王子的幻想更當如何呢！希特勒便不為王子所接見了。

## 二十四 嘉爾之被任為政府特派員

在同一天，希特勒可以理會為什麼原因他是來得太晚了。

如果，因為將希特勒安置於鬪爭大同盟之首腦的地位，服膺全德國統一的人們，便以為是一番重大的舉動，那麼，巴伐尼亞分離黨人之還擊，當更趨於猛烈了。希特勒的心意，是想照他歷來在同樣的狀態下所用活動的辦法而活動；他想發言，而是於同一晚上在十四個會場裏面發言。這樣的聚會很可以作為暴動的預兆。牠很可以藉一種適當的理由，發起早有準備的行動。

但是克里林總理卻於九月二十六日宣佈施行戒嚴的處置，而且任命嘉爾為政府特派員並賦與範圍最廣大的全權。

希特勒失了一切自制的力量，禁止開會的命令之使他動氣，實比任何其它都嚴重。他狂怒萬分。「什麼，」他喊道：「便因為這十四個無害的集會，而就庸人自擾嗎？他們便宣佈戒嚴，而便任命一個政府特派員嗎？若是我們弔死了革命之十四個首惡，甚至於四百個，到那個時候，他們該怎麼做呢？」在這一夜裏，他只覺得越來越動怒，他對於羅梭所說的信約等等都忘記了；簡言之，他便想真真實實的執行他的苦迭達計劃，直到那個時候，這個計劃是被敵人們所無道理的誣構。他便在崔伯勒家中，與後者及包勒與羅姆聚會討論，並且考慮究竟可否暴動。最後是羅姆的異議壓倒

了希特勒的神經發作。他們因此認爲暴動是不穩當的，便與以放棄，而十一月事件之四百個罪人，仍然不會弔死。

到了第二天，嘉爾要希特勒宣佈對於新政權的態度。希特勒便以無罪過的孩子態度回答他說，人家在任命嘉爾爲政府特派員之前不會詢問他的意見；他將根據特派員的舉動而決定他的態度呢。

## 二十五 慕尼黑之動員反抗柏林

嘉爾現在攬權了，「得到省長先生所許可的革命」是到了成功之路。他自己加上了反抗中央政府的任務。他開頭便在努連堡奪取德國國家銀行所有的現金。隨後他禁止巴伐尼亞管理財政的官吏將稅款解往柏林。

他也做了軍事方面的佈置。他將保護共和的法律宣佈無效，這個辦法便可使愛拉爾特大尉入境，後者自加勃暴動以來是被法庭所緝捕。他也伸展他的權力到國防軍第七師團裏面，這一師

團是在巴伐尼亞招募來的。牠的司令官——猶疑不決的羅梭——是夾在兩個戒嚴狀態之下。一個是宣佈於全德國境內，一個是宣佈於巴伐尼亞境內，他不知道應當傾向那一方面去。到了最後，他決定傾向他所認為最近的方面。柏林會命令他封禁人民觀察報。他抗不受命。因此，柏林將他免職了。可是巴伐尼亞政府恢復了他的位置，並且使第七軍團脫離中央參謀部的管轄。這一點確實是違反憲法，而且是慕尼黑向柏林宣戰的一種行動。巴伐尼亞武裝起來，將牠所有的力量與金錢全部動員——而並不曾十分明白爲的是什麼目標。

直到那個時候，國防軍會供給挺進隊及其同盟者所應付的薪餉，這一點可從羅梭將軍於十月二十六日所發的祕密訓令裏面證明出來。或許這個事實是對於巴伐尼亞事變的結果，曾發生最有勢力的影響，其力量是遠在於萬種陰謀的詭計之上。國防軍是用黃金的鎖練以繫連非正規的隊伍。但牠缺少了充分的工具，遂使牠不能夠穩牢抓住這根鎖練，換言之，牠是不能夠繼續不斷的供給這些人；假定沒有這種情形的話，牠將能夠制止希特勒的暴動了。在缺乏金錢接濟之下，這些義勇隊的人員便在他們心裏感覺有行動的願望與搶奪擄掠品的衝動。在審理希特勒案件之



一次祕密開審庭中，慕尼黑挺進隊聯隊的首領，退職中尉維廉布魯克勒（Wilhelm Bruckner）曾對於這種情緒有下面之精確的敘述：

「我覺得，他說，國防軍軍官是很不滿意的，因為人家沒有向柏林前進的決心。他們說：這個希特勒是一個普通的開玩笑的人。你們不往前進攻嗎？我們不管誰將進攻；我們呢，總須跟着運動走。我本人曾對希特勒說道：我感覺是到了抓不住我的部下的時候了。我們部下裏面，許多是失業者，他們穿破了最後一套衣服，最後一雙鞋，並且花光了最後幾文錢，以求受到軍事訓練；而他們會以為大家不久便要往前進攻，隨後便將他們編入國防軍，而他們便將打出難關了。」

即如魯登道夫那樣穩健的軍人，他也於十月底抓着羅梭將軍的軍服鈕子向他說：「我們總要發動，因為蘭爭大同盟的隊伍將淪為餓殍了，我們是難於抓着他們了。」

挺進隊是瀕於瓦解的危機，希特勒又沒有任其解散的忍心；便是因為這種情形，他於是任其拖帶而作他所會很有理由的認為不可嘗試的發動了。

二十六 贈資者

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國社黨已經得到一萬五千登記的黨員，無疑的，是繳納黨費的黨員。但是，在那個時候，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藉繳納紙馬克的黨費以維持下去。牠們當然需要接收贈金。在一九二三年年初，人民觀察報曾以下面的話表現了這種情況：「我們乾脆的宣稱：如果有一個德國人放在我們的桌上——無條件的——一萬萬或兩萬萬的款，我們將馬上為我們的人民求福祉而花去這批款。」

有了這種規定後，在大家人看去，國社黨之受人羈勒，是為期不遠了。金錢——特別是牠——若是源源而來的接濟，歷來是強迫人家對牠服從，即使牠並不會提出什麼條件。牠之可以有所要脅，單純是因為若使政黨所採取的傾向是不合於贈資者的心意的話，牠便停止送來了。

我們已經看到國社黨之開始存在的頭幾年，是表現着國社主義者有追隨着國防軍足跡的義務。或可更確實的說：他們是追隨着這個國防軍的一批軍官。我們也曾說到那些團體，由愛勃將

軍居間撮合，以財政維持國社黨的機關報。

隨後，希特勒便有找到贈資人而尤其是女贈資人的幸運，他們對於希特勒是發生了比較親密的與比較屬於個人上的關係，而是超過了平常的贈資者與政黨領袖的關係。因為這一方面的成功，希特勒便能夠在黨裏面擁有優越的勢力。可是，從私人關係來的財源，總是極有限的。在一九二三年復活節，希特勒還須向戈林借了幾個馬克以供他出外旅行。如果，在那個時候，他的物質上生活還見稍為改善的話，他實是靠於有些富裕的同黨的慷慨。在這些富裕的同黨之中，我們頭一個須提起他的朋友埃斯漢夫司泰恩（Ernst Hanfstaengl）——眼前是充當國外情報處處長。漢夫司泰恩是屬於慕尼黑之著名的與業美術出版的望族（不過他的族人中，也有的是國社主義之堅決的敵人），他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以一千美金借與國社黨；在當時，這個數目是極可觀的。國社黨方面，便將人民觀察報之所有的財產付與他做抵押品。後來漢夫司泰恩將這個債權買給希特勒的老朋友，同時為鬭爭的伴友，克利斯提安衛柏（Christian Weber），衛柏隨後利用這個債權使希特勒大受打擾。

赫蓮柏黑斯登夫人(Helene Peckstein)著名的鋼琴製造家之妻，與日爾脫烏塞特尼斯夫人(Gertrud Seiditz)所贈與的金錢，是對於國社黨的發展，發生極大的影響。因為靠着這些款，人民觀察報纔能夠改爲日刊。柏黑斯登先生及夫人是經愛加爾的介紹而認識希特勒，柏黑斯登夫人對於希特勒是深表鍾愛，幾乎是一種母性的愛情。當她後來到蘭德斯堡(Landsberg)監獄探視希特勒時候，爲着使人許可她走近囚人身邊，她會自稱爲希特勒的義母。每次希特勒到柏林過訪柏黑斯登先生，後者總給他許多金錢(這是做過了很多次)並且很以人民觀察報所遭遇的困難而表示傷痛。當他們手邊沒有現金可給希特勒時候，他們便給他一張畫或一件美術品，讓他再拿去賣掉。塞特尼斯夫人是與他們一樣的慷慨；她在一家外國的工業機關裏面有些股份，她便將所有剩餘的款項寄給國社黨；她又替後者弄到芬蘭朋友的金錢。

這兩個女人所與的榜樣是饒有興趣的，因爲這裏面爲我們指出國社黨黨人之財政來源的重要一部份是從何而來的：這是來自那些私人的贈與，他們不是基於利益的關係，卻是基於一種純淨的興味，而往往盡他們的力量之最高限度爲國社黨犧牲，那些嚴守歷史經濟觀的學理的信

徒，將堅認爲這些人，也是於無心之下，爲維護他們本身之階級的利益，而始有這種行爲。然而，於有心之下，這些金錢的贈與，實是出於絲毫無私人利害關係的念頭。不過是，希特勒曾宣稱爲私有財產制的擁護者，對於這種宣言當無可猜疑其真確性之餘地，但這個事實當然可以贊助國社黨獲得金錢的接濟。

至於慕尼黑大實業家海爾曼奧斯脫（Hermann Aust）先生之贊助國社黨的動機，則並非無利害關係的。在偵查希特勒案件的過程中，奧斯脫曾對審判官宣稱說：『在古羅博士（Dr. Kuhlö）（巴伐尼亞實業家協會理事）的辦事室中，我們與希特勒會談，在座者有腦爾博士（Dr. Noll）與我本人。在這一會談的經過裏，希特勒對我們說明他的政黨之對於經濟方面所抱的目標，這個目標在那時是還未公佈出來的。其它的談話會，是在貴族俱樂部與商人遊戲場中舉行。希特勒會在後面這一個場所，做一篇關於他的目標的演說，這次演說得到廣大的功效；聽衆們是以後面這個形式表示他們的感動：有幾個先生在私人方面是不認識希特勒，卻委託我將與的現錢轉交給他。我好像記得在經過我手的款項裏面也有着瑞士的法郎。』

這個方法所與上面方法不同的地方，乃是他們放棄了「無條件的」財政援助。或許希特勒或愛加爾是以利害關係的財政援助當爲同鬼神訂定的一種契約，在那裏面，受款人承當採取某種政治的態度並在約中簽字。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簽過字，僅僅是做了一篇小演講，凡是不合適的與帶屈服性的舉動，都會想法避免。實在說來，在決心對實業家們宣佈他之一向保守祕密的關於經濟方面的目標後，希特勒實超出一個政黨領袖所應走的路徑了。

在那個時候，大家是處於濫發紙幣之旺盛期中，大家重視能夠領到價值穩定的貨幣。所以希特勒極力也在外國找尋金錢。剛塞博士(Dr. Gansser)——希特勒之最熱心的宣傳員之一——是駐在瑞士。這些人員並不會經過精密的挑選。所以有的也想得到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金錢。英國工黨議員摩累爾(Morrel)（現在已經逝世了）且曾力稱說，國社主義者們，在不知不覺之中，領到法國的金錢。摩累爾似乎從巴黎內閣一個閣員聽到這個消息。或許有些法國的機關，曾預料希特勒運動的成功對於牠們在來因蘭所採取分離運動的政策是很有利的；得了不準確的報告，牠們或許認爲國社主義運動——那時是柏林的敵人——是巴伐尼亞分離運動。便是

因爲這個原因，在大戰後頭幾年，少許法國的金錢，會流到巴伐尼亞，而到了希特勒手裏。關於這是否影響到希特勒，使之對法國表示好意，這個問題可無須辯論了。

國社黨的職員，至少是挺進隊的職員，其一部份的薪金是用外國貨幣付給。譬如，克利伯爾每月領到二百瑞士法郎。其他軍官，有的領到九十法郎，有的領到八十法郎，在那個時候，這還是很可觀的數目。

領到這些款項的人們，也正如贈與款項或居中撮合的人們一樣，祇認得希特勒一個人。依照贈資者的意思，希特勒不能夠對任何人宣洩金錢是來自何處；因爲這個問題，他曾與查可伯——國社黨第二總理——發生激烈的爭論！然而查可伯仍然絲毫不得知道。

不過，錢櫃總是一空如洗。現在非發動不可了。

## 二十七 「許多頭顱將在地上打滾」

當事變正在逼着希特勒時候，他的內心卻使他得到安慰，爲的是他對於自身的價值有了無

限的信賴，而在他之前，很少政黨的領袖能在這一點上趕得過他。

他向從前的右派政黨大聲喊道：『你們有什麼信仰可以獻與民衆，使他們可以服膺呢？什麼都沒有啊，因為你們連自己的方法都不信仰呢。我們最偉大的任務，是要給這些到處追求與徬徨迷路的廣大羣衆以一種新的信仰，將使他們的心靈有所支持和有所棲息，我們必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這個信仰的創立人卻是被逼而謀反，被逼而屈膝於祇顧自己前途的將領，蠢拙的官吏與狡猾的警察當局之門呢！在這些人身上，任何信仰不會從他們的心裏產生，任何信仰不能鑽進他們的心裏。在這裏，希特勒是被目爲半瘋狂的人，祇有向羣衆說話的用處。在這裏，每日同這些冷淡的擁有權勢的人們接觸他之本身所有的弱點卻天天發揚光大。而這樣的，他便回頭對他的部下說了下面著名的話：『在這一場鬪爭當中，許多頭顱將在地上打滾；這若不是我們的頭顱，則便是敵人們的頭顱。我們要當心使這些頭顱是屬於他們的啊！』

這種可驚的口氣，這種冷酷地宣佈出來的更替論，即是他自己的有些同志，也認爲是過火的。



因此，他力求大家對他的話，要絕對的認真看。他於另一次說道：「有人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果然有一天你們取得政權，你們確實有實行你們的威嚇行動的勇氣嗎？是的，你不必懷疑，我們必有這個勇氣。」在他說話時候，全場是默不作聲。他還不疲倦的繼續說道：「慈悲念頭是與我們不相干的。牠乃是太上權威的事情。我們祇要顧到正義可以伸張無憾而已。」他還說：「我們可以大膽地繼續那麼不人道的工作，祇要是我們應當從這個手段重新使德意志人民得到福祉。」

當他到了應當執行這個兇殘的計劃時候，他的神經還是堅持不變嗎？可是，無論如何，他一向總是想法避免。至於唯有一次他曾經採取劇烈的行動——在本書裏面我們現在即要講到——他卻不是因為基於信念或基於兇殘心而做的，這乃是基於絕望呢。

## 二十八 國防軍軍部之不可解的人

在十月底，嘉爾與斯特萊斯曼發生了瘋狂的與無謂的衝突。瘋狂的，爲的是，在鼓動巴伐尼亞國防軍叛變後，他卻將犀克脫及其將領驅向共和政府懷裏去。無謂的，爲的是斯特萊斯曼已經作

圓滿巴伐尼亞人最過分的要求之準備了。他派遣他的朋友施爾 (Scherr) 海軍上將去會見嘉爾，並對後者呈獻巴伐尼亞的軍隊、鐵路、郵政及財政等獨立。在這個時期中，斯特萊斯曼已經鞏固了共和政府的地位，將社會民主黨的份子擠出中央政府的內閣之外，在魯爾方面，也與法國人訂立一個協定。在這種情形之下，將這番巴伐尼亞進攻柏林之羅曼提克的行爲安放於軍事陳列所，不是更見妥當嗎？

決定主意是不容易的。巴伐尼亞警察廳的賽士大佐於是以十一月二日奉派前往柏林探聽消息。關於政府的某某種改革他從犀克脫將軍口裏僅得到廣泛的宣說：「應當將怎樣調和拍子的任務交付他身上。」而這個拍子到底是激烈的嗎？到底是合法的嗎？不管怎麼樣，塞士是不能夠解釋國防軍之不可解的人物所說的謎語。嘉爾之重要的地位卻大見增加，至少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這麼看法。與愛伯講不到妥協，與斯特萊斯曼談不到和平！他將爲德意志之狄克推多了，他將以無名小卒看待「這些北方的先生們。」從遠遠的地方，他看到德爾斯巴克所戴的皇冠射出燦爛的光彩；克拉斯在他之許多論文裏面，不曾自己也追敘這種氣象嗎？

## 二十九 羅梭之百分之五十一的把握

可是，他頭一著須防止希特勒先下手發動自己的革命。興奮的情緒是將後者趕到半瘋癲的狀態中。在羅梭面前，他竟然將自己彷彿剛柏達（Gabelts），無疑的，也彷彿墨索里尼。他對羅梭的助手柏森（Barchem）中佐說他自己覺得是被召來救援德國似的。柏森曾對他於全德國獨裁政府的計劃裏面所安放魯登道夫的位置，批評說，對於外國人方面，要引起許多難題。希特勒便回答道，魯登道夫的任務是僅僅限於軍事方面的，至於政治方面，是祇靠希特勒自己；魯登道夫在那裏面是什麼都不過問的。柏森還述起他所說下面之可注意的話：「他還說道，拿破崙也是這樣，爲組織總裁政府起見，他身邊也圍繞著許多無足重輕的人物。」

希特勒之最接近的助手，也當然的嗤笑如此的大言不慚。鬪爭大同盟軍事首領克利伯爾便曾對一個來自北方的人說：將一種指揮權交付希特勒，是沒有這個問題的；他腦中也祇有他之宣傳工作。戈林也曾於十月二十三日對挺進隊的首領們說道：魯登道夫當然可以充任德國的狄克

推多；「我們可以在政府裏面爲希特勒向某方面找到一個位置。」某方面嗎？戈林也不十分知道，在取得政權後，怎麼樣希特勒還能夠有用處呢。

在同一次談話當中，戈林預先說道，他們一到了取得政權到手，便施行最「殘狠的恐怖。」任何人稍爲企圖反抗，便即予以槍決。爲慎重起見，挺進隊的首領們應當預先記錄應予逮捕的人物。至少其中之一，在武力發動之後，須立刻執行死刑，用以做一個榜樣。

這乃是真確的革命的情緒，但卻是用以衝撞嘉爾那樣的人物。嘉爾於是決計選拔武裝的同志，並趕走那些要不得的份子。他因此於十一月六日召集軍人各團體的領袖，並對羅梭面前，向他們發出一個訓話，訓話的末了是說：他禁止一切非他本身所準備的苦迭達。「我們祇可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後纔發動，而且祇可在我的命令之下。」

至於羅梭呢，在被鬪爭同盟各首領緊緊勒逼之下，他於絕望之中，吐出這個著名的話：

「我總往前進，我總往前進，祇要在我的方面有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把握。」

### 三十 希特勒之茫無頭緒

嘉爾所召集之天真的軍人，祇是在他的演說裏面看到巴伐尼亞狄克推多之可恥的畏怯。可是，當他們將談話的情形告訴國社黨各領袖後，後者們卻有了另一番的見解。不崔伯勒·里克脫跳起來說道，嘉爾不是畏怯的，也不是猶豫不決的，他卻是恰恰相反：很顯明的，他下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主意：他想佔希特勒與魯登道夫的上風。

希特勒突然發生恐慌。當天晚上，他同崔伯勒與愛加爾會商。崔伯勒便說明爲避免被排擠起見，他們應當做一點事情。既然嘉爾不久也總要進攻，最妥當的辦法便是先下手——外面裝出不知道的態度。克利伯爾於是打電報到各方面，並且吩咐同志們武裝起來。他們決定在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日的夜裏集中於慕尼黑城外；假裝說做黑夜大演習；到了清早，他們便將向慕尼黑前進，將在這個城裏，建立一個國民的政府，而將嘉爾與羅梭放在既成局面的前面。

可是，希特勒在事前還想再度採取緩和的步驟；他要求嘉爾於十一月八日接見他。如果嘉爾

是答應了他的要求，或許希特勒在離開省長公署時候，腰包裏面是帶了副攝政的頭銜。再不然的話，或許嘉爾將他逮捕於等候室。而政府特派員卻無解決這個兩難論法之必要，因為是他不接見希特勒。他自言道，在近這幾個星期，國社黨黨魁於每次詢問他的時候，態度實是過於傲慢不恭了。他果要請求私人接見的話，可以使他等候等候。因此，嘉爾定在十一月九日召見希特勒。或許希特勒仍然一直等候到九日，如果在這相隔期中，局勢不會有遠出於他意料之外的劇變的話。

在十一月八日，黑爾道夫（Heldorf）伯爵——將來之柏林挺進隊的首領，在那個時候，爲斯太黑姆·杜斯退堡（Stahlhelm Duestenberg）的副官——向羅梭報告關於北方的態度之不甚愉快的消息。羅梭將軍便失掉了耐性而說道：「如果在柏林祇有那般萎靡不振的人們，沒有下決心的膽量，那麼，巴伐尼亞也不能夠單獨營救德國。」這種怒氣還不是十分危險的。但是後面跟下去的話是更見厲害了：「在巴伐尼亞，羅梭繼續說，我們毫無任其漸漸的而必死的與北方共在黑紅三色旗之下，同陷溺於呆滯的泥淖之意願。如果北方是失掉了生存的志願，那麼，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便有做到一種分離的局面之必要。」

後來羅梭當述到這次談話的經過，還用一種兇惡的滿意神氣說道：「黑爾道夫於離開時現出侷促不安的態度。」當然的，羅梭將軍不會想見他所說的話會發生了確實重大的影響。

黑爾道夫趕緊跑到崔伯勒家裏，並告訴他說，巴伐尼亞人作脫離德國的威脅了。

在那個時期，崔伯勒在希特勒身邊有了重大的勢力，他好像憂懼巴伐尼亞人果然不久要嘗試分離局面的暴動。他看到民族主義者將德意志從割據的局面解救出來之歷史上一剎那是降臨了。現在是不能錯過一分鐘的。

### 三十一 「安頓你會保守秘密嗎」

命運卻以一個絕好的機會供給叛黨。經幾個經濟的團體請求後，嘉爾將於十一月八日晚上在布格博羅酒店做一篇關於政綱的演講。這個演講會是包括慕尼黑之所有和平的與快樂的人物，他是絕對無害的。因此，希特勒希望用他所火速調集的幾百個武裝人員，可以不費什麼大氣力便能得到成功。除了他之最接近的同事之外，惟有包勒曾預聞他的計劃。

假使沒有發生希特勒的舉事，演講會將在十點鐘於向政府特派員歡呼致敬之中宣佈散會。到了那天晚上，希特勒穿着舊大禮服——他之最好的衣服——佩帶鐵質勳章，他先打電話給杉斯（Zentz）參事官——演講會的籌備員——請他們等候他本人到場後再宣佈開會。希特勒實是有心喚嘉爾走出場外，向他指明會場是被他的部下包圍了，並且告訴他國民革命已經發動了。那個時候，或許嘉爾同他一路走，他便無須乎做無關緊要的演講，而使同希特勒向會衆宣佈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因為希特勒請他等候，嘉爾心中便覺得不愉快。

他於是說：「我們很可以替希特勒先生找到一個座位。我們不能夠因為他一個人而使三千多人等着。」他便開始做他的演講。

希特勒急遽坐汽車趕來。特萊斯勒坐在他旁邊，以為他們兩個人是去鄉下的一個演講會。忽然間，希特勒轉身向國社黨的名譽總理，對他說道：「安頓，你會保守秘密嗎？我們不是到佛來斯（Freising）去的。到了八點半鐘，我便下手進攻了。」



特萊斯勒受了禁止，覺得很難爲情，便冷淡的回答道：「我祝你有好運氣吧。」

到了酒店，希特勒想闖開一條路，直達到嘉爾面前；但是他沒有辦法做到。入口處是被人擠滿，有好幾百人找不到座位，便佔據那裏。挺進隊怎麼樣衝過這一堆人羣中呢？希特勒於是想出道理。他走近維持秩序的警察身邊，吩咐他掃清入口處和街面，以預防發生吵鬧。警察便執行了他的命令。這樣的，警察本身是爲希特勒的暴動打一條通途無阻的路徑了。

在那個時候，崔伯勒跳上汽車，趕到路維斯荷爾（Ludwigs-hof）將魯登道夫找來。據所有參加這次事變的人們以及魯登道夫本人的證明，後者是完全不知道一切籌備的經過，而是被希特勒放在一種既成的局面當中。希特勒是報復了努連堡之「德意志日」的怨憤。

### 三十二 布格博羅酒店之一響槍聲

當挺進隊人員到了酒店，嘉爾差不多演講了半個鐘頭。這次來的人員是屬於希特勒的保護隊。他們很容易的佔領了警察曾經掃除的入口處，並在那個地方，架設許多機關槍。警察隊隊官於

是打電話到省長公署請求訓令。那邊回答他說，維持街上的秩序，至於其它方面，須看情形如何變化；他們是不知道局面將怎麼變化呢。發下這個命令的長官乃是佛力克博士。在一個鐘頭後，希特勒便任命他爲慕尼黑警察總監。

在這個時間當中——大約是八點四十五分鐘——希特勒帶領了他的武裝黨人擁入會場，他手中握着手槍，往嘉爾所站的講臺闖去。照索登伯爵——當時目擊情形的一份子——所說，他完全是發瘋的神氣。他的部下在會廳門口安放一架機關槍。希特勒本身跳上一張桌子，向天花板開一響手槍，又跳落地上，繼續往講臺跑，經過於驟然死冰冰的場中。一個警察隊長，手放在口袋裏面，攔住他的去路。希特勒將手槍支着他的額上，像偵探的小說所講的喝道：『把手從口袋裏拿出來！』另一個警官走過來，猛力的挪開希特勒的手臂。希特勒便跳上講臺，在那個地方，嘉爾是面如死灰，萬分狼狽，往後退好幾步。希特勒便大聲喊道：

『國民革命是爆發了。會廳是被六百個全身武裝的人們所佔領了。任何人不許出去。如果秩序不立刻恢復的話，我便在花樓架設機關槍。國防軍的營部與憲兵部都已佔領了。國防軍與憲兵

隊已經在卍字旗之下前進了；他們不久便可來到此地。」

隨後，很粗暴的，他吩咐嘉爾、羅梭與賽士大佐——巴伐尼亞警察首領——跟他走。在挺進隊人員護擁之下，希特勒使這三個巴伐尼亞主人翁離開會廳。旁邊有某一個人喊道：「你們不要像一九一八年那樣，現出沒有膽量。開槍吧！」然而他們三個人是無槍可開。羅梭祇能夠低聲向賽士說：「裝傻罷！」賽士便將這個口號傳與嘉爾及幾個警察官長。

會廳從新開亂起來。全場對於手槍的把戲，都覺得忿忿不平。空氣是到了那麼緊張的程度，於是戈林登上講臺，像打雷的聲音那樣，喊道：大家什麼都不要怕，我們僅僅是遇着國民舉義的開始。德國中央政府與巴伐尼亞政府已在顛覆的途中，由一個臨時政府出來替代。到末了，他說：「你們不滿意什麼？你們是總有啤酒喝的。」

### 三十三 「明天不能戰勝便要死掉」

在隔壁一所房間裏面，希特勒開始談判的工作。他開頭先說道：「不得我的許可，任何人不能

活的離開此地。」隨後，他猛然的轉回身對這直挺挺的三個人說道：「先生們，德國新政府是已經成立，而巴伐尼亞政府是顛覆了。巴伐尼亞將成爲新德國的出發點；牠是需要一個攝政。嘉爾先生，這應當由你擔任。包勒將爲首相，並擁有狄克推多的各種權力。」說到末了，他用幾個短句說道：「德國中央政府：希特勒；國民軍隊：魯登道夫；警察部長：賽士。」

他不會聽到了一聲回答，便舉起手槍，萬分激昂的繼續說：「先生們，我知道這番舉動是使你們難堪的。但是我們有走捷徑之必要。我無非是想使你幾位先生容易鼓勵起來。你們每個人都應當擔任所指定的職務；不然的話，我就不擔保你們的性命了。」他們仍然是默默不作一聲，他又說道：「你們理會嗎，你們祇要同我站在一起奮鬥，同我一起戰勝，或是同我一起死掉，如果失敗的話。我的手槍裏頭有四顆子彈，三顆是送給我的同事的，假定他們不跟我的話；而第四顆是送給我自己的。」

他將槍頭指着自己的太陽穴，莊嚴地說道：「若果到明天下午我不戰勝的話，我便自殺。」這是酷像羅馬人所說的話。莎士比亞劇中的布魯吐斯（Brutus）便是這樣地說：「是的，因爲

羅馬的福祉，我殺死了我的最好朋友；但我將同樣的刀留着殺我自己，若果我的死是有益於祖國的。」

可是，嘉爾先生表現了不撓不屈的精神。在他看去，希特勒所說的話，是以殺人爲要脅的，而他的回答便爲這個環境當中之最適當的話：「希特勒先生，他說，你可以叫人打死我，你也可以自己動手打死我。然而死不死，在我是沒有什麼輕重的。」這樣，他是使希特勒理會用威脅的行爲是不能在他身上得到任何允諾的。

談判始終不能得到好結果。實際上希特勒所說的話是對羅梭而發的，而羅梭卻始終不作聲。可是賽士開口說話了。他責備希特勒違背他的誓言。

談來談去，總是提那些信約不錯的，希特勒會常常應許賽士說不作反警察當局的暴動之企圖。可是在十月底，在他萬分狂怒之下——因爲他們禁止他開會——他取消了他的許諾；隨後他又應許了羅梭。他於是請賽士原諒他：他是因爲國家的利益，纔做這番舉動。不過這種話總不能緩和屋中的緊張空氣。希特勒有的時候說起國家這樣那樣，有的時候以囚人看待他們三個人，並且

禁止他們彼此談話。在門口和窗口各地方，站了一批武裝的與帶威脅態度的人們。

### 三十四 向柏林前進

希特勒於覺到同他們三個人談判不能達到任何結果之下，返身再進會廳裏面，便在那裏做一篇短促而莊嚴的演說。據當時證人所說，他易如反掌的轉移了全會場的意見。他宣佈廢立德國現任總統，德國中央政府與巴伐尼亞政府；並且宣稱嘉爾充任巴伐尼亞攝政，包勒充任擁有狄克推多的各種權力之內閣總理；他還繼續說：

「我這樣提議：一直到我們同那些今日陷德國於顛覆地步的罪人們算過賬之前，我本人擔任臨時國民政府的指導任務。魯登道夫將軍擔任領導國民軍隊。羅梭將軍擔任國防軍部長，賽士大佐擔任警察部長。臨時國民政府的任務是向柏林前進。現在我要求你們這個：在會廳外面，是站着三個人：嘉爾、羅梭與賽士。他們是很不容易下這個決心的。諸位接受這個解決德國問題的辦法嗎？我們是想建立聯邦制度的國家，巴伐尼亞在那裏面享有牠所應得的權利。明天，若不是

德國有一個國民政府，即便是我們大家死掉。」

這確是一篇希特勒式的演說，裏面是滿腔卓絕的熱情，而同時包含了鄙劣的狡計。爲的是希特勒可以使聽衆以爲他們三個人已經同他商量好了。全會廳便以歡呼鼓掌報答他。而現在呢，希特勒祇須回到嘉爾身邊，對後者說全會場是準備擁護他了。

### 三十五 陛下的先王

在這個時候，崔伯勒伴著魯登道夫從外面進來；他沒有工夫先同他們招呼，馬上便開口發言。他同大家一樣，他說，想不到有這一番意外的事變，但這是關係着國家的重大利益。他唯有勸告這幾個先生們在那裏面努力合作。他們還是同他拉拉手吧！所有這些話是很使魯登道夫將軍費點氣力的。對於希特勒，他是極忿怒的；希特勒擅自分配各種位置，而祇留軍隊的首領一席給他，因此在整個晚上，他不曾同希特勒交換五句話。希特勒全副精神是注在自己身上與他所幹的事業，起初他完全沒有看到魯登道夫的態度。他大聲喊道：「我們現在沒有退縮之可能了。世界歷史已經

登載這番事變了。」

頭一個恢復自己勇氣的是羅梭；他總覺得不能夠任魯登道夫伸手等着。他拉了魯登道夫的手，冷淡地說：『好吧！賽士也跟上去。嘉爾還是支撐着說：他是君主主義者，他不能夠贊助這一類的革命，他自己認為是國王的代表。』

希特勒於是合著手而鼓勵他說：『先生，我們可不是這樣的。我們所做的乃是補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罪人們對於王朝所施之無窮的與可恥的不公正行為呢。如果閣下可以許可的話，我於散會後立刻跑到王子陛下身邊（魯博烈黑特王子，那時是逗留於柏克特斯園（Berchtesgaden）），對他說這次國民舉義是補救了對於王子陛下的先王所施的不公正行為。』這幾句怪異的話，每個字都曾經包勒一一證實，他恰好是在這個時候從外面走進來。嘉爾找到了退步的餘地，他於是用一種冰冷的聲腔說道：

『好吧！我看到無論如何我們大家都是君主主義者。我接受巴伐尼亞攝政的位置，但祇可站在王子陛下的代理人的地位。』



三十六 發誓

口中聲聲說到國王，臉色暗晦，巴伐尼亞狄克推多重新回到空氣緊張的會廳。後面跟上了魯登道夫，臉上現出蒼白的死人顏色——好像已經死過了的臉色，一個目擊者會這樣說。唯有希特勒是十分高興而且——據同一個證人說——像一個小孩那樣快樂。他說了一篇新的小演說，在那裏面，重新說到他上次所報告關於分配權限的話，他還說：

「在五年前，翰在病院牀上，身體殘廢，雙目失明，我會發誓說，直到十一月的罪人不會打倒之前，直到在今日之不幸的德意志的餘燼上建立了強盛的與偉大的，自由的與燦爛的新德意志之前，我將永不撒手。現在我要履行我的誓言了！」

在這個時候，這個快樂的小孩，絲毫不感覺到他所冒的危險。他並不會留心聽到嘉爾所說下面騎牆的話：「受了必要的狀況所強逼，今天我以五年前被罪人們所推翻的王朝之代理人的地位，來掌握巴伐尼亞的運命。我之決意做這個舉動，不是沒有苦心的，我祇希望牠可以成爲我們巴

伐尼亞地方與我們大德意志祖國的福祉。」

嘉爾之參加革命乃是懷着苦心呢。可是，在這一刹那，嘉爾之良心的表現，也與魯登道夫的怒氣一樣，希特勒是不大理會的。魯登道夫，臉色暗晦，宣稱說：「遇着了眼前的嚴重局面，我在十分驚悸之下，憑着我自己的良心支配，而為國民政府效勞。」後來總檢察官問他：「憑着我自己的良心支配」這一句話是怎樣解釋，魯登道夫便回答道：「那個時候，全會場或許以為我是追隨希特勒的。我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並不照希特勒的命令而行動，但是依着我自己的指使。」

### 三十七 「我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呢」

嘉爾如果能從希特勒手裏奪得暴動的領導權，或許他曾企圖為他自己而實行苦迭達呢。或許的半個鐘頭後，當他同雜沓的人羣離開酒店時候，克里林首相的一個顧問走近他身邊，他便低聲對後者說：「親愛的同事，我是萬分狼狽了。你自己也看到我祇說了勉強的與被強迫的「是」字。我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呢！」在這三句話裏面，我們看出嘉爾先生——希特勒想得其許可

而做革命的嘉爾先生——之一的性格了。

可是，希特勒是很有機智的，在布格博羅會議裏面，將他所能找到的巴伐尼亞政府的部長悉數扣留起來，他們裏面的首腦便有克里林首相。同時，這好像是奇怪的舉動，他也扣留了索登伯爵，即是希特勒所想爲其父親復仇的魯博烈黑特王子的祕書長。從前制止希特勒進謁王子的便是索登。現在人家把他扣留了，伯爵忿恚萬分，喊道：「我看你很有君主主義者的神氣啊！」

一會工夫便來了國防軍與奧伯蘭同盟之一支隊發生衝突的消息，後者是想解除軍隊的武裝。大家於是覺到希特勒太快認定軍營是被鬪爭大同盟佔據了。挺進隊曾幾次藉口親善，企圖佔領軍營，但完全失敗了。希特勒與崔伯勒是太急於發動的。

希特勒便自己跑到軍營，想法調處；在回來時候，他以爲魯登道夫與羅梭是正在開軍事會議，討論進攻柏林的步驟。可是魯登道夫卻請他的同事們回去睡覺。崔伯勒長長縮縮的表示反對，魯登道夫便動怒了，說他不許任何人不尊重一個德意志軍官的話。

三十八 動怒的將領們

關於嘉爾與羅梭所做破壞希特勒暴動的詳細情形，現在我們不必提起。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謠傳所說魯博烈黑特王子與浮爾哈伯大主教之從中干涉，乃完全是捏造的事實。能夠增強嘉爾——羅梭——賽士三頭聯合之抵抗的希望心者，其初乃是站在事變之外的塞尼黑將領們的態度。尤其是衛戍司令官但勒（Danner）將軍的態度；他曾對羅梭說了這個粗野的問話：『我希望所有這些事情無非是虛張聲勢吧！』一向將領們心中所含蓄之反對義勇隊份子的積忿，終於最後發作起來；布格博羅酒店所演手槍的惡劇，是被認為侮辱軍隊的行為。而照名譽的習慣法來講，希特勒做了這番舉動後，是應該處死於亂刀之下的。可是前任伍長卻不曾想到這一點。

在同羅梭協商之前，但勒、克奈斯·克勒森斯登（Kress von Kressenstein）與李伯（Leob）大隊長已經採取一切有效的佈置，使軍隊隨時可以抵抗外來的侵犯。即使羅梭不下命令，他們或許也向敵人進攻。在這個時候，他們聽到愛伯總統將應付整個德國的全權付託犀克脫將軍，並且犀

克脫會通知慕尼黑方面說他將以武力解決這次暴動局面是操縱在忿怒的將領們手裏了。

總而言之，即使嘉爾有時候會懷着避免的不堅定的意志，而三頭聯合之復歸正路總有各種充分的道理。而一到了主意決定後，他們三個主腦便毅然決然下手行事，儘力量使前此之懦弱無能的行爲所引起的不幸的影響，減到最低的限度。

### 三十九 被判罪者與抵押人

可是，包勒和佛力克在他們那方面，卻準備發出一張佈告，慕尼黑人便於第二天看到貼在城裏各處牆上，那裏面是說：

「最高法院已經成立，牠的任務爲審判危害民族與國家的安寧的罪人。牠之判決罪狀是取有罪與無罪兩種形式。無罪的開釋，有罪的處死。死刑是於宣佈判決後三個鐘頭內執行。」

另一個佈告是通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事件的罪人，並宣稱每個德國人應有將愛伯·蔡德曼 (Scheidemann)、奧斯加·柯恩、保羅·雷維 (Paul Levi)、迪歐多爾·窩爾夫 (Theodor

Woh), 喬治·柏拿爾(Georg Bernhard)等人,及其黨羽不管活的或死的,擊解國民政府的義務。起草這篇佈告者的姓名,不幸到現在仍不爲人所知道。

在九日早晨,一隊叛黨侵入慕尼黑市政府,擊捕了九名市議會社會主義黨的議員,市長士密德(Schmid)也在其內。他們把囚人們驅入運貨汽車,而駛到一個樹林裏面;把他們趕下車,牽引到樹林深處。鬚髮斑白的市長便說道:「我是不重視我的性命的。」他們到了一塊空地後,隊長便向囚人們說,他要向他們通知一個不好的消息。「他們要打死我們吧。」這些囚人是這麼想着。但結果完全不是這回事。這一隊裏面的人們聽到了暴動的不好消息,他們於是需要文人的服裝,便想從囚人身上取下來。

幸虧幾個市政府的人員追上了他們,便向叛黨說他們有要回這些囚人之必要,因爲若沒有後者們的簽字,他們便不能支付失業者的救濟金。若果把這些市議會議員槍斃了,失業者領不到錢,恐怕要因此發生騷動。叛黨方面,或者是因爲相信了這篇假話,或者是樂得很體面的拋開這些不好惹的囚人,終於把他們放走,後者於是能夠,身上僅穿着襯衫,趁第一趟火車回到慕尼黑。

其它的部隊便搗毀猶太人的住宅，擊捕了二十幾個人。關於後者，乃僅是從電話簿裏面隨便選到了姓名的。可是，在他們所認為是猶太人的囚人裏面，便有一個伯爵及幾個傾向國家主義的人們。這些充作抵押品的人們，便被關在布格博羅酒店；正當看守人向他們要射擊時候，保安隊趕到，把他們解救了。

#### 四十 太早了二十四個鐘頭的攻擊

在十一月九日夜裏，希特勒心中是縈迴於快樂與煩悶，希望與絕望的情緒當中。「到底，我們是走到比較好的時期了，」他滿懷愉快的對他的朋友羅姆說；他還抱着羅姆說道：「我們不倦的團結我們的力量，使德意志從窮苦與恥辱中得到解救。」到一個鐘頭後，他卻滿面憂鬱，聲言此次果然成功當然是再好不過的，而不然的話，他們祇剩下自己吊死一個辦法。隨後，他又換了他的聲調，朝着包勒，猶同拿破崙對他的將帥說話的嚴重口吻，說道：「首相先生，我們把政權交給你，是要你行使這個權力。我們應該想出辦法來。假使我們的部隊跑到城裏喊道：把旗號掛起來，我希望看

到他們不至於使大家不高興罷。」

說句實話，革命黨方面，雖然在政治上有了許多錯誤，他們仍然可以挽回有利於他們的局面，假定準備工作是充分發展的話。他們的人數最初祇有八百人，但在一夜之中，大見增加。統合算到駐紮於城中各地點的人數與由各地步行或坐大汽車趕來的人數，必定有着好幾千人。以人數而論，鬪爭大同盟方面的實力是高過於政府的軍隊。而且在鬪爭大同盟方面，也並不缺乏機關槍與大礮；他們祇差了整整二十四個鐘頭，可以佔領了軍營，封閉了軍站，奪取了電報局，做到所有這些。在他們的計畫裏面曾經詳細顧到的步驟。所以嘉爾與羅梭，他們自己也相信在那一夜裏，叛黨是已離成功的局面不遠了。他們因此跑到各處軍營，以求保持軍隊的忠心擁護。有兩營的軍官似乎拒絕於第二天進攻叛黨；第三營的首腦卻是不得已的而接受命令前進。在高級軍官與從大尉以下的低級軍官之間，似乎是發生裂痕了。局面是這麼可憂慮的，所以羅梭也顧不到有損他的威嚴，而於第二天下午，請求犀克脫加派三個大隊與礮隊前來救援。不過，後者結果是不會參加進去。在等候當中，叛變已經被鎮靜了。



#### 四十一 佛力克謹慎的官僚

叛黨是陸續一一打敗了。頭一個犧牲者便是佛力克。在起事那天晚上十點鐘，他的秘書走到警察最高機關，告訴他被任爲警察總監的消息。據他自己的口供，這個新的光榮，使他發生憂愁，其程度是遠在他的愉快的感覺之上。他向包勒解釋說：「他祇願意以關在布格博羅酒店之曼泰爾（Mantel）市長的助手之資格繼續服務；」他並且首先要得嘉爾的同意。在他的革命活動的第一夜裏，佛力克實不曾表現出公民的偉大勇氣了。

佛力克與包勒不久便被兩個警官擊捕了，即是在兩個鐘頭前，向他們賀喜新任命的警官呢。

#### 四十二 失機的魯登道夫

在暴動當中，鬪爭大同盟方面所得到之唯一的勝利，乃是靠在羅姆身上。他曾託辭舉行一個聯歡會，使他的部下集中於羅文博羅（Loewenbran）酒店，在那邊準備待機行事；到克利伯爾發下

命令，他便佔領了巴伐尼亞軍區司令部。魯登道夫曾出這一下襲擊的主意，便叫牠爲：給於羅梭看的儀仗兵。他們於是在司令部周圍佈設電網，並在各窗口架設機關槍。在這一夜裏，司令部暫時成爲叛黨的大本營。

不久後，司令部的新主人們心中漸漸覺得他們的動作進行裏面是遇着了某種不得手的地方。他們曾以嘉爾與羅梭或許被將領們所囚禁了——當時確是近於這種情形。派到軍營打聽消息的軍官們，都被羅梭下令一一逮捕了。其中有一個曾要求說，至少總要給魯登道夫一個回話，羅梭便萬分忿恚回答他說：「叛黨們所應得的待遇，便是開槍打死他們！」

將領們這種毅力與這種決心與敵人的緩和態度卻是完全處於相反的狀態。在司令部那邊，一個軍官恭恭敬敬的向魯登道夫表示他的見解，據他看，如果武力衝突的話，國防軍方面，將極力保守牠的軍營，直到最後的一個子彈。魯登道夫卻不會用一個真正革命家所應當這樣說的話來回答：「那麼，你也應該於放了最後的一個子彈後死於陣上……」他卻用憂鬱的口吻——那裏面是充滿着從心坎裏吐出的同情——回答道：「我完全懂得他們。但我永遠不進攻軍營，也不進

## 攻國防軍。」

希特勒的情緒卻是完全不一樣。當他一聽到了國防軍抵抗的消息，他萬分忿恚，喊道：「我們運兩門大砲去，把他們趕回裏面。不管整個的營房是被炸燬了！」

到了早晨五點鐘，叛黨方面，從累波爾（Leipold）大佐口裏，聽到羅梭將向他的軍隊下射擊的命令。他們也應當射擊嗎？有些人是很願意，並且曾有那麼做。可是，他們的首領魯登道夫，自己覺得他出面的時候是到了。他以為可以對着對方的槍口前進，這樣便可以使對方放下槍枝呢。

## 四十三 腓德赫恩廈的鬪爭

叛黨方面，這一早晨的工夫是費於在伊薩爾（Isar）河邊佈置防禦工作並安設幾門大砲。約在十一點鐘時候，希特勒與魯登道夫帶領幾千人開始在城裏巡視。各人肩上擱槍，有的已在槍口安上刺刀；頭幾排之後，便跟着一個安設許多機關槍的汽車。

設使革命黨方面的確是想看清地位，與認識政府的態度，那麼，他們很可以避免再往前走。

因為貼在各處牆上的佈告是這麼寫着：

「有些包藏野心的人們，以奸偽與惡毒的行爲，假藉國民示威運動的名義，竟演成了深可痛恨的強暴惡劇。在手槍威脅之下，我本人與羅梭將軍及賽士大佐所被強迫而公佈的一切宣言，是完全無效的。從此後，國社黨以及「奧伯蘭」與「德意志國旗」各鬭爭的團體均一律予以解散。

政府特派員嘉爾」

希特勒、魯登道夫、衛柏博士、霍伯勒與克利伯爾等人是站在大隊前頭前進。在他們後面幾排，德意志北部的人民黨領袖格拉夫，神色慘沮的，也跟着走。他是應魯登道夫之召，在那個早晨才到慕尼黑。他便是參加這次運動之唯一的「北方先生。」

走到了伊薩爾橋邊，大隊便被保安隊攔住去路。保安隊已經舉槍瞄着。他們便要開槍嗎？戈林單獨走近他們身邊，手按着他的軍帽，說道：「我們這方面被打死頭一個人，抵押人裏面也將有一個人被打死了。」其實，抵押人並不會領到那邊，希特勒在最後幾分鐘，親身把他們領出大隊。一轉

瞬之間，保安隊被解除武裝了；大後睡他們的臉上並批掌他們的面頰。大隊繼續進到市中心點。人民是有了沮喪的情緒。嘉爾所發的佈告，與代理首相馬特 (Matz) 從拉提斯本 (Ratisbonn) 城鼓動巴伐尼亞人反抗『普魯士人魯登道夫』這些辦法是發生效力了。

魯登道夫仍然前進，並無確定的計劃——正如他後來所曾承認的——僅僅是明白了大略的方針而前進。他自己說，他的辦法是同坦侖堡戰爭時候一樣的。經過幾番爭論後，大隊到了公署街。在通奧迪安廣場的弄口，夾於公署與腓德赫恩廈 (Feldherrnhalle) 之間，猶同夾在一條狹道當中。在那個地方，保安隊攔住去路。保安隊的人數是不足叛黨，他們祇能夠在這個地方攔住後者的去路；因為革命黨若果達到奧迪安大廣場，他們人數上的優勢，將陷保安隊於不利的地位了。

在這個時候，是那一方面先開槍，這個問題，當然的，在雙方當事人中，後來引起激烈的爭論。奧伯蘭團體的領袖衛柏博士，所持的意見似乎是最合情理的；據他說，鬪爭大同盟方面有一個人或曾搶奪保安隊的槍枝，而在相持之中，頭一響的子彈便射出來了。不論情形是否這樣，雙方敵人隨後便正式開槍射擊。在槍聲發作幾秒鐘前，鬪爭大同盟方面有一個人從他隊中跑出來，向保安隊

喊道：

「不要開槍！魯登道夫閣下來到了。」話剛說完，他便輪倒地下了。這個不幸者，即是在生死關頭這一剎那，也不會忽略了「閣下」這個稱呼。不過，克利伯爾也會在這個早晨，在牌子上面高高寫着：「羅梭閣下違背他的信約……」

希特勒是夾在魯登道夫與崔伯勒之間前進，他挽着崔伯勒的手臂。他右手握一支手槍，當保安隊正要開槍的時候，他向後者喊道：「你們投降！」祇有一會工夫，崔伯勒身中要害，他死倒地，下拖帶希特勒也跌下，後者在跌下時候，手腕脫骨。希特勒現在竟然輪倒地下了。他是被崔伯勒牽帶跌倒嗎？還是照軍隊的慣行動作而自己伏於地上嗎？他自己也無從說起。想用精神制服敵人者，當然應該站着不動；而況在着手攻擊之前，希特勒不會宣稱說他自己準備被人打死嗎？即使有人能夠保證他是站在他的位置不動，也是首先攻訐他的。

許多保安隊隊員會說，頭一排槍發出後，那方面的人完全伏在地上，即是魯登道夫也是如此。但後者絕不承認。無論如何，魯登道夫是不逃的。他朝着保安隊的槍口，一直進到奧迪安廣場，退職

大隊長斯特尼克(Stenik)——鬪爭大同盟的份子——伴他前進。假定有五十人，或即使有二十五人，跟他一起上去，或許這天的情形有着另一番變化。魯登道夫被對方逮捕了。對方竟然下手擊他，他因此忿恚萬分，宣稱說，從這一天起，他再也不認識德國軍官有任何關係，他永遠不再穿他的制服了。

在這一條狹窄的街道上，槍火發生了可驚的效力。十四具屍首橫臥於土瀝青地上。那裏面便有着奧斯加·柯爾奈——國社黨前任第二總理——在那裏死得不分明。崔伯勒的死是像一種可慘的處罰，因為，大體上說，這次暴動乃是他創造出來的。

一到槍聲停止，希特勒頭一個站起來，這是照他的信徒與援救他的人，瓦爾脫·許爾斯博士(Dr. Walter Schulz)說的；他打了半圈後，即開步跑走。許爾斯博士便找來跟隨大隊的一架汽車。他們把希特勒安放汽車裏，便一直向鄉下駛去，並曾經遇好幾次槍火射擊。希特勒大聲呻吟他的傷處痛楚，但是手臂脫骨並不是十分嚴重的。汽車停在離城六十公里外，斯泰斐爾屋(Steffelhof)湖邊的烏芬(Ufen)村，在那個地方，他的朋友漢夫斯泰恩有着一所別墅。兩天後，希特

勒在裏面被逮捕了。

五年後，希特勒對這次脫逃，做了一篇奇異的敘述。他走上羅溫博羅酒店的攔板，握了一個小孩的手，向大家解釋說，在暴動那一天，他看見這個小孩站在腓德赫恩廈前面，他於是挽着小孩的手臂，使他離開槍火的危險。我們可以批評說，不管希特勒是如何愛護兒童，他在這個時候，應該站在他的部下前面不動，並且繼續奮鬥。此外，在當場目擊的證人裏面，沒有人先前曾聽過他提到這個小孩。

腓德赫恩廈前面的衝突發生後兩個鐘頭，羅姆在司令部投降。那裏面曾死了兩人。這次暴動使關爭大同盟方面一共犧牲了十六條生命。保安隊方面死了三個人。



## 第六章 一九二四年

### 一 希特勒有逃避之權嗎

在大體上批評希特勒這次暴動，我們可以說：工作做得不好。第一個錯誤是在於未有充分的準備便輕易發動，第二個錯誤是在於不十分注意國防軍首領的心理，第三個錯誤是在於十一月九日那天缺乏了勇氣。即是如羅姆那樣勇敢的軍人，也自願受敵人的包圍，爲的是他沒有向他的同伴開射機關槍的決心。魯登道夫是毫不願意用武力鬪爭的，他祇想用迷惑的手段。在大隊未動搖時候，希特勒本人也神志不定，對他道：「他們向我們開槍呢！」魯登道夫祇有用英雄的而且是輕率的口吻回答他道：「我們前進吧！」

在暴動發生後，我們會發現慕尼黑的人民似曾有出來參加的準備。繼續在兩天之中，情緒激

昂的人民奔馳街上，唾國防軍兵士的面頰，威嚇嘉爾的各處辦公廳，搗毀穩健派的報館，並且口裏喊道：「打到漢奸！」警察雖揮動警棍彈壓他們，但終是無效的。幾千學生在大學校裏面騷動，侮辱嘉爾；校長向他們勸解，幾乎被從樓上推下來；愛拉爾特勸告他們安靜，也受到他們的怒罵。

有着這麼熱心擁護的人民做後盾，他們總可以做出偉大的事業呀！然而這卻在於鬪爭大同盟應當努力奮鬥——照牠自己的名稱是應當那麼做的——而不應當遇到頭幾響槍聲便撒手。在這個時候，每個賺來的鐘頭都要減削了處於仇視的民衆包圍之中的政府的地位，這批民衆勇敢地面無所用地繼續他們的示威運動歷兩天之久，而各領袖那時卻躲於安全的地點了。

這與共產黨叛徒在漢堡，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德國中部，所做一番興高彩烈的舉動，有什麼差別呢？鬪爭大同盟的各當事人，竟然不管魯登道夫單獨對着警察的槍口前進。與伯蘭團體首領柏博士在整個一鐘頭中悽愴流淚，而希特勒卻頭一個坐汽車逃走，並不顧到他的部下各人。

我們可以替失敗者解釋說，在那個時候，他們大多數都以爲魯登道夫是死掉了。這可以作爲他們喪失銳氣的解釋，但總不能解釋希特勒的逃遁，他本人原應覺有現在單獨站在那邊指揮之

必要呢。

後來，鬭爭大同盟各領袖，爲替自己辯護起見，再三說明德國人不應當開槍射擊德國人。然而在魯爾，或是當推翻慕尼黑共產主義共和國時代，何以同樣的行動是被認爲應當的，何況那時是向徒手民衆下這個手段呢。這是說，在他們心中，革命的鬭爭祇可在各階級之間發生，換句話說，在各層的人民之中，自以爲——不管有道理無道理——是彼此仇視的。在腓德赫恩廈前面的死者之中，僅有了四個工人；其他的是商人、銀行職員與退職軍官。

不過，這天流血的日子，乃是國社黨之幸運的日子。牠之連接於國防軍的臍帶終於剪斷了。所以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起，國社黨纔真正的產生出來。

## 二 國社黨屈膝於王子之前

可是，在暴怒的前夜，這個新生小孩的心靈曾遇着比警察的槍火更要重大的危險。希特勒曾要求魯博烈黑特王子與以保護。

他便借重得有王子寵愛的退職中尉紐色脫 (Neunzerl) —— 羅姆的朋友 —— 從中溝通。紐色脫所負的任務為請求王子疏通嘉爾，藉使國防軍與關爭大同盟的衝突不至發生，此外，在嘉爾那方面，須取消在法庭起訴希特勒及其友人。

紐色脫清早搭快車趕到柏克特斯園。王子提出這個條件：希特勒須向嘉爾道歉。他可以向嘉爾解釋說他的舉動是受了羣衆的勒迫——這實是不與事實相離很遠。此外，他須聽從合法的機關處分。王子完全不喜歡聽到嘉爾所宣稱祇以王朝之代理人的地位接受新政權；但是，他仍然向他的「代理人」表示說，他不願意軍隊藉故開槍，並且要他盡力量停止追究叛黨。

直到這個時候，王子必然曾公開認定他有繼承王位的權利，但並不會有過分的表示。他曾公開支撐政府特派員。他是否企圖從後者手中取得王冠，這一點是難於肯定的。無論如何，他認為在政治策略上，應當趁這個機會，以各方面之公正人的資格出來說話。在十一月十一日，他起草了一篇宣言，在那裏面，他責備嘉爾，並邀請兩方面的敵人在臺前握手和好。可是這篇宣言不曾公佈，因為嘉爾威脅說，果然公佈的話，他便引退……。

### 三 希特勒想自殺

暴動後幾個星期間，調解工作還曾嘗試進行了好多次。魯登道夫希望大家免除他到法庭出席。但是巴伐尼亞人民黨卻強要法庭起訴，自嘉爾的狄克推多權力衰落後，巴伐尼亞人民黨的勢力是大見擴展，在牠採取強項態度之下，調人的努力終告失敗了。最初，希特勒也想避免到法庭。在暴動後頭幾天中，他想自殺。隨後，他被拘禁於蘭德斯堡監獄，他想絕食。但是特萊斯勒打斷他這個念頭。

起初，地方是激動了公憤而起來反對嘉爾。支持嘉爾的那些人物裏面，愛勃將軍也是其一。「慕尼黑之解放者」曾盡力勸告學生。在法庭裏，他曾對於這種舉動做了一篇奇異的敘述：

「幾位高年的先生跑來找我，用游移不定的并且顯然很爲難的聲腔，他講，『而且求我對學生們說幾句勸告的話。我是不很喜歡參預角的事情，因爲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同時要受了兩方面的攻擊。』他表示了這個態度後，仍然同意接見學生的代表，向他們解釋之中，他曾說到了希

特勒違背他的信約。

出席法庭的祇有一部份的有責任者。

魯登道夫與衛柏博士已經在腓德赫恩厦前面落於警察手中。將軍是受到極優良的待遇，並且在他答應不做任何政治活動後，對方便暫時恢復他的自由。曾鼓起十一月九日事件的激昂情緒，現在在他心中竟變成一種虛無主義，一種對於凡是代表了政府的權威之漠視的態度。他忍氣赴預審法官的辦公室，心中實感覺痛苦。到那地方後，他拒絕從大門走出法院。後來還是從暗門走出去。

羅姆、佛力克、包勒以及退職中尉布魯克勒——慕尼黑挺進隊首領——是以現行犯被起訴。在法庭裏，列席候審的還有着退職中尉華格桌（Wagner）——他受到義勇隊首領羅斯巴克的幫助，曾帶領國防軍步兵學校學生參加暴動——與一個無罪的傀儡，魯登道夫的女婿拍勒（Parnel）。在訴訟開始不久之前，克利伯爾自動投案。反之，受重傷的戈林及埃塞與羅斯巴克是逃往外國。戈林在茵斯布魯克（Innsbruck）住些時候後，隨後同埃塞逃往意大利。他在那邊大約住

了一年，同那些法西斯蒂團體發生了友誼的關係，後來到瑞典去——他從前已經認識這個國家——同他妻子在那邊度艱苦的光陰。在希特勒的暴動裏面，他犧牲了所有數目很可觀的財產。

羅姆所在他身上早已感覺到的病象，且於暴動期中曾充分表現於對抵抗人們所說激烈的話裏，現在在瑞典，又發作了極嚴重的程度，因此被人拘禁於療養院裏。他便沉溺於麻醉藥品了。愛加爾也是被拘禁的人中之一，他是嚴重患病。在耶穌誕前不久，他恢復了自由，而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死於柏克特斯園暴動的第二個煽動者也死掉了。

在關爭大同盟與國社黨各機關裏，警察終不能夠找到與暴動有關的文件。這些文件是放於司令部保險箱之安全地點，羅姆經手把牠藏在裏面，與國防軍的文件混在一起。在那個地方，任何人都想不到往那裏找去。

#### 四 魯登道夫反對王朝與教堂

希特勒的案件乃是德國從未見過之重大的政治的案件，但並不顯出有什麼非常的地方。唯

一的非常變化的情節乃在於魯登道夫所做驚人的反天主教教堂的宣言，與同有資產的和智識的階級決裂。

「在大戰時候，」他說：「梵蒂岡並不會嚴守中立，但卻是反對德意志。法蘭西是受到庇護與尊崇。這實使我感覺苦痛——我個人原是尊視天主教教堂的義舉及其教義的——當我在前夏看到教皇起來反對我們在萊因與在魯爾所採取破壞的鬭爭；看到福煦大將在旅行美國時候，在那邊受到教會所贈的光榮寶刀；看到克利孟梭也在那邊受到名譽博士的贈與；好像所有這些德意志的敵人是為基督公司的利益而努力的。我還記得查理皇帝所受的影響，與他之叛負德意志的行爲，以及那些天主教教士所作宣傳反德意志的演講。」

他之反教皇全權論同時使他對巴伐尼亞天主教徒的聯邦主義懷着不信任的態度。在他看去，這種聯邦主義所包含的意義是「德意志做法蘭西的奴隸，而這種奴隸的地位是將因普魯士的覆亡而實現出來。」而且，因為使他的話不爲人所誤會起見，他還說道：「我不是主張大普魯士的；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希望有一個強盛的德意志，一個照俾斯麥的意思的德意志。」



或許在一九一八年，魯登道夫比較是擁護大普魯士的人，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他卻不願意承認了。但是，在與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接觸之下，他曾排除了若干偏見。他說：

「我確信有給與人民一種新的東西之必要，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一種意識。同民族解放的運動發生接觸，對於我是成爲心靈之深濃的需要了。我是主張君主政制的，但我以爲君主政制這個問題在眼前是無法解決的。王朝牠的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牠祇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後面一句話證明出在努連堡做了辭氣傲慢的演講的人，心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苦痛的，是那些事變使我確信我們各種指導階級是無能力向德意志人民灌輸爭取自由的志願。」

德國皇帝的忠臣，現在卻拋棄了頭戴皇冠的人，而想到民間去。這樣，到了六十歲的年紀，他找到了在他之前斯登將軍（General von Stein）與俾斯麥——在他晚年——所曾走過的路線。不久後，他與巴伐尼亞軍官團體斷絕一切關係，與登堡決裂，而且在一九二七年年底，脫離基督教。這實是一種非常的性格，雖然有某某點是缺乏的；閉上眼睛，他暗中摸索到民間去的路徑而前進。在這一條路上，他遇着希特勒，希特勒是來自民間的，但卻是張開眼睛的，向上面坐着帝王與大

臣的高峯走去。

### 五 一個「擊鼓者」是什麼樣人

希特勒做了應付官司的準備，心中是打算趁這個機會更進一步提高了他由暴動所得到的名望。全球報館之最出色的訪員將到法庭來呢。對這一批旁聽者，他的自信心把他提高到上面坐着君王與大臣的高峯之上。他說：

「你們記清楚我是不以部長的位置為可滿足野心的。一個人若祇希望以部長的頭銜流傳後世，我便不承認他為偉大的人物。我一向所抱的目的，是比這個偉大幾千倍的：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破壞者。這個工作，我總要做到；而我做到了後，部長的頭銜將使我覺為可笑的。當我第一次來到里察爾華格桌 (Richard Wagner) 墓前，我心是活躍着高傲的情緒。長眠此地的人曾拒絕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下面的字樣：「王室顧問御前音樂主任伯爵里察爾華格桌之墓。」我覺得這個人，同德意志歷史上許多其他的人物一樣，竟然祇願意將他的姓名，而不將他的頭銜，傳流後世，

使我也可揚眉吐氣。這不是因為謙遜緣故，我願意做「擊鼓者。」這個職務實是最偉大的，其餘的算是什麼東西。」

這篇話並不是完全正確的。希特勒在最初時期確是謙遜的。這種說大話也並不是缺乏了壞的嗜好。但是偉大的志趣卻會忽視好的嗜好。希特勒這篇話裏面，是含包了偉大的志趣，這是無可否認的。他有這種勇氣公然的以偉大的任務自許，卻不會顧到引起他人的嗤笑。

## 六 魯登道夫的「心不在焉」

全體被告幾乎都承認他們所被控告的各種事實，有些還帶着傲慢的滿意態度。克利伯爾爲解釋他之參加暴動起見，曾說了一番可供後人參考的理由。鬪爭大同盟的首領，原是具有天生的軍人的天賦，他是這樣說：「我之認識威馬爾憲法，並不多過於巴伐尼亞憲法。當人們起草威馬爾憲法時候，我是服務於停戰委員會。因此不曾看到憲法的全文。但是所有巴伐尼亞報紙，所有愛國的議員，所有各部長，都喊道：打倒威馬爾憲法！我那時，在我的軍人簡單頭腦裏，因此想道：既然大家

都反對這個憲法，爲什麼不把牠推翻呢？」

魯登道夫的態度是不同他們一樣。其他的被告都承認犯了叛逆的罪狀，祇要求嘉爾應當以同樣的罪狀也到法庭受判；魯登道夫卻與他們相反，他極力認爲自己是嚴格的依據法律與憲法而行動的。

判決主文裏面也承認魯登道夫應當享受與其他各被告不同樣的待遇。法庭沒有勇氣處罰全德國最有名望的人物。但牠是難於否認當希特勒廢立愛伯總統與德國中央政府時候，他是不會站在布格博羅酒店的講臺上。法官們於是想出一種簡單的遁辭——不過終不能遮掩任何人的耳目，這裏面是說：十一月八日晚上，魯登道夫心中應是非常感動，因此他不會看見也不會聽到在他前後左右所經過的事情。這樣地宣告無罪是不很光榮的，而將軍也以動人的聲音喊說這是侮辱了他的身份。不過，他總是受了宣告無罪的處分。

## 七 寬仁的判決

塞尼黑人民的心中總無須乎因爲這番判決而感覺痛苦了。陪審員們是熱烈的爲各被告辯護，並且要求宣告無罪。爲要得到判罪之法定的票數起見，法院主席祇得向陪審員們保證所處的刑罰將不至於執行，或將不全部執行。

因此，希特勒、衛柏、克利伯爾、包勒等人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反叛國家的罪名，被判處五年拘禁，但是法庭方面通知各被告說受刑滿六個月後，他們便可得緩刑的待遇。除了魯登道夫之外，其餘的被告被判處三個月拘禁，但都受到緩刑的待遇。說句實話，這次判決實成爲法官對於暴動的褒獎。而關於希特勒方面，比四年半的緩刑更見重要的，乃是法院並不會與以驅逐出境的處分，而在保護共和政府的法規裏卻對此有着嚴格的規定。加之，法庭也不會將希特勒於一九二一年頭一次受判的兩個月拘禁併科執行。

法庭的寬仁是無涯際的。頭一件，在五月一日作暴動的企圖後，法庭對於希特勒的起訴是取消了。

現在牠卻是更進一步了。總檢察官曾反對緩刑的處分，結果是無效的；他曾使大家注意到這

種寬仁的態度是等於鼓勵反叛國家的行爲，結果也是無效的。假定巴伐尼亞最高法庭不會顧全陪審員的意見，牠或許可以採納總檢察官的訴狀，而希特勒或將等到一九二八年纔能夠離開監牢。然而巴伐尼亞司法部長孤爾脫勒有心使希特勒恢復他的政治活動權。由他的內弟杜爾（Durr）參事居中接頭，孤爾脫勒請總檢察官撤回訴狀。緩刑的處分終於仍舊維持着。

## 八 魯登道夫領導國社黨

希特勒一到了剋制起初的失意後，雖然關在監牢裏，他決計保持國社黨的領導權，因為巴伐尼亞法官並不會以阻礙那些犯法者繼續做他們反叛國家的活動爲他自己的職務。希特勒在訴訟進行當中的情形和在判決後的一樣，有權利接見外面來的代表，集會討論，並且發表宣言，簡直是無異在自己辦事室裏面。僅是出外旅行，他是受了禁止。因此，關於在外面接洽的事件，他將全權付與他的政治顧問羅森培。羅森培便同國社黨第二總理查可伯組織了「大德意志民衆大聯合」（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後者是用以替代被取締的國社黨。

希特勒希望他的政黨以新的名稱忠守舊的綱領。反之，魯登道夫卻堅持國社黨與格拉夫和伏爾的人民黨（德意志人民自由黨 *Deutscher Volkische Freiheitspartei*）合併。希特勒嚴辭的回答說，假使國社黨領袖與政綱，可以保持優越的地位，他便可贊成合併。關於這一點，即使希特勒是處於行動自由的環境，格拉夫尚不肯作這種讓步，何況現在希特勒身處囹圄，格拉夫更要表示拒絕了。

現在連希特勒的話，都不爲人所聽從。他是反對國社黨參加選舉的，但其他領袖都表示贊成，他們便露骨做去；希特勒的親信朋友，卻沒有一個名列候選單裏面。在候選單裏，有許多人民黨的老輩，他們都準備投入一切可以進去的社會，下級官吏，圖書館副館長，初級法庭法官，學校會計與教員等等；大家都想博得一個位置，作爲他們所認爲有功於民族運動的報酬，而結果大家都如願以償。在這些有名的份子裏面——他們曾與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在班堡（*Bamberg*）成立「巴伐尼亞民族主義派大聯合」並曾想頌揚希特勒的光榮以求得到國會若干議席——幾乎沒有一個國社黨份子。這些人是屬於自由的智識階級老份子，眼前在國社黨裏面仍然是中堅份子。

——不過從前以資產階級的傲慢態度對待土匪希特勒，從這個時候起，這個態度是稍為消滅了。關於有工人身份的代表，他們便選出被希特勒取消黨總理地位的特萊斯勒。到最後期間，希特勒費極大力量也將斯特萊列入國會候選單裏。

選舉結果是極可觀的。民族主義派大聯合得到巴伐尼亞邦議會(Landtag)二十四個議席；並且四個星期後，到五月四日，得到國會(Reichstag)三十二個議席。

這麼多量的議席之獲得，實使幽禁於蘭德斯堡的希特勒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事實絕對的證明他的反議會的策略是不對的，為的是選舉勝利實成爲最動人的宣傳。希特勒很感覺到痛苦，生了厭世的觀念與鬱結的病狀。探視他的人，都感覺他是猶疑不定。這原是他的本來面目，但直到那個時候，不像在監牢那樣，他比較能夠與以掩飾。

因爲他的代表人羅森培沒有權威，同時後者傲慢的狀態使人躲避他，希特勒的勢力因此受到重大損害；他由是改派包勒。從魯登道夫宣告無罪後，包勒痛恨魯登道夫。不幸的很，包勒又沒有領袖的魄力。他的同伴責備他不能活動，因爲這個問題，巴伐尼亞民族主義派大聯合首領便寫了



憤慨的信給魯登道夫和格拉夫。

三十二名議員進衆議院後，格拉夫堅持在全德國境內統一民族主義的運動。他籠絡了羅森培，並於取得希特勒的同意之前，宣佈統一的辦法。到第二天，羅森培便同費德赴蘭德斯堡；他們兩個向希特勒提出統一運動的計劃，計劃裏面，將領導機關分爲兩個，一個管轄德意志北部，另一個管轄德意志南部；但是他們不提起另一個事實，即是照魯登道夫的主張，國會裏面的份子，是已經決定合併起來。希特勒照他向來不信任的態度，不加以任何應許。但是，到第二天，他在報上看到登載說，根據他本人的志願，全德國所有民族派各黨合成一個唯一的組織，他閱悉之下，勃然忿恚，痛罵這些人趁他幽禁時候蒙騙他，並且視他等於廢物而把他擠去了。他便寫信給民族派各機關報，聲明他放棄國社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且在他幽禁時期中，他摒絕一切政治的活動，他收回他所授與各代表人的全權，並請後者不必向他有所請求。此外，他的舊黨徒從此後可以不必再來探視他。

這種舉動是等於向魯登道夫正式宣戰。魯登道夫現在是忍無可忍了；他的政治地位是受了

牽連。

直到那個時候，在民族主義運動裏面，魯登道夫僅是靠他自己出面以鼓動大家興奮的大人物。曾經統治半個歐洲的他，不會覺有在愛國團體的組織裏面親自動手之必要；他將實際任務交與小將領們、中級軍官們以及各中學教員。他也曾放任希特勒下手做去，固然他可以對希特勒發號施令。但是現在呢，他再也不能維持這種寬大的態度了。

現在他依照自己的心願，自處於新「獨立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地位，在那裏面，他同格·拉夫擔負全德國的指導權。他將蘭德收特藥劑師斯特拉塞——以國社黨代表的身份——召來身邊。

## 九 斯特拉塞之出臺

在長時期中，斯特拉塞或許是國社黨之最使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外貌是龐大異常，有獅的大聲腔與熊的大氣力；同他比較起來，希特勒是渺乎其小了。斯特拉塞之開始認識希特勒為演講家，

乃在一九二一年，但起初他與後者祇有着少許共同的見解，而且這種共同的地方或許祇限於國社主義這個單獨的名詞。他以辦事精力與野心壓服黨的其他各領袖；不過他有點缺乏靈敏的觸覺。他不爲猶疑不決所惱亂，因爲這一點，他是長於實際工作而不長於創造。以政治的人物而論，他是大戰後的人物之最可注意的代表者中之一，國社主義運動便是靠着這種大戰後的人物而發展的；以尋常的公民身份，他以為無永遠以舊的著名人物選派到議會去的理由。他爲不知名的德國人，從戰壕回來，現在自己想掌握國家的命運。

在最後期中，斯特拉塞在國社黨裏會充當下巴伐尼亞區首領與下巴伐尼亞挺進隊總指揮。他不屬於希特勒之親信份子裏面，在黨中毫無勢力，當暴動那天，他曾擔任危險的任務，防守伊薩爾河邊。大家也把他忘記了。到一九二四年，他被選爲邦議會與國會的議員，這是他被人擁出臺面之第一次。

希特勒始終有着兩個忠實的黨羽擁護他的主張，並且步步還擊魯登道夫。這兩個便是埃塞和斯特萊徹。埃塞是從他的流亡所在地急遽回國，在民族派各次集會之中，他大聲疾呼反對那些

「先生們與博士們。」他喊道：在國會裏面，從前大學出身的人是太多了；凡是不願意無條件順從希特勒者，儘可請退回原處——他說話時候，揮動手杖，採取一種威脅的態度。特萊斯勒請他安靜些，而結果不生效力；埃塞并不因此而檢點，他并且堅請民族派議員祇可在議院裏拍桌而吹哨子。可是，在同時候，邦議院的民族派議員卻會宣稱他們想做建設的工作呢！

埃塞會從斯特萊撒身上，後來又從著作家亞都爾丁脫 (Arthur Dinter) 身上，找到同盟者。他於本年七月初被舉爲「大德意志民衆大聯合」的領袖，即是羅森培所組織的政黨，後者竟這樣地被敵人所排擠了。雖然始終忠實於希特勒，羅森培卻繼續憎惡埃塞，往往於稠人廣衆之中，將埃塞描寫到那麼暗晦的形狀，竟然使大家覺到希特勒是因同埃塞勾結而受了陰惡的牽連。埃塞便回答說：「人們可以將破壞名譽的罪名加到我們身上。我們不爲這個而動情，即使對方能够做到欺騙我們。進攻失敗後便棄刃而逃，這纔是一個極其拙劣的將官呢。」可是，羅森培也好，斯特拉塞也好，都否認採用這種「軍事學」。

## 十 羅姆組織新的隊伍

在這時期中，魯登道夫完成了他的工作，八月十六日與十七日曾於威馬爾開了獨立國家社會主義黨各首領的大會。希特勒打電報給斯特拉塞，堅請他與民族派決裂，但結果是無效的；羅森培、埃塞奧斯特萊、撒都擁護希特勒，但結果也是無效的；斯特拉塞仍然站在魯登道夫那邊。或許他也恨怒國社主義者以無禮的態度攻擊魯登道夫將軍。因為他們的無禮態度，魯登道夫便會發怒，離開會場，表示反抗之意。

敵人方面是易於應付魯登道夫，這是的確的。凡是他所經營的，無有不失敗。在這失敗的事業之中，便有組織新武力的失敗——他想藉羅姆的幫助，為黨組織新的武力，後者的名稱是叫做前鋒隊（Frontbann）。

羅姆得到希特勒與戈林所授與領導挺進隊的全權。但當他攜魯登道夫的計劃前往蘭德斯堡時候，希特勒一方面疑懼因此而完全失掉黨的領導權，并且使總檢察官有所藉口而延長他的

幽禁時期；另一方面，他又不願意隔斷了黨之新組織的消息。因此，他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羅姆原是腦中有了軍事計劃後便不考慮政治上問題的人，他立刻下手做去；他於是同軍人的與愛國的各舊團體組織一種可與鋼盔團(Stahlhelm)相頡頏的隊伍。

不幸的很，他祇認識了軍事條例，而不懂刑法的規定。他起草了入隊志願書，隊員應該在那裏面發誓追隨魯登道夫及其所任命的官長直到「死而後已」。可是，這種無條件的服從誓約是爲德國法律所嚴禁的。

總檢察官現在可以作進一步的舉動了。希特勒及其同伴原是希望於十月一日恢復自由的，但現在卻受了同謀的嫌疑，仍舊須幽禁於監牢裏。因此在希特勒、羅姆及魯登道夫之中，發生激烈的攻訐。到了格拉夫與斯特拉塞也想參預前鋒隊的領導機關時候，彼此間的爭執更加嚴重。羅姆極力反對他們的企圖，並且反進一步堅求在國會議員幫——他本身已經在內——裏面，增加他的勢力。一九二四年的國會壽命是很短促的。當準備新選舉時候，羅姆要求在候選單裏面，將他與戈林的名字列入首排。這個事情便發生決裂了。戈林住在意大利，他的名字就乾脆不會列入，而羅

姆的名字被放在末尾，因此不會當選。因為這回事情，羅姆永遠不肯原諒斯特拉塞。

至於前鋒隊事件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希特勒仍然留在監牢裏，差不多延長了三個月之久。

## 十一 困難時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日德國國會選舉的結果，是民族派方面失掉將近半數的原有選民。一方面，馬克價值的穩定使人心趨於安靜；另一方面，民族派內部各領袖的對敵行為使他們自己的部隊感覺厭倦。因此，民族派的議員祇有十四名重進國會。

希特勒現在可以感謝運命的賜與了，在他幽囚期中，國社主義運動竟然受到這種打擊。他咀嚼報復的甜味，洗雪他所受到的侮辱，因為黨會不理他的主張，而參加四月與五月的選舉。他對於過訪者改換他的口吻——他雖禁止人們來獄探視，但他們仍然陸續的來。在九月中，他還宣稱可以同意於參加選舉，現在他又去破壞腐敗的議會制度了。而在國社主義者中，便有人埋怨說若是希特勒在場就不至有那種禍事發生。

其實，希特勒也不能爲黨挽回失敗；失敗的各方面原因是過於深重了。貨幣價值已經穩定；道威斯（Dawes）計劃會得到德意志國民黨的同意而被接受；同法國妥協的政策是順利地進行着；德國的經濟狀況是趨於繁榮了。利率從可驚的高度逐漸低降，而到貨幣穩定後，牠立刻維持不動；實際上，牠還是非常之高；而因此使外國的資金擁入德國。這些資金使用於德國工業之復興與其合理化等等事業上，結果使大家差不多都能找到工作。

一九二三年之國社主義的煽動既然是基於經濟困難的原因——其中大半實因爲這個原因——那麼，現在情形變更，牠自然是和緩下來。沒有人希望那些受濫發紙幣的影響而犧牲了的不滿意份子再來鼓動新的風潮，使國社主義得以從中漁利。而且政治的策略，是不能夠採用過去的口號，以發展眼前的行動。濫發紙幣的時期已相去很遠了；國民祇求忘卻慘痛的時期，現在卻腳踏劫後骸骨而努力向前進取了。

在這種新的情形之下，國社主義再無活動的餘地了。希特勒和魯登道夫這些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是機關槍、暴動、與狄克推多。他們曾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得到他們再好不過的機會。而



他們卻隨手將牠失掉。這是太可惜了。到了今天，大家是經過合法的方法而達到可以苟安的環境，而且在少數的民族派團體之外，各個選民都堅確認定希特勒的名字是不再出現於政治的廣告上面了。

越是民衆方面擴展他們之無所可否的態度，黨內部的對立是越見尖銳了。「先生們」現在明白了應當替希特勒想點好辦法，這不但應當在暗中進行，而且應當光明坦白的向全國下手。斯拉塞便負責做去。剛好巴伐尼亞邦議院正在討論恢復希特勒自由的議案，斯拉塞便從他的座位站起來，向首相黑爾德大聲說道：「這個拘禁處分是帶有階級性之最卑鄙的裁判所做的舉動，這是巴伐尼亞之可恥的污點，巴伐尼亞是處在一羣狗才與壞蛋的統治之下……」首相便離開會廳。斯拉塞立刻被驅逐出，他再不在那裏出現了。從此之後，他把全副活動力量都用於德國國會。

## 十二 從魯登道夫到黑爾德

希特勒現在到底從蘭德斯堡監獄放出來了。他一身所剩有的，祇有他的自由。他在全國，有幾千朋友，且有很多羨慕者；但同胞衆的關係是斷絕了。在一年的過程之間，民族派的運動竟成爲自己的信徒所目爲可恥的對象，而且被民衆傳爲笑柄。

希特勒以十二月十七日釋放出獄。巴伐尼亞政府視他同一個尋常「十一月事件的罪人」一樣，對他所取的态度并不比後者特別優良，也并不特別惡劣。與他同時釋放的，還有幾個同伴，不過他們前此在獄中的待遇，并不像希特勒那麼舒服。

埃塞和斯特萊徹便聚於希特勒的慕尼黑家中迎接希特勒。希特勒請求他們絕不要解散「大德意志人民大聯合」。這個團體或許還有用處呢。

隨後，他首先決計同魯登道夫決裂。在最後幾個月中，魯登道夫會做了種種舉動使他自己再不能夠同巴伐尼亞天主教接近。他曾寫一封熱烈的信給「新教大同盟」的大會，表示他的敬意，并且推動基督教徒反抗羅馬。他很無謂的同魯博烈黑特王子發生惡感，責備後者——其實完全是錯誤的——應負十一月九日暴動失敗的責任。在爭論當中，巴伐尼亞舊軍隊之二十七個將領

都擁護王子而與舊統帥決裂了。

所有這些重大的錯誤，都使希特勒證實了他的意見，即是魯登道夫是毫無政治的意識。加之，魯登道夫企圖引誘那些精神上肉體上完全服從希特勒的信徒歸附他自己，因此他使希特勒在私人上感覺不快。因為受到共同的侮辱，所以在希特勒和在包勒心中生出共同的怨恨。在一次同魯登道夫作難堪的談判中，希特勒宣佈取消他們的政治聯盟。但是他不會對魯登道夫說明，爲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漸漸同羅馬勢力接近，而不管後者卻是和羅馬愈離愈遠。

在他恢復自由後幾天，他謁見黑爾德首相。巴伐尼亞人民黨舊領袖（黑爾德）現在是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攻擊。所以希特勒之前往拜訪，是很動人的。因為他想減輕這種印像起見，他便託辭說他的目的祇爲着替幽禁於蘭德斯堡獄中的同伴辯護，并且也替包勒辯護（後者還不會投案受刑）。其實，他的拜訪目的是爲向首相提出民族主義的批評者所叫做的『與羅馬講和』。希特勒開頭便向黑爾德保證他的忠實態度與不越法外的心緒；他承認十一月九日的暴動是一種錯誤。他表示願意在政治上與政府合作；還曾說了『鞏固政府』這個字眼。首相便問他怎

能夠將同政府合作與「反對羅馬」兩件事情調和起來，而反對羅馬恰是民族主義派政策的主要目的呢。反對羅馬乃是魯登道夫的意思，希特勒很激昂的回答道：至於他本人，一向絕不會攻擊羅馬，將來也絕不至攻擊羅馬。從訴訟後，他便同魯登道夫失感了。他不攻擊任何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將來也不攻擊；他專為反對馬克思主義而奮鬥的。假定首相自己也要領導這個鬭爭的話，希特勒是願意供其驅使的。

他這些話確是誠實的，幾天後他便證明出來：手中拿一條馬鞭，他出現於邦議院民族主義派議員的會中，責備他們不參加巴伐尼亞政府。要不是同一個政府共同合作，便應當同這個政府作熱烈的鬭爭；總沒有站在中間的道理。

這樣，從蘭德斯堡監獄所發出來的消息，現在被證實了：希特勒不贊成反對巴伐尼亞人民黨，即使是反對德意志國民黨，他也不贊成；他願意在資產階級陣營裏彼此和平相處，

黑爾德首相僅是一半相信希特勒的意見。事實上，他撤消了取締國社黨的禁令，但他冷酷地對國社黨領袖說明他維護政府的權威而制裁企圖與以侵犯的任何人；他絕不寬容再有如一九

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變繼續發生。至於甸勒，他終不能得到特赦，仍須以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進牢獄去。

民族派方面批評者們之責備希特勒接近巴伐尼亞政府，實顯出他們不會認識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理想。後者雖然在各次革命黨的會場中大放厥辭，其實他歷來需求得到當局的庇護。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實際上當局是國防軍。到了魯爾鬪爭結束，德意志國民黨人參加中央政府的內閣，道威斯計劃簽字等等後，軍人的權力是退到後臺，而將政府的領導權讓給文人當局。另一方面，維持那些軍人各團體會員之無數的祕密存在的士兵的源泉，現在因社會穩定而涸竭了。在政治上，現在是到了資產階級的世紀降臨時代。

希特勒由是決心，在取得他所能獲到寬仁態度的右傾政府的庇護之下，從新創造巴伐尼亞民衆運動。他想先由加入這個政府的步驟，而達到使巴伐尼亞變成國社黨權力的堡壘之結果。舊的計劃仍然是有效的——照那裏面所說，在五年之內，不要產生將運動擴展到德國北部的念頭。希特勒願意仍舊反對議會，但是採取和平的態度。永須保有當局的優遇：這乃是他之「合法的」

德國國社黨史

政策所傾向的理想。

## 第七章 一九二五年

### 一 新國社黨

格拉夫現在是忙於組織他之新的民族主義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底，獨立國社黨在柏林開「普魯士大會」。希特勒從他與魯登道夫決裂之後，再不能希望得到北方的德國人的諒解。格拉夫和伏爾責備他再不想做「擊鼓人」，而想做教皇。同時，魯登道夫宣稱說，如果希特勒要拿回國社黨的總領導權，他本人即要擺脫不顧，而且他將要放棄一切政治的任務。但事實上，魯登道夫——格拉夫——斯特拉塞三頭政治終於二月十三日引退，而格拉夫便於二月十七日同伏爾、烈芬特羅與斐立赤（Fritsch）組織一個新的政黨：德意志人民自由運動黨（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bewegung）。

可是在這時期中間，巴伐尼亞政府撤消了取締國社黨的禁令。希特勒便趁這個機會，立刻決定歷來爲黨內信徒與敵人所望而卻步的主意；改組舊國社黨；新國社黨仍然保持原有的首領與原有的綱領，但牠的黨章是經過修改了。

二月二十七日，在布格博羅酒店，對數千聽衆，希特勒做他恢復自由後頭一次的演講。他誇稱手下還有四千黨員，並且用隱約的言辭攻擊魯登道夫說：我們不應該一下子追趕二十個野兔。他自己祇認得兩個敵人：以人的方面說，猶太人；以思想的方面說，馬克思主義。可是，當他指明一個敵人，他可以暗中指出第二個敵人。

他所曾經長時期酌定的演說，是活躍着激烈的反映：「凡你們到處看爲是好的，是屬於亞利安民族；凡你們看爲是壞的，是屬於猶太民族。我們可以撕破和平條約，可以取消賠償，然而猶太的毒質總是作破壞德意志的威脅。我們祇須看到腓力特力街（Friedrichstrasse）上，每個猶太人臂上總挽着年輕的德意志女人。我並不要求羣衆特別的優遇。在此後一年內，你們可以評斷我。假定我做得好，大家再繼續做去；假定我做得壞，我便將我的任務奉還你們手裏。但是，從今起，是由我



來指導黨務，而在我負責期中，任何人不得向我提出條件。凡一切關係着黨的存亡問題，都由我從新擔負完全的責任。我們的鬭爭祇有兩個可能的結局：或是敵人踐踏我們的屍首，或是我們踐踏他們的屍首。假定我，在下次鬭爭中死掉，我的希望是卍字旗做我的收殮布。」

希特勒在監獄裏發胖了。他之外面噴湧着熱血的怒氣的演講，實發生了可驚的效力。驟然間，舊日的仇人都跳上講臺：一邊是埃塞、斯特萊撒、與丁脫，另一邊是佛力克、布特曼（Buttmann）與費德——他們彼此握手。這一幕是演得非常精彩，其莊嚴的情緒是不下於演講的。各領袖之間，現在應當停止一切爭論，希特勒歡呼道：「當他正在說話時候，布特曼宣稱他所有疑雲現在都消散了。斯特萊撒在情感衝動之下，格格不吐的說道，大家應當感謝上帝護庇希特勒；人們使希特勒受了犧牲便等於使老百姓受了犧牲啊。」

不過是，和好工作不見得全部成功；裏面有缺席不來的：譬如特萊斯勒這個人，在前一天，希特勒會打電話給他，請他做開會的主席。但舊名譽總理卻提出幾個條件，裏面便有不許埃塞進場的要求。希特勒發怒了，便掛上電話，再不睬他了。斯特拉塞也不會到會；他還不能決定是否要屈服於

希特勒，他對於後者私人上并無感情，而在見解上又極少共同的地方。

## 二 國社主義的道德觀

在好些年之間，希特勒之最重要的工作乃為替他的政黨創造一個首領的幹部，因為國社主義運動的存亡，是靠在這個問題能否解決。當希特勒改組他的政黨時候，他曾對於選擇首領的問題，申明幾個原則，那裏面的態度從容的臨機應變主義，卻與他歷來批評敵人所採取的嚴厲態度，有着極其激烈的反映。這些『方針』是這麼重要的，所以我們在這裏有抄錄原文之必要，下面是錄自人民觀察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所登載的原文。

「我認為一個政治的領袖在他所擁有的人才上，沒有想法改良，或即是想法建立，一種單位的力量。每個人的情緒、性格、與能力是這麼複雜的，所以聚集一大羣人使大家都有完全相同的構造，是絕不可能的。以教育的方法來救濟妨礙這種單位的實現，這也不是政治領袖的任務。凡是這一類的嘗試必不免於失敗。人類是既定的和現實的表現，絲毫不能隨意變改，而且他之極其緩慢

的進化，是經過好幾世紀纔有所成就的。一般的說，這種緩慢的進化，本身之實現，須有民族根本的因素發生變化。

「一個政治領袖若想深入這條路上，他將要作無窮期的打算——而不是作幾年或至多幾十年的打算——始有達到他的目的之可能。

因此，他的任務祇是在這些極不類似的人中，找出可以使他們合成爲一個單位的共同之點。

「這樣，他不能夠打算在合於理想的與普通的標準人物身上，爲他的政黨羅致一批人物，但須在現實的與各有極不類似的才能的人物身上着想，後者是由他們的全部而組成了一種和諧的結構。

「一個政治領袖若不承認這個實情，並且祇想羅致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結果他不但要看不到他的一切計劃失敗，並且不能樹立一個組織，而反立刻陷於混亂的狀態。到那個時候，他便想將一切錯誤歸咎於他的信徒或他的同事，而其實，他本身卻爲對這個情形之唯一的負責者。」

下面是這篇話的結論：「我所擔負的任務，是使黨中廣羅具有最不相同的情緒、能力，甚至於性格的各種人物；他們可以在黨中彼此互相彌補，而且能夠為全部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希特勒在這裏所提出關於選擇首領的原則，乃是目的可以證明手段之正當。這篇愛墨的宣言所由來的理由，是因為當他羈留在監牢時候，那些爭權的首領受到對他們個人的攻擊，并且埃塞與斯特萊撒也受到外間同樣的攻擊。直到這個時候，經驗曾證實了希特勒的理由；羣衆并不怒視國社黨各領袖的性格。國社黨的確包含了多量之廉潔的與清正的官吏，但原則上牠內部並不排除「結構不同樣的」各種性格。不過是，既然有着這種原則，我們不甚明白何以希特勒還能夠稱呼他的政黨為廉潔人物的政黨。恰是相反的，國社黨乃是最富有行為曖昧的企業家，甚至超越於曖昧，即使是列於最高位置的人物，這一類的政黨中之一個而已。

這種構成國社黨的幹部之「構造不同樣」的性格，乃是國社黨之最大不幸的一個原因，總有一天會使牠受到損害。要解釋希特勒之對於他同事的德性所採取無所可否的態度，我們或者可以說因為他有着個人上無可非議的人物之超出尋常的情緒，而且他心中祇懷達到目的的念

頭。不幸的很，這不但是關於羅致各首領的問題上，希特勒對於選擇方法不會謹密從事。國社主義運動之產生，實恰在政治暗殺罪案公然盛行的時期中。羅姆所招集的陰謀者的團體，實為巴伐尼亞這一大批恐怖的謀殺行爲的鼓動者，而其中的各罪犯從來不曾破獲，因為上面那個團體替他們保護。從希特勒一生的過程裏，我們看到他之對待暗殺罪件之親昵的態度，從安置許爾斯（Schulz）和亨斯（Heines）於國社黨的首領地位之讚許暗殺拉德羅的兇手態度，直到了他寄與暗殺波當巴（Potempa）的兇手的電報所取的態度。在這地方，絕不僅是為主義的成功而犧牲了良心的問題。希特勒會常常宣稱他絕不重視人類的血，熱心擁護一種理想——人們對於他所不能否認的——或許能夠諒解某某種道德上的遷就；但接受這種遷就所採取之無所顧慮的態度，實無從證明其為正當的。

加之，在他們蔑視一切道德與法律的楷式者心目中，他們的行爲乃是帶着革命性的行爲。關於這一點，羅姆所說下面的話，或許是最忠實的了：

「所謂社會道德，乃是比任何都要虛偽的東西。我先聲明說，我是不屬於勇士的階級，而且我

也沒有使人視我爲他們裏面一份子的野心。我更不願意附屬於「有道德的」人物的儔類，爲的是經驗告訴我說，這些「道德家」的「道德」并不算是大了不得的東西……大家所叫做政治家，羣衆領袖，這等等的人物，當他們注重道德的時候，往往是他們心中毫無更好的理想之明證……有些「民族主義的」著作家，隱藏於安全的口岸，袖手旁觀大戰的經過，在他們心中，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使之驚異的……即使政府自命有權，倚賴各種法律，來節制人類的情慾，即使牠以爲這樣便可以將後者領向其它的路徑，這種辦法在我看去，總是幼稚的和不適當的……瘋狂，瘋狂，到處是瘋狂！正如李察爾華格泉的作品中漢斯沙克斯（Hans Sachs）所說的。」

這種自由的追求乃是絕望的呼聲，雖然牠自以爲表現「陽性」的見解。因爲我們總不能夠違反下面這個原則：個人的權利是不能超過侵犯隣人的權利的範圍。

### 三 希特勒巴伐尼亞政策之失敗

希特勒希望在巴伐尼亞政府庇護之下，可以反抗柏林政府，但不久後，他便告失望了。他之同

黑爾德談判，已經不是在使人可以安心的空氣中過去。他曾對首相保證說他祇認得一個敵人：馬克思主義；但不久後首相便似乎不相信他的話了。因為在他出獄後演說之情緒熱烈當中，他曾不覺的吐出兩句話，這兩句話便使他受到不幸的遭遇。頭一句話是講到敵人，但他並不會提起名字；講明是誰。巴伐尼亞政府可以認為是隱約指牠身上。第二句話是講到希特勒要踐踏敵人的屍首；這便使警察當局有所感動了。

巴伐尼亞內務部長於是禁止希特勒公開演講。普魯士和大部份其它各邦便羣起仿效。巴伐尼亞的榜樣，此外，在德國北部，國社黨并且遭受取締的處分。

希特勒的運動計劃是被推翻了。他之發動巴伐尼亞以反抗柏林的希望是消滅了。我們不能說定他自己是否立刻覺得有將運動中心移到北部的必要，但另一個人必然理會到：這個人便是斯特拉塞。

斯特拉塞還不會同希特勒重修舊好。他是爲着幾個理由：希特勒這個人物及其各種目的，在都使他認為是可疑的；不過，希特勒是還未到他的左右那種程度。以巴伐尼亞人而言，斯特拉塞

雖然比希特勒更多土著的色彩，但在這種事情上面，他立刻現出較少帶着本鄉的氣味；他是反對將運動的總機關仍舊留在慕尼黑。

可是，希特勒之二月二十七日不幸的開場，實使斯特拉塞確信德意志新民族主義黨失掉了巴伐尼亞的地盤了。國會中兩個巴伐尼亞議員，佛力克與費德，已經同希特勒和好如初，繼之者便有民族派議員狄特力克（Diétrich）。斯特拉塞還應當為攻擊希特勒之國會中唯一的巴伐尼亞議員嗎？他於是採用最後的步驟：他向巴伐尼亞區民族派各團體調查意見。他所得到的答覆，是使他相信無抵抗之用處：大部分的團體主張回到國社黨。三月十一日，在民族派大聯合之最後區大會裏面，斯特拉塞神色沮喪，宣稱說：埃塞和斯特萊撤確是聲名狼藉的同伴，我們拒絕同他們合作是很有理由的。然而，在人的問題外，現在卻有着國社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必要的，且有廣大前途的——這是他，斯特拉塞自己，在旅行威斯特法尼（Westfalen）與普魯士中，曾產生這樣的信念。「假定我是因為一種理想而生存，我將追隨我所認為最有利於這種理想的成功的人物，這個理想在我心中是代表一切的。即使我看到這個人物的左右是我所視為有害於我理想的成功，我



自己還是說：主義是高過一切的，此所以我本人聽從希特勒的驅使。」

關於這一點，斯特拉塞是顯得比特萊斯勒聰明了，後者總堅持成見，不願與埃塞和斯特萊撒這種人物混在一起努力。

斯特拉塞之回黨，便完全移動了國社黨的重心。爲什麼緣故呢？這似乎是十分滑稽的，原因是：在於他以議員的身份所享有的鐵路免費旅行證。靠著這張旅行證，一個熱烈的活動者得以做到一種有利的宣傳並且因爲這個自己得在黨中造出優良的地位。至同黨其他國會議員都不是演講家。而斯特拉塞不但攜有他的旅行證，且也帶來他自己的金錢，這批金錢是由出讓他的藥房而來的。無疑的，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在那個時候，國社黨卻須重新每文錢計算。不久後，斯特拉塞便顯出是一個最有能力的運動者，而且在活動的精力上，他是超過希特勒的。靠在他身上，趨向於議會的活動，是在黨中處於優越的地位。希特勒再不能想使黨與議會分離了。

在同一個時期，希特勒失掉了最可貴的政治顧問。包勒於受完三個月監禁後，出獄祇有幾天，以四月十一日在汽車失事中死掉。那時候，大家看慣了政治的暗殺案件，所以包勒的朋友們嚴厲

認定汽車司機爲使汽車出事起見故意將車輪脫落，並且他們還向他提出訴訟。

希特勒又失掉了另一個朋友：羅姆；他同羅姆發生爭執，因爲當戈林在國外時候，羅姆收回挺進隊的領導權，現在他拒絕將挺進隊屈處於希特勒之絕對的權威之下。挺進隊便因此瓦解，而國社黨在整一年中不復擁有牠了。這次決裂曾使羅姆感受很大的苦痛，他原是易受友誼所感動的。他寫信給希特勒，要求後者至少不要斷絕他們私人的關係。但希特勒不會回答他的信。羅姆便再發他的信，這一次卻是登載報上。人民觀察報祇將他的信登載出來，而不加以批評；不論是在私人方面或是在公開方面，希特勒仍然默不做聲。事實上爲國社主義機關之真正的設計人，現在卻悄然離開，不會受到謝禮，也不會受到敬禮。羅姆在好幾年中不能不隔離政治的舞臺了。

#### 四 斯特拉塞之成爲障礙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希特勒是處在比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他釋放出獄的日子——更要慘淡的環境。包勒死去了，接近巴伐尼亞政府的計劃失敗了，挺進隊失掉了，而他部下的半部份

是財政上與精神上均操縱於斯特拉塞手中了。上面便是國社黨改組後的賬單。

這一時期的活動是幾乎專歸斯特拉塞領導。他用驕馳電掣一般的速度，在北部成立了等於一個新的政黨。在三月底，他於哈爾堡（Harburg）聚集來自德國北部各地之可信任的人物，向他們保證希特勒的『羅馬』政策，並且消滅他們對於南德意志人之不信任態度。盲目服從一個領袖的原則，是還未能够使這些人信從；或者是，至少在他們心目中，所想像的領袖可不同希特勒那樣。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祇同斯特拉塞接頭。斯特拉塞竟然成立了國社黨七個『黨區』（Gau）：什列斯威好斯敦（Schleswig-Holstein）、漢堡（Hamburg）、梅格稜堡（Mecklenburg）、蓬麥給（Pommern）、哥廷根（Goettingen）、呂涅堡（Lüneburg）與哈諾瓦（Hannover）。不過在那個時候，他并不抱嚴格的態度，而且祇要有着多少可信任的人物的地方，他便成立一個黨區。斯特拉塞也在柏林成立一個黨區，但沒有得到好成績，因為後者終於在本年底自己解散了。在這個時期中，國社黨的宣傳是不能進入柏林的。

當斯特拉塞在北部開關一個王國時候，希特勒須在南部保持他的原有地位。在巴伐尼亞邦

議會之二十四個議員幫中，祇有六個對他還是忠實的。在屠麟根 (Thüringen) 在瓦敦堡 (Wuerttemberg) 尤其在薩克森 (Sachsen) 希特勒都遭遇了最痛苦的慘敗。在薩克森邦中，邁根泰勒 (Meyenthaler) 教授與邦議會議員斯忒格 (Steger) 所領導之大部份的國社主義者都脫離希特勒，希特勒手中所剩餘者祇有斯多德牙爾的地方支部了。

可是，斯特拉塞仍然繼續擴展他在黨中的勢力。希特勒不能夠做到使北部接受關於任命地方支部的首領應由中央總機關主持。北部德國人，仍同過去一樣，自己選舉他們的首領，而選出的首領往往是斯特拉塞及其朋友們所挑選的人物。在這年九月，斯特拉塞在魯爾做一番大活動工作。在活動工作進行中，他於來因蘭一個平凡的小職員身上發現一個新的天才者，他立刻加以認識。這個人便是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 (Dr. Paul Josef Goebbels)。愛爾柏斐爾城 (Elberfeld) 之北來因蘭黨區的書記。他們兩人彼此間發現到大相接近的見解，這一點便引導他們組織共同反對慕尼黑的戰線。基於這個目標，他們創立了在國社黨內部維護社會主義的理想之一個新的機關：『國社主義文藝』。一種半月刊，牠是不在外面公開發售的。第一號是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一

日出版；總編輯即是戈培爾。

那是斯特拉塞與戈培爾之共同的見解呢？他們乃是社會主義政策的信徒並且是傾向俄國的。

「未來是屬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國家中之獨裁政體。」這一句話並不是錄自 Rote Fahne（共產黨機關報），而乃是錄自一九二五年之人民觀察報，並且是出於戈培爾博士的手筆。確實是不帶任何成見的，他甚至覺得「階級鬭爭，同歷史上一切的事實一樣，有它的好的方面，也有它的壞的方面。」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底，斯特拉塞在希特勒所擁有的機關報裏面，承認一九一四年之老社會民主黨曾經確實成爲一個莊嚴的政黨，他說：「我們應該記憶這幾百萬人的這種忠誠，這種猛烈的虔心，這種興奮情緒，唯有他們能够克服這些日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慘楚的苦痛，並且釋明那裏面的理由，而繼這種苦痛而不久後跟來的，是由國民的悲憤所產生的疑雲與恥辱。」一九一八年的斯特拉塞，好像幾乎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唯有一個失望的情感，纔產生這種忿懣呢。

「這個因有像伯比爾 (Bebel) 那樣熱烈的性格所發揚光大的政黨，幾千顆情緒興奮的心是在那裏面犧牲了的政黨，卻變成包爾 (Baer) 和黑爾曼 (Heilmann)，里克脫 (Richter) 和巴爾馬特 (Barnat) 的政黨了！」這種話當然表現了不同於希特勒佈道的聲調，後者是說：猶太人用馬克思主義毒害了德意志工人，在大戰前即已經有撲滅社會民主黨之必要了。

斯特拉塞具着一種帶政治性質的固執，那裏面對於各種事物有着純淨的和自然的感覺，而他以此反對羅森培之俄國式的反猶太主義。他於十月中在人民觀察報上面寫道：德國絕不應當向西方尋求援手，牠絕不應當支持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英國的帝國主義而反對俄國。凡是與凡爾賽對立的都是德國之天然的朋友與同盟者。德國的地位是與新生的俄國爲伍的，是與土耳其、中國、印度、喀比里族 (Kabyles) 和德律斯族 (Druses) 等等爲伍的。世界上祇有凡爾賽的保衛者或凡爾賽的敵人這兩方面。既然俄國也是反對各種條約的，牠便是德國的同盟者了；牠自己所採用的制度是與旁人毫不相干的。

居留德國的白俄人是不願意聽這種話的，他們便以忿恚萬分的抗辯大肆攻擊人民觀察報

的編輯部。聶米羅維赤——丹真戈博士——斯哥羅巴斯將軍之情報處主任——便攻訐斯特拉塞沒有智識，好像不會懂得俄國現在是不存在了，而所存在者唯一是一個猶太的鮑爾雪維克主義。羅森培在編輯部所發表一篇短文裏面，向忿怒的俄僑與玩社會主義的武器之同志，極力調解，他說：我們希望讀者知道「我們認東方的鄰國是一個猶太的劊子手的殖民地。」但是，處眼前的狀況之下，大家應當絕對避免有德國干涉俄國的可能性。此外，外交政策是絕不能帶有武斷性的。羅森培不能夠公然禁止斯特拉塞，他於是轉而攻擊年輕的戈培爾之疏忽的過度行爲。戈培爾會虛構一篇與共產主義者談話的文章，在那裏面，他將斯特拉塞之實際的外交政策變成一種戲劇的筆調。他劈頭說道：他沒有必要向他的共產黨朋友表白說他之估量人民與民族是與大肚子上面掛一條黃金鍊子之愛說話的先生所估量的完全不同。俄國工人委員會的制度——現在是絕不近於廢棄——不是國際所共有的，而乃絕對是俄國的。沒有一個沙皇能像列寧那樣深切了解俄國人的心靈。列寧會犧牲了馬克思而以自由給與俄國，即使是鮑爾雪維克主義的猶太人，也承認有俄國國民政府的存在之絕對的必要。下面一段話，在國社主義的觀察點上，是近於邪說

的發明：「事實上，猶太問題之複雜，是遠在人們意想之外。資本主義的猶太人與鮑爾雪維克主義的猶太人或許不是一個唯一的和同樣的人物。」

這樣的說，戈培爾不會注意到他所主張的話已經幾乎不是反猶太主義了嗎？無論如何，羅森培總不放鬆這個錯誤；不對，戈培爾、列寧不會以自由給與俄國農民啊！今日的俄國不是屬於國民的，牠是處在第三國際統治之下，而即使在倫敦猶太人、紐約猶太人與莫斯科猶太人之間有衝突之存在，俄國的政治總是猶太人的政治，而鮑爾雪維克主義乃是純粹猶太人的創造品。俄國是，而且眼前繼續是，鮑爾雪維克的猶太故土。

雖然如此，斯特拉塞在某一時期中，終於做到使人接受他的各種意見，作為國社黨之正式的政治方針。唯有在一點上：關於南提羅爾問題，希特勒曾與以干涉。因此，斯特拉塞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國會所作反對羅加諾（Locarno）條約的演說裏面，他所不提到的話，其趣味是不在於他所提到的話之下。他說：「我們國社主義者，前線的兵士與軍官，永遠不放棄亞爾薩斯羅崗（Alsace-Lorraine），歐本（Eupen）與瑪爾美地（Malmédy），薩爾（Sarr）以及我們的殖民地，我們



之不放棄北部什列斯威，也與我們不放棄沫美爾（Memel），但澤波森、東部普魯士以及上西勒西亞各地一樣。我們不因爲好話而犧牲了我們在奧大利的同胞與蘇特的德意志。「清單是很長的……可是南提羅爾卻不曾提起。希特勒曾加以干涉。反之，在跟下去一句話裏，反對干涉蘇維埃俄羅斯的斯特拉塞，卻直言無隱了。

## 五 希特勒之與格拉夫宣戰

希特勒雖然猛烈反對民族派黨人的企圖，但他卻不作挑釁行動。祇要他們不在南部擾亂他，他便可以放任他們在北部爲所欲爲，況且他們在北部是與斯特拉塞發生競爭的。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國會裏面國社黨黨員甚至於加入人數較多的格拉夫信徒的幫中。

這種策略是基於一種默約所定，民族派黨人不在慕尼黑擾亂希特勒，但他們卻不會遵守約定。因此，希特勒決計從新搗亂敵人的集會，他自己親身帶隊討伐。格拉夫與烈芬特、羅伯爾過於輕率的想，在何夫博羅酒店演講，希特勒便同他的忠實部下在那裏面出現；他登上一張桌上，口中不

發一言，祇指手畫腳和發冷笑，隨後便發生那麼重大的混亂，特別是因爲婦女們的驚悸呼聲，因而使警察出來驅逐大家出場。烈芬特羅站在講臺上，神色嚴厲，目送一大隊警察背後所經過的劇情。當希特勒退去時候，他向後者喊道：『再會吧！』

## 六 哈諾瓦之內訌

反對民族派黨人的鬭爭從新開始後，斯特拉塞再不能夠維持北部的活動了。他於是想法使他的部下脫離民族派，並且向他們提出同時兼有社會主義的與國家主義的目標。他於戈培爾之外，又在他的兄弟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從前是社會民主黨份子——身上，找得一個可貴的助手。在那個時候，幾乎在德國北部與東部之所有國社黨各支部裏面，都有着帶斯特拉塞色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是屬於在各黨中所經見的那種參加份子，一向便不會看過黨的綱領，也不會看過委員會的佈告，他們之加入政黨無非是基於後者的傾向，而不是基於後者的各種理論。到現在，他們認爲有尋求使這個新的傾向具體化的綱領之義務。這個便是斯特拉塞以十一

月二十二日在哈諾瓦所召集之「德意志北部黨區大會」的任務了。

在這一次會中，已經現出有兩個國社黨：一個屬於希特勒，一個屬於斯特拉塞。哈諾瓦黨區首領魯斯脫（Rust），便會宣稱說，北部的德國人是不願意自處於慕尼黑黑教皇統治之下的；在「教皇」這個字眼裏面，實充分表現了對於巴伐尼亞天主教徒之希特勒的敵視的情緒。大會改成為德國北部與西部各黨區的集合體。費德便以觀察者的資格從慕尼黑來會。他一向會打擊共產黨的朋友之戈培爾的神經；戈培爾卻表示說，當大家以朋友的關係在那裏碰頭時候，最簡單的辦法是招待費德。實際上，希特勒的使者不能參加一句話進去。斯特拉塞闡明一個廣大的對外政策和社會主義的政綱；除南來因蘭黨區首領雷伊博士（Dr. Ley）外，全場一致通過。可是，還有比這個政綱更見重要的，便是大家所認為應當採取黨在國內活動的策略。這個策略是直截了當的被目為慘劇政策。國社黨應當歡迎一切可以搖動政府的權力的行為，不管它是好斯敦農民所拋的炸彈也好，或是共產黨工人的罷工也好。

到最後地步，希特勒或許接受社會主義的政綱和對俄國協調的政策。他從經驗上知道有多

少人，一到事態嚴重了，便很少受主義的支配，他也知道有多少政綱，到了政黨發展後，便被拋棄了。然而他不能夠贊同宣言裏面認藉重暴動和炸彈爲正當辦法那一段。他現在還受着緩刑三年的待遇，說不定一二年，他便可以被驅逐出境。況且，在本年年頭，奧大利政府曾宣告取消他的國籍；他現在是絕對的無祖國之人了。若果他不願炸彈炸他本身的話，他便要從北部德國人的手中將炸彈拿走。

同當局發生關係，像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那樣，現在對於他是多麼有用處啊！丁脫在屠麟根想法同右派各政黨發生密切聯絡。他結果是失敗了。而挺進隊各隊——黨的權力之另一個工具——是破裂了。黨所剩下之可以相當的引起羣衆的注意者，祇有了褐色的衣衫。牠是羅斯巴克中尉於一九二四年所構想出來的，希特勒本身當幽禁於蘭德斯堡時候也曾穿着。現在牠卻成爲羅斯巴克的同伴亨斯中尉之經濟來源的工具，後者乃開設一家出賣褐色衣衫的貨店。

## 七 希特勒在政治上與在愛情上之不幸

這一年頭對於希特勒是在淒涼中結束，也正如這一年開頭時候一樣。他所著的書我的鬪爭史頭一本是於六月間出版。但是他呢，一向是一貧如洗，現在想太過度的賺錢。這本書每冊定價十二馬克，價錢是太貴了，而在好些年中，很少賣出去。

另有愛情上的痛苦，益發增加這些愁悶。他曾對於慕尼黑社會的一個年輕的女子發生了不幸的愛情。他之有幸福的敵人乃為慕尼黑大學之一個著名的教授。若果在那個時候沒有發生希特勒和一個猶太種的女人訂婚的謠言，或許這件事情便不傳到外面。在十月中間，人民觀察報覺有發展一篇更正之必要，那裏面是說：訂婚的故事從頭到尾是一篇撒謊；進一步說，所涉到的人物，X……女士（她的姓曾發表出來）絕不是原籍猶太的人。

在這一年年底，當他談到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運動，他發出真合於人道的口氣：這是第一次而且是最後一次。

「馬克思主義者」他於十二月在斯多德牙爾所開的大集會中說道：「有他們個人的世界觀念，固然是大家也都有着。我們應當以民族主義的觀念與他們抗衡。到了資產階級得到社會正

義之熱烈的認識後，我們才算達到目的。若使資產者們還是認破費金錢的事實爲一種犧牲，他們便沒有權利使他人捐流他的血。因爲社會理想并不求人犧牲，它所求者乃是恢復社會的正義。

一篇好聽的話。在那樣大吹大擂後，它卻從希特勒口裏，幾乎是悲慘可憐的，發出溫和的聲音。在同樣的情緒之下，他在巴伐尼亞之一個耶穌誕會中說道，到國社主義的理想勝利時，或許是經過二十年後，甚而至於一百年後。今天相信這個理想的人們很可以死掉：在一個民族的，人類的進化過程中，人壽是幾何呢！

當希特勒回想到一九二五年，他當不免雙淚盈眶啊！

## 第八章 一九二六年

### 一 希特勒之組織衛隊

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年頭，實不自知到這年底他是否永遠居於他的政黨的首腦地位。在人數單上，國社黨擁有三萬黨員，但這些黨員不是屬於希特勒的，他們是操縱於他所不能倚靠的部下手裏。唯有南巴伐尼亞那一部份是他所靠得住的。佛蘭斐（Franken）區域成爲國社黨之最堅固的堡壘。在一九二五年，在入黨者的數目上，努連堡已經是超過慕尼黑。斯特萊撒在市議會裏，甚至使民主黨份子呂蒲（Luppe）市長感覺不安。可是他許任何人侵犯他的地盤。在屠麟根，希特勒的心腹丁脫同他的部下發生鬭爭；主持薩克森黨務的富實業家慕赤曼（Mutschmann）不能解散叛變的東薩克森黨區。瓦敦堡黨區是破毀無遺。巴登黨區仍然奉命，但他的力量是很薄弱。

的。德國北部乃是國社黨腹部大傷口所在的地方；在那邊，靠着九個反叛的黨區，斯特拉塞組成了國社黨內之一個政黨，他還不能決定到底是完全脫離希特勒，還是乾脆的廢立後者，請他到無能爲害的名譽總理的位置。

他曾於烈芬特羅伯爵面前訴說，他覺得對於希特勒有了更密切的接近後，便發現到後者不過是一個演講家，而不是一個政客，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永遠是躲避政治上具體的決定，他所宣傳的主義，與其說是政治的，無寧說是哲理的，一切如此情形實使人不能同他合作。斯特拉塞自以爲如果他本人同戈培爾在希特勒面前提出兩個供他選擇的辦法，或是從新分割彼此的權限，或是彼此決裂，則希特勒將要讓步，而且情甘接受名義的總理與黨之第一演講人的位置。

我們應當考慮到所有這些黨的領袖，所有這些黨員，所有這些謀反者，並不是他經閱歷的政客，而乃是市井的人物，滾入政治的漩渦；他們心中的觀念是不會經過一番良好的消化，而他們的希望是龐大異常；他們尤其是不懂得在政治上一切功效祇能緩緩得到，而卻戀戀於紙上最輕忽無謀的計劃。在一九二五年，斯特拉塞於熱望理想的羣衆裏，得到發展過速的成功。這個人曾一下



子獲得一萬信徒，他必是容易忘記這總不過是一百萬中之一小部份而已。斯特拉塞還不會遇到一個堅決的敵人，而他卻爲幻想所迷糊，以爲黨內各件事情都是很容易做下去的。然而在這個時候，希特勒注全力於黨內部經營一種保護個人的一種力量。

在眼前這個時期，人民觀察報幾乎是希特勒所擁有之唯一的物質的基礎。在一九二六年年中，他做到脫離債權人的羈勒。到一九二七年年頭，他可以說人民觀察報在財政上是獨立的。因此，在一九二六這一年中，他之全副宣傳的力量不是費於徵求新黨員，而乃費於徵求人民觀察報的閱者。

S. S. 隊 (Schutzstaffeln 保護隊的簡寫) 牠也須分擔這個宣傳的任務。從幾個月來，在慕尼黑從新成立一個小隊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希特勒要求在黨的勢力所及的所有各地方，改組 S. S. 隊。後者是繼承 S. A. 隊 (挺進隊) 的。以黨之正式承認的唯一的隊伍而言，牠的任務爲壓倒並且到處吸收如挺進隊、羅斯巴克義勇隊等等舊份子的小團體。因此，非常的慎重須爲牠的編制之主宰。當從前組織挺進隊的時候，所發的口號是：「本黨希望各同志一致參加。」現在口號卻改

變了：「本黨指導機關所根據的原則，是一個精選的和堅決的人物所組成的隊伍是超過萬萬於一堆無數的傀儡和無毅力的人物。因此，參加保護隊須經過極其嚴厲的條件，而且牠的額數須有嚴格的限制。」

後來，保護隊之對於再度成立的挺進隊所扮演的任務，實等於監守隊對於前線隊伍的任務。眼前，牠還是人數稀少的隊伍，因為希特勒祇許的確忠實的人們加入裏面；在各黨區裏面，在不甚可靠的文人之中，這些人是代表一個清白份子的核心；他們維護希特勒的主張而反對斯特拉塞的主張。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起初時候，保護隊不會發展到巴伐尼亞境外。牠的首領為從前希特勒突擊隊（*Stosstrup* *Either*）的首領，且為希特勒的老友柏克托爾。在五月間，於威馬爾所開國社黨大會裏面，希特勒於尊嚴的形式中以「血旗」授與新隊伍，即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曾受槍火的旗。

這些選拔出來的人物，後來將自命為民族之新的貴族階級，而眼前卻被派擔任極其平凡的工作。無疑的，他們保護國社黨的集會。可是，在眼前，武力鬭爭和街上討伐敵人的時期是過去了。所

以在成立保護隊宣言裏面，曾經說明保護隊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爲人民觀察報吸引訂戶和廣告并且爲黨吸引黨員。」

當眼前這個時期，在「血旗」下，前進着一批辦理廣告的人員。

## 二 主人翁之反對奴隸

假使我們試將瀾漫一九二六這一年的關於黨所應遵循的思想的途徑之熱烈的爭論總括起來說，我們或許可以概括如下：在民衆的擁護者與領導階級的擁護者之間，發生一種積極的對立。前者自命爲社會主義的信徒，不過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加上一種迥異普通所指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他們夢想一種全體擁有平等的機會之有產的大衆共同體，而所謂平等的機會并不繫於有形的財產之擁有。在黨裏面，意見的對立所演成的形式，實爲工人與「大學堂出身者」彼此間的爭論，婦女權利平等或爲男子之附屬品這個問題的爭論。這種對立也擴展到外交政策方面，在這方面，羅森培受他的反猶太主義的推動，而主張屈服於查格魯·薩克遜的國家的統治之

下，他所引爲自慰的，是後者曾確定了亞利安種族的無上權，可是斯特拉塞卻想使德意志民族領導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恰恰是爲着抵抗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統治。所以，卽在這種地方，大家看到奴隸反抗主人的鬭爭。

至關於婦女問題上面，國社黨自從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起，決定任何婦女不得進入黨的指導機關或執行委員會，牠已經採取極其顯明的地位了。上面的決議也已經爲當場各婦女非常高興的表示贊成了。然而，從此後，情形又稍爲發生變化。

國社黨不會擁有一個婦女的團體；不過，牠卻有一個友好的團體，卽愛爾斯伯特·山德（Elisbeth Zander）所領導的「德意志婦女團體」。牠的口號是：德意志婦女不應該要求權利，而應該要求義務。黨的另一女同志，哈德利克博士（Dr. Hadlich）卻起來激烈反對這個公式。她說道：從前日耳曼婦女在男人的會議席中曾有積極的參加，而且往往是果斷的參加；但現在卻盛行男性的私心的道德觀。大家不應該提高男人或女人，而所應當提高的是德意志人；婚姻與母道不應當卽於襁褓時期中便指爲婦女之唯一可能的前途，而婦女實應當進入公共活動之所有各部份以及

各種負責任的位置。因為男性當權，所以關於種族問題，犯了對於現時代國家之不認識的毛病。

羅森培對她施以嚴厲的反駁，他說：「這個地方便是人道的德謨克拉西主義；人們便是用這些論證來創造『第三種性別』；至於涉到從前日耳曼人上面，顯見發號施令的是男子，如西格斐力、巴爾杜及羅奇（Loth）等人的榜樣可為明證。婦女的使命乃為增加德意志人的生活之興趣，至關於營造術方面則保留給男人。」

哈德利克女同志覺得這個反駁是大奇妙的而是無甚意義的。她力言說，在黨內，那些人是「絕頂東方化的國社主義者，因為壓迫婦女，正是導源於猶太民族的呢。」

羅森培粗暴的回答說，哈德利克夫人的見解乃是達爾文派之老朽的餘瀋，他而且說，本黨指導機關到適宜時候將公佈牠對於本問題的意見。

### 三 斯特拉塞之被馴服

如果希特勒想保守他的領袖地位，他需要避免以中立人的資格干預黨徒這些爭論，免使他

的地位受着影響。他不能夠殲滅敵人，但一到後者現出威脅的態度，他便可與以重大打擊。這便是後面所發生的事情。

那個時候，在德國產生一件重大的政治運動：即反對給付各皇子賠償費的運動。實際上，這是反對保守勢力的鬭爭，即革命時期所不能不擱起的鬭爭。現在呢，牠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再來鬭爭。領導這個攻擊運動的，即是共和政府——牠的新「大元帥總統」（與登堡）曾已承認黑紅金黃三色國旗——的各首領；反對者德意志國民黨本身，曾已接受保護共和政府的法律，而且後幾年牠也不能不正式批准處分廢皇的流刑。北部的國社主義者裏面，便有許多人參加反對皇子的運動；這是毫不足驚異的，他們裏面許多人是舊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份子。

尤其是渥托斯特拉塞博士起來激烈反對給付賠償費，並且要求國社黨人維護民衆的請求。希特勒便於這個問題下面找得置北部反對黨於死地的工具了。

二月十四日，在班堡開全黨各領袖大會。北方人到會的祇有兩個人：斯特拉塞和戈培爾，其他領袖則托辭旅費昂貴不能到會。照實在情形說，那時候之各黨區領袖在空閒的時間中儘量盡他

們的職務，而他們不出外旅行，除了可以希望從收有入場費的集會之盈餘項下取回他們旅行的費用。希特勒所選擇的地方又是班堡，乃爲屠麟根、薩克森和巴伐尼亞的黨區領袖所容易去的地方。

非常靈巧的，希特勒知道尋找主張沒收各皇子財產者的弱點，找得後，他便下毒手。他於是說，這種煽動乃是一種撒謊。我們可以先注意沒收財政界、交易所和商界之非德意志的皇子的財產。因爲這個原因，求避免受這種攻訐起見，國社黨各議員於四月底向國會提出一個議案，那裏面第一條是說：「銀行和交易所的大王，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後移入德國境的東方猶太人，以及所有其他的外族人的全部財產，和從這個日期起，因利用大戰、革命、貨幣膨脹和貨幣緊縮等等而獲得的利益，全部無賠償的沒收入官。」

希特勒還懂得找出其他的理由，雖然那裏面不能表示什麼意義，但發出來是很響亮的。凡是屬於皇子們的，我們分毫不得給與他們。但凡是屬於他們的，我們沒有權利取其分毫，「因爲我們是站在法律的立場上說話。」然而，任何人不得根據這種態度斷定黨是偏向於君主制度；政府

的體制乃是次要的問題，幾乎是像軍隊的制服選擇顏色的問題一樣。

上面是用很見輕蔑的口氣談到君主身上，可是反對黨方面是被掃蕩無餘了。一個月後，黨的指導機關公然佈告說：「國社黨黨員無須參加猶太人所組織的國民投票。」

無疑的，在那個時候，北方人不會知道希特勒會希望藉巴伐尼亞王子的援助使十一月九日的暴動得以成功。他們所知道的僅是黨內所傳佈的故事，照那裏面所說，這次暴動反是爲預防君主主義者的苦迭達而發生呢。

這樣，希特勒便以高壓的手段，終於做成打倒北方的反對黨。然而他不能做到強迫斯特拉塞取消其它各項問題；後者且繼續堅持說，不應用一種盲目的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以擾亂民族青年的思想和心理；上面這個情形正是資本主義政權所施行的巧計而產生的結果；這個民族青年本來是與榨取者的制度無絲毫關係的，竟於不知不覺之中，變成這個制度的藩籬。

希特勒用嚴厲的聲調回答道：這個人因爲對於現在的俄國到了這樣不認識的地步，所以能夠主張德俄聯盟，這個人卻不會想到這一類的聯盟的意義即等於德國立刻鮑爾雪維克化了。希



特勒呢，卻追求同意大利聯盟，在他看去，南提羅爾問題不足成爲同意大利直爽的和公正的談判之障礙。想用武力收復南提羅爾簡直是一種妄想，爲的是所費的代價過高，而不得不償失了。不能憑着感情作用啦！進一步說，墨索里尼是傾覆德謨克拉西之意志堅強的人物，而因此博得全世界的祕密結社的仇視。

#### 四 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

希特勒不但壓倒北方的反對者，他而且獲得一個新同盟者：戈培爾；在班堡大會中投票決定應取的步驟時候，戈培爾竟傾向於費德，於斯特萊撤，於希特勒。敵方營壘裏面，祇剩下斯特拉塞一個人。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也無非是效法後者於一年前對格拉夫所作的舉動而已。從這一天起，斯特拉塞同戈培爾結下至死不解的仇恨。希特勒之所以能夠永遠掌握國社黨的指導權，實基於他們兩人之彼此對立，而希特勒便懂得在這個對立的局面中，運用他的巧妙手腕。

斯特拉塞雖然在班堡失敗，他終不放棄鬭爭。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藉他的兄弟的幫助，他於

柏林創設一家出版社，名為奮鬥出版社（Kampf Verlag），後者後來竟然曾於一天之中印出五種國社主義的報紙。這幾種報紙之中最重要的是柏林工人報（Berliner Arbeiterzeitung），牠是一個週刊，為渥托斯特拉塞所主編的，裏面的筆調或許稍為呆滯。這個報紙，與其說是鬭爭的，無寧說是富有理想與教育的報紙，但是在持論之誠實上及議論之豐富上，牠是遠優於人民觀察報。

然而，這樣的建築出版業的堡壘，或許是下手太晚了；不然就是哈諾瓦的進攻是下手太早嗎？斯特拉塞兩兄弟很可以在德國北部經營一個政治的地盤，希特勒很不容易從那裏面把他們趕走；但是奪取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地位，使之退到名譽總理的位置，這種希望暫時是不能不放棄的。戈培爾之所以叛變——挺進隊一個首領斐佛大尉形容這個舉動為「絕無僅有的反叛」——是因為他自己明白斯特拉塞雖然眼前領導德國北部，但未來總是屬於希特勒的，因為後者擁有最強有力之物質的準備。在眼前，戈培爾須出去外面，希特勒先派他在巴伐尼亞，隨後在瓦敦堡活動。

## 五 埃塞之下臺

當戈培爾在國社黨內部開始他之新的生涯時候，同時和他有許多共同的見解之另一個領袖，卻不能不在數年內中斷他的同樣生涯。後者乃是海爾曼·埃塞。埃塞曾在勞連堡國社主義者的社會裏面惹起曖昧的情事，他和國社黨一個保護者的夫人發生猥褻的關係。因為人們以這一件事情責備他，他反辯說這種關係可以使他在困難的時期中，以希特勒所不會歸還他的金錢借給國社黨。

假定事實果然是正確的話，牠將向運動方面給與嚴重的損害。埃塞於是不能不答應希特勒說他立刻離開勞連堡。可是他仍然不履行他的許諾。希特勒不禁發怒，聲言他的寬仁的態度現在是到了最終的地步；他前此已經因為埃塞而犧牲太多的好朋友了。他不願意再見這個青年，至少在後者未曾從新拿出良好行為的證據之前。當然的，我們對於這些話不能認真相信牠的字面。希特勒是不能夠摒棄他之含有危險性的心腹的情形雖然如此，但從這個時候起，經過很長久的時

期，埃塞是離開了國社黨中央指導機關。

## 六 新的黨規

從班堡大會以後，希特勒很可以自誇為戰勝者且為唯一的主人翁；但這個絕對的主人翁地位，乃建築於虛無飄渺之中。他雖然曾召集了好幾次會，但在德國政治的生涯裏面，事實上國社黨是被淘汰了。原因是在於一個政黨的生命不但是與參加的人物有關，而且與大幫的冷淡的羣衆有關，最低限度是不要受後者對牠取反抗的態度。當一九二三年，註冊的黨員的數目並不高過於眼前這個時期，但有無數的表同情者，均熱望新的運動能够成功。到一九二六年，希特勒的徒衆祇可倚靠他們自己本身了；德國羣衆不會對他們表示惡感，而所表示的乃是不在乎的態度。即是各個信徒，也彼此低聲談論希特勒主義的死亡。比較一九二五年改組時候，眼前環境是更見惡劣；在一九二五年那個時候，大家還懷着若干成的希望，那時在國會裏面還擁有十四名議員，並且在國內還有一大批可以成爲信徒的預備隊。現在呢，在繁榮的陽光下，後者是鎔解了。天天產生新的

叛變。老朋友又棄他不顧了；克利伯爾滯留於克倫地亞（Carinthia），布魯克勒接受了德僑聯合會的一個職務，羅姆服務於製造鋼軌工廠。所有那些從前爭前恐後的追隨希特勒之重要人物，現在都離開他了。巴伐尼亞的資產階級，當一九二三年時候，是同情於希特勒的，現在卻視前此種種為瘋狂行動，而心中感覺慚忤，從前之挺進隊份子，遇到人家對他們提起過去的舉動，便現出不安的面色了。

處在這種黯淡的環境當中，非有偉大力量的性格，便不能免喪失勇氣。然而這個勇氣恰恰是由黨所處的環境造出來的。希特勒或許已經願意同民族派妥協，祇要後者們會想要如此；假定斯特拉塞兩兄弟是處在黨的主人翁的地位，而不必憂慮到在妥協的局面當中他們將成爲被犧牲者，那麼，他們或許也做了妥協的活動。便是因爲各領袖間有這樣的對立，竟然維持了黨的完整，並且使牠保有生機。

現在希特勒想用盡所有意想所到的安全方法來維護他在黨的權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慕尼黑開了一個全體大會，會中採用了爲希特勒而設的新的黨規。爲使北方人的幻想的

花樣永遠消滅起見，大會宣佈黨的綱領是「不可觸犯的」——而便是希特勒在他所作幾次演講中曾經指摘內中有許多錯誤的綱領。可是牠的永遠不變的各條，便從此成爲環繞希特勒的防衛的藩籬了。

按照新的規程，黨之合法的代表者乃爲在慕尼黑註冊的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協會。協會的領導機關同時掌握黨在全國內的總指導權與慕尼黑地方黨部的指導權；這樣，在黨內，這個地方黨部便處於優越的地位，並且處於希特勒直接管理之下。他那方面，在黨中，指定一切勞動者的聯合爲目的：「藉使在我們民族內部，實現了可以使這個民族恢復他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獨立之初步的條件；依照協會的綱領，可對於個人，猶對團體一樣，培養其精神與毅力，以達到上面所說的結果。」黨的組織之第一元素爲地方黨部；聯合幾個地方黨部而成區黨部；「爲求得運動之一個強有力的指導機關起見，協會的主席，即黨的總理，是頭一個對這個指導機關負責的。」

全國的指導機關內面，分設一大批委員會：宣傳、青年、體育、組織、財政各委員會。黨的總理——便是希特勒本身——任命各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後者們之若干助理。全國指導機關的任務是由

「執行委員會」主持，後者是由下列數人組織而成的：第一總理希特勒，情報部長與總會計（兩個毫無勢力的人物）；隨後便是上面所述各委員會的主席，最後是祕書長（另一個奉承希特勒與毫無政治勢力的人物）。執行委員會祇對全體大會負責。

第八節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他賦予黨的十分之一的黨員以請求召集非常全體大會的權利，在非常全體大會召集時，執行委員會須向他報告活動的情形。

為保障慕尼黑黑得在黨中施行獨裁權起見，於是下了三個重要的決定：第一，各黨區的領袖應由希特勒選定；這樣，「往日之德謨克拉西式的積習」會使各黨區得自己選舉牠們的領袖或至甘受斯特拉塞的支配，現在可以不成問題了；第二，決定從新組織挺進隊，體育委員會的改組便是為着這個目標。保護隊不會得到他們對牠所期望的功效，為着是牠的首領柏克托爾在全德國境內缺少了權威。新挺進隊的指揮權是交與退職大尉斐佛（Franz Felix Pfeffer von Salomon）。直到這個時候，斐佛在魯爾黨區充當希特勒的觀察者，這個黨區乃為斯特拉塞之最大的采地。第三，希特勒創設「烏施拉」（Utschla）（調查和解委員會 Untersuchungs und Schlichtung-

sausschuss 的簡寫)可以說是國社黨的『捷加』(Tscheka)這個委員會的正式任務在於提出和平解決在黨的內部所發生的意見與糾紛的方法，而牠的偶然的任務是對於請求入黨的人們作各種調查。牠在政治上的重大的重要性是基於下面這個事實：得牠的同意之下，第一總理可以整個的解散地方黨部；可是，不僅委員會的主席，而且連後者的助理，全是由第一總理任命，總而言之，委員會是在黨之上的絕對的統治權之一個工具；然而，在表面上，卻保留着各黨員的權利——表面上似乎是一種人種的權利——是操在一個德謨克拉克西式的委員會手裏的現象。烏施拉的第一任主席爲退職中將亨涅曼(Heinemann)；從一九二七年起，繼任者爲退職司令官瓦爾脫·培克(Walter Buch)；一個完全忠實於希特勒的人物；他的兩個助理爲格拿夫(Graf)和律師法蘭克第二(Frank II)；也是對希特勒絕對忠實的兩個信徒。在國社黨裏面，烏施拉是變像希特勒之黑暗的記室。與牠相類似的委員會也照樣在各黨區的領袖之下設立着。

第十二節包含了一個策略上十分重要的條件：從其它的團體或政黨出來的集團，非放棄他們過去的特權，不能接受他們加入國社黨。這一節是針對其它民族派的政黨，預備在時機到了時



候，可以安安穩穩地吸收他們的殘餘。

新黨規是以七月三十日在慕尼黑黑註冊黨的中央威權便這樣堂皇地在巴伐尼亞首都確定了。斯特拉塞戰敗了。他從新空費力量跳入戰場，不倦地旅行和演講；一年之中，他在一百八十個會裏發言。然而，從這個時候起，斯特拉塞不再爲他本人努力，而是耕種他的主人翁的葡萄園了。

爲慶祝他的勝利起見，希特勒於七月初在威馬爾召集國社黨大會。新國社黨全體出來與大衆見面，這是頭一次。大會聲稱是「堅決反議會主義的。」在一年前，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那個時候，巴伐尼亞的希特勒若是以領袖的態度與北方各首領相見，後者們將當面大肆嘲笑了。

不過，在眼前這個時期，希特勒的獨裁野心實會使國社黨消耗盡了。國社黨從來沒有到過像這一次威馬爾軍事檢閱那麼窮窘的地步。穿着奇異的制服從所有各黨區來的挺進隊份子，其人數并不多過於希特勒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慕尼黑黑校場所檢閱的挺進隊。而在那個時候，那裏面僅是巴伐尼亞人。在威馬爾，人們便又談到「國社主義的沒落」了。

可是希特勒本人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寧可願意指揮三千人，而不願意同三百萬人談判。國社黨很可以在若干時期中淪於衰頹的狀態。國社主義或許已經「死掉」了，而希特勒的健康却從來沒有這麼好的。

### 七 希特勒對德國經濟界的演講

現在國社黨在希特勒面前，呈現一塊荒地的現象。他卻想在這塊荒地上面廣佈軌道和馬路等等的線網，希望并且預算很快的便再行建築起來了。因為這個，他須有金錢。在黨不會發展之前，一個馬克的註冊費與增加到八十分尼的黨費不能弄到很多的金錢。

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中間，希特勒便次第周遊魯爾各地，并在非公開的聚談會中，向地方上的大人物演講。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在愛森(Eisen)演講；十二月初，在愛森和柯尼格斯因脫(Königs-winter)，一九二七年四月，四百多人來到愛森城的克虜伯(Krupp)大廳聽他演講。

看到國社黨的首領絲毫不曾向老闊們作他們所不能答應的要求——來因蘭·威斯特法

倫日報 (Rheinisch-Westfälische Zeitung) 於批評六月演講時，便是這樣的表示着——這些社會便生了很愉快的印象。因為希特勒曾宣稱，國社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並且認定自由的經濟是最有效力的，而進一步說，是唯一可能的。反之，他要求經濟界無保留的支持民族與國家的正義。

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經濟界的思想不是像它在一八九五年那個樣子了；我們若想了解希特勒對它所發的演講，便不應忽略這一點。那些大銀行團——可是照國社黨綱領的字面上來說，那是完全相反的——曾使實業界領袖深切了解社會的實況，並使他們比較多用真理對待人類的器械。到了今天，雖然在許多自命為工業領袖的心裏，還存留着那麼幼稚的經濟概念，但是比較前一代所應用的小貨店的經濟學，這些概念已經表現向所未有的進步了。對於資本專制，古典派馬克思主義會很有道理的預言牠將急遽的崩潰，而現在牠卻變了一種比較大有柔性的權威，其原因便是在此。在許多開明的資本家看去，最有才能的下層的人物之昇入最高的職務，乃是本制度的目標，是保障這個制度之存在的最好的方法，且也是維持內部和平的方法。依照這個現時代的

觀念，資本變成社會的僕役，其程度是同勞動一樣，而勞動不應成爲資本的僕役，但也是社會的僕役。可是，希特勒所目爲國家社會主義，正是這種社會的組織：個人爲社會而犧牲，這是國家主義；社會爲個人服役，這是社會主義；這兩個聯合起來，便是國社主義了。

## 八 斐佛之不堅決的獨立意志

在這個時期中，斐佛着手組織挺進隊。

「我們應當取得紅色戰線的鬪爭精神，」一個年青的國社黨員，於一九二六年年頭，在人民觀察報上這麼寫着。這是與斐佛的意見一樣。

每個國社黨員須付十分尼的捐，專給挺進隊用的。在一九二七年年頭，亨斯的褐衫營業所被黨收買回來；收買的代價是亨斯及其羅斯巴克的份子歸併挺進隊。像愛拉爾特從前那樣讓步，羅斯巴克也讓步了。他再不想做鬪爭的工作，而專心組織一個業餘喜劇隊。保護隊首領柏克托爾會有些時候搗麻煩，并且拒絕受斐佛的指導；他這個反抗態度便引起希特勒的狂怒，且甚至於動武。

到一九二七年，柏克托爾放棄了他的職務，而歸心於國社黨的新聞事業。

斐佛迅速地在黨內擴展他的統治。在一九二七年年頭，他逼使『希特勒青年隊』——這是由威馬爾大會決定創辦的——受他的指導。青年隊的首領古爾特·格魯伯 (Kurt Gruber) 僅成爲奧沙夫 (Osaf)、希特勒挺進隊總司令 Oberster S. A.-Führer 的簡稱。斐佛的代理人了。在斐佛的工作發展之下，他本人的勢力增大到那麼猛烈的程度，使希特勒認爲有予以打擊的必要。

希特勒不能採用其它的方法，他於是演出喜劇來了。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公開宣佈說，關於挺進隊的一切重要的命令，經過奧沙夫簽署外，還須經他本人簽字，纔能發生效力。這是等於變相的譴責斐佛了，經過這件事發生後，斐佛唯有走辭職這一條路。然而事情是已經走到那麼遠了，使希特勒預先看到斐佛對於這種譴責將是絲毫不在意的。所以他還增加說，他對於不會經他簽署的命令將不負責任。而他說這種話，僅僅是在他正式宣言擔任國社黨一切行動的責任之兩年後呢。

原因是基於斐佛曾武裝挺進隊，并使挺進隊作軍事練習。希特勒隨時有被剝奪他所享受緩刑的待遇與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國社黨經過了一個糾紛不寧的秋天。班堡大會僅是用不愉快的態度記錄希特勒的勝利。漢堡區在十一月被解散了，許多地方黨部也一樣被解散了。亨斯原為永遠不守紀律的傭兵，且無一點政治的意識，他也在慕尼黑，為反對希特勒的機警行為而叛變。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希特勒用激烈手段將他驅逐出黨，似乎是做給斐佛看到他所能做出來的手段。

## 九 戈培爾之被派往柏林

在區領袖施蘭格博士 (Dr. Schlange) 與挺進隊首領達魯格 (Daluge) 之無精神的領導之下，柏林的情狀是特別惡劣。柏林挺進隊裏面的一個首領亨斯·何恩斯登 (Heinz Hauens-john) ——他在魯爾爭中出名——曾同幾個同志攻擊一個為他所不喜歡的黨員，并至於毒毆這個黨員。經斯特拉塞要求之後，何恩斯登及其同犯者均被開除黨籍。但是，雖然經過斯特拉塞

指明何恩斯登是警察當局所驅使的挑釁者，而柏林黨區的調查委員會卻替何恩斯登復權。直到那個時候，柏林方面絲毫不曾在黨內扮演積極的任務；而牠所做出真正存在之第一個舉動，便是不受節制的行爲。

希特勒便趁着這個機會派遣他的一個心腹到柏林去，而藉此將柏林從斯特拉塞的統治裏搶到手來。他解散了柏林和波斯丹（Potsdam）兩個黨區，而創設柏林——白蘭德堡（Brandenburg）一個新黨區，將這個黨區的指導權付與戈培爾。戈培爾之受到國社黨宣傳的最重要的位置，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時，他又受到非常的權限。「戈培爾博士是對我一個人負他的行爲的責任，」希特勒宣佈說。柏林的挺進隊一向對於文人的大權是堅持牠本身獨立的態度，現在不能不屈服於新的區領袖，而達魯格也被免職了。

戈培爾對於他的宣傳活動之要堅持祇對希特勒一個人負責，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從九月中間以來，斯特拉塞充當全國宣傳部長，對於這個位置，斯特拉塞很愁悶地稱爲「黨的第二個

位置。』第一個位置是組織部長；希特勒將後者委任素無野心的人物之退職中將亨涅曼。雖然站在宣傳部長的地位，斯特拉塞祇能光明的行動；不能夠佈置祕密反抗的組織，不能夠在各黨區之間建立暗中的聯絡。

斯特拉塞在他新的職務中，曾想出幾個好主意。他以十一月九日暴動的週日爲黨喪日，藉以紀念犧牲於腓德赫恩的死者。他又主張所有國社黨黨員，在他們工作的時間之外，須顯明地佩帶卍字徽章，因爲這是做宣傳之最好的方法。

現在他在黨中做完全合法的活動；他深知唯有服從希特勒，他自己纔可出頭。他的兄弟渥托在柏林經營印刷所；預備一個國社黨新的綱領，這綱領的第一個原則是對希特勒宣佈獨立。這個新學說的散佈，會對於國社黨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雖然這新學說的來源仍是祕密的。到了最後，牠的內幕被人揭開，渥托斯特拉塞不能不離開國社黨了。



## 第九章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 一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

希特勒之以柏林黨區付託年輕的戈培爾博士，不僅是以此酬報戈培爾在班堡和在威馬爾所盡的勞績。戈培爾確實自認不但在主張上爲希特勒的信徒，甚且對希特勒個人，是崇拜到地的。

『至親愛的亞多爾夫·希特勒，』他在班堡大會後，用一種微帶諂媚的口吻寫着。『我從你身上學到說不盡多少的事情。你帶着友伴的情誼，對我指示說不盡多少的新軌道……』而他便請求希特勒把他收入幹部裏去。

『各人都是都在那邊。你把他們喊來罷。再不然，憑你在他們身上所認識的才具，一一加以選擇罷……爲的是或許有一天，一切都破壞了，羣衆圍繞着你，態度激昂并且高聲喊道：把他釘死十字

架上罷。到個時候，我們都在那邊，懷着像鐵一樣的決心，而且唱着喊着荷散拿（Hosanna）歌！

這個年輕的唱「荷散拿」歌者，若是像不久之前坐在同斯特拉塞作廢立希特勒計劃的革命者的桌旁，那就什麼都做不來了；他現在藉着罵舊日的同伴，以恢復自己的本色：「現在，我知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你們是大言不慚的革命者……我的志願從來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空談這麼多的理想，不要相信說唯有你們是這些理想的養父和唯有你們是 *Grail* 聖杯的守護人。你們學習罷，信任自己罷！你們相信理想的勝利罷！那樣，我們緊緊地站在這個理想的主宰後面，這便不是尋覓達馬（Damas）途中之回頭彼岸；那樣，我們俯伏他的面前，並不是爲着空洞的壓迫，乃是懷着這種面對皇帝寶座的人之舊日的自高氣概，乃是懷着這個安全的情緒，後者是基於我們知道他是在你我之上，而他也不過是這種神聖的意志之一個工具而已，即是在一個新的創造的愉快之潮流裏面，創造歷史之神聖的意志。」

戈培爾竭力採取領袖的態度，甚至在瑣碎的問題上面，譬如參加國會選舉的問題，他都採取這個態度。佛力克博士在一九二七年國社黨年鑑裏面，曾誇稱少數國社黨議員，在議會裏面，藉着

巧妙的提案，可以做出有效力的搗亂；戈培爾在一封公開的信裏，大肆攻擊佛力克的意見：

「丟開你們的議案罷！我們的教義是用不着議案的！」而有一天，他便逢迎希特勒的想像，給這些議員以致命的打擊。「到選舉的時期來了時，唯有領袖一個人可以指定列入候選名單的人物。現期的委任狀只賦與靜候呼喚的權利。在這個地方，最出色的挑釁者將與黨的最出色打手更番輪替……到國會開重大會議時候，這二十名議員緊緊排在一堆前進。他們穩穩的站在議院講臺前面；十個喉嚨經過訓練的演講者，十個開聲動作的打手。有十個精於質問者便足使斯特萊斯曼先生狼狽不堪，而幾下適當的拳頭便可使紅色的或桃色的叫囂不寧的德謨克拉西——主張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德謨克拉西——懾服并生出莊重的情緒。」

在這種分工的議會工作裏面，戈培爾祇替他本人保留質問的工作，而毆打的工作則留給比較強有力的人。矮小的身段，彎曲而經過改造的腳，他在同伴——幾乎全是純粹的軍人——之中，像巨人羣中的一個矮子，需要精策術以救濟他的弱點。在國社黨的政治家中平均算來，戈培爾在智慧上是高出他們，可是在這種智慧當中，卻缺少了性格和達到一種目標的意識；牠是游移於學

說與方法兩者之間，僅僅注重着一點：成功。在一本名為『國社黨』(Die Nazi-Sozi)小冊子裏，戈培爾描寫在一個狄克推多與兩個議院指導下之未來的國社主義政府，這兩個議院：一個是職業議院，一個是具有二百名經狄克推多選取的終身議員之參議院。遇到這個參議院議員有死亡時候，則用選擇方法補充遺缺；此外，參議院還選出一個指導政治的總理大臣。這個計劃幾乎是白天的夢想；在未來的政府裏面，將是『總理大臣』戈培爾，在『狄克推多』希特勒的命令之下，擔任實際的指導權。

戈培爾並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他缺少了相對的觀念，也缺乏了希特勒的辯證法。然而，靠着他的熱烈的性情，他具有對於人的精細的認識，及對於他們所使用的地方；他最接近的左右是包括着忠實的信徒及勝過希特勒所有之精選的同事；他是富於被人錯認歸屬於希特勒之鼓動情感的性格；雖然他的性格和他的口氣遠不如希特勒所有的那麼接近羣衆，但他懂得利用這種隔離的情況而作幻惑的工夫。國社黨的宣傳之採用一種英雄故事的格式，其功績是屬於戈培爾的。希特勒援引德意志各英雄現身來世，而在戈培爾看去，這些英雄已經在那裏了；當他在他的干預

報 (Angriff) 裏寫到挺進隊前進於紐哥倫 (Neukölln) 之沈寂的和淋溼的街道時候，他儼如談歷史上有名的希臘戰役一樣，而沒有一個國社黨的烈士能像柏林學生可斯特·維塞爾 (Horst Wessel) 之那樣被捧為英雄的。他是不喜歡簡單的，向魯爾黨區的同志通知他要離開他們，他并不乾脆的說他是被任為柏林黨區領袖，而卻說：『骰子已經擲下來了，他們已作違反你們和我個人願望的決定了。』而他并不像一般人買張車票，於七點四十分，下柏林動物園車站，而卻說：『我懷着萬分愁悶，摺疊我的帳篷，到這幾行字遞到你們手裏時，無情的輪船已經把我運到柏林之地瀝青的荒漠去了。』這裏可以看出，即是穿着旅行服裝，他也要裝出英雄的模樣。他想總有一天，有人站在防禦物上高唱國社黨黨歌，但他并不這麼簡單的說出來；而卻說：『牠的（黨歌的）音調總有一天成爲爭取自由的防禦物上之革命呼聲。』因爲要說明先需要佔領街市然後再攫取政權，他便說：『街市的樂音乃是政權之最接近的期待者。』

假定這些話製成詩歌，將更見好看了。

然而，假定這種格式可以充分描繪戈培爾的本色，這便是完全根據這種大言而下斷語，結果

卻是有負他這個人物了。戈培爾以一八九七年生於來因蘭；同他的良心相抗戰，他是先從他的宗教環境解放出來的。他因獲得大亞爾伯 (Albert-Lo-Grand) 天主教協會的助學金，而得以完成他的學業；七個大學曾經受過這個不安分的學生的光顧；他隨習日耳曼文學和文學史的功課。他是天生的作家。與其說他具有確實豐富的思想，不如說他具有一種包羅許多學識的思想，他尤其是缺乏平衡力及從這種平衡力產生出來的特質：機敏，興趣。在他的心坎裏，有着一種探索的精神；在那裏面，懷疑是明顯的強烈過於任何信仰。

照他自己說，他曾於一九二三年，在被佔領的區域內，設立一個國社黨地方支部，因為了這個，他曾被比國人摔進牢獄裏去。可是，在另一次，他冒稱說，會因為做有利於興登堡的候選的活動而身受牢獄的處分，他還補充說，在這一次他被人用馬鞭毆擊。因為這種前後說話的矛盾，黨裏面同志常常公開控告他撒謊，他自己也并不提出抗議。無論如何，這是使人驚異的，因為一九二三年之人民觀察報對於黨之纖微的收穫都記載無遺，何以不曾提起來因蘭新支部，也不提起後者的創辦人呢。戈培爾曾寫有幾本文學的小說和幾部無價值的劇本，這些作品便可作他之信仰的懷

疑和他之反抗宗教的與精神上的關係之明證。這些作品不但是非社會的而且是非政治的作品。戈培爾曾完全修竟他的學業，並且很合規則的得到他的博士學位；但是在不能消化所得的知識這一點上，他還是更有甚於希特勒。他的演講和他的文章或許是最沸騰的和富有理想的，但同時是最缺少經過沉思的實質的；希特勒至少還得某一方面專門的學識；關於外交政治方面；在戈培爾胸中，我們則看不見任何實在的知識。

這樣，在希特勒之後，黨之最良好的活動者是——同希特勒一樣——一個天生的流浪者；不過在這種性質上，後者是更有甚於希特勒的。他是黨的一個真實不虛的巧言者。他可以做出絕妙的表現；譬如，他可以說現在有一種「小勞動者」的模型構成出來，這個「小勞動者」可以大大的方的同「小資產者」相比較，因為人們若能慣於饑餓同慣於壓迫一樣，他便可變成「小的」。隨後，他猛然擁抱勞動者們大聲呼道：「新勞動階級的年少的貴冑，你們站起來吧！你們是第三德意志的貴族啊，你們用熱血所播下的種，將來長出燦爛的收穫。你們握着拳頭，擡起頭來！打倒德謨克拉西式的平等，它是少年勞動階級到完成其歷史上任務的道上之障礙物啊。」這些話是發

出純潔的聲音嗎？當戈培爾稱呼勞動者爲他的同伴和他說到「以模型給與無產者的粗野性」的時候，好像一個濃裝豔抹的女人擁抱一個革命的水兵一樣。

他所說出來的話，多少是從一種可敬的情緒發出來的，然而不是一種誠實的情緒：「人在與生涯糾纏時候，他便不是自由的。」這句話是極正確的。可是戈培爾博士應當進一步說他自己也稍爲缺少這種自由。很快的，柏林的信徒紛紛傳說「博士」不常常是極勇敢的。

「在旅行時候，我不佩帶黨徽；我很少感覺到有與人作政治談話之用處與必要。」他這樣承認說，雖然全國宣傳部長恰好命令佩帶黨徽。在人民觀察報裏面，有許多篇認得出是屬於戈培爾筆法的文章，使我們看到他遇過「意志薄弱」的同胞的強暴行爲。有一天，他從醫院出來，碰到一批共產黨準備打他，警察來到，使動「這個共和政府的象徵：」橡皮棍，他纔脫身走出。又有一次，乘坐汽車行駛時候，他現出確實有雙層眼光的天才：「忽然間，」不知名的編輯敘述道，「戈培爾博士從他的座位站起，停住！車夫同志，停住！汽車停住了。博士有什麼事情發生？車夫問道——不知道什麼，但我們碰着危險事情啦！抽出我們的手槍，跳落地上。不要作聲。看不見任何人啦！我們巡繞汽車



看，四個橡皮輪是全部鼓漲，並沒有傷損。啊，這是什麼？不錯的，左邊後輪短少了四個螺絲圈。五個螺絲圈裏面，短少了四個。一番無恥的與奸惡的陰謀。猶太人及其走狗是這樣的做鬪爭。這個便是他們的聰明的武器呢……」

國社黨其他的領袖，并不曾不遭遇危險。斯特拉塞於某一次衝突後，還會臥床好幾個星期呢。然而他們沒有一個認在黨的機關報裏敘述這種事變是很漂亮的辦法。所以斯特拉塞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在他的柏林勞動報裏面，用極鄙視的態度宣稱說，在前線的鬪士，不應當利用某某種事件來做個人的宣傳，也不應當不斷的使人談到他個人身上。

有一個人，未來之柯尼斯堡黨區領袖，愛尼克·高克（Erich Koch）曾於愛伯斐爾（Eilbertold）認識戈培爾，他在斯特拉塞的機關報同一號裏面，發表一篇談「種族混合的結果」的文章。這篇是在表面上絲毫不懷惡意的「科學的」研究，目的祇在證明彎曲的腳是代表不可與以信任的人物：「當心帶有特殊記號的人物呀！下薩克森的一個俗諺是這麼說的。因為通俗的經驗曾經證明出種族混雜所發生的危險結果。英國之李察爾第三（Richard III）是駝背和跛腳的，路

易十三瘋王是殘廢的，達來命（Talleyrand）是具有特別錯誤之性情的。

「我們勉強可以用這個字眼：那一種的人便有那一種的性格。他可以眩惑人們，可以大肆誇張，可以散放虛偽的消息，可以很不道德的利用他之同事們的忠忱，想榨檸檬汁一樣榨取他們，隨後便揮走他們，藉使他自己可以收穫他們工作所得的利益。他同時熟悉譏謗，暗算和口是心非之種種卓絕的技術。」

當然的，這些歷史的追述無非是針對柏林黨區領袖而發之一種粗鄙滑稽的嘲笑，而這位領袖的亞利安的種系是大大發生疑問的，並且因為他的不良性格，他便受了人們的憎惡：「我們無須再作這些引證了！它爲我們指出種族混雜和種族退化之可怕的结果。因爲種族的關係而生出之精神上與肉體上殘廢的人們，往往具有起初可以惑人的各種才能；然而這些才能是像一顆燈泡，當牠走電時候，在永遠黑暗之前，射出強烈的光線那種形狀。事實上他們是聰明的人物，但又是無情的利己者和野心無度的人物；總而言之，他們從來祇有是有害於民族的。」

## 二 爭奪柏林的激烈鬭爭

戈培爾之在柏林辦理宣傳事業，所用的方法其粗俗的程度實不下於斯特萊撒；他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干預報上面寫道：『國社主義者們！你們不要相信住在某街門牌十四號二層樓的某君……他是你們之最危險的虐待者中之一個。』而幾天後，他用同樣的方法激動閱者反對另一個敵人。假定經過這種辦法後，甲君或乙君被人毆擊，干預報對此是毫不相干的；牠不過使閱者當心而已。雖然如此，戈培爾之感動他的聽衆，其深刻程度實遠在黨中任何其他演講者之上，而且遠在現時代任何其他政治家之上。他向年輕的無產者們說話，直使他們在無產階級的皮膚裏面都感覺舒服；使他們拒絕一切哀矜的情緒，而祇夢想着光榮與勝利。

國社黨在柏林的候選區域爲斐力德羅 (Friedman) 和斯德格尼赤 (Stegitz) 之資產階級的市區，從前爲德意志國民黨的采地；到一九二七年後，國社黨從這兩個市區侵入北部無產階級的區域。在好幾年中，東部市區仍然不讓國社主義者進去。反之，在法羅斯 (Pharus) 大廳和

博克 (Bock) 酒店，他們大打敗共產黨人；戈培爾便使這兩次鬭爭在國社黨的歷史裏面名垂不朽，正如希特勒關於何夫博羅的鬭爭所做的一樣。如果柏林的信徒談到公館街的鬭爭——在那裏面并且犧牲了十四個國社黨員——他們僅是用一種勉強的態度；但是在來往郊外的火車裏面所發生的幾次衝突，竟然極其迅速的構成一段故事了。到了兩年後，人們遇到提起「運動的開始」時候，大家絲毫不想到何夫博羅的鬭爭和十一月九日的暴動，而祇想着「里克脫斐德 (Tischerfelde) 的鬭爭」了。而黨領袖儼然不是希特勒而卻是戈培爾了。有人在希特勒面前表示不平，他回答說：「國社主義在此地或在彼地染上地方的色彩，這是不很壞呀。」

### 三 戈培爾之不合法的行動

但是，柏林黨區領袖又另一次使希特勒失望。

戈培爾到了柏林之「地瀝青的荒漠」到了「部下的公館」抱着大幹特幹的希望。他於一九二七年創辦干預報，後者是一張週報，他想用着粗野的方法，靠這張報來同斯特拉塞的柏林勞

動報競爭。他在街上和會裏面做挑釁行動，因為，照他自己說：『在外面用着恐怖行爲和激烈行爲以堅持他的哲學的人，他總可以有一天獲得權力，並且同時獲得顛覆政府的權利。』他便這樣做去，做到好幾次在酒店和地道車裏面發生鬪爭後，柏林警察當局便於一九二七年五月禁止國社黨在柏林及其四郊的地面活動。希特勒正於五月中在柏林的一個非公開的會中，對着幾千聽衆演講，而他祇希望能夠從新在普魯士公開演講，因此希特勒對於他的戈培爾博士之笨拙行動大見不滿了。

因為，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漸漸做到和新當局重新建立可以相處的關係。巴伐尼亞政府已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廢除禁止希特勒公開演講的命令。希特勒於事先會須經過國社黨議員布特曼之居中接洽，向內務部長保證說：『……國社黨不追求任何違反法律的目的，而他也不使用任何不合法的手段，以求達到他的目的。』此外，國社黨各首領還須答應不使如挺進隊或保護隊各種組織帶着軍事的或警察的性質。

希特勒一切都肯同意，祇要對方許他演講，因為國社黨之能擴大起來，實倚靠着希特勒的演

講，而不是倚靠着斐佛的軍事把戲。

#### 四 從右翼政黨來的生力軍

其他聰明的人物也承認這個事實。「我無條件的服從亞多爾夫希特勒先生的命令，爲什麼呢？因爲他曾證明出他是懂得指揮的。」這篇寫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多少有點誠懇的宣言，其作者不是別人，而乃是從前在開會時候受過希特勒搗亂的烈芬德羅伯爵。

在個人方面，烈芬德羅是反對「代表大地主之潛伏的資本主義的」傾向的，在國家主義的運動裏面，烈芬德羅曾夢想一個受他同斯特拉塞的指導之國社黨。但是斯特拉塞使他明白了有利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假定伯爵不先向「慕尼黑的教皇」投誠。因此，烈芬德羅便同希特勒談判，到了對於希特勒同羅馬方面串謀的問題，他鄭重聲明贊同後，他便加入國社黨，而他的國會議員位置也經對方保證給與他了。過幾天後，另一個民族派議員，司托爾 (Stöhr) 在同樣的條件下，也加入國社黨。這兩個人都增強了斯特拉塞的羽翼，烈芬德羅并且支持斯特拉塞的外交政策。在下

一次召集於努連堡的國社黨大會中，他宣佈說：「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國社主義者，所以我們不應當追隨一種做或可以做資本主義的利益之工具的政策。」德國共產黨人也可以說：我們擁護蘇維埃聯合國呢。

希特勒所得到這種民族派的生力軍，其成分不是十足的。他之仍然樂意收納這些靠不住的徒弟，便可證明出他有在數目上發展之必要。在那個時候，在政治的重要地位上，鋼盔團甚至於德意志青年黨都超過於國社黨。

## 五 軍人維持費之浩繁

希特勒若不願意放棄一切政治的前途，那麼，他也應給他的黨徒以一種軍事的組織，使後者不僅做牆上貼紙條或替人民觀察報做廣告的工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忍受斐佛的軍事的把戲，雖然他是實在不喜歡這個約。在一九二七年年中間，斐佛擴展挺進隊到了很好的程度，使後者，否則在人數上，至少在活動上，可以與鋼盔團相抗衡。八月二十一日，國社黨開大會於努連堡，差不多

有二萬挺進隊隊員在會前列隊遊行，即是比較前一年，挺進隊人數是超過三倍了。到這個時候，希特勒便可以宣佈說：『我們再不要同時跨在其它軍事團體的黨徒了。』可是在一九二五年，這種跨名的辦法可以隨便做。從一九二七年起，這種辦法是被禁止了。

在這一次大會中，希特勒於向挺進隊舉行授旗典禮時候，以類似有歷史性的任務付託各隊。每隊各有各的任務。對來因蘭支隊，他說：『你們掌起這面旗，直到德意志的萊因河重復歸還德意志之日為止。』對維也納隊的掌旗說道：『你接受這面旗，視牠猶同我們的運動之固結的單位的象徵，直到那些不道德的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被我們撕碎之日為止。』他還尊稱愛森的人們為『德意志帝國之世傳的武庫之代表人。』

在慘淡的威馬爾大會後，努連堡的列隊巡行，還不能使人感覺快慰。挺進隊的功績首先是屬於斐佛。他做到將所有未曾加入鋼盔團或猛狼會 (Wewolf) 之舊日前鋒隊 (Frontmann) 的逃亡份子吸收到挺進隊來。這種辦法當然很費金錢，而國社黨的經濟來源還是最微薄的；這些經濟來源幾乎全部費在挺進隊身上。譬如戈培爾於一九二六年到柏林時候，幾乎是囊中不名一



文——而他已經是一個有名的活動者。所以努連堡大會注重尋求新的經濟來源。於是組織有資產的黨徒和同情者的團體，名爲『奧斐林格』(Opferlinge)，牠的份子須按期捐出很重要的款項。

此外，並請所有各黨員都特別捐助兩馬克；在希特勒發言的大規模的演講會裏，包箱的票價取費極昂。靠在奧斐林格，各黨區的領袖，不久便可在比較舒服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在一九二七，戈培爾已經可以坐在一輛馬力強大的汽車裏面馳騁柏林道上，而預報當談到有一次宣傳活動時候，會誇獎這輛汽車的華美；牠說（而且好幾次提起汽車的招牌）：『精神勃勃地在大隊前頭前進，像一個大灰色老虎一樣。』

## 六 斯特拉塞之再度擡頭

國社黨需要金錢的援助；加之，自挺進隊的組織佔據了各人的精神後，黨的組織便爲人所忽視了。這種狀態延長下去，便將成爲一種危機，因爲它將鞏固斐佛的地位。組織部長亨涅曼將軍

——一個多病的人——現出他是不能勝任他的任務。因為不能以他的意志壓倒他的幾個部屬，他便辭職不幹了。亨涅曼的退休實爲斯特拉塞方面的勝利，斯特拉塞便於一九二七年取得亨涅曼的位置。同時，黨從普魯士邦議會議員孤白（Kube）身上，得到一個新的援軍。孤白同烈芬德羅與司托爾一樣，是屬於斯特拉塞的朋友團體裏面；他在某時期中極力反對戈培爾，甚至於請求警察的援助以對抗柏林的國社黨人。他自然是斯特拉塞的同盟者了。保護隊現在是受斯特拉塞的一個舊同事與姆勒（Himmler）的指導，斯特拉塞因而在保護隊裏面得到另一個的援助。到一九二七年年底，斯特拉塞在黨中的地位，又到了他在希特勒領導下所能做到的那麼堅強的程度。在班堡的失敗之二年後，他終於得到很愉快的擡頭。

## 七 選舉鬭爭之失敗

雖然有挺進隊之耀武揚威和演講會之成績，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國會選舉，卻指明出國社黨仍然是很少政治的重要地位。

這次選舉給與國社黨的全國票數爲八十萬七千票，至於格拉夫的民族派競爭者僅得到二十六萬五千票。從此後，希特勒在國會裏面有着十二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七個議席；但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曾得到十四個，而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二個。在普魯士邦議院裏面，他得到六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一個議席；在巴伐尼亞邦議院裏面，他得到九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六個。然而這總不過是一九二四年的數目之三分之一而已。經過這次選舉後，國社黨似乎是極不足畏的，因此，在同月的三十一日，禁止柏林國社黨黨區活動的命令是廢除了，而幾個月後，又許希特勒在普魯士演講。

在這十二個議員中，除了愛勃將軍——他已加入國社黨并且立刻被選放候選人名單的首位——僅有兩個希特勒的心腹：烏施拉的首領培克和戈林，後者已從外國回來。戈林現在同羅森培（他對羅森培還懷着強烈的憎惡）又成爲希特勒之親密的顧問；靠在他的社交生活的興趣和他的各種關係，他很快成爲練達的議員，成爲與非國社黨的，資本家的，甚至於猶太的，各種社會之中間聯絡人。

他個人之對於霍亨索倫皇室的信仰，使他同廢皇太子接近；廢皇太子雖然從來不曾隸屬於國社黨，但他同戈林與戈培爾在黨的內部構成某種勢力；這種關係延長到一九三三年，直到戈林和戈培爾反目之日為止。他們聯盟的目的，多半是爲着排擠格列戈爾·斯特拉塞——希特勒之下的最有力的人物——并且盡力量打擊佛力克的勢力。

#### 八 丁脫之被開除黨籍

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後，沒有一個國社黨人會想到國社黨，在一年後，會變成德國第二政黨，而在二年後，會變成德國最大的政黨。人們心中產生紛亂的情緒，以爲國社黨不會走上正當的途徑。領袖們便覺得他們最迫切的任務是在於改造黨員的性情，使他們明白炸彈和機關槍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仍然維持着他們奮鬥的精神和軍人的忠忱。

在是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大會中，希特勒於開除屠麟根黨區領袖丁脫博士之下，得到鞏固他的權威的機會。丁脫會請求設立一個諮詢會以佐助黨領袖。他還且贊成由希特勒任命諮詢會

員。然而一個會總是一個會，總要牠選出一個主席來。

希特勒便以譏笑慢罵的怒潮掃去這個提案。諮詢會這種機關，對他是毫無利益的。他從來不會向不會擔負一種任務之完全責任的人物請教。他若要探問關於國會的消息，他便找佛力克（他不說找斯特拉塞）；關於挺進隊，他找斐佛。這個提案終於被擯絕了。丁脫又不謹慎而在會中談到新的宗教學說，遂被開除黨籍，而希特勒便大聲喊說他不讓黨變成宗教的或哲理的爭論戰場。

## 九 國社黨的改組

這次大會的實際結果，實為國社黨之全部改組。從十月一日起，國社黨分為二十五個黨區，與德國的選舉區域相符合。魯爾黨區原為斯特拉塞的勢力之大本營，現在被解散了——這對於希特勒，實為政治上一番勝利。

希特勒永遠以保障個人的權力為慮，於是聯合巴伐尼亞各黨區成爲一個，其指導權由他保留在自己手裏。對於國社黨奧大利支部，他握有與上面相同的最高權威，這是根據一九二六年的

國社黨議決案，那裏面決定黨的最高指導機關擁有將「所有受德意志民族統治之國家」的參加者歸併入國社黨的權利。基於這個議決案，國社黨正式放棄了蘇特的國社主義者；那麼，希特勒是格外注視與奧大利人合併了。因此，他重傷了他之舊日同胞的國民自尊心；而因為這個事實，他身受責罰，奧大利的國社黨在好些年中絕不會有所發展。

## 十 附屬的組織

從一九二八年起，一大批附屬的組織產生出來。為首中之一個——挺進隊除外，牠站在另一種地位——實為「國社主義文化鬪爭大同盟」，為羅森培根據一九二七年努連堡大會的一個議決案而組織的。

在原則上，黨無須組織一個國社主義公務員聯合會。它尙且壓制那些熱心過於能幹的黨員嘗試這一類的工作。它認為不要與那些公務員為擁護本身的利益而組織的大職業團體競爭。它知道這種態度可以格外得到他們的同情。在一九二三年年頭，希特勒已經表示「他從來擁護公

務員的權利而反抗敵人的侵犯與攻擊。」一九二六年威馬爾大會曾照佛力克的提議決定擁護「公務員的權利，悉按憲法所給與他們的保證。」為取得公務員的同情起見，國社黨竟不惜承認威馬爾憲法。

不過，公務員中至少有一類受到國社黨人的注意，這便是學校教員了。在一九二九年年頭，於未來的國會議員漢斯·謝模(Hans Schemm)的領導下，成立一個國社主義教員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到一九三〇年的選舉後，這個協會有着廣大的發展。另有其它協會的組織，使國社黨得伸張勢力到最重要的職業裏去。德意志國社主義法律家協會(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成立於慕尼黑，組織者為國會議員漢斯法蘭克(Ingolstadt)；國社主義醫師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zte Bund)成立於因哥斯達特(Ingolstadt)，組織者為里伯爾博士(Dr. Liebel)。

此外，直到這個時候，德意志婦女協會對於國社會多少是獨立的，到一九二八年年頭，它被國社黨吸收進去，而採用「紅色卍字會」(Rotes Hakenkreuz)的名稱。這個名稱充分表示婦

女們祇承認擔任看護的工作，而不是站在男子旁邊共同奮鬥。因為要使任何疑義均無發生之可能起見，紅色卍字會主席愛爾斯伯·山德女士曾於一九二八年在慕尼黑召集的國社黨領袖大會裏，宣稱國社主義的婦女祇想擔負『伺候』的工作，支持挺進隊的作戰，而不要求政治的平等待遇。

此外，還有『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的組織，它的首領孤爾特·格魯伯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進入國社黨最高領導機關。還有國社主義大學生協會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指導者為恩忒博士(Dr. Adrian von Renteln)。

在所有這些附屬的組織之中，最擁有勢力的——這種勢力縱在希特勒主義崩潰後，還能支持數十年之久——便是德意志國社主義學生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了。一九二八年，在基爾(Kiel)城，一個國社黨員第一次充當大學全體學生代表會的主席。這個國社黨協會極力鼓勵德國學生團體的反猶太的情感，其實它們從來不曾缺少這種情緒。在它的新領袖西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的領導下，它的勢力迅速發展，而且一



種新的空氣瀰漫各大學校。至於從前，譬如有任命猶太教授的事件發生，學生們僅向校長呈遞恭敬有禮的抗議書；從此後，如有這一類的事件發生，大學校即陷於革命的狀態。國社黨員現在開始在講堂裏高聲吵鬧，並且在學生大會裏互相毆打。

在一九二八年，支持這種附屬組織之龐雜的關係網者，也不過六萬人。國社黨之擴展的速度是緩慢了，因為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人數不過從一萬七千增加到四萬。這些附屬的組織之擴張，結果竟成爲一種危機，斯特拉塞於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本人也於一九三〇年，都曾指點出來。到了羅姆於一九三〇年年底主持挺進隊的領導，並且照他本人舞弄官樣文章的癖性而加倍增多各種章程與條例，於是國社黨變成了一片叢莽，在那裏面，或許連它的領袖也不復認識自己了。



## 第十章 一九二九年

### 一 柏林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

上面所說那些附屬組織之有點可慮的蕃殖，還趕不上有些革命的政治理想的蕃殖，這些理想的老巢，乃在格列戈爾·斯特拉塞和渥托·斯特拉塞的團體裏面；給這些理想以最鮮明的表現者乃是戈培爾，他使從慕尼黑方面來的口號慘淡無光。但是，雖有創造者們的努力，這種北方的國社主義總不能成爲一種學派，也正如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那個時候的小資產者所提倡的國社主義一樣。在它那裏面，混滿着各種情緒和各種方式，它們費許多力量而總不能使之治爲一爐，有時到了彼此碰頭時候，也不能互相調和。

革命後六七年，德國的文藝大受由俄國來的馬克思理想的暴風雨所震盪。馬克思對無產者

所發出的危言聳論，也於斯特拉塞的團體中得到一種反響，在這個團體裏，他們當然不當作一篇對無產階級的勸告，而乃當作是對無產的各民族的勸告——而德國便是無產民族中之第一個。因此，產生出一種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而在這些年間，它是國社主義所給與青年之最有力的影響。這個教義所包含的思想內容，並不十分是創見的。他們從現時代人物如埃恩斯·容格 (Ernst Junger) 和布魯克 (Moeller van den Bruck) 等等——姑且不說先進人物如尼采 (Nietzsche) 或拉嘉爾德 (Lagarde) 等等——借來好些理想。這些現時代人物，雖然年紀很輕，已經被尊視同祖先一樣。在他們與國社黨人之間，存在着隔斷哲理與行動之整個的距離。

但是各種理想的本質，向來趕不上這些理想的數量。即使我們承認，在政治上，無所謂正確的理想和錯誤的理想，但祇有成功的理想和失敗的理想，不過在這個新的國社主義的倫理學裏面，有着許多愚拙的地方，有着許多觀念恰與其它的觀念相矛盾，甚至與黨的本身行動相矛盾。然而，不管有着所有這些謬誤，斯特拉塞的團體的理想之表現新時代的希望，實高明過於希特勒的一切演講。這個地方可以確實表示着黨的思想前鋒之所在。

## 二 國社黨之躲避工人問題

可是，在這個時候，有着更嚴重的困難題目：國社黨避免解決各種最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工會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努連堡大會，曾經叮囑黨的指導機關迅速召集新大會以討論工會的問題。在那裏面應當討論到國社主義工會的創立。好久以來，便有人埋怨說黨對於擁護勞動者的利益所取的步驟是過於冷淡。斯特拉塞的信徒會很誠懇的努力提倡擁護勞動者的利益；他們甚至想要成立一次國民表決以求通過一種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度之不可觸犯的法律。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渥托·斯特拉塞想要「工資之大量提高」結果被希特勒斥為「毒害輿論」因為一個淪於奴隸地位的民族說他可以藉較高的工資以得到大大舒服的生活，這便是毒害輿論了。

努連堡的決議終於不見實行。這個決議實使國社黨站在下面的更替論組織「黃色」的工會，或是同資本家鬭爭。第一個辦法將使它更爲工人所懷疑；第二個辦法將使它失掉資產階級的

援助以及工業界之財政的救濟。加之，那些已經加入國社黨的工會會員，是過於忠附他們固有的團體，而不很贊成創設與後者競爭的國社黨機關。因此，國社黨總指導部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採取後面的決定：

『我們宣告任何人不得以國社黨名義組織工會。雖然本黨總指導部承認有在某時期創設國社主義的工會之必要，但在眼前它認為這個時期還未降臨。』

直到一九二九年，國社黨人在勞動羣衆方面所得的成績是微乎其微。但從這個日期起，他們吸收大幫的無產者。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德國有着三百三十萬失業者。民族的經濟動搖到了這種程度，當權的社會民主黨或革命的共產黨都不能表現出救濟的能力，這個民族當然投入國社主義的懷中了。

### 三 農民宣傳

從一九二八年起，國社黨同時開始更正它之對於農民階級的態度。處在其本身小資產階級

的來源及在大戰中所產生城市饑餓的人民對於鄉村人民之仇視的影響之下，在過去很久時期中，它簡直不睬農民。二十五項綱領絲毫不涉到農業問題。

經過很久時期，希特勒不肯打消這個念頭。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在漢堡對着四千什列斯威·好斯敦農民演講。這些農民們會希望從在那時候已經爲德國最有名演講家的口裏，聽到關於減低利率和提高關稅的好話。他們不但沒有聽到這種話，而卻聽到希特勒宣佈說：「種種困難不是基於民族中某一種階級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而是由於整個德國是踏進崩潰的路線去。你們不要以爲賦稅的重擔，外來的競爭，物價低落和債務增多是特別影響到你們的；這些事實乃是整個的社會本體之崩潰的現象呢。」這些話是正確的歸納起來的和千真萬實的，但是不足以獲取農民的擁護的。

在那個時候，希特勒的確還不會企圖獲取農民的擁護。在他所著的書裏，他曾寫道：「工人羣衆乃是我們新興的運動藉資發展的武力之儲藏庫。」

在開始時期，國社黨不能吸收農民，因爲它沒有任何話對他們說，同時也因爲在它的各首領

中，農民佔極少數。斯特拉塞的團體首先認識了吸收這些被重利與賦稅的負擔所壓迫的農民羣衆，可以使國社黨得到重大的利益。但是他們夢想農民革命，扔炸彈，劫奪稅局。希特勒在他那方面，以為雖然在黨的名稱裏嵌有『社會主義』字樣，而他尙且對農民保證說他是贊成土地私有制的，他對農民所做的工夫可以說應有盡有了。此外，費德已經於一九二三年宣佈說：『國社主義承認土地私有制之合法性，並且置土地私有制於國家的保護之下。』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國會選舉前夜，希特勒又重新宣佈說：『關於我們的敵人之故意濫作我們的綱領第十七條的解釋，我們可以確實說明如下：國社黨既然承認土地私有制，『無償徵收』那一段，僅可適用於不正當獲得的土地或非照公共利益而被利用的土地。它首先是對猶太人土地投機公司而言的。』

兩年後，國社黨又退讓一步。唯有不正當獲得的土地，可以無償沒收；反之，非照公共利益而被利用的土地，可以用『適當的代價』從地主手裏收回來。

到了最後，國社黨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公佈一個直接以取得農民階級的擁護為目標的



農業綱領。在他的主要部份上，這篇綱領乃出於希特勒的農業問題顧問著作家瓦爾脫達雷（Walter Darré）的心裁。牠不但承認「供養民族的農民階級對於民族有着極重要的關係，」牠并且看定這個階級是「全體人民中之最純潔的份子，民族的新生機之源泉，我們的軍事力量之骨幹。」而牠便下這個結論：「一個壯健的農民階級之存在，乃是國社主義政策的基點之一。」

其它各段說到取締土地投機的辦法，禁止地產抵押，并且在一切土地交易中國家享有優先權。另一段許給農民得「在最可能的公道條件下，得到經營土地的放款。」

至關於大面積的土地，綱領則說：「關於農業經營的面積，我們不能訂立一種非天然的規則。大批的小農與中農之存在實為國家的最主要之點。但是大面積的地產也有牠所貢獻的任務，也同比較裂成片斷的土地一樣，牠的存在是很合法的。」

同國社黨的其他綱領一樣，有許多問題，農業綱領卻閉口不談，但我們可以說這是基於一種深邃的賢明處置。一個確定一切各點的綱領，往往是過於縮少思考的範圍，而且因此變成不可卒讀的而又被人所遺忘了。國社黨的農業綱領給與農民以反覆熟思的一種資料。主要的地方不在

於牠消除一切疑雲，而在於引人注意並使人迷惑。牠答應保護土地所有權，壓低資金的利率，維持物價；尤其是牠將農民階級擡到德意志民族的首位，使人在表面上看到這種高尚地位乃是國社主義倫理觀之自然的結果。戈培爾之對無產者，羅森培之對中等階級，希特勒之對大學生，都是用同樣方法來做工夫，現在達雷則答應農民說後者將形成未來的血與土地的新貴族。國社黨逐漸現出一個可愛的主人，它希望把紙牌擺佈好，使每個賭客都可贏錢。

#### 四 資產者與無產者

在迴避工人問題與製定機會主義的農業綱領之下，國社黨表現它內部的精神是逐漸低落了。當希特勒在漢堡向農民誇稱國社主義「不僅是祇求擁護綱領之幾個重要點的一個簡單的政黨」時候，他自己不會覺得已經言過其實了。在那個時候，他還沒有一個確實決定的綱領之幾個要點，因為他缺少了專門人才。在等候後者們紛紛歸附之時，他只顧自己擴大意大利的法西斯蒂對於這樣無綱領的狀態會創出一種學說，叫做「動力論」。希特勒於一九二七年說道：「人民實

在祇要一個可爲他們主人翁的人物；當他說這個話時候，他似乎將「動力論」的學說據爲己有了。

直到一九三〇年，創立國社黨那一幫人物，是來自各方面的，并且受種類極其龐雜的野心所驅使；在黨從事鬭爭和擴大勢力中，這些同伴彼此并不十分認識清楚。據斯特拉塞的信徒們的議論，他們對於領袖希特勒的著作和演講祇有着微少的認識，而且并不加以重視。在柏林方面的人物看去，慕尼黑方面的人物實類似思想複雜的文人，因爲後者們有心將他們的理論推進到了各種極端的結論，即使這些結論是不稱意的。即在一九二八年，這些領袖還是聚會於柏林或慕尼黑的簡陋公寓中之小幫的朋友。不過，他們的物質上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轉。到一九二九年秋天，希特勒便離開他的簡陋的三間房間的公寓，而遷入比較舒服的九間房間的公寓，即位置於巴伐尼亞首相公署的對面。

當初，國社黨是那些小資產者爲使工人得到國家主義思想而創立的一個政黨。希特勒原同愛加爾和特萊斯勒一樣，是由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到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很愁悶的看到德國資產

階級是一年比一年無產化他說道：「在這一點上，大錯已鑄成了，大眾可以自信了。」但在斯特拉塞的團體裏面，大家不流出這種眼淚。恰恰相反，柏林勞動報卻以愉快的態度於一九二八年二月宣告資產階級的死耗：「資產者死掉了，他是裂成齏粉了。祇有到了坐在黃金袋上，他纔還可引人重視。他的存在是不復有甚意義了。」反而言之，他們伸手向共產黨人說道：

『波杜羅布 (Botrop) 與雷那 (Lenna) 的關士，慕尼黑與漢堡的關士，我們是尊敬你們的。在那個時候，或許我們的槍彈也曾加入打擊你們，爲的是我們不會知道。現在韓幕是揭開了，我們看到我們同你們一樣，過去是曾經錯誤了。』

## 五 斯特拉塞的社會理想

但是，理想是同活的機體一樣，可以進化的，而不久後，連斯特拉塞他自己也與正統的社會主義相隔很遠了。他對於我們的時代這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所與的答覆或許可以概言如下：強迫的勞動加上軍事服役便是社會主義。他於一九二六年在國社主義通訊 (NSDAP)

tionalsozialistischen Briefe) 上，要求每個德國人爲國家服役一年，這一年的時間不是用於建築道路，但用於學習一種技藝。最良好的德國人當自願編入軍隊，而這些戰士在選舉時候將有二十倍的票之權利。因爲斯特拉塞是深刻的承認人類之不平等；在他看去，軍人是最值錢的。平等的謬說，是在文化上構成致命傷的威脅。事實上，人類生來便是不平等的，他們彼此間的不平等是因生活而格外深刻，他們在社會裏面和在國家裏面所處的環境也是不平等，這是合於自然的。

逐漸一步緊過一步，在國社黨內部現出有兩種敵對的性格彼此鬭爭。即在反猶太主義這一點上，它們兩方的觀念也彼此不同。在一九二八年，談到猶太人身上，希特勒甚至於允許說：「假定他們行動端正，他們可以留下；不然，就趕出去！」靠着這個宣言，整個的猶太人問題可以有一天不動聲色的清理好了。然而這便不是斯特拉塞派的主張，後者在幾個月後宣佈說：「徒事叫囂的反猶太主義是死掉了，曾被制服的乃是一種擴張的恐慌。猶太人的怨恨之幼稚的運動，不十分可靠的出版物（顯明是指西溫長老議定書而言的）都是屬於過去的了。一種新的反猶太主義正在產生出來。反猶太主義萬歲！」那裏面好像是對希特勒發出一個警告：不要因爲一時之空虛的敢

治上成功，而放棄猶太人的怨恨。

## 六 反對因果律的政黨

與希特勒的機會主義和無準確之學理的政策相對之下，斯特拉塞派，靠了幾年的努力，構成更合理的和鼓起熱烈情緒的一種學理系統。但後來收穫這種知識上努力的結果者，卻是希特勒，因為靠在斯特拉塞派，國社主義得受德國青年之廣大的歡迎。

至於希特勒，他是像酒店的演講家那樣，叫學生們留心反對「藝術的鮑爾雪維克主義」他說：「在我看去，一段簡單的德國軍隊前進曲，是強過一個多音的樂隊所奏之一切妄誕的音調；這些人應當送到療養院去；我們是向以下賤的穢物獻與我們民族之無恥的猶太編曲家、詩家、和畫家屈膝投降啊。」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實向早經消滅的表情派提出已晚的抗議，而北方人則極力創造一種新的思想方式。在一九二九年秋天，物理學家愛爾文·施羅丁格 (Erwin Schrödinger)——新式燙髮機的發明者之一——曾表示懷疑因果律在物理學上的價值。斯特拉塞立刻在柏

林勞勳報上宣稱說：是的，因果的觀念是被消毀了，信仰定數與一現而不再見的現象是從新壓到一切了，合理的宇宙論是趨於沒落了，這不僅在物理學上爲然，而在人生所有各方面也無不如此。在推想已告失敗的地方，心靈應當出來干預，並且須以情性替代邏輯。是的：『國社主義乃爲反對因果論之最可畏的武器。』

這一篇文章的題目是叫做「無教育狀態萬歲！」

## 七 選舉人之蔑視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在召集於慕尼黑的國社黨全體大會中，發表一篇非用以感化選舉人之輕蔑的演講，他說：「我們要將歷史的少數人攙合起來，他們在德國大約含有六十萬到八十萬人。到我們使本黨取得這些人時候，我們同時將在政府裏面獲得最優勢。然而羣衆如果大聲吶喊投入我們懷中，這反而對我們有壞處。所以我們要將黨員與參加者分開。後者構成全部的德意志人民，黨員則在六十萬到八十萬之間。祇有後面的人數是有價值的；其他人祇須到我們列

隊前進時候纔可加入裏面；他們不過是單純的單位；而不是個性的單位，其數目不過在投票的結果裏面發生效力而已。」

雖然有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不利，希特勒從這年九月普魯士政府從新許他公開演講後，發言比較取慎重的態度。德國衆議院院長社會民主黨員羅博（Loebe）也在講臺上贊助解除禁止的命令；他說大家不應對待一個曾經持槍四年捍衛德國之從外國來的德國人，比較對待德國境內的德國人，更要劣壞。

#### 八 國社黨與國防軍之再度齟齬

公開演講的禁令解除後，國社黨與當局的關係應當可以相安無事，設使斐佛不會以他所使隊伍操習的軍事訓練從中擾亂。在一九二八年九月的全體大會中，希特勒曾努力慰藉那些不滿意的黨區領袖，使他們明白他需要挺進隊作爲他之威力的工具，藉以保障黨的統一。但他又對他們講述許多迷人的話；其實，在斐佛的領導下，挺進隊卻是擾亂這個統一的。猶同過去的羅姆及猶



同所有其它軍人團體的領袖一樣，斐佛所期望的乃是一個秘密組織的軍隊。在右傾的政治領袖之中，希特勒幾乎是對於這個問題持相反的意見之唯一的人物。

他於是宣稱：「國社主義者絕無任何理由可為現政府效勞，即使為後者略動小指頭也都不可。唯有為我們所努力的新的德國政府纔可要我們為之效勞。因為同樣的理由，我們的挺進隊份子祇可擔任保護有利於這個新的德國政府的宣傳，並且它本身須自命為這個未來的國家之宣傳者。」

這個原則，後來經過各次通告的傳釋，竟在黨中受了反叛祖國的指誦。

希特勒的新宣言在挺進隊的組織中，曾發生了最重大的糾紛。他本人盲目的認定他的訓令所證明挺進隊的非軍事性質是無可懷疑的。然而斐佛實則繼續發出確實包含軍事性質的命令。其結果則使希特勒同他的奧沙夫在法官面前爭辯以求決定誰人應該統率挺進隊。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挺進隊有些份子以擾亂治安的罪名被傳到施衛特尼斯 (Schweidnitz) 法庭。政府律師指出斐佛的通令裏面有明白的提到 S. A. 隊 (挺進隊) (Sturmabteilungen) 的名稱，作為

犯罪的確實證據。各被告答稱這些通令是無任何價值的。希特勒與斐佛都被傳作證人。希特勒肯定各被告的意見，他并且宣稱這些通令曾經撤銷，S. A. 隊是改組為保護隊(Schutzabteilung)。可是斐佛則加入發言，他用一種勉強矯飾的怒聲抗辯說，S. A. 隊絲毫不願作異於挺進隊的解釋；至於成爲問題的通令則是始終有效的。

斐佛露出壞過羅姆的面目，希特勒老早便想將他排走。希特勒於是同他的老朋友羅姆重復攜手，羅姆則已於一九二八年十月在一次國社黨的會中受了莊嚴的歡迎。他在這次會中發表一篇演說，在演說裏，他禱祝『偉大的時期早日降臨。』希特勒便想立刻將挺進隊的指揮權交還他，但羅姆卻有點謹慎，寧願再等候一下，到一九二九年，他接受了玻利維亞國軍隊裏的一個職務。而在一年後，他便回國，替代斐佛而充當挺進部參謀部長（即事實上爲最高指揮官）。

其實，關於挺進隊之運用的問題，希特勒與斐佛間所發生的爭執，是根本基於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以來，國社黨與國防軍間之不甚友好的關係。在正式上，國社黨與國防軍是彼此不復相識的，雖然希特勒，在受審叛國罪狀中所發的最後演講裏面，曾表示國社黨與國防軍總有一天

在共同的旗號下重新共同奮鬥的希望。在國社黨人目中，國防軍軍部儼爲十一月共和政府之真正的支撐者，並且被認爲比普魯士社會黨內閣還要危險的東西。加之，在維謨（Vehme）的政治暗殺兇手的審判中，國防軍軍部拒絕承認在各犯人中有軍人，因此，它便與黑色的國防軍脫離了，或至少與它的方法脫離了。在這個案件中，有一次在一九二八年審判，主要的被告亨斯中尉以殺人罪被判處五年監禁。但在一九三〇年年頭，他即被赦免了。雖他於一九二七年以反叛的緣由被開除黨籍，希特勒則以莊嚴的形式使他恢復入黨，並使他充當國會議員，而不久復使他充當西勒西亞挺進隊首領。國防軍軍部則公然憎惡國社黨，目它爲「以激烈手段推翻德意志帝國之立憲政體爲目標」的。

## 九 「施萊轍應上校刑臺」

所以，希特勒決定了抓牛先執牛耳的辦法。他便於一九二九年做了一番有計劃的宣傳，目的在重新把握國防軍的心靈。當挺進隊份子——或許不會得有希特勒的同意——正在與進入軍

隊之舊日同志重生關係，暗中向後者遞送報紙和傳單時候，希特勒在他的演講裏面直接向軍部的人物說了下面的話：

「將領先生們，」他於一九二九年大聲喊道：「靠了十萬人，我們當然不能同外國作戰，但總可以全部改變社會狀態。此後，到底是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當權呢，或是我們在德國當權呢，這個問題一部份是靠於軍隊的。假定是左派勝利的話，那麼，你們頭上可以戴上佛利佔帽子（譯者按：Bonnet Phrygien 爲法國一七九三年第一共和時代所帶的紅帽子），而軍官們都變成了警察的代理人。」希特勒這樣的哀求各將領與國社黨恢復關係。然而，在同一天，斯特拉塞在國會裏面支持共產黨人所提出反對國防部部長格羅勒（Gröner）之不信任的提案，他加入討論的結論是這樣說：「內閣裏面的將領是太多了，如施萊赫（Schleicher），如斯杜爾納格爾（Stulpnagel）等等，在班特勒街（Boindlersstrasse）代表現行的體制，而革命的國家主義團體的真面目是完全暴露出來了……我們努力鬪爭，以求總有一天成立一個高等法庭來判處所有這些出賣德意志民族的賣國賊，他們破壞了德意志民族的軍事的威力，並且減退了他的好戰的意志：大家把

他們絞死罷！

這些兇野的呼聲，從國會中十二議員的一個小幫之領袖口裏吐出，在那時候，實不能使任何人恐慌——假定有的話，便是希特勒了。斯特拉塞想絞殺這些將領，而希特勒則想以溫言好語誘惑他們，因為希特勒深切理會國社主義的勝利須靠於他們的好感。若無國防軍的援助，便無第三德意志帝國（Das dritte Reich）了。

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後，國社黨人類似淪於黯淡的境遇和淪於本世紀初年他們的反猶太的先進所處的一種有點可笑的境遇。至少，他們的敵人是這麼相信着。因為後者祇根據了希特勒所遭遇的失敗；然而不會想到共和政府雖然表面上是登峯造極，但無形中是坍塌了。



## 第十一章 一九三〇年

### 一 共和政府之傾頹

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後，在各大政黨之間，發生很滑稽的和層出不窮的談判，其目的是將內閣交與選舉中佔勝利的社會民主黨，但同時選舉失敗的政黨領袖斯特萊斯曼，又可保留外交部的地位。欲求適應那時所謂議會政體，唯有根本上主張相反的三個政黨聯合起來，纔是可能的辦法。

照這個辦法而成立的海爾曼·穆勒（Hermann Müller）內閣，一開始便因中央黨之不信任的態度而感受痛苦，中央黨是反對斯特萊斯曼的外交政策的；它的新領袖嘉斯（Kaas）和布魯寧（Brüning），預料到意見的改變。社會民主黨雖然在選舉鬭爭中得到燦爛的勝利，但在當權時候僅受到不利的結果。牠從前內閣手裏受了不愉快的遺產：牠不能不同意建造一艘新軍艦，

雖然在選舉競爭時候，牠會激烈反對恢復軍備。加之，在牠統治之下，德國是處於財政困難的壓迫中；固然其罪原是屬於前內閣的，前內閣曾增加公務員的薪俸而大大增重了國家的負擔。不過，假定可怕的經濟恐慌的先兆不會現出，那裏面的困難還不至到了這麼重大的程度。經過一九二七年的貨幣跌價和有着失業人數的增加，內債的負擔開始落在德國經濟界身上。到了外債的來源完全斷絕後，道威斯計劃所定的分年清償的辦法，便現出是不可能的。到一九二九年八月，法哇格 (Favag) 事件便爲一批經濟大破產的事件之發軔了。

不僅是共和政府日趨於衰微，各個政黨也是這樣，牠們一向是處於共和政府的敵人地位，如維斯達布 (Westarp) 伯爵所領導的德意志國民黨便是一例。但是在投票贊成道威斯計劃之下，這個政黨在某種情形中是將威馬爾憲法的政府架在肩上。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中，牠遭受慘敗，便是他的罪過受到深重的處分了。到了牠的黨員，國會議員蘭巴克博士 (Dr. Lambach) 發表一篇不敬皇朝的文章，黨的真正主人翁『報業和電影業大王』胡根堡博士 (Dr. Hugenberg) 一直到那個時候，他是站在後臺裏面的——便堅要開除蘭巴克的黨籍。胡根堡一上政治的前



臺，他便決計站着不動，而到了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他便被選爲德意志國民黨的首領。

## 二 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

胡根堡使他的政黨脫離了純謹的在野黨和準備與政府合作之立場，而轉入現政府之無可和解的和激烈的敵人的營壘裏面。因爲這樣做法，他失掉一半的人數，但他仍然是不在乎的；他寧願維持一小批意志堅強的國家主義者，而不要一大幫不凝結的溫和者。德意志國民黨議員班格（Bang）爲與希特勒和胡根堡兩方面均有關係的朋友，他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後，便於他們兩者之間成立初步的關係。祇要有一個機會起來，右翼各政黨便可聯合前進。胡根堡正在尋求一個口號，而希特勒運動之不能成功也是因爲缺少這個口號而受到重大的阻礙。

機會不久便產生來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在巴黎所經過的談判產生了世人所稱爲楊格的計劃。這個計劃是被德國大工業界所反對，後者的代表伏格烈博士（Dr. Vögler）在巴黎與他的同事沙赫德博士（Dr. Schacht）發生意見而辭職去了。但是，因爲外交上的關係，德國政府不欲

聽任談判失敗，它便接受沙赫德所得到的結果。

德國工業界之反抗，實在國內造成一番激烈的騷動。可是，這個工業界從前曾接受道威斯計劃；隨後又曾擁護羅加諾的政策與加入國際聯盟會的政策；斯特萊斯曼並且是靠它來支持的。然而這個擁護力卻與時光同時消滅，到了社會民主黨入閣後，牠反一變而為坦白的反對。到現在，工業界則直截起來反對巴黎計劃之執行；國社黨便充當抵抗的工具之一了。

當然的，國社黨人不願意露出充當隨從附和者與服從一個口號的態度。一從楊格計劃的結果披露後，斯特拉塞便要求從新選舉國會，並且極力抨擊競爭人胡根堡。至於他之所以要採取這些辦法，其理由是因為胡根堡曾向希特勒要求國社黨排除斯特拉塞的社會主義以及費德之反對有利貸款的學理反對論。斯特拉塞在他那方面做搗亂的工夫，而希特勒則與胡根堡訂立同盟。希特勒之決心採取這個步驟，心中並不是願意的，因為有了這個辦法，他便放棄了使他的部下久經慣處之傲慢的孤立地位。說實在話，他最初實不願意加入胡根堡所創立的「國民總投票委員會」；但不久後他便認識國民總投票可以使他不費一錢而坐在胡根堡聯合團的列車裏面，並且

可以爲他自己的利益而利用這個可驚的宣傳工具。

### 三 國社黨之因胡根堡的援助而強大

「德意志國民反對楊格計劃與戰債謊言總投票」在事實上爲工業界領導者方面之反對斯特萊斯曼的外交政策的一種反抗行動。希特勒一向不斷想法與這方面發生關係。現在他於愛彌爾·基爾多爾夫(Emil Kirdorf)老頭身上得到一個贊助人與朋友——基爾多爾夫擁有供給政治活動之強大的財政能力。鑛業界所付與國社黨的補助費，是到一九三二年春天，經斯特拉塞做了一篇過於反資本主義的演說後，纔停止支付，但停止的期間也很短。在爲國民總投票而奮鬥中，胡根堡——並不缺少某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用盡他所有一切強有力的技術方法來活動，雖然他活動的結果並不使他的政黨，而使國社黨得到利益。胡根堡的聯盟與工業界的津貼，實使國社黨各演說家的呼聲得以驚震全國，遂使一年之後，他們可以得到六百萬選舉人的聆聽。總投票的建議是恰好可以通過；在最低限度所需要的百分之十的票數上，牠僅得到百分之

十·〇六的票數。國民表示不贊成的票數祇有五百八十萬票，即勉強有着必需的總數中之三分之一而已。這次是全部失敗了。

當奧登堡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簽署楊格計劃時候，羅森培便在人民觀察報上寫道：我們不懷任何情感的宣佈說，奧登堡大總統是脫離德意志而選取楊格殖民地了。所以復興的德意志也脫離他了。『斯特拉塞在議會冷酷的宣佈說：『我們將向未來政府的高等法庭要求絕對蔑視德意志生命的需要而簽訂楊格計劃的那些人們的頭顱。』』

總投票是失敗了，然而靠着胡根堡，國社黨遂成爲在全德國內爲人所最稱道的政黨了。不過是，它之能夠維持它的盛名，實賴於它本身的毅力。從一九二九年秋天到一九三〇年九月，它做了一番不斷開會的運動，其它政黨，則僅於選舉時期中，纔有這種動作的習慣。在這樣活動當中，它展開這種雷厲風行的活動力，使飽擁票數與位置的敵人們爲之震懾。飽腹者不知道羨慕，懶惰者不知道活動，醇謹者不知道冒險。

#### 四 同盟乎革命乎

一九二九年五月，在薩克森邦議會的選舉裏，國社黨已經可以登記一次盛大的成功：它得到倍於一九二八年所得的票數。這次固然祇給它五個議席，但在同年年底，它於屠麟根得到六個議席。黨員的數目也按照比例增加。在一九二九年中間已經到了十二萬人，而在一九三〇年三月則加到二十一萬人。

國社黨之得到這種成功，大部份是由於希特勒採用借自資產階級政黨的一種宣傳方法：參加政權。薩克森選舉得到勝利後，希特勒立刻主張一個國社黨議員加入政府裏面。

格烈戈爾·斯特拉塞便起來反對這個策略。他說：我們不要放棄禍變的政策，因為唯有禍變纔能為國社主義開闢一條道路。

然而希特勒堅持他的主張。可是他的企圖是失敗了，德意志人民黨卻拒絕國社黨人的建議。到一九三〇年一月，國社黨人在屠麟根得到更佳的成绩，於是國會議員佛力克成為德國所

未曾見的第一個國社黨的部長。佛力克在服從希特勒的訓令之下，不僅自甘作一個緘默寡言的工作者，他反而使人極力談到他身上。一個敵視憲法的政黨黨員，竟然在德國之一個邦內掌握警察的大權，這一個事實便足影響羣衆的精神：成功便可引來同情心。果然，佛力克之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就任屠麟根邦內務部長實爲國社黨之最妙的宣傳。他在各學堂的課程裏面加上國社主義的禱文，而遂與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塞維林（Severing）發生尖銳的衝突；靠了這件事情，屠麟根的「國社黨政府」遂天天在全德國內成爲談話的資料。命運又是有利於佛力克的。到四月底，塞維林與社會民主黨內閣同時下野，而他的繼任者徹爾特博士（Dr. Wirth）不再繼續鬭爭。這次戰勝「馬克思主義的部長」的結果，當然要引起資產階級對國社黨人的新的同情心了。

這樣，屠麟根的試驗得了與斯特拉塞兩兄弟所期待的恰恰相反的結果。格烈戈爾·斯特拉塞的表示是比較聰明些；在反對參加政府之下，他並不超出慎重的範圍。反之，渥托·斯特拉塞則竟然在寄與國社黨所有一切有勢力的黨員的通告書裏面，大肆抨擊佛力克之參加政權。這便是

決裂的行動了。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在歷時幾個鐘頭的一次辯論中，希特勒硬要渥托·斯特拉塞解散他的『鬪爭出版社』。斯特拉塞加以拒絕。於是希特勒委任戈培爾『清除』柏林黨區。戈培爾之得驅逐渥托·斯特拉塞及其所有的黨羽出黨，實自己十分感覺愉快。格烈戈爾·斯特拉塞雖然與他的兄弟心意相通，但卻表現出一種可嘉的屈服態度。六月三十日，他辭掉鬪爭出版社的各刊物編輯，並宣稱他要嚴重責備他的兄弟的態度；至於他自己，將來和過去一樣，始終爲亞多爾夫希特勒先生之忠實的信徒。

鬪爭出版社仍然握在渥托·斯特拉塞手裏，但受了國社黨的抵制，牠繼續傾倒下去，而戈培爾的『干預』週刊則變成日報了。渥托·斯特拉塞隨後便同幾個朋友組織一個革命的國社主義黨，名爲『黑色戰線』，但它不曾獲得任何政治勢力。

渥托·斯特拉塞儘管宣告：『社會主義者脫離國社黨』，但實際上，很少國社黨人跟他走。大堆的信徒都以無所可否的態度聽取對於國社黨的官僚政治之暴露，至於希特勒所資以約束各

首領之形體上的附屬，他之比桑丁（Byzantin）式的專制，以及「社會主義」觀點的爭論，都絕不使他們感覺興趣。

## 五 挺進隊之叛變與斐佛之下臺

渥托·斯特拉塞之被開除黨籍，實為柏林黨區領袖戈培爾博士同時對於格烈戈爾·斯特拉塞的勝利。後者之獨立的地位——鬪爭出版社——是被破毀了。格烈戈爾·斯特拉塞固然始終為「組織部長」，便是說，地位僅次於希特勒之國社黨的頭一個人物，但他總覺得自己不過是希特勒的政黨中諸首領之一，而不是國社主義運動的首領，他對這種信念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即使這樣，滿足他的野心的希望，仍然是很夠動人的。到有一天，斯特拉塞做了總長——在希特勒心中是覺得沒有這麼容易的——在那時候，斯特拉塞的時期是到了。

不久後，戈培爾再度受了運命的庇護：經過柏林的挺進隊叛變後，斐佛下臺了。渥托·斯特拉塞之離黨，曾在挺進隊的份子裏面激起某種騷動。固然，挺進隊份子對於希特勒的社會主義是否



有鮮明的色彩是不大關切的，但斯特拉塞之暴露國社黨的「寺廟化」與慕綠的事實便引起紛紛議論。有些挺進隊的份子是不滿意的，因為人家沒有提出他們做國會選舉的候選人；他們的部屬，也訴說在選舉時候會擔任極辛苦的工作，而結果沒有得到金錢的報酬。到八月底，挺進隊公然罷工，不到柏林體育宮去擔任在那裏所開的會裏的警察職務。保護隊不能不立刻去代替挺進隊，而挺進隊便去佔領柏林黨區辦事處，在那裏大肆劫掠，並向戈培爾施行侮辱的行爲。有人並且和保護隊開槍互擊，戈培爾便不冒險親身走近叛黨身邊。希特勒不能不自己到柏林來；他起初神經大受刺激，但很快的壓制着而恢復了向挺進隊發言的力量。他從這間酒店跑到那間酒店，痛哭流淚而懇求他的年輕部下不要在關鍵的時期中對他反抗。但金錢是比眼淚還多效力；希特勒向每個黨員徵收二十分尼的特別捐，將入黨費增加一倍，提起地方支部的選舉準備金之半數，交與挺進隊應用。從此後，挺進隊的人物便不是爲着純粹的理想而盡他們之辛苦的任务了。

在普通的軍隊裏面，叛變行爲須受死刑的處分，至於不能制止叛變的長官，至少也要受撤職的處分。希特勒祇能採取後面的辦法：他便趁這個機會而排走作障礙的斐佛。後者是在百番謝勞

之下被免職了，他繼續居住慕尼黑，身受各種的光榮與金錢。希特勒則自己充當奧沙夫，便因此將文武大權歸隸他一人身上，而成爲國社黨之絕對的皇帝。不過，他總不能實際的擔任挺進隊的指導權。那裏面須有一個參謀部的首領。戈林會自己提出做候補人，並且有戈培爾爲之擁護。但希特勒卻選上羅姆，後者已從玻利維亞回國。

## 六 穆勒之坍塌與布魯寧之錯誤

所有上面那些禍變，都不會制止國社黨之勝利的進展，也像幾塊小石頭之不能制止大瀑布的傾瀉一樣。到四月底，穆勒內閣辭職下臺，而德國最後的共和制政府也同他一起坍塌了。穆勒下臺的藉口，是因爲關於失業保險的預算案裏面的一項，其中含有七千萬馬克，社會黨與人民黨彼此發生意見。後來，有人便說社會黨方面誤於這麼微小的意見上面，便將政權放棄了。其實，那裏面錯誤的原因實不在此，實由於社會民主黨過於採用寬大的政策，計較各種瑣屑的問題，懶於辦理宣傳的工夫，並且始終運氣不好，遂至式微不振，而不足爲人所畏懼。奧登堡總統好久以來曾表現

對於普魯士首相渥托·布勞恩 (Otto Braun) 懷有一種友誼的敬意，但忽然表示了比較冷淡的態度。他和右派幾個直到那時尚站在第二位的政客發生關係，便如德意志國民黨之特尼維拉律斯 (Thevianus) —— 胡根堡 的政黨之投降者 —— 和中央黨的領袖布魯寧 博士。穆勒 內閣除了使他簽署楊格計劃 外，再也沒有比較好的辦法可以貢獻，這便不能使他對於穆勒 內閣另眼看待。從斯特萊斯曼 於一九二九年十月死了後，外交政策在庫耳齊烏斯 (Curtius) 之謹慎的傳統政策和中央黨之樹立一種「新動力論」的意願所拖曳之下，實際上是羣龍無首的現象了。

在穆勒 辭職後，大家看到新內閣已經在總統府的夾套裏面排佈好了。奧登堡 元帥任命布魯寧 博士出來組閣，後者便向他呈上一個不包含社會黨黨員的內閣。布魯寧 在議院裏面不曾擁有多數，但祇懷着一種希望：得到脫離胡根堡 而稱爲人民保守黨並受特尼維拉律斯 領導的德意志國民黨 人的擁護。他想在衆議院裏面發出一種主人翁的口吻，而且在兩個相對立的而力量又很相等的戰線中間，樹立一個現實的和專斷的政府。擔任向右派的選舉人闡述這個政策者，乃是特尼維拉律斯；他以藉強力來治國的政府勇士自居，以爲可以擔保得到廣大的擁護。

可是，布魯寧的錯誤便是在這一點上。政府的更動實使民衆對一切統治者更表示不信任的態度；民衆不注意新的狀態，而祇注意着舊的狀態之崩潰。布魯寧便遇着極其不幸的開始；他解散國會，並向民衆聲述他願藉緊急條例以治理國家。特尼維拉、斯奮身投入選舉的鬭爭中，而擁護保守的理想。政府之辦理宣傳，再也沒有比這次更見笨拙的：牠不以麵包買好人民，而卻對他們談其所不認識的各種理論。各個演講者徒斤斤計較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議會主義等等，自以爲選民是反對德謨克拉西的。然後者們祇是反對捐稅和失業的。

可是，布魯寧也十分了解下面這個事實：假定重伸老套的許諾，這次新的選舉戰便不能勝利。其實，一部份「現實主義的」選民，從前原有以投票換取物質利益之許諾的習慣，現在卻是厭倦了。他們漸漸產生了任感情，或即是候選人的身份，來指揮的習慣。然而布魯寧及其同黨，則不能觸動這種情緒。

## 七 打倒政治

希特勒則又當別論了，所有各政黨都用它們的鬭爭口號：『打倒馬克思主義』而將選民趕向希特勒方面去了。後者了解民衆對柏林所施的政治之厭倦：『我們的整個公共生活遭受了一套人造的分崩離散的即錯雜化的行爲，』他對好斯敦的農民大聲喊道。『這個公共生活，實被人們故意的形成那麼錯雜的狀態，特別使廣大的民衆不能夠看出什麼東西來。各種思想是被人故意弄得淆亂不清，這些人所抱的目的是攪亂好幾百萬人的純潔的和自然的判斷力，遂使後者不知道怎麼樣行使他們的投票權……』這些話似乎深入人們的心坎，也好像吐出希特勒本人所感受的苦痛——他曾忿然揮走一張報紙，因為裏面所登載一段議院開會記錄是用了許多數字而使他無法可懂。

同時，他使大家明白他本人也是一個簡單人，而不是一個職業的政客；卻實爲絕不尊重柏林現政府之錯雜的技術的簡單人。選民們當然認定複雜的政治事件很可以大見簡單化，假使人們在那裏面運用良正的意識；他們對於希特勒之披露他們所固有的信念，當然表示感激了。好久以來，他們便有着指導階級應由下層人物來更替的情緒。

在有一個時期中，所有其它各政黨都想獲取最大不過的利益而後收受政權；在要求政權的全部責任之下，各個新的領袖實使人產生重大的感想。

這些領袖便鼓起態度冷淡的選民來參加政治，即從前之不投票的那一大堆的選民。所以有人說希特勒會使這些態度冷淡的人們「政治化」了。然而「政治化」是代表什麼意義呢？便是說領導他們到投票區去嗎？其實，他們之到投票區去爲的是反對政治，他們實會使政治「非政治化」了。

這部份反對政治的選民大眾，祇能被國社黨人吸收去，後者是唯一之不贊成複雜的。無論如何，選民不會跑到德意志國民黨那邊去。不但是因爲德意志國民黨已經統治過了。他們所做的情比別人還要壞：當布魯寧內閣出席國會時候，胡根堡曾投票擁護，因而挽救了布魯寧內閣的命運。胡根堡是被迫而不得不如此的；在那個時期，德意志國民黨還不敢反對被總統喚來抵制國會的政府。爲着這次投票，胡根堡是似乎同意楊格計劃的；事後大家也談論德意志國民黨之殒落了。

## 八 國社黨之藉「平民」的擁護而勝利

在這個時期中，趁布魯寧政府之錯置失當而發起選舉戰的機會，國社黨在國內開展它的活動。約從一年以來，在每個鄉村裏面，都有着一個國社黨的公告牌永遠掛在公倉門上。國社黨實爲以熱烈的宣傳號召全國和不斷開演講會之唯一的政黨。斯特拉塞則組織鄉村宣傳。他們富有金錢；各人可無須節省，而在其它政黨的演講者看去，在選舉期中所盡的任務，實爲一種很勞頓的老套和辛苦的義務；在國社黨人看去，則爲一種娛樂。一年來，希特勒的政黨認爲選舉戰是從未停止而大肆活動。

到了真正的選舉運動開始後，希特勒計算可得五十個議席；到了選舉結束時候，他的腦筋改變，而便大膽的希望可得八十個。幾乎全部的新選民無疑的可以投票擁護他，因爲其它政黨從他手裏乘虛搶走，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實。同樣，大部份首次投票的青年，一定跑到他這方面來；共產黨雖然因經濟恐慌而增加它的煽惑力量，但它缺少了良好的領袖和目標。資產階級的各政黨裏面

包括德意志國民黨，必定要失去許多票數，而得之者當不是社會黨。

這樣，從資產階級各政黨手裏搶取票數果然可以成功的話……譬如，新國會假定增加了五十個議席，國社黨便可在這五十個中得到四十個；假定增加的議席是八十個，它便可得到六十五個。如果它又從資產階級各政黨手裏取得很多的票數，那麼，國社黨的大勝利是可能的。關鍵是在於向不投票者下動員令之是否成功。

動員令是成功了。議員的數目從四百九十名增加到五百七十七名；便是說，新選舉人有了四百六十萬，他們要選出八十七名新議員。右派資產階級各政黨受到重大的損失，即如德意志國民黨幾乎減少一半；德意志人民黨減少了三分之一；有幾個議席是被社會天主黨及其它小黨所獲得，但右派各政黨總共失去二十四個議席。因此，空出來的議席，有一百一十一個，而大部份是歸於會向四百餘萬新的選舉人下動員令的政黨。在這一百一十一個議席中，國社黨人得到九十五個，而他們便以一百零七名的數目進入新國會。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的神祕，便是如此了。



「如果有一天羣衆大聲吶喊投入我們懷中，我們將要失敗了，」希特勒在兩年前曾這麼說。然而，他們現在投來了。而且，不僅是他們已經這樣做了，但還有一個問題：他們爲什麼這樣做，這些問題實使國社黨發生憂慮。挺進隊爲信念所驅使，盲目的不顧生死而前進。可是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六百四十萬選民，並不是爲着熱烈的情緒而投國社黨的票，而卻是爲着厭惡趨於崩潰的共和政府的緣故。這些心裏懷着厭惡情緒的人們，過半數原是直到那時候不理政治的，他們便可以確實代表最好的德意志嗎？



## 第十二章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

### 一 希特勒之站在反政府的地位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國社黨已經成了政權之一要素。現在的問題是在於靠着它來攫取政權的本身。

在這一點上，希特勒具有幾個可能性。他可以，比方說，加入右派政黨與中央派政黨，即布魯寧的政黨，所組織的國會聯合戰線。或許佛力克就做了內務部長，戈林就做了航空部長。那個時候的德國當局，還可以支配許多部長的位置，藉以滿足一個尋常的新進者的願望。

然而希特勒卻始終忠守他於七年前在莊嚴的一剎那裏所宣佈的話：在他眼中，一個部長的位置實不值得覬覦的。他不願意參加政權，但要人家以船舵付托給他。從他有着使敵人因精神墮

落而失敗的充分希望以來，他便完全放棄了從前之突擊的策略。

## 二 撲滅法蘭西

經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總選舉後，龐大的國社黨之出現，實使德國國內與國外的各界大起影響，其程度是好像一個素昧生平的人穿着奇怪的服裝不經傳達也不被邀請而昂然進入全場滿座的大廳裏面，那時所引起大家的驚愕。還且不僅如此呢！這個怪人口裏說了一套幾乎無一人懂得的話。所謂的輿論，在這個情形下，纔相信它自己直到現在都不會注意到這個應予注意的運動。可是，六百四十萬德國人則相信認識國社黨很清楚而認為足使他們投票與以擁護。

這些人之投票擁護希特勒是基於一種激烈反抗現狀之共同的情緒與乎千種各不相同個人的理由。幾乎是每一個人對於希特勒的政綱，都有不同樣的見解，為的是沒有一個人會正確的認識這個政綱。這一點對於希特勒是有着一番大利益的，但同時又是一種重大的負擔。現在希特勒須逐漸找出一個真正的綱領，以替代那個無價值的二十五項綱領。他絕不能廢除這二十五

條的主張；反之，在形式上，牠們始終是有效的。到希特勒逐漸接近了政權的責任，他便聚精會神向德國之領導的和有責任的各界，提出一個可以被人接受的政綱。這不是一下子做成的，乃是一步一步流露出來的。

頭一步他先更正他之外交政策的綱領，或可以進一步說，改裝這個綱領。當選舉戰勝利後，許多外國新聞記者找他談話。特別是，在與羅沙邁爾爵士（Lord Rothermere）——英國大報業家——談話當中，他闡發了一個政綱，那裏面最可注意的，是他對於法國的態度驟然大見溫和。他的口氣是不大與從前的相同了：

在我的奮鬥史的書裏面，他曾鼓勵德國的政治移向東方發展，但他要求事前應先與法國清賬：「固然因為這個緣故（侵略東方的領土），我們需要一種武力，但此外還有我們民族的死敵法蘭西，它嚴酷的扼着我們的咽喉而搶去我們的武力，我們應作一切必需的犧牲以撲滅法國人在歐洲爭取霸權的企圖。凡是認法國之在歐洲爭取霸權的野心為不可忍視的國家，牠們現在都為我們之天然的盟友。我們應當忍痛踏上接近這類國家之任何途徑，應當表示可以放棄任何權

利，祇要能夠實現打倒最殘視我們之民族的結果。」

希特勒的原書第七百五十七頁是這樣的寫着；他而且要求實現與法西斯底的意大利聯盟，目的是在外交方面着手打倒法國。但照他的信念和他的意願，這種外交戰的結果當激起大戰。因為，他於原書第七百六十五頁以下各頁裏面所確定之一九一九年後德國外交政策的工作，便是這個步驟：

「我們希望可以希望做到或逐漸消磨法國人之反對德意志民族的志願，或者有一天果然撲滅法國人這種志願，如果有特別難堪的事件發生，我們忽然轉移方面，武力對付我們的敵人，那麼，那種結果是不難產生的了。但這個辦法所代表的意義，當然是一番拼命的鬭爭，而我們若要在那裏面得到僥倖的命運，那非是充分做到使法國處於孤立的地位不可，即是使這第二次大戰不為德國與全世界對抗的鬭爭，而乃為德國因反抗不斷擾亂世界和平的法國而採取一種自衛的行動。」

「我堅持着這一點，我而且確實相信這第二種情形無論如何應當產生，並且將來必定產生。我絕不相信法國對我們的態度，會發生變化；因為牠是深深根據法國人之維持他的民族生存的

志願而發出來的。假定我本身是法國人的話，假定在我心中法國的威權之是可貴的與德國的威權之是神聖的，其程度是同樣的話，我則不能，並且也不願，作不同於克利孟梭所作過的活動。法國漸漸陷於沒落的途中，不僅因為牠的生殖率低減，而且也因為民族之最優秀的份子消滅了，所以法國之能逐漸維持牠在世界上的地位，除破壞德國外，別無它法。無論法國的政策是如何迂迴曲折，牠總望這個目標走，而這個目標實代表着牠之最後的企圖和最熱烈的希望的實現。然而，我們若相信這個目的在保全自己之純粹消極的志願可以繼續對付一種長時期積極的且其精力又絕不減退的抵抗，那麼，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了。假定我們仍然將德、法兩國的糾紛當作德國對付法國的攻擊之一種自衛來看，那麼，不但永遠沒有解決辦法，而且結果是相反的，到了幾個世紀過去後，德國的地位將一一失掉了。祇要我們觀察從十二世紀到今天德意志文字的界線是如何變遷，便可覺得直到現在使我們受過許多損失的一種協調政策和一種進化政策之成功的希望是如何微渺的。

「祇有到了德國深切明白那裏面的情形，大家不使德意志民族之生存的志願，在一種純粹

消極的自衛中，日見萎靡，但集中一切力量以赴抗法之最後生死關頭的鬪爭，而在德國方面，是抱着最廣大的最後目標，祇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纔能消滅德法兩國間之永久的而無益的對立；不過有着一個條件，即德國祇認撲滅法國爲使我們民族有向它方面發展之可能的一種方法而已。我們今日在歐洲擁有八千萬德意志人。這個對外政策的特點之能爲大家所承認，須到了在百年內有二萬五千萬德意志人生存於大陸上，不像工廠裏那些苦力，一個擠着一個，爲世界之其它部份人做工，但須像在彼此互助下而以勞動維持生活的農民和工人。」

照這樣說，德國之最後的目標是在東方，但德國之最大的政治活動應從撲滅法國下手。這便是一九二六年在鄰近柏克特斯園的一間小房子裏面，一個無勢力的政黨領袖所作的感想。反之，到一九三〇年，未來的國務總理再沒有擁護他從前所持之意見的勇氣了。孤斯塔夫赫爾維（Gustave Herve）曾於寄給他的一封信裏，做了德法協調的幾種提議，希特勒便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的人民觀察報裏作一篇文章來答覆。

他說：在德國沒有人不希望德法關係好轉，而他本人的心緒也是如此。德意志人民實希望過



和平的生活而且與一切文明的國家發生友好的關係。

撲滅法國的問題再也沒有了；永遠的對立，兇殘的仇視和清算無可避免的賬，這些字眼再也不提了。從這個時候起，國社黨人自願保持和平的口吻。當羅森培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似乎以未來外交部長的資格，首次旅行外國時候，他在那邊保證國社黨不至與法國挑戰；照他的行動，似乎他的首領從未寫過一本名為我的鬪爭史的書。然而，不錯的，他在這次旅行中也宣佈說，國社黨人不至在德國樹立獨裁政權，但祇在憲法的基礎上樹立一個強有力的國民政府。

### 三 國社黨之放棄沒收『金融界各大王』的財產

國社黨在另一個方面，也須確定它的立場：即經濟與社會方面。國社黨綱領的主要點為費德之廢止利息貸款奴隸制的理論。這個理論之最末次的發表，是在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由國社黨一百零七名議員提出於國會并經國社黨大部份的領袖簽名的一個提案裏面。提案裏面主要一段是這麼說：『銀行及交易所的各大王，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後移入的東方猶太人，以及』

切有外國原籍的人等及其家族戚屬等等的財產，以及從上面那個時期起，因大戰、革命、貨幣膨脹與貨幣緊縮等有機會而增加的一切財產，應予無條件的沒收，而歸於德意志人民所公有。各大銀行應即刻收歸國家管理。」

某某種報紙一向是作有利於國社黨的言論，現在也不免因為這個議案而產生不良的感想。有的人極力用友好的態度勸告國社黨人不要因為表露對於經濟定律之無知識而自討沒趣，同時黑克勒（Herkner）、亞多爾夫衛伯（Adolf Weber）、愛開特（Eckert）、哥斯（Götz）各教授逐點證明在實際上這個理論是不可實現的。到了最後，這個議案撤回了。

#### 四 希特勒贊成罷工

九月的勝利後，另有一個問題，亟須解決，即國社黨對於工人階級的態度。德國資本家正在大規模的向工資進攻，於是工人的騷動彌漫全德國境內。一九三〇年十月中間，在柏林發生鋼鐵業罷工，波及十萬以上的工人。希特勒因此在人民觀察報上宣稱：在這個機會，國社黨人頭一次擁護

罷工，使德國實業界覺悟有停止過度利益的政策之必要。在這篇宣言裏面，他還引用好些粗俗的經濟觀念。

## 五 ……但同時安慰資本公司

這種鼓勵罷工的行為之使資本公司大起恐慌，當然是容易了解的。因此，國社黨的財政專家不能不急遽說出可以安慰資本家的話。退職司令官瓦格勒（Wagner）便向薩克森資本家宣佈說，國社黨指導機關不能夠阻止他的黨員參加罷工，因為果然阻止的話，工人將大批的離開國社黨而投歸社會民主黨了。這樣說話的用意，是想使資本家曉得國社主義的罷工者總比社會主義的罷工者好些。

## 六 領土之要求

照上面所說，他們的政黨經過發展後，國社黨人所走的途徑是自己先受羣衆的支配，而後輪

到他們身上來支配國家。

靠在他們之對於實際上需要的非常的意識，他們也懂得應付最矛盾的環境。在各個國社黨員中，曾經有着很多，而且現在還有着，希望將各大都市之無產羣衆移到農間去的人。這個回到農間的理想，在德國是最得人心的和流佈最廣的。然而牠專屬於城中人的理想。在鄉村裏面，移民，殖民，這些字往往是代表拍賣的理想，那是過去的有產者，經過惡劣的經濟環境後，不得不被逼而生出這種理想。在東部大田地勞動的僱農，往往寧願在歸屬於他本人的地面工作，由辛苦經營而得到固定的收入。

說句實話，希特勒從來是反對國內殖民的。他曾詳細的照自己的方法在我的奮鬥史裏予以說明。他的出發點是：德國的人口總有一天達到二萬五千萬的數目，因此需要日見廣大的可以養人的土地。而在世界上，現在還有數量非常多的未經使用的土地。他說：「自然並不會將這塊土地保留給某一種民族或某一種人種，留給他們將來在那裏面發展；這塊土地乃留給有力量可以搶牠到手與有毅力可以在那上面耕種的民族。自然是不知政治境界的。牠起初將人類捧到地球來，

而袖手看他們自由武力競爭。最勇敢的和最勤勞的人，便是牠的愛子，而且將主宰世界……；或者是宇宙受我們現時代德謨克拉西的觀念所支配，那麼，每個決定都將有利於在數目上最佔優勢的種族；或者是宇宙受弱肉強食之天然的定律所支配，那麼，具有兇猛的意志之民族將佔優勢，而絕不是自願限制本身勢力之發展的民族可以再度勝利。這個世界總有一天再度成爲人類求生存之最慘酷的鬭爭戰場，任何人不能還抱懷疑的態度。總而言之，維持生存之不可當的本能，永遠爲優勝者。在這種熱慾沸騰之下，一般所叫作的人道，原是愚蠢、怯懦、和無知識之一種混合物，將如太陽光下三月的雪一樣登時融化了。在永遠不斷的鬭爭中，人類是偉大的——在永遠不斷的和平中，人類是走消滅本身的路上去。」

上面那一段實爲希特勒累說不厭的政治哲學。不倦的提起——希特勒自己曾斷定那裏面的原則爲宣傳之第一基點——在他全本書裏，到處可以看到。在殖民問題裏，也是這個政治哲學做他的出發點：

「在我們德意志人看去，「國內殖民」這個口號的本身，已經是不祥的，因爲牠使我們益發

相信在那裏面還有方法繼續生存，可以照和平的觀念而過一種甜美的曠曠生活。果然不幸這種教訓在我們心裏發生重大效力，這便是說，我們將放棄在這個世界裏保持應有的地位之一切努力了……大家對於國內殖民政策從來沒有看清楚，第一，牠祇能救濟幾種社會的弊害，使土地不爲投機目的物，但若不擱取新面積和新領土的話，則這個國內殖民政策絕不夠保證民族的將來……民族所擁有的面積愈大，它之天然的防衛也愈強；因爲對付聚居於最小領土內之民族的軍事行動，從來能夠更快的成功，所以比較對付擁有廣大面積的國家，是來得更容易，來得特別有效力而且成功最完全……不過，如在喀麥綸（Cameroun）地方，這種政策不見得能實現，到今日，則幾乎專專在歐洲可以實現，我們必須嚴酷的和透澈的堅持這一個見解：天公必然不會立意要使某一個民族在這個地面上擁有比另一個民族超過五十倍的面積。我們不應爲政治境界的見解所迷誤，而不理會永有的權利之境界。在地球上果然有土地分給全世界人使用的話，那麼，人家也應當以生活上必需的土地給與我們。」

## 七 「聯英反俄」

希特勒對於大戰前德國的外交政策，指摘它說不會認識上面所說那種需要。照希特勒的意思，它應當侵略「大塊的，而祇是出於俄國人身上的」土地，並且「遵循古時條頓勇士所走過的途徑而前進。」

「爲實現這個政策起見，在歐洲唯有一個可能的盟友：英國。唯有在英國的援助之下，我們纔能後顧無憂而實行新的政治的遠征……爲求取得英國的好感，任何犧牲都不足惜。我們可以放棄殖民地政策和海軍優勢政策，不使英國的工業因我們的競爭而感受恐慌。唯有一個坦白的和無條件的解釋纔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放棄德國艦隊政策，將國家的武力集中在陸軍裏面。這個辦法或許要形成武力暫時受限制的結果，但是它實構成一個偉大的和強盛的前途。在過去某時期中，英國實曾準備作趨向這種意思的談判。」

這段話我們不當視爲一種簡單的研究文字，以爲希特勒在那裏面僅僅說明過去時期中會

有實現可能的一種政策；恰是相反，他實是在那上面闡明將來的一種外交政策，而以過去的色彩來粉飾而已。在希特勒的政治生涯開始的時期中，他對於俄國還不會生出這種見解。他反會認俄國人為生成與德國人和睦的民族，但做了猶太人的傀儡而已。

希特勒是有心不承認過去的錯誤的呢，還是自己忘記過去的信念的呢？但一個事實是存在：國社黨人的未來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還是和英國聯盟，不管要費那一種代價以求達到目的，必要的話，可以放棄殖民地政策和商業擴展政策。英國的友誼須成爲計算國社黨人的外交政策之實際的成功風雨表。

在這個政策上面，我們看出構成希特勒的觀念之嚴格的辯證法。但是，我們可以指點出一個事實，它可以推翻國社黨領袖的一切算盤。這個事實即是德意志人民并不照希特勒所假定的繁殖力而增加不已，而他的生殖率反而漸漸低減。照保多爾佛（Burdorfer）和埃恩斯·嘉恩（Ernst Kahn）兩人的計算，到一九八〇年左右，德國將僅有五千萬人口。這麼一來，希特勒的領土政策所根據的假定，已失去全部的價值。除非國社黨能夠藉政治的建議改變了生殖率弧線所



趨的方向。

#### 八 希特勒尊重法律之誓言

國社黨在得到那麼迅速的擴展後，便開始常與國家法律所樹立的範圍發生衝突，因此牠須尋求一個不拘如何的方法，以與支配那時候的政治生活的條例相融合。我們知道從好久以來希特勒會承認運命推動他入議會主義的路線後，是如何有利於他的。然而一般民衆對於他，還無任何認識，他們所知道的，祇有他往時會在慕尼黑幽禁政府人物與鼓動巷戰而已。但到了現在，這般民衆便於莊嚴的狀態下，知道希特勒願意嚴格的，甚至於刻板的，忠實於憲法了。

離九月選舉不久後，來比錫 (Leipzig) 法院起訴國防軍的三個少年軍官，芬特 (Wendt) 中尉和盧登 (Ludin)、士林格 (Scheringer) 兩少尉。他們三個人會與國社黨發生關係，被控有心在國防軍裏面作政治宣傳以離散後者。好久以來，共和政府之能適應環境，實賴大部份的國防軍軍官在政治上是右傾的。但現在卻發現了在少年軍官裏面，國社主義的信仰之傳佈是愈來愈

愈厲的。人們因此疑心國社黨人在軍隊裏面作有計劃的宣傳。國社黨人在那裏面博得同情，這是無疑問的。但希特勒卻堅決認為這種同情是不期然而然的，他並沒有不知道有這種同情的存在，但國社黨並不作任何不合法的運動以求博取這種同情。因為希特勒自稱為革命家，在來比錫法院審判當中，有人懷疑他所表示守法行為的保證，他便答辯說：

「再經過兩次或三次總選舉後國社主義運動便可佔有國會的大多數；到那個時候，便可準備國社主義的革命了。」

首席法官（帶點嘲弄的態度）：你說是精神上的革命啦！但若有人對這些字作了同樣的解釋；那麼，你要說道：這不是我們的錯誤。

希特勒：到了今天，德國是被各個和平條約所綁縛了。現在全部向德國立法所趨的途徑，無非是在德國人民心中確定了各個和平條約。國社主義者不把這些條約認做法律來看，但祇認為受武力所強迫的東西。我們不容絕對無罪的後幾代人民忍受這種負擔。當我們用一切方法來反抗這種狀態時候，我們是走上革命的途中了。

首席法官：也用不合法的方法嗎？

希特勒：我在事實上認為我們將得到政治的勝利。到那時候，我們用一切方法來反抗這些條約，即使有些方法，在世界的眼光中，是被認為不合法的……

首席法官（仍然帶嘲弄的態度）：你的建立第三德意志的意構是如何呢？

希特勒：憲法所規定的，祇關於鬭爭的範圍，而不涉到鬭爭所趨的目的。我們鑽進立法機關裏面，要使我們的政黨在那裏面得到最優越的勢力。到我們一旦取得立憲權到手，我們便將使國家走到我們所認為良好的路上。

首席法官（極帶懷疑的態度）：照這樣說，你祇走合法的路徑嗎？

希特勒（用乾脆的聲調）：必然的。

上面便是希特勒所作的誓言，引起大家的驚愕，並且也引起國社黨好幾部份重要份子的駭異。大家估量着希特勒果然確實獲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舉人嗎。挺進隊的幾個首領一向認為遵守法律是無用的，他們現在也作同樣的想像。大部份人是輕率的宣稱他們的「領袖」所作的誓

言不過是一種詐術，便是說，是一種僞誓。但是另一部份人很覺失望，並且追悔不會趁着良機同托·斯特拉塞撇開誤於遵守法律的『領袖』。

### 九 「砍下頭顱」

可是這種不良的印象，卻爲希特勒在同一次開審中所說的話所減輕了一部份。有人企圖使他墜入矛盾的困難地步，提起他在從前的宣言裏面曾說了『砍下頭顱』的話。希特勒對於這個威脅的口氣，同樣的知道作了合法的解釋：

「到國社主義運動得到勝利後，我們將組織一個國社主義法庭；那麼，十一月的罪人們將身受刑罰，而許多頭顱將砍下來了。」（旁聽席中大聲唱采。）

希特勒的威脅，實在德國產生重大反響，他從前所作之任何宣言都不會到了這種程度。靠着這個兇惡的影像，他使那大部份德國人之模糊不清的感覺更見顯著；即是說，開始於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是還未結束，而到這時候還未產生之一切恐怖的光芒總有一天可以補還。在資產階級的

驚異之下，一九一八年的革命黨曾放棄斷頭機而不用，希特勒則指示他將架起這些斷頭機了。或許希特勒本人，或他的同伴之一，曾在慕尼黑參加一九一九年春天所開某次大會，在那裏面，曾有一個狂熱者要求在市政廳廣場中安設斷頭機，以解決社會問題；詩家伊倫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在那時候充任人民委員，他聽到這個話，便跳起來，憤怒的說道，斷頭機是一個廢止不用的機器，不適合於二十世紀，我們是生存於講人道的世紀呢。而在這一個世紀，希特勒卻宣告殺人，而他的信徒中之因受鼓動而在風驟雨似的鼓掌稱讚，更表現出這種殺人行爲之使人鼓舞的情緒。

至關於宣傳方面，威脅行爲實發生了可驚的效果。它揭開國社黨人之兇殘的心願，而使敵人陷於一種瘋癱的恐怖狀態。在屠麟根議會裏，有一個社會民主黨議員聲訴這種殘忍的宣傳；另一個國社黨議員聽到後，便大聲向他喊道：『你的頭顱也要砍下來了。』利爾博士（Dr. von Leger）——國社黨之文化問題專家——所作的一篇宣言更充份表現希特勒的話之影響某種人的腦筋，是到什麼程度。在這回訟事發生後一年，利爾博士於干預報上敘述審判經過，談到希特勒在那

莊嚴的一剎那「傾吐非常卓絕的話，這個話實表現出我們大家心中所感想到之責罰罪人的許諾：砍下頭顱。」

在一個上軌道的國家裏，若是一個政客信口發出像希特勒所作的威脅，他立刻被人送進牢獄，特別是這個人如果又是外國人的話。然而這種結果絲毫不會發生，任何負責的機關即予以處分的思想也都不會產生。即就這種狀態而言，希特勒之採取「合法」的路徑，可以證明是如何有理由的。這麼怯懦的政府自然不免有一天受了像國社黨那麼積極的和強幹的政黨之壓迫而傾覆，即使憲法還是受人鄭重尊視的話。後來所發生的狀態便是如此。

## 十 挺進隊之再度叛變

不過，在希特勒宣言尊視法律後，國社黨內部發生了暫時的分裂。特別是挺進隊囁語議論。假定政權須靠選舉票紙方能獲得的話，隊伍不免自覺是無用的了。德國東部全部挺進隊與柏林挺進隊首領斯騰因（Stennes）上尉起來作反叛行動；戈培爾一向對於希特勒，雖然在大庭廣衆

中一意奉承，但在祕密中則懷着妬意，現在則火上添油從旁煽動。而到了勝負關頭，他又摔開他的同伴，而照他一向的習慣，藉口說他對這個同伴曾認識錯誤。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那天，德國東部挺進隊與柏林挺進隊之幾個重要的部份宣告脫離希特勒；叛黨們坦然宣稱挺進隊份子受饑寒的壓迫，而希特勒則在慕尼黑建築了華麗的宮殿；褐宮，這實是一件可羞的事情。但是，斯騰因及其黨羽之宣佈反叛，乃在希特勒已經下手預防他們及使羅姆向他們轉達免職的命令之後。這樣，一到叛變開始的時期，希特勒已微微佔了先風；幾個星期後，叛黨方面祇剩下少部份人，這些人後來投入渥托·斯特拉塞那一幫裏面。在清理叛黨的行動中，戈林曾擔任一部份重要的工作。





## 第十三章 德國政潮

革命的狀態有不同樣的表現，全看人們之觀察它是從那一邊的壁壘，或在那一個的時期。在後代人看去，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這兩年中所發生的事變，或許形成國社黨攫取政權的鬭爭史。但是編年史人，則想盡力量保全經他本人所直接目擊之豐富的歷史材料，卻認爲指示威馬爾共和政府之如何因本身的錯誤而遂至於傾覆，這個任務是更見重要而饒有教訓的。

這個漂流無定的時期所留下之確實的大獲得物，實爲戰後德國之經濟復興和牠與舊敵之和解。如果國社黨人，於利用這些當然不完全的成績下，能夠做到保持已得的利益，那麼，他們便將表現一種偉大的才能了。

在這個經濟復興中，大實業界與各工團若仍然和平的站在牠們各個的界線裏面，則政治局面是穩定不變的，即使內閣繼續更迭與社會民主黨長期堅持溫和的反對地位。實業界大資產家

佔居領導的地位，農業界對牠祇能緩緩的組織抵抗的力量；組織中等階級政黨的嘗試，經得了最初的一點成績後，便立刻逃亡無踪了。

但到了工團，特別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做了一番運動，以提高工資到已經增高之紅利的水平線，政治的緊張便開始了。便是這個提高工資的運動，格烈戈爾·斯特拉塞會想使國社主義者加入那裏面，而因此引起希特勒的指摘，說他想欺騙人民。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希特勒實很機巧的使他的政黨離開危險的地帶，為的是工業界向這個運動反攻而喊道：打倒馬克思主義！這句話正是希特勒的口號。這種彼此不信任的恐慌之開始，不久便要影響到一般的經濟界，我們可以看作故意斷肢砍腹之一種行為，資本便是用這種行為以抵抗高價的工資與重大的社會負擔。

在德國，大工業與工團間之默認的合作契約是撕破了，而到一九三〇年夏天，社會民主黨離開政府了。到那時候，社會民主黨——直到那時牠為德國之最大的政黨——便有着這個問題：牠是否站在反對派方面？然而，這便等於有着另一個問題：牠是否願意和是否能夠離開這個常權政黨之無責任的制度，即一般所誤稱為德國議會制度？牠是否應該為取得政府領導權而奮鬥呢？

——這是牠從一九一八年來所不敢做的事情。這本書不是討論社會民主黨是否應來擔負這個領導者任務的地方，但是，唯有準備擔負這個任務的政黨，纔有繼續生存之可能，這個事實是必然的。社會民主黨到了被趕到假定的反對派地位後，還是寧願繼續參加無責任政府的制度。關於這種參加的方式，他們找出這個字眼：「寬容」為不放棄議會的原則起見，社會民主黨於是「寬容」布魯寧政府，在國會中幾次勝敗關頭的票決時候，竟投票與以擁護。這樣一來，社會黨人之在國會中的地位，是類似某種德謨克拉西的國家的國王，名義上握有否決權，而在事實上向來不使用這個權利。其間有着這個不同之點，即是在這些國家裏國王之不使用這個權利，是得到人民稱讚的，而社會民主黨黨人所採用的策略，卻受了他們的選舉人激烈的批評。

### 一 德國德謨克拉西之虛構

社會民主黨自己毀滅了政治的意志，祇剩下一個巍大的門面，牠這種癆瘵病象與德國之整個德謨克拉西議會政制的沒落，是有相互關係的。威馬爾所樹立的共和政府之感覺困難是因缺

少一個大目標，爲的是沒有一個領袖或優秀份子能夠替他提出一個目標來。工人階級固然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然而意見上共同之點幾乎全部祇在於這個名詞上。社會黨沒有能力以產生具有制馭黨人的權威與統治革命所產生各種問題之必需的智識上優點的一個領袖幹部。在大戰發生前幾年，社會民主黨曾有緩而有恆的進步，這種進步似乎與德意志帝國之一般經濟的繁榮和諧和的關係。這個政黨是站在皇帝陛下下的政府之反對派地位，牠實以爲這種反對派立場的政策尚須長期繼續，而牠本身承當政權之責任的時期還是相隔很遠的。假定這個時期來了，牠以爲皇帝不過任命幾名社會民主黨的部長而已。他們那會深切想到以工人階級攫取政權，想到樹立共和政府，想到廢黜軍人的勢力。

可是，各種事變發生乃完全出於社會民主黨的意料之外；大戰之發生及其不幸的結局，均爲社會民主黨所不曾希望且亦所不能希望的事實。俄國鮑爾雪維克黨人情願承認軍事失敗以求保障革命的勝利，德國社會民主黨則完全缺乏這種強毅的決心，牠又沒有德國保守黨人那樣的決心，立意抗鬪外敵直至最後一點的熱血流盡爲止。當然的，保守黨人們不能撇開德皇而作

鬭爭的企圖，反君主主義的潮流不能不激怒他們。社會民主黨黨人在他們那方面，於歎息呻吟之下，歡迎他們所不會希望的革命，而資產階級則以為遇到它所目為潛勢力爆發的事變，以為這事變是表示它這階級崩潰的意義。所以，威馬爾共和政府之產生，實不得各方面的歡心，而在慘淡的降生後，拖延了十四年之飄搖不定的生命。

## 二 斯特萊斯曼之徒勞無功的嘗試

國家之能夠統治得當，或者是靠着武力，或者是靠着大多數國民的擁護；兩者之中，威馬爾共和政府實不會具有一個；憲法禁止它成爲一種狄克推多的政府，而各政黨的心意又禁止它成爲一種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威馬爾憲法實無形中假定這個事實：雖然在瑣屑的問題上有着各種反對的意見，但永遠總有一個趨於協調的多數之存在，以適應國家行動的需要；因爲這個原因，牠以爲有一種能夠壓服大多數民衆之政治的共同目標之存在，其實這個目標是不存在的。再換句話說，各政黨似乎無形中作這種假定：到了危急關頭，在它們之自私自利的活動上，總永遠現出維護

公眾利益而向它們抗拒的權威；即是說，一種獨裁的政權，能夠排開一切而實現各政黨間之不能的協調，喊出如路德總理有一天在國會裏所發的呼聲：「無論如何，總應該把德意志治理好。」我們可以看出德國人民在眼前這個時期，腦中是如何不可避免的習慣於一種專斷的君主政體。

斯特萊斯曼爲「大聯合」的創造者，從社會民主黨轉到右傾資產階級政黨之德意志人民黨，他徒然努力於創造一種共和的公民意識；在作這種嘗試中，他失掉他的健康和生命。到他退回來，又被他的政黨所捨棄後，他將全副精神貫注於外交方面。無疑的，他覺得在德國與其舊敵國之間成立一種可以相處的諒解，實往往比較在德國各政黨之間成立一種協調還容易些。

### 三 布魯寧之虛有其表的權威

布魯寧博士則嘗試另一相反的經驗。他從天主教工團出身，但又缺少了普通人的一種性格，他於一九三〇年，企圖在各政黨上樹立一個專權的政府——這些政黨之彼此對立的而又顯然相等的力量實使國家陷於萎靡的狀態。政府靠在它所倚賴的大總統來做中間人，以維持它與選

民的關係。在憲法上做了一種大膽的解釋後，於是由總統本人用「條例」的方式來頒布法律。各政黨對於這些「緊急條例」便不能不作一種議會批准，即於極微弱的多數贊同一個提議之下投票決定不要取消這些條例。這個多數是包括社會民主黨、國家民主黨、中央黨、德意志人民黨及其它右派小政黨的議員；至於少數方面，其構成份子則為國社黨、德意志國民黨、及共產黨的議員。

其實，支持布魯寧政府者，卻是另有其它的勢力，其色彩是比這個假稱的國會多數更見顯明些。頭一個是格羅勒（Grosche）部長及其助手施萊轍將軍所指揮的國防軍。其次則為大總統本身。國防軍對他完全是忠實的，他也因為有這個事實，所以能代表國內最高的權威。第三要素為中央黨，它的靠山為天主教會與德國南部兩大邦：巴伐尼亞與瓦敦堡。最後一個，即第四個要素，為社會民主黨，它在這一點上實與普魯士警察當局混在一起。因為在代表德國三分之二的普魯士境內，社會黨人擁有一切重要的地位，即如警察局、內務部與教育部等等。因此，在興登堡與格羅勒之外，普魯士首相握托布勞恩與其內務部長加爾塞維林實為布魯寧的政策之最重要的支柱。當然的，社會黨人之同意支持，僅是因為恐懼新選舉會創立獨裁的政制而宣佈他們在普魯士的政權。

之終止；但後來果然發生這種事實。

不過，我們應當承認布魯寧政府能夠抗拒許多敵人而支持兩年之久，在這一點上，它確能證明得有某種成績。在這兩年中，布魯寧能夠在內政方面防止無政府的狀態，在外交方面，取消賠款——固然他之努力的良果是被他之幸運的繼任者所收穫。這些事實是無可否認的。

可是，布魯寧內閣之重大的不幸，實為被環境所逼，而與日趨嚴重的經濟恐慌與社會恐慌相抗關。在其它國家內部，也有好幾個內閣因為經濟恐慌的影響而遂遭顛覆，但在德國，經濟恐慌的影響竟消滅了人民對於威馬爾共和政府的信用，或可以說，消滅了人民對於威馬爾「制度」——這是國社黨人所利用的方式——的信用。在維護工資的關爭當中，布魯寧實際上是站在資本家方面，因為他以為唯有這樣做纔能維護德國的社會基礎。他知道因此失去羣衆的信任，但他因此得到他之政黨的信任。所以，他不能不採取最失人心的步驟——假定他不替別人冒險作這種舉動，則現任的總理也不能不親自採取同樣的步驟了。布魯寧之機警的政治手腕，是在於以樹立右派的獨裁政府來威脅社會黨人，藉以取得後者的擁護。但他卻把德國的最大政黨拖入他本



人所墜落的失掉人望的地步了。

在布魯寧主持政府期中，德國經過一九三一年之多難的年頭。這個年頭之開始便遇着奧大利地產信託公司的坍閉，隨後便有胡佛延債的宣布，繼之者爲英鎊價格的跌落與克勒格 (Kreier) 銀行團的破產。約在這一年中間，經過丹那銀行 (Danat-Bank) 之停止付款與德勒斯登銀行 (Dresdner-Bank) 之倒閉後，德國經濟界的基礎大見動搖。在德國經濟界裏面，這些事變實鼓起一種深刻的印像，並且造出一種有利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心理；但是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則僅僅採取可異的遲緩步驟，以適應由經濟恐慌所產生的新的環境。

#### 四 反對國社黨之各主教

在那時支持布魯寧的各勢力裏面，我們應當特別提到天主教教會，及後者與國社黨間的關係。教會方面很不滿意國社黨之某某點關於教義的教材。它特別以綱領第二十四項指摘國社黨第二十四項是將國社黨人之宗教信仰與日耳曼種族的精神聯在一起。可是，就它的本體上說，教

會對於種族問題是取寬容態度的。不過，假使國社黨之著名的理論家羅森培不會在他所寫的文章裏面闡發那些靠不住的教義，則第二十四項不至引起糾紛。固然有人出來肯定說羅森培的意見實不含有任何正式的性質，但這種舉動仍然是毫無效力的。在一九三一年三月，所有德國各主教聯名做一篇反對國社主義的宣言。巴得波爾尼 (Paderborn) 教區的各主教甚至於特別說明「在國社黨仍然宣揚與天主教教義不相容之政治的與文化的概念時候，禁止天主教教徒加入國社黨。」巴伐尼亞各主教則說國社黨人所稱的基督主義實已不成基督的基督主義了。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馬因斯 (Mainz) 主教拒絕爲一個國社黨市議員舉行宗教的葬禮。

當然的，褐宮方面是十分願意與教堂相安無事。戈林雖然本身是基督教教徒，但爲緩和天主教教堂的惡感起見，他於一九三一年年頭前往羅馬，并在那裏同教皇與比撒爾圖 (Pizzardo) 大主教接談。他對這些人物保證說，國社主義永遠是歸附於實驗的基督主義，大家不應當將它與某某種異端邪說混在一起。固然如此，這次談話並不產生迅速的效果；教堂對於國社主義仍然抱着觀望的態度。

## 五 共產黨之意志不堅決

實業界方面，實亦同樣抱着徘徊的態度。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城，希特勒向德國經濟界全部重要領袖的大集會演講，這次大會是希特勒的老朋友和忠實信徒佛里慈·提森（Fritz Thyssen）所召集的。但是，當快要散會時候，提森喊道：「希特勒萬歲，」據當時目擊的證人說，會中祇有三分之一的人數附和提森。

即是在國社黨之最熱烈的敵人方面，即共產黨人方面，也懷着不堅決的態度。共產黨也於經濟恐慌的風潮中，得到許多信徒，固然比較國社黨的收穫是顯見微小。共產黨實因服從莫斯科方面發下之策略上的命令，而陷於困難的地步；它儘管在德國公開的或秘密的活動，這種狀態將使他永遠感覺困難。莫斯科方面之忖度德國的情事，絕不能如當地人之透切了解。一直到了一九三二年，共產黨服從這個可奇的口號：應當促成希特勒當權，因為須經過法西主義及這個主義的破產然後纔能達到共產主義。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共產黨不向國社黨作激烈的攻擊，而卻向社會

民主黨。

這樣做後，在希特勒的各敵人中，自衛的意志之瓦解，共產黨也負了它那部份的責任。希特勒的強大力量便基於這種狀態。與他對立之精神的及物質的力量，總算起來，是遠過於他所有的力量。然而，前者是各趨向於各的目標，遂至彼此互相對抗。即使希特勒主義之推進的力量已經開始減退，他們永遠還是無效力的。這一段鬭爭的歷史和意外勝利的歷史，實充滿着舞臺上之單調的情景；然而它的結局是猶同一段神怪故事，恰與這個歷史於十四年前所因而開始的神怪故事不相上下。

## 第十四章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 一 興登堡的左右

在有些時期中，德意志國民黨領袖胡根堡曾企圖掌握反對動搖的共和政府之運動的領導權；對於希特勒，他自以為可以處於保護人的地位，而不會想到他本身是不免於失敗的。他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一日在不靈士外喜邦之哈次堡城，開成全體右派大政黨的一個大會，在會裏面，宣佈與布魯寧內閣作一番死戰。這個組織，為大家所名為哈次堡戰線，成立之後，布魯寧之在興登堡總統前的權威，便受了一番嚴重的打擊。可是，好久以來在幕後操縱德國政治的人物——施萊徹將軍——又來給他一次援助。

一到了當權時候，施萊徹將軍所表現的無非是平庸的政治家的本色，他是純粹的一個隱存

幕後的政客，喜歡在黑影中活動，而在這黑影裏面，各種政治性的特徵都帶着一種有利的模糊色彩，但反之，施萊徹的燦爛肩章足以在那裏面發生一種威嚇。正式上，施萊徹是處於國防部處長的位置，此外，他又爲格羅勒部長之有勢力的和危險的親信顧問。在政府裏面，他的勢力不久便超過格羅勒與布魯寧，裏面一部份是建立於他與登堡總統的兒子奧登堡大佐之早年友誼上面。與登堡總統是到了八十五歲的年紀，他之了解自己的政治任務的精力已經是勉強存在的；僅是有些時間，關於人的問題上，他還表現出可驚的倔強態度。一般的說，當人家說起奧登堡總統的見解和他的決心，這裏面是暗中表示這種見解和決心是出於一個小團體的，這個小團體是包括總統的兒子，邁斯勒（Meissner）次長，保守派少年議員熱利克（Gerecke），施萊徹將軍以及一批政客與東普魯士的大地主——最顯著的是老侍從官鄂爾敦堡·查律紹（Oldenburger-Januschau）。這些人物，雖然內心的信仰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保持奧登堡之已趨衰微的權威，如果可能的話，則進一步提高這個權威，而對手方又是自陷於萎靡地位的國會，實現這個目的當然不見困難了。在這樣情形之下，奧登堡團體實與希特勒團體同樣採取一個政治的策略。

即在雙方敵人彼此爭取政權之際，而作從中取利的第三者。這個團體的最出色的政治首腦施萊轍將軍，也計算在某時期利用國社黨，以支持興登堡的獨裁政權。他實估量低了這個敵人，完全同其他德國資產階級的政客一樣錯誤。

興登堡的左右抨擊布魯寧，說後者不知道替興登堡利用右派各政黨及其領袖胡根堡與希特勒；有人便說，因為這個原因，布魯寧實破壞了愛國的那部份民衆對於總統的愛戴。這些謠言曾在這個老軍人的總統前，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後者原是十分以民衆的愛戴自傲，並且極怕失掉這種聲望的。假使布魯寧想維持他的位置，他便須拿出堅決要調和興登堡與右派各領袖的感情之證據。

## 二 布魯寧向希特勒建議

他便採取了一種粗率的政治計劃。起初，在哈次堡的宣告發表後，施萊轍又挺身出來保護布魯寧，並使他得到應付的時間。在實在的情形上，布魯寧應當下決心，撇開他的內閣裏面幾個多少

帶點左傾色彩的部長，就中如帶共和主義色彩之內務部長維爾特和外交部長庫耳齊烏斯；庫耳齊烏斯正因為企圖實現一種變相的關稅聯合之德奧關稅同盟（Anschluss）而陷於不可下臺的地步。可是，布魯寧終不能做到吸收大實業界的各領袖，雖然他曾施行壓低工資的政策以博得他們的歡心；唯有顏料工業的一個代表，華謨波爾（Warmbold）教授，經布魯寧十分要請後，纔肯加入內閣而充任國民經濟部部長。

這樣，布魯寧內閣可以繼續維持了相當時間，還且靠在另一個事實，即格羅勒受施萊轍的推動，深望在他之國防部長的職務外再兼內務部長。這個辦法是等於宣佈國防軍與布魯寧成爲一體，存與同存，亡與同亡了。受了這樣的支撐，布魯寧於感覺稍爲鬆緩之下，遂進行更困難的工作：博取希特勒的友誼與信任，並且以這個政治的傑作，如可貴的勝利品似的，獻呈於興登堡總統面前。這個計劃更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含有危險性的哈次堡戰線剛剛成立後便全部解體；不錯的希特勒及其部屬絕不願意屈伏於胡根堡的領導之下，也絕不願意與像塞爾特（Seltze）和都斯忒堡的鋼盔團那麼無精神無目標的同盟者同流合污。布魯寧無希望與胡根堡恢復好感之可



能，因為後者實為他之熱烈的敵人；加之，同胡根堡恢復好感對他自己是有利益的，因為德意志國民黨的瓦解乃是很顯明的事實。反之，他若同希特勒協調是較有良好希望，拿胡根堡來比較希特勒，則後者更有勢力且為更精細的外交家。這一個步驟又是施萊轍所出的主意；他於哈次堡大會不久後，兩次邀請希特勒到他家裏，作準備希特勒與布魯寧會面的地步。

這兩個人的會面是實現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在德國政治上，發生了極重要的結果。談話的託辭是關於選舉新總統的問題，這次選舉應於這年春天舉行。布魯寧由是向希特勒建議贊同與登堡保持總統的位置，避免在這個糾紛的時局當中，使德國人民又發生選舉鬭爭的麻煩；若是得國社黨投票援助，則國會可以通過一條憲法修正案，准許不經選舉而延長興登堡總統的任期。布魯寧那方面所答應的報酬是他自動引退并請總統選擇希特勒為國務總理。不過，希特勒還須忍耐等候一年，因為布魯寧想在這個期間中，在他曾經努力幾年的外交問題上得到一個最後的成功，這個問題即是取消賠償的問題。他自以為很有理由的說道，舊日各敵國或許願意成就布魯寧總理而贊成這個舉動，但牠們必定拒絕以這個問題成就希特勒總理。無疑的，這裏面可以發生一個

疑問：設使牠們知道布魯寧的居心僅是爲希特勒開闢路徑，牠們是否還以這個問題成就布魯寧呢？靠着這個策略，布魯寧既可摧殘德國左傾政黨，又可欺騙各協約國。最後，這個把戲還可使第三人受了損失：即希特勒本人。因爲，在一年中，許多情形可以變遷；尤其是希特勒可以失掉一大部份選舉人的擁護，假定他忽然支持，即使是變相的，布魯寧的政策。

### 三 最後的議會制內閣之傾覆

憑着他之大政治家的本能，希特勒立刻明白那裏面的把戲，而布魯寧的狡滑計劃便告失敗了。希特勒表示拒絕後，便聽戈林和戈培爾領他到選舉戰爭裏去，而在鬪爭中的激昂行動，並不是完全照他本人的見解做的。因爲可以提出他的候選資格起見，他立刻取得德國的國籍；照德國的法律，他祇要被任爲公務員便可獲得候選的資格；不藍士外喜邦於是給他以顧問的名義。

四月十日，第二次投票的結果，興登堡以一千九百三十萬票，即佔有效票數之百分之五十三，再度當選，至希特勒祇得到一千三百四十萬票，即百分之三十六的票數。興登堡固然得到絕對的

多數，但希特勒已是大踏步邁進了。那一個是比較好的呢？那一個的確在選舉戰中獲得勝利，這是很難說的。然而有一個人確實在選舉戰中失敗了：這個人便是布魯寧了。

因爲，在他不能做到與希特勒成立妥協的那天，他便永遠失掉在總統身邊的地位了。而且，或許是更惡劣的事實，從那個時候起，他又有了施萊赫將軍來做他的對頭。不管有着選舉的鬭爭，不管有着希特勒和戈培爾之狂熱的宣傳，施萊赫繼續以最友好的態度對待國社黨人，而後者也採取以德報德的態度。這裏面有一個困難的原因，即從選舉時期起，興登堡在心坎裏面對希特勒懷抱反感；興登堡之第一次看見希特勒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天，在這次絕對守祕密的會見當中，老元帥不會覺得希特勒是十分可親的人物；在一九三二年夏天，他還說道這個傢伙不配做國務總理，充其量祇可充當「郵政部長」而已。然而，希特勒可以藉他的政治勢力之逐步增長，以補償總統這種憎惡的態度。他之同布魯寧與施萊赫的談判，實使他頭頂上發出一種圓光：他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同總統與國務總理談判嗎？或許布魯寧永遠不會明白他出於意願之外的給與希特勒以如何可驚的宣傳功效呢。

總而言之，他的末日總是要到了。他雖然抱一種整個的犧牲精神及一種由平素那麼冷淡的人物發出來而使大家驚異且甚至高興的熱情，以投入選舉鬭爭裏面，但結果總是無用的。奧登堡絲毫不對他表示滿意。「你可以算準一件事情：即老先生的無恆心，」格羅勒部長會在那時候對他這麼說。不久，老元帥便有表現負義的機會了。在總統的選舉勝利後第四天，布魯寧和格羅勒會決意解散國社黨的挺進隊和保護隊；普魯士警察進行搜查的結果，曾確實證明有準備內戰的國社黨計劃之存在，並且有以謀反罪起訴國社黨之充分的證據。但是德國司法官又來救援國社黨人。檢查官認為文件不充份而拒絕起訴。奧登堡原已簽署解散挺進隊的命令，因為這個情形，便感覺受了牽累。加之，他的朋友們向他稱述布魯寧想徵收東普魯士的一部份大地皮以作國內殖民之用。「這樣便是鮑爾雪維克主義啦！」老元帥便忿然說道——他本身也已成爲大地主了。格羅勒先下臺；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布魯寧也跟着下臺。戰後德國政治最有趣味的一個經驗，於存在兩年之後，便這樣的斷送生命了。

布魯寧身上實含有宗教武士與學校教師之混合的性質；他實第一次在戰後德國政治裏面

灌輸了這種艱苦修行的特質，在他下臺後，國社黨黨人也會繼續維持這種特質，但是帶着較多的狂怒，或許同時帶着較少的大公無私的精神。爲求達到偉大的目的起見，布魯寧會放棄很容易做的競爭；他并不遲疑而本着良心來作大家眼前還期望於希特勒的犧牲，即犧牲民衆的愛戴。與他同時消滅者實爲領導一個至少在表面上的議會制政府之最後的德國國務總理。

#### 四 與登堡之排棄希特勒

施萊轍將軍選取中央黨議員巴本 (Franz von Papen) 充當新的國務總理，與登堡在受他的勸告之下，便邀請巴本。巴本原屬於威斯特發倫的天主教貴族階級；他先在軍隊裏面服務，在大戰中，他充當駐華盛頓武官。他不但在那邊參加反對美國的陰謀，並且曾鬧出笑話，因爲他的貯存合謀的文件皮包竟被人竊走。他因結婚而得到薩爾工業的重大利益；在煤和鐵的徵象之下，同時也在梵蒂岡的十字架的徵象之下，他努力領導親法的政策，認爲這個政策足以保障歐洲之雖不熱烈但是長久的和平。他的心可以因一種相當野蠻的國家主義，但也可以因一種宣揚文化的

和天主教的宇宙主義論，而鼓動起來；然而他的精神則似乎不足以控制這種矛盾，也不足在兩方面中選擇一條路。與其說是他本人應當負他的政治錯誤的責任，不如說負責任者是經過幾年的無意義的政治活動後把他從黑影裏拖出的那些人們。好久以來，他極力使他的政黨離開左傾的立場，使之採取一種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治立場——實則這種努力始終不曾成功。他又企圖——同樣是無效果的——恢復外交官的環境，並且祇求盧森堡（Luxembourg）公使館的職務。在政治上，巴本是一個情緒熱烈的有心人，但同時又是一個不常常有幸運的情人；當他發言時候，他的神氣是像以足尖站地上的身材矮小的人物。

施萊徹曾希望巴本能夠聯合中央黨，並且以他的倔強的國家主義者的身份，可以得到希特勒的援助。前一個希望是幻想的：中央黨已曾警告這個背叛的黨員說它對之將取激烈的反對態度。反之，希特勒則準備默默放任巴本，但提出兩個條件：廢除取締挺進隊的命令和解散國會，因為希特勒很有把握的認為新選舉可以給他比上屆多一倍的票數。巴本很願意接受這些條件，而因此此在六星期中得到希特勒的青眼。此外，他自以為替希特勒斬草除根而向「馬克思主義」下一

番嚴重的打擊；以武力廢立布勞恩——塞維林之普魯士社會主義政府。這次突然的處置，是發生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在歷史上留下有名的事蹟，它實斷送了社會民主黨在德國的勢力，永遠消滅了這個政黨之精神上的權威，雖然經過有些時候它的表面的結構仍然可以維持着。

但是，巴本的成功絕不能妨礙希特勒的勝利，希特勒於是年七月二十日的選舉中得到二百三十個議席，並且爲是日之無可否認的戰勝者。他到了這麼優越的地位，便立刻要求國務總理的位置。他堅要巴本自願引退，以讓他出來替代。假使施萊徹會竭力擁護希特勒，則巴本或將在希特勒的壓迫下實行讓步了。但當時情形并不如此，巴本便絲毫不願意演出自殺的舉動了。八月十三日，發生希特勒與興登堡之劇情似的會見，會見的結果是在精神上希特勒被趕出門外。在那時候，老元帥是那麼忿懣的反對希特勒，竟至於不請後者坐下，極勉強的聽後者說話；他像對待小學生一樣教訓希特勒，並且態度嚴厲的說道，他之元首的責任，實不許他以政權付託像希特勒這樣的人物。

這次談話的結果，便引起希特勒與巴本完全決裂。因爲希特勒將在興登堡面前的失敗歸咎

於巴本，而不歸咎於興登堡，他對於後者已不重視了。他回到奧柏沙斯堡（Obersalsberg）村中別墅，從這個地方向巴本發出一篇激昂的宣戰書。他以倍騰（Bentzen）特別法庭的一個判決來做他措辭的藉口；這個法庭是巴本所設立的，曾將五名國社黨黨員判處死刑，後者們曾在西勒西亞之波當巴城用最野蠻的手段殺死一個政敵。希特勒寄一封電報給各兇手，在電報裏面，他以『同志』稱呼他們，并且發誓無條件忠實於他們。於是，他在寄與巴本的一封公開的信裏面，責罵他以殺人的法庭壓迫德國人民。

### 五 希特勒之失掉好運氣

巴本於是不能不違反他自己的意志而同希特勒鬭爭。起初，他確實努力奮鬥，并且得到幸運。反之，希特勒則錯誤疊出。波當巴電報是他的錯誤之一；另一個錯誤則為藉國會的議決而廢立興登堡的計劃。他累次公然宣稱與興登堡不久便要逝世，而到那時，任何人不能阻礙他之被選繼承與興登堡，當他說這種話時候，民衆心中便瀰漫着一種情緒，說患狂熱病的『領袖』是不能十分剋制



自己了。巴本則做了幾件有幸運的設施以鼓舞經濟界的狀況。他的運命便因此轉好了。

各方面敵人又做了種種行動以成就他的事業。希特勒應當極力避免新的選舉戰之實現，因為他將在那裏面失掉票數，事實是很顯明的。八月十三日的失敗已經使他失掉不可制伏的頂上圓光；一個野心家至於被八十五歲的老人趕出門外，他便不是一個革命家了；即是下層羣衆，現在也理會這個事實了。繼續不斷的勝利所產生的光輝，現在已經絕跡不見。希特勒本人也明白這一點；但他不幸而有戈林之不同樣聰明的觀察。戈林現已成爲國會主席，他想利用這個資格而對巴本做一番極端狂謬的打擊。利用國會的狡計，他於十二月十二日的全體大會中，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通過共產黨所提出之對內閣不信任的議案。但他的手段又是很笨拙的，而在實行之前，宣佈休會一個鐘頭。這樣，他便給與巴本以應付的時間，得由政府送來經過總統簽字的解散國會命令。在戈林設法通過這個議案之前，解散命令已排在國會的公事桌上。議案固然仍舊通過，但牠不生效力了。

因爲這番不可了解的舉動，戈林實使他自己的政黨受了重大的損害。隨後舉行的總選舉竟

使國社黨失掉——恰如大家所曾預料的——二百萬以上的票數。十一月六日，國社黨祇獲得一百九十七個議席，以替代上屆國會的二百三十個，至於共產黨所得的議席，則從上屆的八十九個增至一百個。希特勒那顆明星一向是光芒閃耀的，但從八月十三日的不幸那天來，則黯然無光了，而希特勒自身現在也不知道這顆星往後是否完完全全熄滅去了。

在這時候，施萊赫終於離開了後臺，而以國防部部長的地位加入巴本內閣，他以為能夠降伏希特勒，並且將後者馴馴的引進與登堡左右的壁壘裏面。他計算星光已經開始黯淡的希特勒是相對的容易馴伏。於是他決計使巴本採取後者於八月間曾力與拒絕的辦法：巴本辭職下野，與登堡便不能不委託希特勒組織新內閣。表面上這是國社黨人可以補償八月十三日失敗的一番勝利。但是與登堡總統提出條件，即在掌握政權之前，新國務總理須同各政黨談判，以求在國會裏面得到多數的擁護——國社黨如想在國會裏面獲取相對的多數則須得到中央黨與德意志人民黨的援助。希特勒又為與登堡所接見，他們隨後會交換函件，在這些函件裏面，至少可以看見也不是疲倦的老人也不是易衝動的活動者會有作口頭談判之餘地。到了最後，希特勒謝絕組織新內

關的任務，以爲在那裏面發現了一個陷阱。

這個結局恰是巴本所期待的，因爲他一向是希望再做國務總理。然而施萊轍卻惋惜談判的失敗，而反對巴本回到國務院；他說：一個不得人心的政府領袖，實不適用於剛剛投票擁護左派的德國。這實因爲施萊轍再不願意藉下面這一種勢力前進，後者實在是做一種走繩的把戲，而藉兩端之唯一的支柱以維持本身，這兩個支柱即是大總統的威望與國防軍的槍桿。在另一方面，施萊轍并不急於試用他的隊伍。他知道在國防軍裏面潛伏着對於國社黨的同情心。而且，他或許格外憂懼着從另一壁壘發出來的危機：在十一月初，柏林公共交通的員工會有罷工的舉動。施萊轍便說道，如果幾千公共汽車和電車的司機便可使全城的活動力整天陷於麻木的狀態，那麼，遇到一次真正的總罷工，政府又將陷於如何懦弱無能的地步呢？一次總罷工，假定得到整個民衆以充分的同情心來支持，而國社黨人也參加罷工裏面去，那又當如何呢！我們說這句話是因爲國社黨人確曾在公共交通的罷工中這麼做過。在這種情形下，國防部部長施萊轍實自己感覺沒有充分的力量來以他的機關槍之無條件的援助允許巴本政府了。

我們不提這些陰謀的瑣屑事實。祇須說到巴本於興登堡總統萬分悲痛之下，在十一月底引退。老元帥以自己的相片贈給他最所親愛的巴本，在相片上面題了這幾個字：

「我曾經得到一個同志……」

## 第十五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

### 一 國務總理施萊轍

巴本之繼任者爲施萊轍將軍。施萊轍之接受新職務或許不是他本心所願意的，與登堡在心坎中常常希望離開這個狡猾的政客和危險的軍官；他對於後者之前此的敬愛，現在一變而成爲確實的冷酷無情。他懷着惡意的歡心，而將兩前任者所陸續失敗的任務交於施萊轍。巴本曾付總統的許可，得下令解散國會，以應付國會的頑強態度。反之，施萊轍則不曾從老元帥手裏得到表示信任的證據，因此，在開始時期，他已經受失敗的處分了。這裏面最堪發矇的事實，乃是施萊轍不曾立刻明白自身所處的非常的環境，到了危殆的一刹那，他纔看見輪到自己永遠不變的陰謀家的身上而受人之如何殘狠的播弄了。

這樣的，第一次在德國共和政府的歷史，一個將官出來充任國務總理。他完全不照大家所期待於他的辦法來統治德國。施萊轍將軍拋開軍人獨裁的幻想，而這種情形並不僅由口頭表示出來的。果然不錯，他實因為不願意這種獨裁政權，所以推翻巴本內閣，而絕不是基於個人的野心而作這個舉動。因為本身充任國務總理的理想並不是使他極端動情；他或許寧願扮演類似畢爾蘇賓基（Pilsudski）將軍之以陸軍部部長的地位而在波蘭所扮演有效力的腳色。施萊轍之自信他的政治天才，實超過於信任他的機關槍，而這種「文人」的自尊心也同他的失敗有着不少的關係。

他有着雙層的任務排在他的面前：他須成爲積極的國家主義的國務總理，同時又須爲德國社會改造的建築師。至少在他的色彩上，我們可以形容他爲國社主義的總理，而他同希特勒所發生的決鬥，並不僅僅爲着爭取政權，但也因爲爭在他兩人中決定誰來完成國社主義的任務。

從凡爾賽條約產生後，德國的國家主義是處在兩難論之下：或者說，凡爾賽條約的各條規定，在不可忍受的各部份裏面，應視爲「戰勝者」的精神作用。在這個情形下，則到這個精神作用過

去後，修改條約是可能的。照這樣想，任何人都不如斯特萊斯曼所得到的成績，他使德國人民心中確信修改條約是可能的，換句話說，即與法國妥協是可能的。或是說，凡爾賽條約恰是這個信念的反應，存在於其他的民族心中，而將德國以同伴的地位加入國際和平協調，這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情形下，則任何友好妥協的希望都是不可能的；而為免除凡爾賽條約之不可忍受的條件起見，祇剩下堅忍與抵抗，必要時候用武力。第二種見解之最明白的代表者，乃是希特勒。

## 二 挺進隊之募捐

新國務總理的任務，即為在這個兩難中，尋求足供明白本身責任的政治家所採取的解決方法。在開始時期，他即得到一個功效：日內瓦裁軍會議曾承認使德國得到權利的平等實為會議的目的之一。在國內，新總理須用建設的設施，使國家得適應於經濟恐慌所創造的社會崩潰的環境……但是最緊急的問題仍然為制伏希特勒，如不能加以制伏的話，則與以消滅。

禍宮方面，忽然基礎沒有從前那麼穩固，牠所考慮的問題是如下：到發生衝突，國社黨與施萊

轍政府，到底那一個是比較脆弱的呢？因為，大家很恐佈的觀察到：希特勒主義勢力低減，而民衆心中則愉快的認明施萊轍是具有某種毅力的，並且希望他能夠善與利用。

到十二月，屠麟根縣選舉的結果，又增進國社黨的傾頹。可是，若拿壓迫國社黨的金錢恐慌的問題來比較，則屠麟根縣選舉的不幸結果又無足稱道了。以實際上政黨的地位，國社黨固然有着不紊亂的財政；但是無數的出版所、儲藏庫、挺進隊制服販賣處、日趨繁華的各黨區及其各處謁宮，都負債纍纍；他們寫訴苦的信給各債權人，大小各貨主，而這些信一部份跑到敵人報紙的方面去。在消息靈通方面，有人估量這些債務總數達到一千二百萬馬克。窮窘到了那麼深重地步，竟使普魯士邦議會的國社黨議員取消付給邦議會聖誕節的賞錢。在全德國各城市裏，幾萬挺進隊份子蜂擁街上，手提蓋了國社黨封條的撲滿向公衆捐錢，情形實類似被免職的兵士，得到軍官之准許行乞以替代薪餉。挺進隊的下級首領，整批跑到敵人機關報的編輯室，以出賣國社黨的祕密消息來換取金錢。

在那時候總共六十萬挺進隊隊員裏面，有着一大批的失業者，和從未操持任何職業的極年



輕的少年但也有着各種職業之已有成就的人物，他們期待希特勒的勝利以求回復資產階級的生活。因為希特勒對於攫取政權採取了猶疑的態度，這些飢餓的隊伍便一天比一天感覺失望。漸漸的，內部的叛變陸續發生，這種事實是無足驚異的。後來，希特勒得到勝利，干預報帶着離開危機之放心的情緒，照這樣情形而追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這個月中的空氣。牠說：「一種失望的情緒會擴展到四周圍。有人便說：我們絕沒有達到目的時候；堅持我們之永遠不變的要求，這實是瘋狂的舉動；不如接受人家獻給我們之任何部長的位置。」而戈培爾也公開承認他本人也疑慮國社主義是否驟然坍塌呢。

### 三 格烈戈爾·斯特拉塞之脫離希特勒

在這個瓦解的空氣之下，曾有着幾個人物，於違反希特勒的意志，想藉妥協施萊徹的步驟，以挽救國社主義運動。這些人物乃是佛力克與斯特拉塞。當希特勒禁止他們進行這種談判時候，佛力克完全服從命令，但斯特拉塞則第一次拒絕服從。斯特拉塞覺得國社黨陷於危機，足以使他遭

遇不幸的結果。他首先考慮財政的狀況，以爲大家如果不採取一千二百萬馬克大借款的辦法來整理重壓國社黨各商業機關之無數的債務，則這些機關非宣告破產不可。這個整理辦法可用兩種可能的方法：第一是參加政權，這個方法可以堅定債權人的信任，而使國社黨得延長新的期限；只怕國務總理將用於「青年訓練」或「勞動救濟」的祕密費花光了。另一個辦法則爲救援於私人經濟界，即來因蘭和威斯特發倫的重工業界。第一個辦法須與施萊轍妥協，後者是主持社會綱領的人物，並且自命爲蔑視資本主義的人物；第二個辦法則拖帶國社黨更密切的接近大實業界與金融界了。斯特拉塞熟計國社黨與施萊轍決裂後必須走上第二條路線。或許是因爲這個問題，關鍵所在的理由，逼他向希特勒要求作一個已經挨延好久的解釋。

斯特拉塞從這個談話出來後，心中大發生動搖。他認爲希特勒的計劃……很無恥的，而且是反國家主義的。他便於寄給希特勒的一封信裏面，發表他的意見，這封信乃是一番正式的決裂，但牠也表顯出一種久受壓迫的心事。斯特拉塞首先聲訴黨的指導機關在他的活動上所施的各種障礙，當然使他認爲損害他的政治環境。然而他所要特別宣佈的，乃是說他再不贊成黨所採

取的政治方針，便是說，希特勒所採取的政治方針。他反對那些要求以殘狠的武力對付政敵的人們。他說，在各政敵中，實不乏可貴的建設的力量，誠懇的良好意志，不論是社會民主黨黨人或其它德謨克拉西的政黨黨人，都有這種情形；大家不應使用暴力來排斥他們或壓伏他們。希特勒之實際上的行爲與他在宣傳裏面所標榜的理想，實完全不符。了解自身的責任與目標的指導部，竟爲戈培爾之矯偽的媚民行爲所籠罩，而且，在最高領袖的同意下，國社黨實走了絕望的政治路徑。這樣實準備演成混亂的和無政府的狀態，而陷德國於萬劫不復的地步。

希特勒所遵循的路徑確在這些話裏面闡發無遺。然而，從第一天以來，他的路徑始終沒有改變。在希特勒心中，獲取政權的路徑是經過「共產黨的暴動」換句話說，即經過大家所責備共產黨的暴行。斯特拉塞忘記了從前他自己也曾與高彩烈的走上這條路徑。但是到今天，他改變了，而贊成議會制與尊重法律的傾向都超過希特勒了。

爭論的結果是斯特拉塞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辭去他在黨內的一切職務。在某一刹那，費德曾想步他的後塵，但在開除黨籍的威嚇下，他又退縮不前了。斯特拉塞正式的脫離政府而從

事「休養」不過，他仍然和施萊徹維持關係，且甚至爲興登堡總統所召見；有人提他充任部長。他的脫離，並不使國社黨內部發生破裂，固然他曾擁有多量的和忠實的徒衆，如烈芬特羅伯爵和哥尼斯堡黨區領袖愛立克科（Erich Koch）。「斯特拉塞派」的勢力，便因首領之離開而歸於消滅了。希特勒於是在柏林召集他的派下各公務員與各議員，而在戈林寓中組織一個極動情的表示忠忱的舉動。他在那裏面會表現了最有口才的動作，痛哭流涕而使在座者同樣落淚。這種動作正是真正的領袖的祕訣，他知道利用這種分裂局面所激動的情感，以進一步的加緊留在黨中各人的相互關係。在隨後那幾天中，希特勒可以將全國各地方所寄來的表示忠忱的信件裝滿紙筐了。

斯特拉塞離開後（但他仍然爲國社黨黨員），得到勝利的乃是戈培爾與戈林的政策。一種媚民的政策，出於孤注一擲的博者手裏，結果不是獲得勝利便是全部失敗。新的口號是：救援我們啦，因爲假使我們失敗了，德國將增加一千萬的共產黨了。

國社黨便是如此做法，像一個患狂熱病的女人一樣，以自殺的威脅來強迫德國經濟的領導

者與以救援，而將它擁上臺面。

#### 四 希特勒之得到救援

最初是一幫來因蘭的實業家，在鋼業聯合會的一個高級會員的領導下，償付了國社黨的債務之重要的一部份。

不過，我們不要因此而相信希特勒賣身於實業家。實際上，乃是他們感覺需要一個領導——這是不僅屬於物質上而且屬於精神上的破產的現象。他們之希望一個強盛的國家——在他們於興旺的時期中做了種種行為以使這個國家日見衰弱之後——實暗中含有極淺陋的和個人上的希望：希望國家用公道的價格向他們買回他們的股票，使他們得以擺脫財政的恐慌。這種「破產的社會主義」乃成爲許多資本家所抱的主義，不僅是最少數的資本家，而在易北河流域的大地主中也有着同樣的情形。所有這些資本家，曾經失掉勇氣和個人的信仰，以爲可以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他們的靠山。最滑稽的是他們完全不了解希特勒的目的。希特勒卻需要個人發起之

最大的努力，而他的「資本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不但爲這些屈伏的資本家所不能了解，即加入挺進隊的共產黨人亦何嘗了解。

此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底，國社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方都感覺處於沒落的途中——力求在密切的攜手中彼此互相救援。

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的一個信徒，哥隆銀行家士勒德（Schröder），安排在他家中使希特勒和巴本見面。他們兩個人於是重修舊好，而巴本便設法使希特勒了解應當加入所有各右派勢力的一個大聯合，這個聯合是包括着由興登堡總統與國防軍經過鋼盔團而達到胡根堡。巴本以經濟界各勢力的代表人資格而主持這次談判，當他在國務總理任上，這些經濟界勢力實爲他之最得力的靠山。牠們喜歡這個威斯特發命的貴族與薩爾大實業家之巴本，而不願意社會政策用意不明顯的施萊赫將軍；在巴本領導下同時又可以使希特勒加入裏面的新內閣，將使牠們格外得到保證了。

不過，在未來的合作問題上，這次談判并未產生任何協調。希特勒在那時候實無結合的餘力。

他唯一所關切者乃爲藉一番局部的勝利，不管是如何微小的，以恢復他之已見衰微的威望。所以在里卑·德特摩爾（Lippe-Deimold）邦，一個面積小到極點的小地方，他所進行的選舉宣傳，是比任何談判都重要。他從這一村跑到那一村，僅在數百人面前發言，自己覺得毫不在乎。經過這番工夫，他便得到超過於過去十一月與十二月所得的票數。無疑的，這不過是表面上小勝利而已；他犧牲了整個的森林以建築一個鳥巢。然而，黨中同志卻因此而恢復自信力了。在舉行這次選舉前幾天，弗蘭斐的奧沙夫斯蒂格曼（Ostmann）藉辭職來反對努連堡黨區領袖斯特萊撒的私人醜穢的生活。但這種情形已經存在了十年之久；何以到今日纔見爆發，無非是一般恐慌的現象而已。里卑選舉的成績，絕不能壓制這種恐慌，但至少可使牠不至於擴大。

## 五 斯萊撒的大計劃

當希特勒正在應付黨內的恐慌時候，施萊撒也在努力對付內閣的恐慌。大地主所領導之強有力的農民組織，『農民大同盟』，不經事前的通告，忽然以未曾有的激烈狀態攻擊施萊撒。施萊撒

於取得政權後，曾表示他將照布魯寧所企圖的辦法，犧牲一部份不能藉本身的力量以繼續維持的大田地，以供國內殖民的使用；他不會想到因為這個而自己宣告死刑。加之，他又不能將自己與人民彼此間的關係樹立於堅固的基礎上面。他曾做了好些計劃，結果實使他因對勞動界之認識淺陋而受到傷害，尤其是因對靜力性過於積極性的工團官僚政治的力量，作了含有危險性的過高估量。施萊轍，尤其是他的各顧問以為在那裏面找到良好的意志，可以使之脫離國會各黨派，而加以組織，藉以實現德國穩定的復興局面。各工團本身也曾使人產生這種希望，因為它們曾表示，到必要時候，將與國社黨之有理性的份子合作，以支持施萊轍內閣。在這個計劃裏面，格烈戈爾·斯特拉塞的名字曾佔重要的地位，他們並沒有說不藉斯特拉塞以抵制希特勒。或許即是因為他們想藉這種新戰線的威脅，使希特勒表示比較馴良的態度。這些計劃內容，實含有過多的醜惡和過少的誠實，而施萊轍將軍便將拉薩爾所說的話作了一番實驗，即是說，在有些大事中，狡僞行為可使吾人喪失性命。無疑的，施萊轍以為在自己面前有好幾條路線可走，而他便想保留選擇的自由呢。從第一計劃，第二計劃，以至於第三計劃等等，一一斟酌，這種參謀部軍官的腦筋，若是用於選



擇方法，可以成爲力量，但若在各種原則中，用這種腦筋來決定方針，則結果將大大不然了。

## 六 施萊轍之下臺

不管怎樣，施萊轍的計劃須有充分的時間以達到成熟的地步，而爲獲得時間起見，他非將國會延期不可。他希望藉舉行新選舉的威脅，可以強迫國社黨黨人對他表同意，因爲在新選舉中，他們必定要失掉許多票數（不管有里卑選舉的成績，任何人對這點都不至生疑問）。奧登堡總統會以解散國會的處分授與巴本國務總理，必然也可以將這個授與他了。然而，完全出他意料之外，施萊轍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得知總統竟拒絕授與他了！

經過的事實是如下：即是在前一天，巴本曾來謁見奧登堡，向後者保證說，他已經得到希特勒的同意，以實現一種「國民團結」。但希特勒堅要以國務總理位置給他自己。當然的，老元帥反對這個要求，但巴本會靠幾個必要的慎重步驟，約定希特勒服從他的意思。依這樣情形，國社黨不得攫取外交部，也不得攫取國防軍；在內閣裏面，他們僅是一個少數，而巴本本身雖然處於國務副總

理的地位，實將爲總統府與政府之間的唯一的中間人，換言之，即是真正握有全權的人物。

假定施萊轍，在已經辭職之後，不會想玩一套特別狡猾的把戲，以防備與登堡再召巴本組閣的話，或許到了最後，與登堡終於摒棄上面所說的辦法。這種違反民意的內閣，施萊轍說道，不能夠維持下去，也不能夠長時期得到國防軍的擁護。施萊轍是這樣的計算：如果組織巴本內閣是不可能的，總統因爲對於希特勒懷有人人所知道的反感，便不得不喚我出來。因爲在施萊轍背後，實站着撼搖不動的整個國防軍軍部，即是說：國家之最可畏的和最必需的勢力。

國防軍各將領於是冒險作最大膽的行動。他們目擊領袖在總統身邊，因爲巴本的緣故，竟失掉他的勢力，而且與登堡大佐，從前原爲施萊轍的好朋友，現在卻轉而親近巴本了。「憲法所不會規定他的地位」之總統兒子，實爲他的父親所最信從的顧問，而且成爲紐狄克（Neudeck）之合法的地主，他對於施萊轍國內殖民的計劃，認爲直接損害與登堡家族的利益，因爲與登堡家族現在也名列於大地主階級裏面。或許施萊轍也會放鬆了他與總統的兒子間個人上的關係，至於巴本，則鄭重維持這個關係了。在國防軍裏面，有人想道，無論如何，現在非排擠巴本不可。在這種情

形下，於是產生了一個純粹軍人的浮燥計劃；藉反叛國家的罪名以幽禁巴本，因此使總統處於既成事實的局面中，再使波斯丹警備隊作一番示威運動，更可進一步增高這次小小的苦迭迭的氣餒了。到了現在，我們還不能斷定施萊轍之外交行動的謁見老元帥，是否即與這個挑戰的計劃有着連帶關係；當然的，所有參加那裏面的人物，都極力否認，或絕口不提。不管如何，他們所計劃的苦迭迭，卻發生了與他們所期待的完全相反的結果。祕密洩漏到外間，希特勒由是知道有迅速下手之必要，如果他不願意在這一一次，於對方的武力行動下，又無可挽救的失掉政權。像施萊轍一派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底所作的政治計劃，竟到了那種錯誤的地步，實我們所極少看見過的；唯有離這個時期不遠後，希特勒政府的狡猾無可復加的計劃所觸犯之更可慘的錯誤，差可與前者相比較。當巴本開始他的交涉時候，與登堡實不願意在巴本身邊復有國務總理之希特勒，希特勒也不願意與巴本並列，尤其是與胡根堡並列，而充當國務總理。然而，一到了各將領的計劃發現之後，那兩方面的抵抗行動都驟然間消滅了。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那時是國防軍陷希特勒於失敗之地。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採取報復的行動，便由他來打擊國防軍了。

其實，希特勒早已看出巴本之拉他加入資產階級佔多數的內閣裏面，是想將打好的活結子套上他的脖子。但他卻切斷這個結子，所靠的工具乃是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樣善加運用的武器：他要求解散國會並舉行新選舉，作為他表示柔和態度的代價。因為，他深切了解這個事實：在巴本與登堡眼中，他不過將為表面上的國務總理；在民衆眼中，則他將成戰勝的政治運動家，平民而登寶座，奮鬥者而達到目的，叛黨而獲得勝訴了。他擁有從成功而產生的惑人力量，並且他現在可以利用前人所不會使用的工具：無線電廣播。在爭取民衆的擁護當中，他不怕各新同事，如巴本與胡根堡等等，能夠佔他先風，即僅僅緊追他的後面，也是不可能的。

但前，在內閣各部長中，卻有一人明白看到前途的趨向：這個人乃是胡根堡。哈次堡戰線之組織者（指胡根堡）看到哈次堡戰線的內閣到底快要產生出來，但他也看到內閣非用「哈次堡式」的方法不可。如果它不願形成一個單純的國社主義的內閣。他於是宣佈說：如果解散國會果然是必要的話，則當避免舉行新選舉，而以宣佈「社會危急狀態」代替後者——憲法上是不會規定這個處分的，但即是因為這個緣故，熱心擁護右傾獨裁政治的人們好早希望牠能夠實現，牠

又可使總統掃除憲法的掣肘。但希特勒毫不願意談這個問題；因為這裏面的意見，在進行中的談判幾乎陷於失敗。興登堡已經決意再任巴本爲國務總理。即在這個時候，計劃拿捕巴本的聲浪傳到雙方談判者耳中，便使他們改取比較和順的態度。希特勒於是在極莊嚴的神氣中，發出他的誓約——據鋼盔團首領杜厄斯脫堡（Duestenberg）的敘述，這個誓約是這麼說：「不論三月五號的選舉結果是如何，所有參與在計劃中的內部各部長一概不更動。」

希特勒和巴本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午刻聯袂進謁總統，並報告後者說，「國民團結」已爲既成的事實了。總統一口注重在這個團結字上，便以組閣的任務付託希特勒。他向希特勒說，他從前不能以這個任務交與國社黨領袖，但現在希特勒則爲國民共同戰線的代表了。興登堡的國民團結，乃是老頭子的一個幻想。以這個團結的名義取得政權的國務總理，是很明白個中情形的。國務副總理也已經明白了嗎？在這些握手與宣誓的儀式中，實隱藏許多騙局與幻象，奸猾與含蓄的深意。

七 達到目的——希特勒任國務總理

於是，在希特勒身邊，設立很少的內閣所曾有過的國務副總理一席。充任國務副總理者乃爲巴本，他同時任普魯士內閣總理；每遇國務總理與總統接談，他都在座；他實是這個「頑童」的「保姆」了。當然的，大家不能不將幾個重要的位置交與最大政黨的領袖佛力克，便任內務部長，戈林任普魯士內務部長。因此，各邦的警察監督權與國內最強有力的警察隊之自由支配權，都落於國社黨手中。不過，在普魯士邦內，巴本掌握最高的權威，而且在普魯士內閣裏面，與在中央政府內閣裏面一樣，國社黨仍然居於少數的地位。照憲法的規定，當然是由國務總理決定一般政治的方針。然而，在政治上絲毫都不懂的希特勒先生，便能反對一切嗎？因此，總統慎重的將外交責任交與保守派之牛賴特（Von Neurath），將國防軍交與一個妥當的軍官，來自哥尼斯堡的布倫堡（Von Blomberg）將軍。後者攜帶他的秘書長賴赫瑙（Von Reichenau）大佐同來。誰曾注意到這個人是與國社黨有關係呢？其它的位置，多半重新落於巴本之知己的同事手裏：許威林·克洛

西格(von Schwerin-Krosigk)伯爵——有名的專門家——仍任財政部長，律柏納克(Eilts von Ribbenack)子爵仍任交通部長，而基烈克(Gerecke)博士則爲失業監督，基烈克爲奧登堡的心腹，在奧登堡被選連任那時期，他曾指揮宣傳的工作，因爲這個緣故，他於幾個星期後，被國社黨人從部長的座位拖入監牢。還有前任巴伐尼亞司法部長之孤爾脫勒博士。我們已經認識這個人，數年前曾阻止驅逐希特勒出德國的便是他。胡根堡受到重要的兩部：經濟部與農部；他在普魯士內閣裏面佔領同樣的部務，因此他可以發揮他之專門家的才能——這實是他老早所希望的。他爲不願宣傳只管實際工作的內閣政治人物中之第一個，而且得有實現這個行爲的方法。鋼盔團首領佛蘭斯·塞爾德(Franz Seldte)任勞動部長，戈林也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內閣裏面佔領一個位置，他任航空部長。但還有一個人暫時無從安插，這個人乃是戈培爾。希特勒是被放流到無望的少數地位嗎？希特勒受壓迫嗎？我們隨後便可分曉。

一月三十日晚上，國社黨慶祝它的勝利。勝利的大宣傳是開始了，並且三月五日選舉的勝利，大部份是基於此。在繼續好幾個鐘頭中，二萬五千個提燈人遊行於威廉街(Wilhelmstrasse)；老

興登堡全身冰冷的站在總統府窗前。隔了幾步，在另一個窗前，站着全身舞蹈的希特勒。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那天，他在布格博羅酒店宣佈廢立中央政府以來，在羣衆面前，他從來沒有這次那麼高興。在他整個身上，祇看到凱旋的笑顏；他的上半身不倦的探出窗外而向羣衆行禮。



## 第十六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至三月五日

### 一 中央黨之失掉機會

「到我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復興那天，我的任務纔告完成了，」這句話是希特勒於一九二四年對慕尼黑的陪審員說的。

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他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嗎？輿論界的權威之十分正派的各報紙，都承認胡根堡爲真正的勝利者。在普魯士邦政府裏，與在中央政府裏一樣，胡根堡綰領四部的職務，而且是屬於經濟方面的各部，在這個苛刻計算的時代，牠們實代表真正的起重的槓桿。士威林·克洛西格伯爵乃爲厭惡國社黨人的右傾人物，他以財政總長地位看守錢櫃；至於國防軍裏面，則施萊轍的勢力似乎仍然很強盛的。絕對不，國社黨之加入政府，並不會實現國社主義之偉大的

革命。恰是相反，從現在起，這個革命纔見開始；從現在起，纔開始希特勒之最偉大的和最可怕的鬭爭呢。

這個鬭爭的運動是追逐兩個目標，牠們恰與兩個方法相呼應。希特勒須藉熱狂的宣傳以獲取多數的民衆；我們所指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指他的龐雜的盟友。這個宣傳之最有力的武器，即爲希特勒之任國務總理這個事實。第二個目標則爲消滅他之一切敵人與競爭者，從共產黨以至德意志國民黨。這個目標後來果然也達到，所靠的是使用——在結果上是兇狠的而在方法上是最精細的——國社黨所擁有的權力，但又不是國家之最高的權力。

中間會發生一幕劇景，使希特勒得渡過最後的難關。興登堡總統要新國務總理嚴密遵守憲法的規定，並且不得企圖擾亂國內和平，他對這點會特別堅持。所以，在下令解散國會前，他要嘗試是否可以找出擁護新內閣的多數。希特勒於是與中央黨領袖喀斯（Kas）開始談判，商量將國會延會一年。但喀斯拒絕作任何接談，祇寄一封信給希特勒，在信裏面，他向後者提出至少有十個以上的難堪的問題，等於強迫後者接受一個政綱，而且使國社主義的革命或復辟運動都不能實

現加之，中央黨又將信裏面所提出的各問題在報上發表；這實欲迫希特勒處於一種政治的繃勒之下了。因此，希特勒不費力氣，得到內閣各同事的同意，而與中央黨決裂了。他寫一封極和氣的信給喀斯，在信裏面，他向喀斯說，現在應當不要繼續談判，因為繼續談判的結果，祇有使他們彼此的關係發生破裂，他是想極力避免這種結果的。在上帝面前和在他自己的良心上，他感覺解除散國會外，沒有其它解決辦法了。這樣的，於無心中，中央黨給希特勒以動作的自由，使他隨後可以掃除保守派的各同事。

## 二 戈林之組織力量

國社黨之應用行政的機能，其迅速程度實可驚異的。他們所讓與德意志國民黨的各部，僅是無頭的機體；反之，戈林藉普魯士政府內務部的地位，指揮整個德國的行政機關。他一到就職後，立刻任命一批叫做名譽的部員，如保護隊首領達魯格及他個人的助手荷爾（Hall）與邁麥斐爾特（Sommerfeld）等等；希特勒的律師律厄格布倫博士（Dr. Luegbrunn）被任為法律顧問。

退職總檢察官格羅爾特 (Grottel) 被任爲警政處處長。格羅爾特爲一個最早的國社黨黨員，且曾以多量的金錢捐輸國社黨。

立刻，免職與新任命波及全國。從各省省長以至於警廳刑事督察長，凡曾擁護左派政策的公務員，都被罷免或分發到候補班裏去。繼任的人物幾乎全部是國社黨黨員。許多挺進隊首領和舊日國社黨職員都充當警察總監，甚且替代那些政治主張極右傾的人們。柏林警察總監麥爾撒 (Melcher) 便是一例，他爲巴本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推翻普魯士社會黨政府的主要主動者之一，現在被一個國社黨黨人，退職海軍少將利威素 (Lewitzow) 所代替。即在三月五日的選舉前，有幾百個警界官吏已經在普魯士失掉他們的位置。唯有靠着這種積極的動作，戈林纔能於四星期的短時間中，組織一個權力出來，即使後來的局勢發展比較遲緩，德意志國民黨也不容易推翻這個權力。

### 三 「保護德意志人民」緊急條例

爲使這個政治的新機能得到活動的效率起見，則當使牠握有某種全權，足使在巴本內閣時代已經大受摧殘的公民政治平等，從此永遠消滅。因此，總統不能不於二月四日簽署一個緊急條例，後者是取一個漂亮的名稱：保護德意志人民緊急條例。政府得條例賦予禁止某種露天開會與穿着某種制服的權利；每次政治的集會須於事先四十八小時通知官廳，如果官廳認爲危害公共安全，可以下令禁止舉行；如果政府的當局人物受了侮辱，則可以立刻解散所開的會。同樣，報紙也可以受沒收的處分，如果牠犯了如侮辱各官吏或企圖嘲弄後者的罪狀。靠着這個富有彈性的條例，戈林屬下各警察總監可以隨意取締任何報紙或禁止任何敵人的競選演講會。在新政府成立頭幾個星期中，他們會儘量行使這個機能；社會黨總機關之前進報，便於這種情形中，甚且在國會焚燬前，經過兩次取締，而來比錫帝國法院會兩次解除禁令；法院第五庭會於一天之中，在同一堂審裏面，解除七個取締報紙的禁令。

發生於下層的恐怖又助長了發生於上層的恐怖的氣餒。一到希特勒登上政壇，共產黨立刻散發舉行總罷工的通告，並且組織街面示威運動，我們應當承認共產黨的舉動實使對方容易有

所藉口。不過，局勢的演進實表現着國社黨已決計先發制人。在共產黨集會各地方，曾發生許多次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事件中，至少可以證明進攻者是屬於國社黨方面。挺進隊已經不將各方面敵人分別清楚，而搗亂他們的集會；在克里佛爾德城（Krefeld），挺進隊便是這樣地搗亂中央黨所開競選演講會，向空開手槍以驅散參加者，並且傷毆演講人——前任部長斯泰哥華爾德（Stegemann）。中央黨另有許多次的集會都遇到同樣的情形；布魯寧博士即曾在其中一次會中演講。根據情報處的官方消息所稱，直到三月五日，在這些次衝突中，會有五十一個國社黨的敵人失掉性命，至於國社黨本身，也死去十八人。大家覺得內務部長戈林對他的國社黨同志的強暴行為，並不十分在乎；反之，巴本與胡根堡所提出的抗議，至少會使希特勒感覺為難。希特勒遂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一篇宣言，在那裏面，他力將這些強暴行為歸咎於敵人所雇用的煽亂者——但他並不會舉出證據來。這篇宣言有可注意的價值，因為牠為希特勒從這個時候起所發表二十多篇宣言中之第一篇，而且他在那裏面極力驅逐他本身所引用的惡魔。

#### 四 戈林下令開槍

從那個時期起，鼓動使用暴力與勸告遵循理智，於瞬息之中，更番輪替，總而言之，是處於異常的更迭之中。希特勒在他那方面，請大家採取鎮靜態度，戈林則公佈一篇有名的通令，在那裏面，他命令警務人員採取一切斷然的手段，以對付即在表面上對挺進隊與鋼盔團取惡意的態度；反之，他們須援助這些份子之一切「國民的」積極行動。『凡警務人員在履行他們的任務上而使用他們的武器，不論他們的行動會引起如何的結果，全由我代為掩護；反之，凡有不注意這個方針的行為者當受懲罰……』。這等於強迫各屬員跟隨他的瘋狂行動。每個警務人員，在出差時，遇到與左傾政黨的份子發生糾紛時候，須作這個考慮：如果我不開槍，我便有失掉飯碗的危險；如果我開槍，不管怎樣，總有人替我掩護。

#### 五 警察別動隊

經過幾個星期後，至少在警察方面，國社黨人已經完成了他們的革命。

二月二十二日，戈林發表一篇命令如下：『……從應加防範的地方的面積過量增加後，眼前所不能照需要的程度而擴充的警察力量，從好久以來，甚至於有力履行牠的任務，都不可能了。警察義勇隊與別動隊都成爲不可少的。』

命令裏面，跟着指定加入警察別動隊的各種條件：須爲純正的德國人，有國家觀念與享有公權的人。這個警察隊的人員，可以穿着其它團體（即如挺進隊與鋼盔團）的制服；祇須佩帶蓋了正式印章與寫了 *Hilfspolizei* 黑字的白色臂章。警察別動隊隊員每日領取三馬克的薪給。但政府眼中視爲最關重要者，則爲他們也領有膠皮製的警棍和手槍。

其實，這個命令不過實現了挺進隊的動員令，使之爲國社主義的革命效力而已。警察別動隊隊員祇可在鋼盔團中挑選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是屬於挺進隊份子，百分之三十是屬於精粹的隊伍之保護隊份子。總共算來，在普魯士境內，招募了五萬人。我們若想在此後幾星期中所發生使全世界憤憤不平的各種行爲裏面，得到相當了解，則須明白武裝的挺進隊會堂皇的履行它的



任務，這個任務即爲以一種做榜樣的殘酷行爲恐嚇德國的輿論，遂使無需要打斷敵人之比較廣大的戰線的抵抗，爲的是這個戰線始終不敢組織起來。

## 六、共產黨的地窟

希特勒所要破壞的，乃是威馬爾憲法的德意志。從國社黨——自由的仇人——在國會中佔得多數後，這個自由的制度已經消滅了；然而，新的政敵可以採用某種新的方法，使舊制度死灰復燃，這種事實隨時是可能的。而且這些敵人可以比威馬爾的殘廢者更危險萬分。社會主義的工人與國防軍聯盟以推翻希特勒的獨裁，在那時候，這個局面是很可能的，而且不至受共產黨的掣肘。在國防軍裏面的某某團體裏——甚且在胡根堡的德意志國民黨內，曾有人洗着的考慮這種聯盟。可是，這裏面應與注意的，他們祇認這個步驟爲一種防守的辦法，以還擊國社黨的進攻。因此，國社黨保有先發制人的優勢。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非常的現象：共產黨變成保守派政黨，反抗希特勒之最有力的支柱。在下

屆國會中構成一個多數，共產黨議席的數目實為成敗關鍵的角色。不錯的，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選出的國會中，國社黨並沒有得到多數；它與德意志國民黨聯合後，纔能得到。但到共產黨議員排走之後，國社黨便單獨擁有絕對的多數了。所以，在選舉前幾個星期中，國社黨最主要的工作乃為搗碎共產黨。祇有在這個觀點之下，纔可領會國社黨的全部行動。

二月二十四日，警察猝然闖入共產黨中央機關之李普克尼希 (Triebnecht) 館。黨的指導部已於幾個星期前離館，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離館前，已曾慎重的攜走一切有關係的文件。事實上，大家並沒有聽說警察曾搜獲重要的文件，如黨員名單、組織計劃等等。情形固是如此，但仍不足阻礙公佈關於這次搜查所得物件之最荒誕的通告；通告裏面曾作如下的敘述：

「據康梯 (Conti) 通訊社的報告，政治警察曾於兩天前關閉之李普克尼希館中，發現許多藏有大批供賣國行為使用的宣傳材料的地窖。此外，又發現一條地道，在歷次搜查中，警察所尋覓的人物，全由這條地道脫逃。直到這個時候，警察從未發現這些地窖和地道等等……」

「地窖裏面藏有好幾百擔的『賣國材料』，應為李普克尼希館中印刷機所印成的。在這些

傳單裏面，他們鼓動人民作武裝的叛變與流血的革命。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是爲着訓練與組織共產黨幹部用的。那裏面會說，到革命爆發後，所有各地著名的資產者都應與以監牢和槍決的處分。」

經過三天後，普魯士官辦情報處又發表戈林的一篇宣言，以補充上面很空泛的報告：「德國非陷於鮑爾雪維克主義的混亂狀態不可。暗殺人民與政府的領袖，破壞國家的根本機關與公共建築物，毒殺整批特別可畏的人物，捕獲婦孺與有名望的人物作抵押品，這種種動作便可陷人民於恐怖的狀態，且消滅資產階級之一切抵抗的意志。

「戈林部長在最短期間內即公佈這些文件。」

必然的，在每個公正的研究者心中，這篇報告裏面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後那一句話。可是，這些非常的祕密文件始終不會發表。有人說，德意志國民黨派下各部長反對發表，因爲受控告各文件的性質，是過於不重要的。

據說，後面這些文件也含有暗殺國社黨各領袖以及破壞公共建築物的計劃。根據這個發現

則戈林非受敵人的襲擊不可了。如果我們站在共產黨的觀念上，必然覺得在選舉的前夜，暗殺希特勒或戈林，則共產黨靠此所得的利益，必遠過於靠無用的縱火焚燒一座公共建築物。然而，官方的報告，則共產黨祇願採取後面的步驟。在官方的消息上，大家並不會聽說希特勒在那個時候曾有性命的危險。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約在八點鐘左右，柏林皇宮的救火夫發現在一間改為辦事室的房內開始失火。他們立刻加以撲滅。在窗口欄板上與在暖氣管上，他們發現引火的小木頭，因此有人認為故意縱火的企圖。各報館之得到皇宮失火的消息，乃在兩天之後，即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而一番更動人的事變在那時已經發生出來了。不錯的，即在這一天的晚上，下面的消息使全球震動。

## 七 國會縱火案

「星期一晚上，約在九時十五分鐘，救火隊被喚趕往國會，那裏面的圓頂廳發生火警。柏林十個火隊儘數趕往施救；大批警察也趕到那裏，且立刻斷絕國會四圍的交通。救火隊趕到時候，中

央大圓頂已在燃燒之中。光星如雨點似的降落附近各處。救火隊和警察立刻鑽入國會裏面，因而能夠抓着一個人，後者很快的自認爲縱火者。他宣稱自己是荷蘭共產黨黨員。」

這個頭一個匆忙的消息發表後，隨後於二十八日頭幾點鐘，接着公布普魯士官方情報處的  
另一個消息。

「星期一晚上，德國國會發生火警。普魯士內務部長戈林先生於趕到失事的地點後，即親身指揮一切施救的工作。國務總理希特勒與國務副總理巴本，於得到首先的消息後，也立刻趕來。

「我們遇到在德國向所未有之最嚴重的故意縱火行爲，這是無可否認的了。經警察的調查，整個建築物，從下層到圓頂，遍佈着引火處。引火所用的材料爲柏油類和火把，這些東西是放在皮面坐椅中，印刷品堆中，門扇、窗簾、木版及其它容易燃燒的地方。有一個警士在黑暗的屋中瞥見許多人手提燃燒的火把。終於在這些放火人中捕獲一個。這個人爲二十五歲年紀的土匠，名爲凡得陸布 (von der Lubbe)，原籍爲荷蘭之萊提 (Leyde) 地方，身上攜有一張合式的

荷蘭護照，並且自認屬於荷蘭共產黨。

「國會中央建築物全部燒燬，議事廳及其演壇與花樓均受破壞。損失的數目達幾百萬以上。這次放火行為實爲鮑爾雪維克主義所未曾在德國做過之最可怕的恐怖行為。在警察於搜查李普克尼希館中時候，所發現的幾百擔主張破壞的傳單中，我們曾找出關於用鮑爾雪維克的式樣而採取共產主義的恐怖步驟的訓令。

「各公共建築物，各府殿，各博物院以及根本重要的企業機關，均須燒燬。他們也曾指出，在與武裝的力量發生衝突時候，須將婦女與童孺，如可能的話，將警務人員的婦孺，排在恐怖的隊伍面頭。靠在發現了這種材料，鮑爾雪維克革命之有計劃的實現是被我們所阻礙了。情形固然如此，但國會的縱火當爲內戰和流血的叛變的信號。他們已經計劃於星期二早晨四時在柏林作大規模的劫掠。現在已經證明恐怖的行為將於今天在全德國境內發生，以危害各主要人物，私有財產與和平人民的生命爲目的，並且將牽動內戰。」

我們從各證人在來比錫法庭的審判中所陳述的內容，知道這篇官方的報告，至少在兩要點

上，是不正確的。當著者寫到這幾行的時候，來比錫法庭的審判尙未結束，歷史家還不能將國會縱火案的來歷下一個確定的判斷。不過，我們已經可以證明下面的事實：官方報告堅稱警察曾在全部建築物中，尋獲柏油類製品和引火的火把。這一點是不確的；所有各警士與救火隊隊員都說不會在任何地方找出柏油類製品或火把。加之，官方報告堅稱凡得陸布曾自認隸屬於荷蘭共產黨。這一點也是不確的。凡得陸布會特別聲明不隸屬於任何政黨。在另一篇的報告裏面，甚至說有人在凡得陸布身上搜出一張共產黨黨員證。這一點也是錯謬的；在審判中，捕獲凡得陸布的警察所報告的話會與以證明。

官方報告還堅持另一點，直到現在，這點並沒有替它維護的證據。它肯定在李普克尼希館中搜出許多文件，照那裏面所說，國會放火不過是共產黨有計劃的行動之開始。隨後須跟着在它處放火，抓人，抓抵押人，甚至在各飯館裏面以毒藥滲入食品。戈林會答應「在最短期間內」發表這些文件。直到現在，這些文件還不曾公佈出來，甚且不會在法庭中提出。我們還須提起這個事實：經在全德國境內共產黨的機關進行搜查後，沒有人聽說會搜得足以判斷紅色恐怖的陰謀之存在。

的文件。

我們還未算完官方報告所包含不正確的地方呢。官方報告還說道：『放火者在招供當中曾自認與社會民主黨有關係。』又是不正確的斷言。在初步預審時候，佛格特（Vogel）法官已經報告說：『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非共產黨的方面曾與國會縱火案件有關係。』

在凡得陸布身邊，另有四個人坐在被告席中；其中兩人為著名的共產黨領袖：國會共產黨派議員的領袖托耳格勒（Torgler）與布加尼亞共產黨領袖狄米托洛夫（Dimitrop）；其他兩人為共產黨學生波波夫（Popov）與馬其頓鞋匠塔捏夫（Tanet）。檢舉方面對於控告他們的幾個事歷，已經放棄不用，譬如有人指控托耳格勒及其同事庫侖（Koenen）曾於失火那天匆遽離開國會。還有國社黨議員喀瓦恩（Karwahné）與夫賴（Frey）及國社黨派公務員克瓦耶（Kroyer）在法庭所投的見證，若照這個見證所說，則托耳格勒曾在國會中與凡得陸布接談。這些證人怎麼想不到，在這個時間中，合謀放火的首領怎麼會在大庭廣衆的國會中與同謀犯商量他們的計劃；這點姑且不管。但檢舉方面至多也應該想到共產黨之放火焚燒國會到底對它本身有何利益。因



爲，放火是否祇使共產黨陷於不利的地位，對這個問題，唯有凡得陸布心中可以懷疑；托耳格勒與狄米托洛夫則不會有錯謬的見解。

即在放火的那一天夜裏，喀瓦恩便跑到督察長達魯格家，叫他踪跡托耳格勒。他們起初會照這樣做去，這是應然的事實；但到了偵查方面證明證據不充分後，他們還是固執不已，這一點實是怪異的。我們有時候會以爲他們故意注重這個不可靠的偵察，目的在避免做另一方面的偵察。

一到放火的消息傳出後，所有外國的報紙都懷疑主動者不是共產黨。這種懷疑又得有德國國內的呼聲的呼應，這個呼聲是發自因縱火案而遭受或許更嚴重於共產黨的損失之政治黨派。不錯的，共產黨可以預料到，不管有沒有國會放火事件，它在德國合法活動的前途已經註定了。反之，在德意志國民黨看去，放火事件乃專有利於國社黨之特別重要的宣傳工具。除此之外，還有驅逐共產黨出國會的事實，其結果將減低保守派的地位。保守派方面，當然不欲阻礙揭開事件的真相，得以免除共產黨的罪狀，或許且將罪狀判歸其他人物的身上。

可是，在這一點上，保守派各領袖的意見不會立刻一致。胡根堡在他那方面，還且於三月二日

在俾勒斐爾德 (Bielefeld) 所作的演講中，說國會縱火事件是爲共產黨人舉事的信號，同時也爲他們的同謀犯社會黨民主黨人舉事的信號。胡根堡是採取國社黨的論調了。在這個時候，他的態度是否誠實的，或他所說的話是否違反他的本意，我們不能加以斷定。但至少他總不至不知道他的左右對於官方報告的正確性是抱着懷疑態度的。

在四月中間，有一篇記事小冊子散佈到柏林政界團體，對於國會縱火事件的內幕，曾有驚人的披露。後來，有人指出德意志國民黨議員奧柏佛倫 (Oberfohren) 爲這小冊子的作者。無疑問的，奧柏佛倫博士曾在第三者面前宣佈與小冊子內容同性質的話，但若說冊子是出於他的手筆，則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證據。據一個靈通消息的來源說，真正的作者乃爲一個右傾新聞記者，他在那個時候曾出入於奧柏佛倫所常往來的政治團體。

冊子堅認下手放火者爲國社黨人，因爲戈培爾博士希望產生一顆驚人的「選舉炸彈」。牠控告戈培爾與戈林爲這次事件之道德上的主謀者，而北勒斯勞 (Breslau) 警察總監亨斯則爲下手執行者。但牠並不指明這種控告是根據那一類的具體的事實。在三月底，普魯士警察曾搜查

奧柏佛倫博士的家，搜獲了反動的傳單。據警察方面說，這些傳單乃關於反對德意志國民黨領袖胡根堡之變相的和不署名的攻擊。奧柏佛倫博士立即辭去他的議員位置；到五月六日，警察方面宣佈他在基爾家中自殺了。或許有人因為對於死者不會發生損害，所以將那個文件委於他的身上。這一點姑且不管。冊子幾乎完全轉載了在三月初流行於保守派各團體中的謠傳。在格來行（Heinrich von Gleichen）所主辦的右派雜誌『企業家同盟』（Der Ring）三月第二號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論調：

「我們果然是盲目禽獸似的人民嗎？這次變故的煽動者藏在那裏呢？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他們是在何等安全的保障中而動作呢！以替代答覆這些疑問，我們冷酷的宣告說：我們缺乏如英國及其它國家所擁有的秘密警察……假定我們擁有這一類的組織，則大家今日便明白應向那一方向尋求國會縱火事件的煽動者，而且也已經知道真正的下手之人。或許他們是德國的或國際的最優越的社會的會員呢。」

顯然的，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不容易掩飾一種比較顯明的口吻。而且發言者不僅格來行，奧柏

佛倫博士及上面所述的新聞記者。二月二十八日，內閣會討論縱火事件，並會將一篇半官式的紀述會議情形的通訊稿送給各報館。據佛蘭克爾日報的登載，稿子內容是如下：

「內閣會費大部份時間討論內務部特派員戈林所遞呈關於昨日縱火事件，柏林皇宮縱火的陰謀及李普克尼希館中所查獲各文件之極詳細說明的報告書。照戈林部長的報告書的內容，現在發出可靠的消息如下……。」

這裏面的話是代表什麼意義呢？當然是在政府內部，有人用起草這篇通訊所取的格式，極力將過去及未來的全部責任卸在戈林身上。起草這篇文章者，顯然使留心注意的人們明白了下面所述的情形是戈林說的，而不是起草者說的。這樣後，下面接着從新敘述共產黨所計劃之一切恐怖的步伐。通訊稿便繼續說道：

「關於國會縱火事件，已經無疑問的證明（這全是根據戈林的報告書說的）共產黨議員托耳格勒曾在國會裏與放火犯交談數小時。有人看到另有許多人在他身邊，而這些人中，便有在國會手提火把者在內，警察不能捕獲，或許因為他們從溝通國會與國會主席官邸的裝設暖氣管

的地道逃走。昨天晚上，另有兩人企圖從國會打電話通到外面，意在將縱火罪狀卸於戈林先生身上，這兩人也被捕了。當訊問他們時，他們承認與社會黨及其機關報有關係。關於這個問題上，眼前不能多所發表，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在所有各篇官方的通告中，這一篇通訊稿儼然像一個神祕的石壁矗立我們眼前。有人常常認溝通國會與戈林官邸的地道之暗示為不經意的供語。這種笨拙的判斷，實不近人情的。我們反可以考慮是否有人故意在這一點上關照大家呢。這個疑念可因另一事實而強化，即通訊稿有心涉到有兩人想通電話到外面的事實；「電訊聯合社」即屬於胡根堡的通訊社，甚至進一步說這次電話是打到前進報去的；它於是告訴兩個人物說國會縱火事件是奉戈林命令執行的，並且冒稱它是受前進報的委託而傳播這個消息的。前進報總主筆立即極力否認這個消息，並且證明沒有人會通電話與報館談關於縱火的消息。

隨後，大家再也不提這些神祕的打電話者，即在來比錫法庭的各被告中，也絕不見他們的影子。照這種情形說，他們乃出於假造的，但是誰出來假造呢？果然是有人，為著某種原因，想在公眾眼

前，將「放火者」與「戈林」兩個名詞膠着一塊嗎？當然的，官方機關報隨後便指為「毀謗」；然而，目的中的效果終於產生出來。

所產生的效果乃為「放火人戈林」這個公式立刻遍傳街上。在宣傳技術上最無經驗的新進者，都能預料到這個結果。所以很難相信那裏面是一種無心的笨拙行爲。恰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可以肯定在政府內部，有人使用在他權力範圍一切可能的方法，想使大衆明白縱火事件之真正的煽動者。

從這一方面發出這種驚人的暗示，大有加以鄭重考慮之價值。牠是一種徵驗，並且是很嚴重的徵驗；牠是不能成爲證據的——我們須特別注意這一點——但一到法庭拒絕或避免審查牠的內容，牠便成爲一個證據了。有一個前任有名的部長，曾爲布魯寧內閣閣員，在電話中與戈林激烈爭論之下，曾罵後者說：「得啦！不要再向我們提你的金諾維柔（Zinoviev）式的放火啦！」這是引用著名的金諾維柔信札的典故——英國保守黨在一九二五年的選舉前，發表這封信札，結果曾使工黨遭受嚴重的打擊，但事後證明牠是偽造的。

在來比錫法庭裏，人們聽取不適當的證人。他們傳訊大家所指控犯同謀罪的國社黨各領袖。他們應當邀請巴本先生，並且訊問他所知道關於奧柏佛倫博士的記事冊的來歷。或許巴本可以說出真正的作者。或許他甚至可以指出放火者……

在客觀上，人們可以說放火者爲一批共產黨人與放火者爲一批國社黨人，是同樣有可能性的。但檢舉方面不提任何一批的共產黨，而即提共產黨的指導機關。在這種情形下，這種可能性是傾向於國社黨方面了。人們比較容易相信一批孤獨行動的國社黨人，可以下手放火，其結果將有利於他們的政黨，但不容易相信共產黨負責的各領袖，可以做這種舉動，因爲後者不至不明白這種舉動將有害於他們的政黨。國社黨放火的夥伴到底與黨的領袖有着什麼樣的關係呢，合夥者是什麼人呢？無疑的，探索究竟是很危險的。

有人將預言家漢努森（Hannussen）的暗殺案——司法當局始終不會過問——與國會縱火案聯繫一起，且以爲預言家認識縱火案的主謀者。這個假定至少有與以審查的價值。漢努森因爲一種不相干的原因，會在那時充任柏林挺進隊之最高領袖的黑爾道夫伯爵身邊擁有很大

的勢力（他甚且企圖利用這種勢力以作欺騙的行爲）。黑爾道夫素來很迷信，無論如何，曾在長時期中信任這個預言家——並且不是亞利安種——他並且參預奧柏佛日記事冊所指為縱火案煽動者之羅姆的密切朋友的團體裏面。柏林警察總監的位置原應交給黑爾道夫而非交給利威素軍少將，但因為巴本反對而作罷。到漢努森死後，黑爾道夫於四月初被召回慕尼黑，失掉柏林挺進隊首領的位置，而退處波斯丹警察總監的位置。如果黑爾道夫熟悉國會縱火案的來歷，則漢努森之同時聽到一點消息，乃是很可能的事實了。後者並且曾利用這種情形以發出失火的預言。（他說：「我看見一座大建築物燃燒起來。」）

可是，在放火那一夜中，黑爾道夫的行動實使人相信他是熟悉內容的，不錯的，即在他本人在來比錫法庭所說的話中，便可以看出；他說，當他在一家飯館裏聽到國會失火的消息後，他便回家睡覺。他處於柏林挺進隊最高領袖的地位，從李普克尼希館中所搜獲的文件裏面，他已知道共產黨將於第二天清晨四點鐘起事，便仍然這樣的行動嗎？假定黑爾道夫是一個被告而不是一個證人，則人們可以駁他說，因為要做出事件發生時本人不在場的證據，他竟至做出這麼完全不合理



的舉動（這是刑法家所深切明瞭的情形）。當一個人已經知道共產黨的暴動連同縱火和以毒物滲和食品將於第二天即刻發生，並且本身又爲柏林挺進隊的首領，他便不至即在聽到國會已經燃燒的時候回家睡覺。黑爾道夫伯爵是否即屬於格來行所指出的「德國最優越的社會」裏面嗎？

因爲過於明瞭許多事實，另有一個人，國際訪員喬治·柏爾博士（Dr. George Bell）於四月三日，在奧大利國境的庫夫斯登（Kufstein）城附近，被從巴伐尼亞乘兩輛汽車來的不知名人們所暗殺。柏爾爲羅姆的舊同事；他曾參預有一次偽造蘇俄銀行鈔票的事件。他能夠使用絕頂靈活的手段，使褐宮內部之各對立的壁壘，都對他發生感情，不論對於羅森培也好，對於羅姆也好，他都有着最圓滿的關係。在某時期中，他影響羅姆的力量是到了那麼重大的程度，竟能使羅姆會見帶共和主義色彩的帝國旗協會的一個主要首領邁爾。在這次會面中，羅姆極坦白的披露他本身的政黨中某某派別的情形，並使對手明瞭無論在那一個壁壘裏面，軍人應當聯合起來，以打破文人之傲慢的優越地位。柏爾曾熟悉此中的祕密並及羅姆之受大乘激烈抨擊的私人生活之種

種特點。從一九三二年來，他已脫離羅姆，他怕生命發生危險，會將實情儘量告訴第三者。所以他的暗殺案的來歷，很可以說明出來，無須牽連到國會縱火案件；但有些證人卻肯定他也曾將縱火案的祕密告訴他們。

總而言之，唯有法庭可以列出確定的證據。可是，我們已看到有無數的徵象及證人的剖白，無論如何，可以爲托耳格勒辯護。法庭既然拒絕各被告延請外國的律師，即絕對守中立的律師，我們很難希望有利於各被告的證據可以全部利用。至於期待有害其它方面的同謀罪的假定，可以得到人們的考慮，則希望更少了。既然國外對於戈林會作嚴重的控告，因爲什麼理由可以拒絕非德國的律師出庭辯護呢。果然是無可掩飾的話，則將外國辯護人混湊法庭中，對於德國政府應當是一件愉快情事。

爲什麼他們要拋棄這件愉快情事呢？

（註）來比錫法庭從九月二十一日開庭，經過三個月的審問後，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讀判決書。凡得陸布被列處死罪；托耳格勒、狄米托洛夫、波波夫及塔涅夫均宣告無罪。國社黨機關報以司法的譏諷形容這判決書。

## 八 「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

有一件事實是確定的：即國社黨極力利用國會縱火事件。

二月二十八日晚上，總統簽署第二號緊急條例，「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牠廢除憲法承認公民所享有的一切基本的權利，從這個時候起，牠永爲希特勒統制德意志的法律。條例的主要各節如下：

「在新命令頒佈之前，德意志人民的憲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百十五條，第一百十七條，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五十三條，以上各條均停止發生效力。政府可以限制個人自由，發表思想的權利，以及出版自由與集會結社的權利；郵政電報電話的通訊祕密不受保障；政府同時有權檢查人民住宅，沒收及限制個人財產的權利。」

另有兩節規定各級苛刻的刑罰，死刑可以隨便施行，譬如，遇有武裝抵抗的情事，即使在行動中不會發生殺人的結果，也可受死刑的處分。

總而言之，這是等於從前的戒嚴法。但是，以後者而論，權柄應操在軍事當局的手裏。國社黨人很機巧的利用施萊轍的理論，說軍隊不應濫入政治的漩渦，因此能夠將權柄移交警察當局，換句話說，關於普魯士境內，交與戈林。

立刻，戈林下令拘留全部共產黨的國會議員，以及一批社會黨的議員與左傾的政客及著作家；他不僅禁止共產黨人開會和共產黨的機關報出版，並且勒令所有社會黨的機關報停版十五天。理由：凡得陸布會自認與社會民主黨有關係。我們曾知道過幾天後這件事即被大家認為偽造的；但戈林仍然一期又一期的重申禁止出版的命令，直到了社會黨機關報陷於破產，最後由所有者手裏被人沒收為止。挺進隊的人物，穿着警察別動隊的服裝，坐大汽車在城中奔馳，闖入「馬克思主義者」的住宅，將他們拖到挺進隊的營裏去，而在那裏面將他們打成半生不死——關於這種情形，我們實有另闢一章與以敘述之必要。在放火案發生後四十八小時內，普魯士境內有二千人以上被拘留；因為他們的人數隨後不斷的增加，挺進隊於是設立了許多收容所，而在那裏面，照佛力克的用語，教化馬克思主義者，使成爲社會之有用的份子。

照希特勒的意見，大部份的人民是以爲共產黨藉社會黨的援助而放火燒燬國會。在從前不甚糾亂的時期中，所有這些輕信者都投票擁護德意志國民黨，現在他們投國社黨這邊來了。

其他的選舉人，心中危懼，而且在看到郵信與電話的祕密取消後，他們便疑慮投票的祕密是否比較受了官方的尊重。左派政黨的競選集會是被禁止舉行了，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機關報也不見踪跡了。三月五日，在許多投票分所前，甚至沒有手提社會黨廣告與散發社會黨票單的人。情形固然如此，選舉的經過仍然很有規則。共產黨還未受取締；假定已經取締共產黨的話，則共產黨的選舉人將投社會黨的票，結果將增強社會黨的地位了。當然的，無線電播音幾乎只許國社黨使用，唯有右派的政黨可以有時利用。

參加選舉的人數是特見增多，佔全部選民之百分之八十八。希特勒爲國社黨提出全數選區的名單中的領袖，得到一千七百二十萬票，即佔全部選舉票的百分之四十三零九。他不僅可以補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的失敗，並且遠遠超過他於七月三十一日所達到的高峯。

新國會共有六百四十七名議員，分配如下：

黨	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三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國社黨	二八八		一九六	二三〇
社會民主黨	一二〇		一一一	一三三
共產黨	八一		一〇〇	八九
中央黨	七三		七〇	七五
德意志國民黨	五二		五二	四〇
德意志人民黨	二		一一	七
德意志國家黨	五		二	四
社會基督教黨	四		六	三
德意志農民黨	二		三	二
瓦教堡農民大同盟	一		二	一
其他政黨	一		二二	二三
共計	六四七		五八五	六〇七

在同時改選的普魯士邦議會裏，國社黨在總共四百七十四議席中得到二百一十一個，德意志國民黨得到四十三個。

照上面所說，在兩議會裏面，「國民團結的內閣」都擁有絕對的多數。不過，在國會裏面，希特勒須藉德意志國民黨的援助，纔能得到絕對的多數。胡根堡果然是選舉戰中真正的戰勝者嗎？

假定沒有戈林和沒有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則胡根堡將為真正的戰勝者了。不錯的，經宣告共產黨不受法律的保護後，絕不是六百四十七名議員，而是五百六十六名議員，進入國會。而且戈林可以隨意在這五百六十六名中除去若干社會黨的議員——將他們送入收容所。所以國社黨穩穩的擁有絕對的多數，而為選舉中真正的戰勝者了。

麥加希特勒內閣的各資產者祇有善處逆境了。他們會希望整頓秩序，但結果是迫處革命的狀態中。他們固然會期待挺進隊之戰勝的前進，但並不期待國會的縱火以及各處設立收容所這些事實。他們會希望狂風暴雨停止，而又假裝不會看見。有人會將關於各種殘酷行爲的確實文件交與巴本，他看到後，失聲說道，他不能想到這樣的情形。洪水已擁上他們的身邊，但這些國民戰線

的先生們，端正頭上的帽，極力保持尊嚴無比的态度，猶同身在作樂遊巡的途中。



## 第十七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至二十三日

三月五日的選舉之最驚人的事實，乃爲國社主義在巴伐尼亞與萊茵蘭佔勝利。這兩個地方，一向構成天主教政黨的城壕。而巴伐尼亞的國社黨人，竟遠遠的超過直到那時候號稱最強有力的政黨。在其他各邦中，也發生同樣的情形。

戰勝者等待他的時期降臨。隨後，挺進隊便開始動作，掃蕩各邦舊政府。在全德國境內，它們大隊巡行各都市，佔據公共建築物，劫掠各工團的會所，搗毀社會黨機關報的印刷所。它們遍處懸掛卍字旗。

從三月六日起，戈林已經親身命令各省長，不得阻礙挺進隊在公共建築物上豎起卍字旗的舉動。佛力克在他那方面，則於三月八日，任命國社黨的人物爲巴登、瓦敦堡、薩克森及紹謨堡。里卑 (Schaumburg-Lippe) 各邦的內務部特派員。派到薩克森的特派員爲國社黨議員基林格，

即愛斯柏格暗殺案的預謀人物。

在巴伐尼亞境內，直到那個時候，大家從來總是宣佈說：「如果中央政府派一個特派員來，我們即在邊界上把他拘捕起來。」因為大家一向總是將這個特派員當作「普魯士人」看待。可是現在國社黨卻派一個純粹的巴伐尼亞人去，這個人是比當時現任的任何一個部長都要得人民的愛戴：愛勃將軍。到三月十六日，黑爾德內閣下臺了，在正式宣言書中，它自己表示退職。

### 一 保守派之投降

國社黨人在他們的戰勝宣言書中，常常提起這些日子為消滅馬克思主義的日子。其實，他們是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競爭者。果然我們要試用「戰勝馬克思主義的人」這個術語，則真正的戰勝者乃是巴本，而他的勝利的日期，為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反之，他是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這個日期中失敗了。

不錯的，興登堡是於這個日期簽署保守派投降的命令，照這個命令所說，「從明日起，直到關

於國旗的最後決定實現之日止，黑白紅三色旗與卍字旗須同時懸掛……至軍事的建築物及海軍軍艦則僅懸掛德國的軍旗。」

最後的一句話，實爲圖中之唯一的黑影。國防軍遠不肯任人拖到國民革命的漩渦中。

然而，國民革命則繼續牠的侵略。德國中央銀行總裁路德博士，於三月十六日，讓位於野心的沙赫德博士。原爲一個澈底的共和主義者之路德，則被任爲駐華盛頓大使；在華盛頓，他卻與高彩烈的爲國社黨効勞了。

此外，戈培爾於三月十四日被任爲部長。因爲使他可以發揮他的特殊天才起見，於是創設「宣傳部」，在隨後幾個月中，這個宣傳部爲國社黨的主張，爲希特勒的個人，同時不忘爲本部長長的個人，作了備極圓滿的工作。戈培爾於不動聲色之中，將他的同事的各部機關收爲己有，即如外交部之情報司，郵政部之無線電，內務部之電影事業及教育部之政治學院等等。

## 二 波斯丹紀念日

在三月二十一日，即新國會之尊嚴的開幕日期，戈培爾第一次大表現他的才幹。波斯丹軍營的教堂被選為開幕的象徵的會所。奧登堡在一篇短促的演說裏，宣稱人民已經以無可否認的多數擁護他所委託的政府。隨後，他走入貯藏大腓特力遺體的墓室，肅默數分鐘，全場均作宗教的靜默。

幾個鐘頭後，國會聚集於迅速改為議場的克洛爾大劇院，開始工作的會議。共產黨議員——大多數已關在牢獄裏——當然全部缺席，社會黨議員缺席者也有九名。

### 三 國會之屈伏

過後兩天，國會開第二次會。政府方面，需要通過一條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使從二月一日以來事實上獨裁的政權經過合法的批准。照憲法的規定，如要通過這條原案，祇須得到出席的議員——而不是全部的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現在祇須使若干名議員離開會場，便可成功。到開除八十一名共產黨議員後，事情容易辦了。不過，權力還操在中央黨手裏，它可以用投票反對

的辦法或棄權的辦法，拒絕以全權授與希特勒。所以希特勒極力用威脅與利誘的手段，以買好天主教派。他答應後者的領袖喀斯說，所有投票贊成這條法律的各政黨，都聯合組織一個工作委員會，形成一種精華的小國會。當然的，希特勒後來是照過去一樣取消這個許諾，或許祇有中央黨領袖故作信任的表示。在中央黨領袖心中，最關重要者，乃為希特勒在政府宣言裏面，對教堂作某種保證。

在他的闡明政綱的演說中，希特勒曾說了下面這些話：「政府無意將國會所賦與的全權，使用到超出執行根本不可少的步驟之必要的範圍之外。無論是衆議院或參議院，都不至感受脅制。總統的地位及其權利，永遠是不可動搖的。政府的最大義務，乃為始終與總統和衷共濟。德國各邦的獨立，不至受到侵犯；教堂的權利，不至受到限制；牠與政府相互關係的狀態，不至發生更動。」而最後到了直截的結論，即整篇演說所着眼的地方，他便說：「政府以準備實現未來的德意志協調的和平合作之可能性，貢獻各政黨。但它同時很堅決的并且準備着以拒絕的態度對付抵抗的表現。諸君，現在是歸你們身上來決定和平或戰爭。」

戰爭嗎！這即是希特勒最後一句話；即是說，他反抗另一半的德意志人民之永遠不停的戰爭。這一半人民是已經解除武裝了，勝利當然是屬於他了。在講臺和過道中，夾在議員座席中間，站着挺進隊全副武裝的人物。在這種情形下，如果社會黨敢投反對的票，便可算個人的勇敢的表现。社會黨領袖渥托威爾斯（Otto Wels）解釋社會黨反對的理由的演說，雖然在形式上流露怯懦的態度，確仍是有勇氣的動作。喀斯在半冷酷半爲難的態度中，解釋中央黨所以不管種種疑慮而投票贊成的理由；他重述希特勒在預備談判中所答應的種種諾言。大家在那個時候所認爲還有威權的政黨的演說者（指威爾斯），也得到某種成績；即希特勒本人也對他鼓掌。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遂以四百四十一票對社會黨的九十四票通過了。全部國社黨議員鼓舞歡騰，大唱何斯特·維

塞爾歌（Horst-Wessel Lied）。

## 第十八章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七月

### 一 各邦「總督」之創設

三月二十三日以後，德意志各邦的統一，即是說，對於重要的管理位置的侵略，繼續進行。三月三十一日，內閣發表一篇命令，後者的作用是使各邦政府脫離各個的議會而獨立，恰與中央政府內閣之對於國會一樣。此外，邦議會都被解散，不經過新選舉，而按三月五日的選舉票數的比例，重新組織起來，共產黨則當然被排除了。全國其它各級議會，直至規模最小的市議會，全照上面的原則改組。因此，在全國各種議會裏面，國社黨人不但一下子擁有普通的多數，而且經取消共產黨的選票後，擁有了絕對的多數。

可是，這種情形還是不夠滿足希特勒實現統一的志願。四月七日，內閣頒佈一條法律，總而言

之，這條法律是等於永遠取消各邦的獨立，爲的是它在各邦的首腦部設置總督（*Statthalter*），由中央政府內閣直接任命。總督的權力是等於真正的絕對專斷的君主的權力，從任命邦政府內閣各部長及解散邦議會的權力起，以至任命全部官吏與法官（在新制度下，法官變爲可更動的）及頒佈特赦的種種權力。此外，在普魯士邦內，總督則爲中央國務總理所兼任。

這一個步驟是對付國務副總理巴本的，直到那個時候，巴本以中央政府特派員的地位，在普魯士邦內擁有權力，而德意志國民黨則希望他被任爲普魯士內閣的首相。不錯的，希特勒兼任普魯士總督後，即於四月十一日，表示選取戈林，而戈林於是充當普魯士政府的首相了。另有兩個國社黨黨員，刻爾（*Kerrl*）與魯斯特（*Rust*），前者被任爲普魯士內閣的司法部長，後者被任爲文化部長。以最後的抵抗戰壕而言，祇餘胡根堡以特派員名義所統領之普魯士內閣的農業部與經濟部了。可是，希特勒避免以部長名義給與胡根堡，後者祇能保持特派員的名義了。

## 二 普魯士的光榮



戈林一做了普魯士的首相，便發揮整個政治力量以對抗希特勒所切望的統一，他在每個情形中，都極力維護普魯士的自主。在他於五月十八日在邦議會中所發宣言裏面，他說：「建築帝國基礎之重要的任務，是基於在前世紀已經完成過這個任務的普魯士。」他又說道：「無論在任何情形下，我總不願普魯士的所有權脫離了普魯士。」當七月中間，有人提議將東普魯士改建行省，使牠與德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戈林便宣佈說，無論何人如果宣傳這種主張，他便將這個人送拘留所去。

爲使普魯士的光榮能在德意志的眼中更見燦爛奪目，戈林便撤消舊日的評議院，而代以一種新的議事機關。舊評議院不過是各省的代表機關。國社黨工團的領袖雷伊博士求得了主席的位置。戈林不願長期有這個對頭，他便於七月八日，公佈新評議院的組織法。從此之後，評議院的議員是受首相的任命。那些議員是包括各部長、各次長與教堂、科學界、藝術界、經濟界及勞動界的代表。但評議院裏面最重要的一批，則爲國社黨的職員所構成的。挺進隊總部領袖即羅姆，保護隊領袖即興姆勒，工團領袖雷伊，全部普魯士各黨區領袖及各省挺進隊首領，都爲評議院議員。以某種

議會的地位而言，評議院不過爲首相支配下的一個諮詢的議會，首相卽爲裏面的主席。但在個人上，每個議員都在他所關係的省內，擁有至高無上的勢力。各省省長在決定任何重要的步驟前，必須先向代表本省的議員報告。在有些情形中，如任命官吏的情事，評議院議員的否決是最終的決定。

評議院是設於柏林皇宮，卽前皇帝的舊居，任何人都可隨便將牠比擬舊王朝時代的皇室資政院。牠是代表普魯士的光榮的，而現在的巴伐尼亞人海爾曼戈林則想復興這個光榮。

同樣的，在其它各邦，各總督幾乎是違反本人的意志，而傾向於維護本邦之特殊的利益。在巴伐尼亞邦，總督愛勃原是澈底的聯邦主義者，永是忠實於德爾斯巴克王室。當他巡行邦中，穿白衣的女郎，在凱旋門下，向他贈送花冠，那時他已不是中央政府的代理官，而是還在期待收回在他看守下的世襲采地的人的代理官了。所以希特勒在三月二十三日的演說裏，發出激烈的威嚇的確，在眼前，這種希望非撇開不可，或許在相當時期中，還得如此。國社主義革命在巴伐尼亞發生後，魯博烈黑特王子因爲躲避爭論，或許因爲某種更討厭的事情，而作希臘的旅行。到他回來後，愛勃

總督走來謁見，而以新的官階進見王子；王子祇對他說一句話：「人民的好賊！」并且即離開他了。

### 三 各政黨之消滅

(一) 社會黨 極迅速的，或許迅速的程度是遠在國社黨人希望之上，革命消滅了那時候還站得住的政黨。趨於極端的政黨，即是說德意志國民黨與共產黨，支持比較長久。

到現在，共產黨還支持某種祕密的抵抗，固然因受倒戈行爲的影響而日見衰弱。

社會民主黨之崩潰是比較更迅速的了。因爲挽救黨的機能起見，它的領袖渥托·威爾斯曾於三月三十日，脫離第二國際的機關，因爲第二國際極力反對希特勒政府所採取的方法；到後來，他曾說這次脫離第二國際的機關，乃是一種策略的作用，但這策略的作用仍是無效力的。到四月二十七日，社會民主黨又做繼續生存之新的嘗試，選出新的機關。後者公佈一篇議決案；照那裏面的決定，社會民主黨應在新的「合法的可能性」的範圍內，繼續活動。兩個星期後，在五月十日，戈林便不游移的指示出這種「合法的可能性」是什麼樣，估據了社會民主黨的黨機關和機關報。

雖然受了這種壓迫，社會民主黨仍是低首下心，甚至於五月十七日，在國會中贊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演說。在演說前，佛力克曾在領袖委員會威嚇大家說，如果政府得不到一致的贊成，則他不管各議員的性命，更不管關在收容所的社會黨人的性命了。

社會民主黨的大部份領袖，陸續出國。其他幾個，如塞維林及前任主席羅培（Töbe）等，則仍勇敢的留在德國，但也毫無政治的作用。在布拉格，成立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新機關。到六月二十二日，佛力克宣佈嚴禁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活動。各議會、各市議會的社會民主黨議員都受除名的處分，機關報則永遠禁止發行。大部份的被選者遭受拘禁，其中便有主席羅培。議員約翰斯忒林（Johannes Steilne）被暗殺。守「合法的可能性的範圍內」的社會民主黨也斷送了。

（二）中央黨 在某期間中，天主教的中央黨還自以為有在國民團結的政府內扮演角色的希望。其實，中央黨的領袖喀斯很早便判定這是無望的。反之，布魯寧還於五月六日，接受替代喀斯常選。他以為希特勒一向對他表示的實際的考慮可以實現。不久後，希特勒便使他覺悟了。六月十五日，希特勒在柏林召集國社黨各領袖，通知他們說革命仍在繼續進行中，他說：「到今天，國社主

義革命的動力性仍然支配德意志的進展啊！

這樣，他是發出信號了。六月二十二日，挺進隊在巴伐尼亞，奮擊巴伐尼亞人民黨的各領袖和各處機關，而且幽禁各份子，估據和沒收各機關。許多教士也被逮捕。巴伐尼亞之外的其它各邦的天主教議員，則遭受比較沒有這麼殘忍的待遇，但希特勒卻通知中央黨說後者再無存在的理由了。七月五日，中央黨機關自己宣告解散中央黨。

(三) 鋼盔團 爲壓服保守派的抵抗起見，國社黨向兩方面進攻，進攻的結果是：德意志國民黨被解散，爲挺進隊的對敵團體的鋼盔團被武力所鎮壓，而終於投降。鋼盔團的大部份領袖，對於塞爾德之加入希特勒內閣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表示不滿意的態度。這大部份領袖的爲首者是第二領袖杜斯忒堡。塞爾德原是缺乏任何強有力的意志，現在爲買好希特勒起見，便於四月二十六日，撤免杜斯忒堡。所假藉的理由，乃因爲杜斯忒堡的祖父是猶太人。到第二天，塞爾德加入國社黨，并在無線電廣播的演說中，通告鋼盔團是受希特勒的指揮了。

(四) 德意志國民黨 因爲鋼盔團脫離了，胡根堡失掉最必需的支柱，次長俾斯麥克 (VON

Bismarck)曾企圖創立一個名爲「德意志國民黨爭圍」的團體，以替代鋼盔團。因爲他之澈底的君主主義的觀念，俾斯麥克即於四月九日，被驅出政府。他企圖集合抱保守主張的青年，并使他們身穿綠色的襯衫，他甚至極力吸收從前左派政黨的份子。

但國社黨即刻採取反抗的行動。六月十四日，在多特蒙得 (Dortmund)，警察總監——從前爲挺進隊首領——發出進攻的信號，他下令取締爭圍的支部。到二十一日，在全德國境內，挺進隊大舉進攻。藉着警察的援助，他們佔據爭圍以及德意志國民黨的會所。兩方面都開槍射擊，甚且都有死亡。在一場熱烈爭論的內閣會議中，胡根堡作了無用的抗爭；他滿臉怒氣，離開會議室，並且命令立刻派一個專差到紐狄克進見興登堡總統。但後者卻被挺進隊的地方支隊所看守了。在全德國境內，德意志國民黨便開始自然的崩潰了。到六月二十七日，胡根堡下野，而希特勒則於二十八日，命令執行委員會的三委員解散德意志國民黨。

兩個星期後，內閣於七月十六日，頒佈取締組織新政黨的法律，裏面第一節是說：

「德國祇許有一個唯一的政黨：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

#### 四 國防軍各總督與挺進隊

如果我們不曾看到布倫堡將軍之想爲堅決不理政治的國防軍部長，則我們將完全不認識國防軍在國社黨政府內所扮演的角色。施萊轍已經過於藉他未曾實際利用的軍隊勢力來虛張聲勢。從他之不生光榮的失敗發生後，佩指揮刀的階級之弱點與政治上無定見，是揭發無遺，他們已經是談虎色變了。從此後，國防軍祇管它之軍事上的工作，并且嚴格服從它的最高領袖，這個領袖在今天還名爲興登堡，或許明天便名爲希特勒了。雖然對挺進隊嫉妬的維持它之唯一的軍事地位，它仍極力給與國社黨政府以後者所需要的威望。

七月二十三日的軍事法修正案，許各總督在遇着政治暴動的情事，得調動國防軍的武力。這一個步驟之真正的意義，乃爲保證希特勒可以對付挺進隊各首領之產生獨立的異志。因爲各總督總是希特勒的心腹，並且屬於黨的文人組織中。

希特勒的全副精神，是在限制挺進隊的勢力。在五月七日，他還答應什列斯威·好斯敦的挺

進隊說：「算賬的時期果然到了；我們要冷酷的實現我們的話，一步不放鬆。」在六月中間，我們會經聽到他仍然主張繼續革命工作。然而，經過兩星期後，他於七月二日，驟然間宣佈以最殘忍的手段，對付爆發第二次革命的企圖。

挺進隊一步一步的失掉它的地位。在五月九日，戈林已經嚴厲禁止各個警務官吏掛名於挺進隊，保護隊或鋼盔團，甚至禁止佩帶卍字臂章。在八月初，他甚至想解散警察別動隊。在七月十七日，愛勃總督得到希特勒所賦予的非常的全權，以取締羅姆所不能制止或不欲制止的挺進隊的過度行爲。這是等於直接抨擊羅姆了。

羅姆不是一個能忍痛吞聲的人物。正當希特勒於八月六日，在巴伐尼亞之奧柏沙斯堡（Oberaulberg）城，召集國社黨領袖大會時候，羅姆則召集全部柏林的挺進隊，約八萬二千人，集中於騰柏霍夫（Tempelhofer）講武場，向他們作一篇激烈的演說，裏面最熱烈的一點是：「凡認爲挺進隊的任務已經完成者，須自問是否承認我們應當站着不動，而且永遠不動。」這是等於宣戰了，不僅是針對戈林或愛勃這類人物，且也是針對經濟部長斯密特（Schmitt）或大實家提森這類



人物，後者們會希望排除經濟上搗亂份子的挺進隊，並且想將他們送去做工，使成爲無害的份子。

## 五 共和政治乎君主政治乎

到奧登堡死後，國社主義的政權要如何攫取老元帥所保留之剩餘的權柄呢？唯有希特勒，或許加上戈培爾，曉得。在希特勒登臺不久前，國會曾匆遽的通過一條法律，照這條法律的規定，設使總統忽然出缺，則由來比錫最高法院主席代理職務。然而，照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授與政府全權的法律的規定，元首不參加立法的工作，則元首的重要性已大見減削了。加之，七月十四日曾通過一條法律，許政府向人民徵求對某種辦法的意見，即使這種辦法須引起修訂憲法的結果。

這條法律是極重要的，因爲從此後政府可以詢問人民，是否再舉新總統，或則任命攝政。它可向人民提出羅森培最近出版的『二十世紀的神話』書中所提的計劃：『國家新創造人的任務，是在於組織一種人的聯合，即一種德意志人的階級，裏面份子爲在我們民族復興中曾作最有力的努力的人物……元首——總統，皇帝或國王——將由這個階級的會議選舉，或即在它的內部

的人物中選擇，元首的任期是終身的。」即是說，所需要的是一個選任終身的元首，或許即是選舉一個皇帝，雖然這個名稱是不很適合希特勒的觀念的。不管怎樣，法律准許希特勒向人民要求他所喜歡的事情——而人民也將作希特勒所喜歡的答覆。在這種情形下，保守黨的復辟，或再造霍亨索倫王朝的夢想，頓成泡影了。到今天，國社黨祇能接受會助它扶搖直上的人們。在這些人中，絕無舊皇室各王子的地位了。

## 第十九章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

### 一 國社黨之攫取工團

希特勒政府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它宣佈五月一日——勞動節的那天——爲國慶日，因此將社會民主黨在經歷十四年的共和政府中所不能實現的工人的和平，一下子實現了。這一個舉動實使工人階級產生一種非常的印象。在柏林，有一百萬以上的人聚集於騰柏霍夫講武場。

在他的演講中，希特勒宣稱，大家應泯滅對肉體勞動至今還存在的社會鄙視的成見：「你們尊重勞動罷，尊敬勞動者罷！」其實呢，這個好主意之感動勞動者本身，還不及感動資產者那麼深刻，勞動者所最注重的，是得到比較公道的報酬和享受比較多的餘暇。所以，這篇演說，總而言之，是躲避社會問題；這裏所關係的問題是飲食問題，而希特勒所唱社會尊重勞動的高調，或許簡簡單單

單是爲他個人收攬人心的高調，是不對題的。

可是，在這個國慶日之燦爛奪目的外表後面，而聚集了一批隊伍，準備炸毀各工團的會所。在五月二日早晨，在全德國境內，許多滿載挺進隊隊員的大汽車，停在各工會門前，佔據了這些工會的辦事室，拘捕了它們的各領袖。主持這番動作者爲雷伊博士，即國社黨組織部領袖。天主教的工會和中立的工會，都自願屈服。它們全部聯合起來，組成「德意志工人戰線」，其領導權即屬於雷伊博士。

## 二 農業政策

這是在胡根堡下臺後，希特勒纔能圓滿施行他的農業新政策。他任命瓦爾脫·達雷爲糧食部部长。

瓦爾脫·達雷生於一八九五年，像許多國社黨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德僑；他是出生於阿根廷。他到糧食部接任後幾天，拿騷（Nassau）的農民爲這個年僅三十八歲的青年，建立一塊龐大的

石紀念碑，上面刻了這個碑文：「紀念瓦爾脫達雷，拿騷感恩的同鄉農民立。」他本人也坦然作紀念碑揭幕的演說。在虛榮心上，他或許是超過戈培爾了。

爲使農民留在田間起見，達雷宣傳回土地去和保護農民階級。關係的原因，特別是保證在戰事發生中全國的糧食。達雷藉他所創製關於世襲農地與關於創立農民的世襲財產權的法律，想強迫農民永遠充當農民，即使是違反農民自己的意願。另一條制定於九月十六日的法律，許他有權決定農作面積的廣袤，決定耕種農產品的種類，直至於決定販賣的價格。

### 三 小商業政策

在新政體成立頭幾個月中，希特勒全副精神是在鞏固他的政權，而將經濟政策的指導權讓與胡根堡。在他於三月二十三日在國會所發表的演說裏，他曾承允極力鼓勵私人的創造和保護個人的財產。

當胡根堡仍然在位之日，國社黨人關於經濟問題上的政治活動，主要的是傾向於藉小企業

的組織而進攻。大商店與消費公司都受抵制，而被迫到破產的地步。牠們的經理是被送到收容所去，而堅要到被取締的商店購貨的人們，則受到無可想的恐怖手段的威脅。

到了這些強暴行為發生結果，許多商業機關，平常收容幾十萬職員，現在都走到破產的路上，希特勒於是否認他從前所作一切的許諾了。到七月初，國社黨人便被禁止繼續攻擊大商店，而兩星期後，消費公司也處於政府的保護下了。「改造中等階級」的問題，此後是再不提起了。

#### 四 希特勒之放棄理論的「統一指揮」

在那個時期中，發生了六月二十七日的大政潮，結果使胡根堡失掉他的部長位置。經濟部的繼任者為保險聯合會總經理孤爾特·斯密特博士 (Dr. Kurt Schmitt)，他是新近加入國社黨的。在三月五日，許多企業機關會從新抖起勇氣，並會希望局面復歸穩定。交易所中的行市有着一番強烈的上漲，便為這種情況之迅速的反應。但是，隨後又發生了悲苦的失望。外邦的敵視，尤其是從四月一日抵制猶太人後——我們隨後再講這個問題——益見確定，和政局之飄搖無定。

——即希特勒顯出無力制裁的挺進隊與各軍事團體之好戰的示威運動與放縱的行爲所造成的局面——使人心發生動搖，所以，交易所的行市便急轉直下了。斯密特博士之入閣，實表現在國社黨的經濟問題的領袖中實行一番總清理，和正式的放棄革命。

在一篇演說裏面，希特勒宣佈放棄革命，恰如列寧之宣告實行新經濟政策一樣。七月七日，他對應召的各總督說，革命並不是永久不變的狀態：「我們不應因爲一個良好的經濟專家還未成爲國社黨，而將他撤免，尤其是如果我們所要改任的國社黨人，對於經濟是完全不懂的。我們絕不是倚靠着理論的「統一指揮」(Gleichschaltungen)，便可以麵包給與工人，便可取消失業。這裏不需要理想的綱領，乃需要七百萬人的每天麵包。」

## 五 抵抗失業的鬭爭

在德國好幾省中，國社黨的領袖奮身投入「抵抗失業的鬭爭」裏，組織許多「戰線」爭前恐後的佔領「陣地」，資本家受了道德上的義務的強迫——這個道德上的義務是無底止的

而雇用工人，即使到了企業機關的狀態不許雇用新工人時候，資本家也非雇用不可。在東普魯士、蓬麥綸、西勒西亞各省中，各總督彼此對敵，每個人都想佔先宣告他的境內已不見一個失業者了。一部份的失業者是被雇爲卑溼區域的雇農，一部份助耕大面積的與中等面積的土地；在這地方，他們之被收容是不支工錢的，在某地方，他們是被視爲低廉的或甚至無報酬的手工，僅領取政府的金錢救濟。

在這種辦法之外，還成立「自願工作」制（到第二年便成爲強迫的了），在那裏面，三分之一的時間做工，三分之一的時間做運動，三分之一的時間做軍事練習。

總而言之，在一九三三這一年，抵抗失業的鬭爭，其結果是：使失業者作不十分生產的努力，所以是不十分得到報酬的；將生產的工作分配於數目更大的勞動者；在小部份的工作裏，有將舊失業業者與不曾得到救濟的新失業者作簡單的調換，後者是將工作讓與前者。

在國稅收入正在減少中（在一九三三年第二季，減少了七千一百二十萬馬克），戈培爾博士則於「抵抗飢寒」的大宣傳運動裏面，向私人經濟抽取了三百萬馬克。任何專制君王，都不能像



國社黨人那樣，大規模的組成強迫贈禮的制度。不過，國社黨應承認，在秋初，勞動的市場的狀態會發生變化，但卻不是整個的復興，而大家所切盼的經濟恢復景氣，卻不會產生。

## 六 猶太問題

當希特勒上臺時候，大部份德國人以爲他將放棄反猶太主義。但很快的大家便知道判斷錯誤了。在三月頭幾天，國社黨熱心的義勇隊已經開始拘禁和虐待猶太種的公民了。這種狂暴行爲的消息，曾引起國外輿論激烈的反響，因爲現在不是關於「馬克思主義者」的事件，而採取對付政治敵人的步驟，而卻是反對宗教上與種族上之少數民族了。因此，戈培爾提議採取對付國外的反抗之報復辦法，即以有組織的經濟的抵制剷除德國的猶太勢力。但比較明白的國社黨人，即如沙赫德，卻反對這個辦法。到最後的剎那，纔放棄杯葛政策；但是，大家已經不能將杯葛運動領袖斯特萊撒所已經着手的準備，完全停止。因此，杯葛運動便實行一天，即四月一日星期六那天。許多義勇兵看守猶太商店及醫生與律師的住宅的門口，禁阻顧客進去；在玻璃窗上和牌子上，都貼了

晉罵猶太人的通告。

到第二天，杯葛運動是停止了。反之，政府卻採取反對猶太的智識階級之合法的運動。希特勒向醫生代表團宣佈說，自由職業中應消除大批「異族」的執業醫生，不然的話，有人可以認為這些異族的醫生之智識優越的表現。四條重要的法律曾經頒佈出來，即四月七日之改組公務員的法律，四月十日之關於准許執行律師業務的法律，四月二十六日之限制德國各學校外籍學生的法律，及勞工部之規定醫生加入社會保險局的條例。

關於公務員的法律，宣稱說，凡非亞利安種的現任公務員全應免職，除非曾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前進機關服務，或於大戰中曾在前線作戰，或於大戰中曾失掉父親或兒子。凡在父母兩系之四個祖父母中，祇要一個不是亞利安種的，本人即不是亞利安種了。因為這個非常廣泛的條款，有一大批人都受法律的限制，而這些人尚且懷疑本身是否有一個非亞利安種的祖先呢。不久後，政府便禁止公務員娶非亞利安種的婦女。

同樣的規則，也適用於律師，藉以禁止猶太人執行律師的職業。同樣的，疾病保險局所雇用的

猶太種醫生，也漸漸不能執行他們的業務。但是關於將來利害關係之最重要的法律，乃為規定猶太種學生進學校的法律；平均算來，猶太種學生不得超過學生數目比例之百分之一·五。因為這個數額的規定，猶太人之受教育是幾乎不可能了。

可是，經久之後，最使德國猶太人的命運發生影響者，乃為對待他們之精神上的差別待遇之劃定，這種情形已經是將他們幽禁於一種「蓋托」的空氣中了。許多猶太人，因為怕受苦惱，除了出去工作或須不可避免的出門外，都不敢離開他們的住所。最多數的猶太人是想離開德國。但不幸他們的苦境恰與發生經濟恐慌的時代同時降臨，在經濟恐慌發生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收容新來的勞動者。在德國方面，有人估量移居國外的人數——裏面最大部份是猶太人——是到了三萬人。這個估計必定是在實際情形之下的。法國是收容了最多的德僑的，據牠的估計，在八月中，法國境內有四萬德僑。在收容德僑的國家裏面，已經有人提出抗議，反猶太運動或許也會擴展到這些國家。

在國社黨當權期中，猶太人運命好轉的希望是空想的。或許從取締猶太的律師和醫生的步

驟中，我們可以認爲不公道的競爭之一種手段。但種族的觀念已經生出新政府所有負責的人物所極端認真看的一種倫理觀念了。在本年春天，有一個外國極重要的外交家會拜訪希特勒，并會遇着後者可作不僅關於某一個题目的討論。反之，在猶太問題上，他卻遇到頑強的抵抗。這個外交家會問他說，他個人是否曾經認識了猶太人；希特勒回答道，他歷來幾乎不曾同猶太人來往，但在他少年時代，他曾一度從同寓的猶太汽車商人受了極不快的經驗。隨後，他便改談其它的問題，藉以表示他認爲討論猶太問題是無益的。

## 七 革命的暴行

在國社黨各領袖的演說中，我們常常聽到這一句話：即從來不見如一九三三年的「國民舉義」之那麼有訓練與少流血的革命。累次固持這種抗辯，便可證明這個話在輿論中的信用是很少的。希特勒有一句話是很著名的：「他不曾動猶太人一根頭髮。」在一次談話中，他曾承認他所發動的革命會犧牲了二十多人的生命。可是，持最厚顏的論調者則爲羅森培：直到現在，他於九月

二十五日對索厄維因 (Sauerwein) 說道，大家總以為社會革命必定連帶最野蠻的暴行的；德國居然不會產生這種現象，實使全世界感覺驚異。

本段祇談到世界所已經認識的強暴行為。我們祇將國社黨本身所不能否認的暴行，做一篇總表：即德國報紙所報告的暗殺政治敵人或猶太人的事件。照這個計算，從一月三十日到八月二十三，日，國社黨的敵人死了一百九十六個，至國社黨方面，則死了二十四個（在這個總數中，包括下面這些事件：有一個犯人在企圖逃獄中被殺死，有一個自己上吊，有一個趁人不注意中跳窗死了）。從三月五日，即有計劃的暗殺之開始，到八月二十三日，政府的敵人死了一百四十五名，國社黨則僅死了六名。

必定的，實際的數目是遠在官方口供的數目之上，而官方的數目，無論如何，也與希特勒所稱之總數二十不相符。所以，外省的報紙，甚至於國社黨的外省機關報，所登載之暗殺事件的消息，不會為各通訊社與各大報紙所轉載，而一百九十六個的總數，即是根據後者的記載而得到的。必然有許多死亡的數目，全不會登載出。即如在六月二十一日，挺進隊於柏林·哥布尼克 (Berlin-

Köpenick) 所鼓動的衝突中，至少死了七個人，而官方祇承認死了四個，其中兩個是義勇隊隊員。社會黨議員斯忒林之慘酷的暗殺案，用布包乘他的屍首，投到河裏，這個消息從來沒有在報上登出。曾經證實之在不蓋士外喜和在慕尼黑附近的達沙 (Dachau) 收容所中的死亡者消息，同樣是沈寂無聞的。

收容所的組織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囚人關在裏面。據官方的消息，在七月十一日那天，他們的總數是一萬八千人。在那個時候，這個數目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但到現在，它必定不是的確的了。不錯的，我們知道警察是有權隨意捕人的，無須將被捕者帶到法官面前。在各個收容所中，有些還負相當「好的」名譽。其他的，如慕尼黑附近之達沙收容所，柏林附近之奧拉連堡 (Oranienburg) 收容所，或北勒斯勞附近之杜爾哇 (Dürigoy) 收容所，至少在某期間中，成爲恐怖的地方的確的，在七月中，達沙收容所不能不用警察以代替國社黨義勇隊的看守者，而杜爾哇收容所不能不被裁撤了。

我們可以在這裏敘述一個絕對正確的事實，它雖然與死亡或重傷的情事無關，但可使最惡

劣的待遇成爲可准許的舉動。在七月中，有一批工人在柏林被捕，而帶到檢察官面前。檢察官便提出通常的問語。到快要結束時候，他問道：「你是共產黨黨員嗎？」如果被告答應說是的呢？法官便站起來，伸開他的手，打被告一嘴巴。在被捕者中，有好幾個婦女，其中有一個是六十一歲的年紀。法官也一樣的打這個老太婆一嘴巴。

## 八 德國與國際

本書前面已經闡明新生時代之國社主義的外交政策的理論。本節祇簡述國社黨上臺後的外交政策。

希特勒之遇到外國的不信任，實爲大家所可預料的，因爲直到這時候，不論他說什麼話，他所揭發的總是報復。但是，照例一個活動家，一到了登臺後，態度便顯然的穩重了。法國大使弗郎沙·龐塞（François-Poncet），於到國社黨的成功之下，曾作了法國政府與希特勒妥協辦法之基礎的判談。此外，希特勒之消滅共產黨，祇有使列強對他發生好感。

然而，四月一日之抵制猶太人，便將這種種情形完全破壞了。據國社黨人的意見，寰球的猶太人，靠着他的龐大勢力，實鼓勵全世界反對德國。其實，經過的情形是極其簡單的。在外國眼中，杯葛運動實爲國社黨不會放棄它的開始時代之最無道理的理論之明證。希特勒儘管自命有大政治家的才智，仍然以慘酷的手段實行他的反猶太計劃，則總有一天，也要堅決實行他的報復計劃了。——而在這兩種情形中，他的行動到底是照本人的主動，還是受徒衆的強迫，結果是無差別的。

三月十八日，墨索里尼曾在羅馬，當麥唐納（Macdonald）和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面前，提出在意、英、法、德各國間成立一種公約的基礎談判，即所謂四國公約，其目的爲修改凡爾賽條約。這個計劃之成功，即等於德國向前走上非常的一步。但英法兩國內部，反對希特勒政權的情緒，實有打斷這一切的希望之危險。爲試探對方的心意和廣播緩和的空氣起見，希特勒派巴本到羅馬，派羅森培到倫敦。羅森培以五月十日抵倫敦，但他之來到這個地方，引起極其野蠻的反對和極其激烈的意外事件，結果他這次遊英，在德國方面，可算爲整個的嚴重失敗，在他個人方面，可算爲特殊的嚴重失敗。從三月三十一日以來，國社黨內部會組織一個「外交局」，但直到現在，羅森



培終不能做到外交部部長，甚至於次長。

外國的態度是越來越險惡；於是希特勒於五月十七日召集國會，在國會裏面作了一篇演說。他於演說中力辯德國的居心是和平的。希特勒之說這個話，我們可以估量他是誠實的。然而，當他要求「與法國作最後的和確定的解釋」時候，他的態度也是誠實的。實則在希特勒腦中，這兩種意見事實上並不是互相柄鑿的；他反對帝國主義，但又認戰爭是必需的。新國家主義的戰爭，可以達到統治的狀態，而使正式的併吞成爲無用的了。日本并不吞併滿洲，是把牠「解放」而使牠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呢。

希特勒之和平的演說，絕不能阻止四國公約——終於七月十五日簽字——不至與當初的本意完全相反。在牠排除由四強國單獨討論修改條約之一切可能性的新形式下，四強公約祇有成就墨索里尼的名望，而不爲德國方面形成任何的進步。

爲賠償這次失敗起見，國社黨頑強的力爭干涉奧大利內政的權利。經過停頓好幾年後，希特勒主義運動突然在奧大利發展，並超過斯泰亨堡（Sturheimberg）親王所組織之鐵兜團的統

粹奧大利的法西斯底運動。德國已經與陶爾斐斯之資產階級的政府開始談判；談判的趨勢，似乎應有成功的希望，但希特勒派來的德國代表哈畢克特博士（Dr. Habicht）所持之無厭的要求，卻把談判的工作弄僵了。結果是雙方的關係發生緊張，有時竟至像宣戰前夜之尖銳的狀態。來到維也納遊歷的幾個德國部長被驅逐出境，奧大利的一個外交家在柏林被捕；德國的飛機飛到奧大利天空散放傳單，慕尼黑的無線電臺廣播反對陶爾斐斯總理之激烈的宣傳，奧大利的邊界事實上禁止德國遊客入境。

直到現在，這種政策的結果，絲毫不使德國產生快感。直到這時候，尤其是法國，極力維持奧大利的獨立；意大利也是注意維持奧大利的獨立的，不過暫時保持緘默的態度，到最後關頭，纔露出面目。在德國國內，大家寧願絕口不談這種缺望的事情，因為在其它的戰線上，尚期待意大利的援助。奧大利的變局，要強迫意大利明白的表示態度，或許恰是違反意大利自己的心意。在陶爾斐斯以八月底和墨索里尼在利西恩（Piccione）會談後，他宣布說，將在奧大利樹立做效法西斯底式的職團制的政府。或許國社黨在某種形式下，也參加奧大利的政權。然而，像德國從來是設法取

得意大利的援助的，意大利的勢力，雖然是比較不顯著的，將永為最重要的了。

眼前的德國政策之一般的趨向，是過和平的生活……直到和平停止那一天為止。牠並不喜歡看見停止和平這一天降臨，但牠先作準備，因為牠知道這一天是必不可免的。德國所特別要避免的，乃西線的戰事，因為在這方面，牠是不易成功的。無論是奪回亞爾薩斯，或是奪回南提羅爾，國社黨都不大想發生戰事；因為在這些戰線上，國社黨的精神上勢力卻碰到拉丁世界之鑽不進去的城垣。反之，在東方，則還有許多空閒的土地。希特勒和羅森培所作關於烏克蘭的計劃，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們的政策，是期待最後關頭的一刹那，到那時候，西部的蘇維埃領土和遠東的蘇維埃領土，將同樣發生重大的變遷。如果蘇俄是崩潰了——而希特勒是確信蘇俄總是一天崩潰的——則德國將得波蘭的同意與援助，以恢復東歐的秩序；那麼，牠將可以扮演公斷人的角色，而確定牠的統治權。做了東歐的主人翁的人，則也將做了中歐的主人翁。蘇俄方面，則極力打破這個危險的政策，將德國關閉於一大批不侵犯條約的網中，和法國重修友好的關係，和英國積極談判經濟的和平，並和美國談判，使牠承認蘇俄政府。

直到現在，德國的外交政策，不曾收穫了美滿的結果，而祇有知道了德國所抱的無窮希望的人，纔能了解這個外交政策。牠的出發點是下面這個信念：世界的現狀不能再長期維持下去了，在發生變化當中，德國祇有得到利益，因為牠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掉。這個想頭是的確的嗎？德國還可以失掉一點東西呢？牠的單位，實際上，德國的政策絕不傾向於和平，乃傾向於擾亂和平。或許，牠自以為能夠在擾亂後恢復秩序；但要下手動作，則牠非需要擾亂不可。彼此相形之下，蘇聯則已經加入為維持現狀而奮鬥的保守派列強中了。

在寄託他們的希望於將來下，德國社會黨人實採取了一種極其危險的政策，這個政策曾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為我們指示德國社會黨人是到了懸崖絕壁的邊際。不過德國固然在這一天的離開軍縮會議並且宣佈退出國際聯盟會，牠並沒有使局面嚴重化，為的是牠并不能進一步的有所作為。然而，在牠的極端為難的狀態下，德國社會黨便依賴牠最能應用的武器：宣傳。從日內瓦排闥走出來，希特勒曾放棄精細計算的一種幽默的動作。一方面，他喚起最切合英國人心理的公平待遇（Fair-play）的情緒；另一方面，他邀請法國直接同他妥協，即使同樣的英國心中發生恐慌。而且將

外交政策的方針交公民投票決定，他又可得到靠得住的勝利，因為，施行恐怖與宣傳的結果，大部份的德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是與他作同樣的思想。

在國社黨所使用之對內政策的方法與對外政策的方法中，有驚人的相符合的地方。國社黨之在德國上臺，是藉警告資產階級說，國社黨的崩潰即等於共產主義的勝利。現在牠在國際方面，也玩這套把戲，牠警告德國的各鄰邦說，如果希特勒上台，則鮑爾雪維克主義將進展到萊茵河，而且無疑的不久便要渡過河了。

德國宣告退出國際聯盟會之第二天，人民觀察報便提出這個新口號：希特勒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他之關切其它的國家，實強過於這些國家的指導者。在這種話裏面，實有離間外國人民與其政府的企圖，但在另一個企圖上，成功的希望是比較少，即離間各個政府的企圖。在國內的政治鬭爭中，國社黨是敵不過聯合起來的全部敵人的；但像後者是彼此互相對敵的，國社黨便成爲最強的了。在對外政策上，希特勒做同樣的打算。假定德國的敵人不能聯合成爲一個共同的戰線，則德國之不可撼動的精力，將壓倒各個分散的敵人了。加之，國社黨人預料，在不很久的將來裏，

法國因爲牠的國內政體之庸弱無能，將淪於第二等強國的行列；他們又預料到，在法國方面，和德國開戰的理想將逐漸成爲不可理會的了，到了那種情形，德國祇須提出一篇口頭的抗議，而不必倚靠其它方法，便可隨意撕毀各條約了。

將這種政策之烏托邦的雲霧揭開之後，我們便覺得希特勒是復歸會使威廉第二及其首相普羅（Briow）淪於失敗之地的同樣的方法了。不錯的，國社黨人之在國內可藉以成功的活動，是不能應用於國外的，因爲他們的敵人並不是德意志人。我的意思是說，外國人之超過我們德國人，並不是在空想上，而卻是在政治的明晰上。所以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終歸於失敗的。

## 第二十章 結論

### 崇拜英雄的民族

國社主義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目標呢？

這個目標並不會標明在二十五項的綱領中。它是在希特勒的腦中逐漸形成的，而隨希特勒之傳授於他的門徒而逐漸確定的，它即是使德國人成爲崇拜英雄的民族。

我們是說，崇拜英雄的民族，而不是說：英雄的民族。從這裏面產生曾經極其精細的研究的企圖，即是創造一個新的更純粹的模型種族，後者享受更廣大的權利，但同時也負擔更高超的義務。國社黨各領袖曾嘗試好幾條路徑以達到這個目標，希特勒則任經驗決定那一條路徑是最良好的，有一個事實是存在不變，並可引起各個公正的人的注意：即這個企圖，目的是在於從一個絕頂

特殊的民族中，用人工挖出一個領導階級，由這個領導階級以一個模型和一個單位給與這個民族。照國社主義的觀點，民族並不是每個都具有創造的發展之個人的一個集合體，但乃為供人忍耐的給他以一個模型的原料。受人陶冶的意志，自加剋制的精神：這便是德國國家主義的祕密所在了。

無疑間的，國社主義羣衆是感於一種單位的情緒，這為德意志民族一向極少領略到這麼濃厚程度的情緒：即是皈依一體的信仰，而這個信仰是壓倒各種利益的對立，能使東普魯士的雇農與來因蘭的葡萄業工人或與德國中部的化學業工人互相接近。

在未來的歲月中，希特勒的一切努力是趨於統制這個局面，即使他不能統制的話，他至少也要永遠支持這個局面。他之能夠壓倒敵人的優點，乃為他了解所有可向人類要求的東西是什麼。靠着這個柔軟的和有黏性的材料，像希特勒那樣的領袖便可以得到非常的成績。即使是因為飢荒的問題，他為什麼不能鼓動至少一部份的民衆呢？在某時期中，蘇俄便會這麼做到。

所以，國社主義政權或許可以維持下去，所倚靠的是澈底利用牠的勝利，極力掩飾牠的失敗，



而且在玩危險的把戲之下，將牠的希望寄託於世界經濟復興中。在著者寫出這幾行時候，希特勒可以穩得半數以上的選民的默許；但這批緘默的和小心謹慎的羣衆是不應與黨徒的狹隘小團體混爲一談，後者是極力使冷談的左右這一幫人趨於熱化。我們可以說，從三月五日後，希特勒獲得了一大批的信徒，這些人是經過冷靜的考慮後，纔以幸運給與希特勒，並且準備享受希特勒努力所得的收穫。固然，在相反方面說，希特勒舊部中之許多熱情者是感覺受騙了，但許多社會黨的份子和共產黨的份子，因他們的領袖投降而受摧殘後，現在則將他們的希望寄託於希特勒身上，這些人之歸附，大足以抵償上面的那個損失了。

國社黨現在已經做到使德國的政治生活之繁冗的和個別的形式成爲灰燼了。要使外國的讀者能夠明瞭國社主義運動，我們須指出鬪爭精神和熱烈的必勝的心志，爲國社主義運動之主要的特徵。必定的，讀者將感覺驚異，何以到了今天，對於德國的政治，有人還是除了以拚命鬪爭的形式，即裏面是手扼敵人的咽喉和刀刺敵人的額角的形式，以形容牠之外，不能作其它的想像。在最近幾年中，特別爲德國青年所歡迎的政治學的教材，乃加爾·斯密特教授的政治學的教材。照

這個教材所說，政治的定理，乃為友人與敵人之間的關係；牠故意的不知道外交的用處。凡要在德國於政治上獲取勝利者，須從事破壞。然而，我們應當承認，在今天，這種情形並不是德國的政治生活所獨有的。

經濟恐慌是不分彼此的而掃蕩世界各國，猶同死亡的對人生是無分彼此的。每個國家，都照自己國民的性格，而設法反抗這個恐慌。可是，在初期中，我們到處發覺了牠們取消了資產階級的生命某某種自由權，即智能所藉以發揮牠的創造能力的各種自由權。放任的時代，即在那時代，人們認每個創造必然是良好的，就使在幾個不同的創造中，存在着根本不相容的現象——這個時代祇有在德國是結束了。可是，我們希望這些黑暗的日子過去。是的，我們要確信——而我們確是如此的——衰落時代之真正的生產品之德意志國社主義不能獨存於衰落時代之後，而且我們不要忘記，在歷史的瞻望中，人生不過是一個極其短促的過程。

到那一天，權力主義也將失掉牠的光芒；朝氣蓬勃的人們起來，反對服從的理由。到那時候，羣衆的智慧突然明白了所有現在這些反對正理與邏輯的邪說，不過是那些渴望政權的野心家之

一種詭計，那些野心家是訓練人們以愚拙自誇，而使他們自己的工作變成容易的了。

這些活潑潑的人們之贊成水平化和均一化的熱烈情緒，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之情甘淪於不識不知之地步的歡心，是從那裏來的呢？這種分化個性的工作，不過是一種時代的表象，這個時代是滿意智慧之減退的。國社主義之將個人鎔化於國民的集合體裏面，實是在政治上做了與科學界之新的研究方法相等的工作。科學是改用了歸納法，後者是倚靠統計，由個別的觀察出發，而藉推論以設立假定的。同樣的，醫學的趨向，是藉觀察病人之全部的構造而確定了診斷法，而不靠觀察病人的病象。所以，在政治上與在科學上一樣，集合體是壓倒了個體。我們要解釋這種進化的現象，可以說牠是一種自衛的反應；各個國家都在自己的周圍纏繞一層厚繭，以抵抗由十九世紀中所實現之龐大的知識發展而產生之超出尋常範圍的問題與義務。這種作繭自縛的狀態，即法西主義與自然的定律將我們引到那裏面的狀態，根本是一種自衛的，非英雄主義的，犧牲的狀態，它是絕不像法西主義之引證維金（Viking）的詩中所粉飾的狀態。在這一點上，人們認識那裏面的矛盾嗎？人們認識那裏面的扯謊嗎？

這種撒謊乃是冒稱爲一種英雄主義的學說的撒謊，實則這個學說不過是逃兵的一種虛張的聲勢。國社主義者躲避進步之門，而逃入緊閉門戶的屋中，躲避個人的責任，而依賴所奉到的命令；放棄自由的動作，而採取服從的態度。這個學說是表現疑懼新的曙光、新的空氣和未知的宇宙，牠是渴望休憩的肉體對於不疲乏的精神之一種抗議。事實上，牠形成對於情感之過高的估量和對於理性之過低的估量，獎勵狹隘的精神而蔑視高超的德性，即是時代的特質之趨於陰性化的一種證據。或許，這個現象便是因爲在一切的国家裏，男性人口的精華是留在戰場中，這一個事實所產生的結果。

可是，我們不能否認，國社主義是天天運用廣大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力量。然而，這些力量不是用在一個目標上；牠們是倒過來摧殘他們本身；牠們使人民陷於分崩離析，而從來祇有推動自己前進。情形是一樣的，這個國家主義之出神的注視，眼光從來是朝向它自己，同樣的，它的行動從來是落到自己身上。滿意自己與自己立主意：這便是這個國家主義之領導人民的最好的力量所趨的方向了。在這個反猶太的大運動中，我們可於十三世紀中瀰漫歐洲的事情裏面，找出一個

先例：即鞭撻自己的人們。自動犧牲之病態的嗜好，是滿載於天天對挺進隊所作的演說中，帶着一種久已超過廉恥的範圍之外的無所顧慮的態度。這些人們以目空一切的慷慨情緒來談犧牲，好像是談體操的練習一樣。

在前後十四年中，國社主義武裝起來，以反抗一個虛無飄渺的勢力，並且在自己的周圍築了一座鋼山。這座鋼山現在滑動了，而壓碎了一個極微小的敵人。在德國的劇臺上，我們現在看到神話與政治相混合。譬如，在牆壁上面掛了許多古代創子手的利劍的戈林部長，或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政治家，但以象徵的面目而論，他是冠冕堂皇的代表着他的時代，他的主張，或許甚至於他的人民。無情的巨人和密德加德（Mithgard）的毒蛇，從北方的重霧中，現出可怕的面目，同樣的，法國的機關槍和英國戰艦的大炮，從世界大戰的重霧中，現出來，猶同猶太的毒物的觸角一樣。即因為對付這些觸角起見，國社主義造成一種戰爭的器械，後者是在國內的戰線上，繼續世界戰爭。在這個地方，德國人之睡遊的天才，終於找到了戰場，而在這戰場上，他看到了不戴面具的惡魔，後者不是穿着聯盟軍的軍裝的了。在這個地方，一切都是帶着適合於他之不羈的幻想的形式，在這個

地方，黨的同志都帶着英雄的面目，敵人則都帶着賣國賊的面目。在這個地方，他繼續他於一九一八年停止但又不會放棄的鬪爭；在這個地方，靠了精神的鬪爭，世界大戰的暴風雨可以繼續大發癡狂——因為在德國人的靈魂中，世界大戰是不死的。我們不要將國社主義認為歷史之偶然的事變和嚴重的錯誤，但須認為一種運命的嘗試，即德意志人民到最後祇有不是勝利便是消滅的結果之運命。戰敗者之反抗未死者之這個鬪爭，曾在德國延長了十四年之久，而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死人是——暫時的——戰勝生人了。

德意志的靈魂躲避過於慘酷的運命的兇光，躲到一種絕妙的英雄故事之仁慈的黑影裏面。最近，德國的戲臺會演了關於瑪倫（Marne）戰役的一劇。在戲臺上，大家看到了德國參謀部的軍官，站在滿插小旗的地圖前面，做了劇文的演說，這些演說是告訴觀客說，在那嚴重的一刹那，如果幾個軍官不會缺乏了毅力，則事實上德國軍隊是打勝仗了。德國軍隊裏面的專家們會對這個與事實不符的表演提出抗議。但結果不發生任何效力。一批廣大的民衆自願受編劇家的影響，以爲瑪倫戰役，「實在講來，」是一番德國的勝利，而有一個戲曲批評家便可以寫道：雖然是不適合

於歷史，但詩人的職務則爲創造一個神話。

一個神話嗎！

誰人向民衆說出真理呢？

在這個時候，真理、公道和自由，都一時感覺不快。但是，在這個試驗的期中，民衆或許知道鑒定他所已經失掉和將要失掉的東西。爲德意志民族着想，他還是從新爲爭回自由而長期奮鬥，不要使這個自由竟消滅於無用之中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

(32661)

漢譯世界名著德國社黨史一冊

*Histoire du National Socialisme*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onrad Heiden

譯述者 林孟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張



## 章淵若先生對於本書之介紹

研究政治學的，往往容易在有意或無意中，爲偏見所左右，致政治學的科學性，至今尙爲一般學者所置疑；所以一個真正的政治學者，如果要想確立並鞏固政治學的科學基礎；首先應當具備客觀的態度，與持平的精神。本書爲德儒 C. Heiden 氏原著，但據法文譯本的序者 Julien Benda 氏說：「德國社主義，其實可說是德國歷史上的一種常態。」可見德國國社主義的發生，初非偶然，而實有其歷史的淵源和時空的特性。Benda 氏又說：「據說當希特勒執政的時候，Heiden 氏原著，即被查禁，氏亦亡命出國。」可知此書立場，與希氏自撰的我之奮鬥，完全不同。商務印書館今以此書與我之奮鬥並列爲星期標準書，具徵該館客觀持平的精神。讀者倘能取希特勒所著我之奮鬥，同時參證，加以體會，則對於德國國社主義，當能有更深而更新的認識。